

目 录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1
中文版译序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概 念

第一章 领域:自我和性格	3
第二章 自我发展的阶段	12
第三章 人格理论中的发展概念	28
第四章 基本特征	52
第五章 可供选择的概念	66
第六章 最适生长和心理卫生	132

第二部分 方法论

第七章 智力的、心理性欲的和自我的发展	155
第八章 划定阶段和类型的问题	175
第九章 测量的问题和策略	196
第十章 结构模式的选择	235

第一部分 概 念

我们不知道自己住在河边，
还以为到了大海。
因为我们遇到的都是水，
田野上的鲜花也是一个证明。

美洲血根草轻叩神秘的源头，
直到我们看到水面的颤抖。
白天，在狂风暴雨下，它犹如钻石
装饰起来一般美丽，
当然，也引发了种种思绪。

心灵的范围如此宽广，
简直难以归于神授。
世界之大，而我们所知甚少。

——摘自克罗尔(Ernest Kroll)

《闭上眼睛》(*The Pauses of Eye*, 1955)

第一章 领域:自我和性格

几百年来,性格的个体差异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幼儿和青少年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也很早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但是,把这两个现象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连续的统一体,还只是近代的事。自我发展这一术语意味着性格发展的过程,意味着性格构成的历史,意味着在一个人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自我发展的能力的提高。本书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但本章却涉及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作些介绍。

这里,我想就“自我发展”这一术语提出些新的看法,但我不希望对这一术语重新下一个定义。虽然自我发展在道德发展这一伦理领域已有论述,但使用这一术语最广的却是和儿童心理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化问题。如同伦理学的许多方法一样,有关社会化的许多方法跟我们现在的讨论无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跟我们在第十章提到的方法无关。大多数儿童心理学家把社会化看作是特殊行为的训练;但我们的课题是性格结构。因而,它的发展被看作是结构的转化,看作是对认知要素的重要性的皮亚杰(J. Piaget,第三章)的影响这两者的系统阐述。皮亚杰的影响不仅可以从他的专著《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中感受到,甚至可以从他的认知发展的研究和结构主义的主张中感受到。我们有关自我发展的讨论包括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课题,例如道德发展、社会化、性格结构和认知的发展。此外,我们把这些课题

归入自我发展,以便为这一术语提供依据,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自我那样具有如此广阔的天地。

虽然我想用自我发展来涵盖上述这些课题,但事实上这一术语已经被完全不同于我的其他一些人,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运用。而且,许多人深信自我发展起源于精神分析学家,或者说是弗洛伊德创造了自我这一概念。其实,精神分析学家对 19 世纪自我心理学作出过有创见的反应,如果说弗洛伊德曾经使用过自我这一概念的话,那也仅仅是皮毛而已。弗洛伊德用德语 Ich(我)来表示 I(我)。同样是“自我”,但在 19 世纪的哲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却有各种用法:诸如“I”、“me”、“self”和“ego”都可以表示“自我”。有关自我发展的定义和用法,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这些定义和用法汇总起来,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但是,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证明处于现实世界的人们的任何东西。试图为自我发展下一个正规的定义,无疑是在这一课题上设置障碍,但是这也容易使人对下面这一概念产生误解,即自我发展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某种东西。

- 精神分析学家为自我发展至少提供了四种涵义,其中的一种涵义,即埃里克森(E. H. 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年代史,是完全适用于本书的。在精神分析学家中间,一个通用的方法[例如斯比策(R. A. Spitz),1959]是把发展限于阶段,只有在这些阶段中,自我才能获得存在。这种方法虽然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它剥夺了这一术语的应用,认为在自我形成期间,一个人无法把自我发展从心理性欲发展和智力发展中区分出来(第七章),甚至无法把自我发展从调节中区分出来(第六章)。

另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把自我发展归诸于在“自由冲突的自我领域”中的一切发展[哈特曼(Heinz Hartmann),1939]。至于那些充满了冲突内涵的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我们将在

第二章和第五章讨论。而且,我认为处理和承认内部冲突是区别高层次的自我的标志。

也许最常见的精神分析方法导源于这样一种自我概念,它为自我发展的许多功能和定义找到位置,包括这些功能的发展[贝拉克(L. Bellak)、赫维切(M. Hurvich)和吉迪曼(H. K. Gidman),1973]。这种方法与我的方法不一致:自我的功能(某些而不是全部)发展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有机的统一体是我的观点。弗洛伊德(1923)认为自我是一种组织。然而,不久,一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发现了“自我的综合功能”[纽伯格(H. Nunberg),1931],好像综合的功能是许多功能当中的一种,好像自我是一个有着许多谋略(自我功能)的小人。在我看来,组织或综合的功能不是自我以外的东西,它恰恰是自我本身(我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家运用自我发展这一术语是极不严密的,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涵义,包括埃里克森(1950)的有关心理社会发展的描述。在上述的一些涵义中,包括儿童心理的社会化,没有一种涵义能像我使用的概念那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自我发展是任何年龄群里个体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至少在青少年期是如此。

自我的概念和自我发展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中古时期”[雅斯贝尔斯(K. Jaspers),1948],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认识他们自己,而且在公元前800~200年之间已经出现各种或多或少独立的文化。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对卡里亚斯(Callias)说:“如果你的两个儿子仅仅是小马驹或小公牛,那么我们可以为他们雇用 一个训练者,让他们获得美和善,以及他们希望的一切;我们的训练者应该是一个骑手或牧民。但现在他们是人,你心目中有 没有合适的训练者呢?这个训练者能

理解一个人和一个公民应该是怎么样的吗?”

使一个人具备最好的本性的思想,至少在苏格拉底时代是存在的,而且这种思想是与从那些人类本性上活动着的力量(包括本能的内驱力和体验)中得到详尽阐述的人类本性的观点共存的。这种可供选择的观点的一个变式称之为“快乐原则”:人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愉快和最小限度的痛苦才活动的。边沁对人作为一个快乐的探究者的经典解释是:本性把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即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唯有这两个君主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将做什么。一方面,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另一方面,原因和结果的连锁,都系在它们的君主手里。他们指导我们做事、说话和思考:我们可能作出种种努力去摆脱我们的屈从,但这恰恰说明和证明我们在君主的统治之下。表面上一个人可能自称他不受君主的制约,但事实上他永远是臣民[(1789)1962,p.33]。按照边沁的观点,愉快仅仅在量上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强度、持续时间、发生的可能性、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斯金纳(B. F. Skinner)把这些差异称之为“强化时间表”。弹球游戏像诗歌一样,都能获得同样的愉快。

对边沁的回答是由穆勒(J. S. Mill)用随笔的形式写出的,如果稍做修改,它可以成为当代自我心理学的宣言。穆勒钦佩边沁的许多研究,他说边沁把细目法引入哲学:除非整体部分地得到解决,否则他是不会讨论整体的,除非把抽象观念化为某些东西,否则他是不会讨论抽象观念的。边沁对“模糊的概括”是不予考虑的,但是哲学家却没有运用他的方法来著书立说,正如穆勒指出的,他们忘记了这些模糊的概括包含着“整个无法分析的人类体验”[(1838)1962,p.94]。穆勒对边沁的贫乏的人性观提出了批评[(1838)1962,pp.99~101]:

边沁把人设想成是易受快乐和痛苦影响的,人的一切品行,部分是通过自我兴趣和利己情感的不同矫正受到影响的,部分是通过同情心或偶然对其他东西的厌恶受到影响的。边沁的人性概念到此为止……

一个人无法认识到他能够把追求精神上的完美作为一个目标;能够希望他们的性格遵奉美德标准,不希望迎合或害怕来自他内部意识之外其他根源的邪恶……

严格说来,他所忽视的——完美的愿望、赞许的或指责的意识的感受——不只是人性的道德方面;而且,作为人性的一个事实,他没能认识到为目标而去追求任何其他的思想。荣誉的观念和个人的尊严(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晋升和贬黜的感受);爱美,想成为艺术家;对秩序、和谐性、一致性、遵奉目标的爱好;对权力的爱好,这种权力不局限于对人的控制,而是抽象的权力,使我们的意志奏效的权力;对活动的爱好,渴望运动和活动,比起它的对立面闭门不出来,它以不影响人的生活为原则等等,人性的这些有力的成分都没有被认真考虑;而且,在边沁的一些著作里,我们发现,他从未承认这些成分有可能存在,因而也就得不出什么结论。人是最复杂的,可是在他的眼里却是非常简单的。 8

弗洛伊德在评论穆勒时说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脱离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用穆勒注意到的而边沁所忽略的人性的那些方面来构筑他的理论。弗洛伊德最初是根据出自本能内驱力的无意识动机和意识上能接受的自我标准之间的冲突结果来解释症状的起因的,这是一个同边沁的理念运算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弗洛伊德也强调过对快乐原则的看法。

19 世纪的哲学对自我的性质和功能做了大量的思索,但这些思索并没有集中在发展上。达尔文(C. Darwin)的进化论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去探究有关发展的许多课题。这样,尽管在 20 世纪早期,弗洛伊德有关心理性欲发展的兴趣与有些心理学家关于自我发展的兴趣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都源自进化论。例如,鲍德温(J. M. Baldwin)因为观点的变化(见第十一章),所以没有受到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

当精神分析学家起来反对自我心理学,反对弗洛伊德及其早期的精神分析的动力心理学时,新的自我心理学应运而生。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间,阿德勒(A. Adler)是第一个自我心理学的代言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在 1911 年关系破裂。像弗洛伊德和费伦齐(S. Ferenczi)那样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不否认自我的存在,但他们坚持认为自我产生于挫折和克制的内驱力。相反地,阿德勒力求把自我实现作为自我发展的动力。

阿德勒有关自卑情结、过渡代偿和男性抗议的早期思想已经渗入到一般的知识,但他后来的研究对我们的课题来说是更加典型和更加重要的。阿德勒始终强调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内驱力,包括性的内驱力,是从属于一个人的生活目的或意图的,从属于他的“主导虚构”(guiding fiction)。虚构的哲学概念最早是由法伊因格(H. Vaihinger, 1911)提出来的。虚构不是幻觉,而是在这个世界里指向一个人自身的预示图式;它们是主观的,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某些情形里是无意识的。阿德勒的“主导虚构”是把这一虚构的思想与生活的目的或意图结合起来,使之适合于发展的领域。按照阿德勒的观点,四五岁的孩子已经选择或构造了某些意图,其中只有部分是有意识的,它们指导着孩子的未来生活。

在阿德勒的晚年,他的最典型的一个概念是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他或多或少地把这一术语和“自己或自我、人格的完整性、个性、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关自我和生活问题的看法、生活态度、生活图式”[安斯巴赫(H. L. Ansbacher)和安斯巴赫(R. R. Ansbacher),1956,p. 174]等概念交替使用。在我们这本书里,这一概念近似于“自我”的意义。不久,阿德勒放弃了对神经症患者的追求优越。在正常人身上,他发现追求人的力量正在逐渐被社会兴趣所取代或指导,那就是希望人类幸福。阿德勒始终保留着自发追求的思想,并用创造性自我来表示这一观点。他写道,儿童是艺术家的图画。

我把阿德勒经过慎重考虑的一些概念用于课题,这些课题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相当重要的。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察觉和理解什么,在出生时已打上自我的印记。因此,这个人对于不受欢迎的或无法同化的意见已预先做好准备。他用这一术语来包括“倾向性统觉”(tendentious apperception)的思想。事实上,自我提供了构筑一个人的世界并在其内察觉这一世界的参照构架,自我还为借助投射技术来评价自我结构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见第九章)。阿德勒指出,心理学的理论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它至少部分是一个人的生活风格的一种功能。这就告诫我们,人们在理解自我发展时遇到的障碍,可能要比人们在面临弗洛伊德的动力无意识理论时遇到的障碍更大。 10

在本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回到自我心理学领域,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这些贡献不能归入动力心理学(见第十四章)。不过,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难以同化这些思想,无法强调它们的重要性,至少在今天是如此。把精神分析的动力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解自我心理学的框架,其不足已导致哈特曼及其同事、克里斯(E. Kris)和洛文斯坦(R. Loewenstein)去创导“新精神分析的自

我心理学”[遗憾的是,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例如布兰克(Blanck and Blanck,1974)把它简称为“自我心理学”,好像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东西。这种用法使得它不可能去描述精神分析的历史,也无法作出其他贡献]。然而,在假设自我领域的冲突时,他们抛弃了弗洛伊德早期研究的一个独特特征,即同样的原则支配着正常的和病理的现象。怎样把弗洛伊德的自我和动力心理学与一贯的范式结合起来,这是第十五章的课题。

至于美国心理学,在20~30年代是备受关注的,由于行为主义的出现,致使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和阿德勒派的自我心理学之间的差异黯然失色[希伯(D. O. Hebb),1960]。奥尔波特(G. W. Allport)是美国最早提及自我的心理学家之一,是全世界都尊重的一位心理学家。麦独孤(W. McDougall)把本能定义为有目的的行为。托尔曼(E. C. Tolman)甚至在动物心理学中也保留了认知的和目的的方法。在哲学领域,米德(G. H. Mead)为自我发展的理论作出过有意义的贡献,但这些贡献对心理学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自我发展方面,现今的兴趣有各种根源。当我们追求完整的理论体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动力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在解释行为时过于简单了。而且,犹如儿童教养中的治疗学和观念学一样,这两大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严格说来,尽管精神分析学家从未要求治疗从青少年犯罪到精神分裂症那样的问题,但一些热心的追随者却乐意运用精神分析法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这种过于延伸的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的失败,导致了自我发展的更新兴趣。最大的刺激也许来自两个因素:一是来自诸如性格缺陷、青少年犯罪和精神变态那些问题的社会意义,这些问题至少部分被看作是自我发展的问题;二是来自一个具有新概念的领域的理智挑战。

一个有关自我发展的充分实现了的当代概念应具有下面四个特征：第一，阶段是潜在的固定点，因此可以用来解释儿童和成人的类型。第二，阶段的概念是结构的；这就是说，阶段及其连续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见第三章）。第三，必须有特殊的测量

第二章 自我发展的阶段

13 自我发展是一种发展序列,又是在任何年龄群里个体差异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一描述并没有满足定义,因为智力年龄也可以做同样的描述。作为一种逻辑定义的替代,本章将对阶段进行印象主义的描述,把各种根源合并起来,就像我们在第五章要做的工作一样,然后通过经验主义的研究,提炼和修正这些根源,就像第九章所概述的那样。要想对每一阶段作出严密的或最终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方法论的思考将在第八章进行讨论。

14 对于一个最经常要问的问题——年龄与阶段一致吗?——我将不做回答。由于从一个特定的年龄中得出的平均阶段不同于从一个特定的阶段中得出的平均年龄,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如果描述儿童的一般的或平均的发展,那将滑入经典的儿童心理学的社会化研究,这与本书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原则上,我试图描述能够用于一系列年龄的每一个阶段(当然,假定最低的阶段不可能在幼儿期之后,最高的阶段不可能在儿童期甚至青春期)。我还试图描述每一阶段的人有共同的东西,而不管他们的年龄。这一试图还要求排除年龄特殊性的相倚(例如,“如果被试是一个小孩,这一行为模式意味着阶段 X,但是,如果他是 15 岁以上的人,那么该行为模式就不是意味着阶段 X”)。

在抽象地描述那些最低限度地参照诸如入学、青春发育期、恋爱、结婚等特殊的年龄要素的阶段时,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揭示的:过渡到一个特定的阶段的最早可能的年龄是什么?最晚可能的年龄是什么?最适宜的年龄是什么?当一个特定的过渡发生时,除年龄外,哪些条件是必要的?哪些条件虽然不是必要的但却是有利的?哪些条件妨碍或阻止了一个特定的过渡?看来,唯有不受年龄支配的一个概念才能允许提出这样一些比平均年龄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

与术语学相关的声明是:这些阶段将求助于名称或编码符号,而不是求助于数字。许多作者已经在计算他们的阶段。这种做法,当确定进一步的阶段时,不是导致术语走死胡同,就是武断地隔绝新的顿悟。这里提出的概念在我们从四点量表到十点量表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发展,而且我也并不排除进一步的发展。只有无知才会提出诸如“第三阶段”的说法。由于第一阶段能够作为一个阶段或两个阶段那样来计算,所以它可能意味着任何一个阶段,或者说,由于它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准备计算任何阶段。而且,我们称之为“过渡”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阶段”。即使这些困难可以通过一个固定的计算方案而被抽象地解决,其他一些困难就有可能把不同的计算方案归因于我们的阶段。

然而,通过名称来确定阶段可以避免计算阶段带来的困难,但它也有弱点。我不喜欢新概念,我曾借日常用语为每一阶段取名,这些名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作用或特征。在某一阶段,这些作用并不完全出现,而且在过渡到下一阶段时已经消失。冲动、自我保护、遵奉等等是或多或少可以用于每个人的术语。关于这些特征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与自我水平有关,但不同于自我水平的差异。阶段名称表明这些特征通常处在该阶段

的顶峰,但事实上它们与定义一个阶段的全部模式一样。一个通过阶段名称的刻板解释来推理自我发展的试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它也无法取代波兰尼(M. Polanyi, 1958, 1966)称之为“心照不宣的成分”(tacit component),心照不宣的成分不可能借助定义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误解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因为在尽可能清晰地表达时助长了谎言。

在这本书里,大写的字母将被用来区分阶段的名称和处在这些阶段中的人的类型。而对那些用来描述一般人的特征的文字,不管他是符合这一阶段的人还是其他阶段的人,我们都用小写字母来表示(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随意使用的编码符号,我也准备把它用于接下来要提到的阶段名称)。

阶段的描述

前社会阶段(Presocial Stages, 1-1)。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自我。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会把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形成“现实的构念”,认识到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客观世界。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是要达到客体永恒(object constancy)和客体守恒(conservation of objects)。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外在世界的自我。处在这一阶段的儿童,自我与无生命的客体世界是不分的,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求助于“我向思考”。

共生的阶段(Symbiotic Stage, 1-1)。甚至在儿童了解了客观世界的稳定性之后,他仍然认为他与他的母亲或生活中的一些玩具有着共生的关系[马勒(M. S. Mahler), 1968]。儿童从这种共生现象中,有意义地促进了把自己与非自己区分开来的过程。语言在加强儿童“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观念方面起着十分



21545737

重要的作用。但是,前社会阶段和共生阶段的残余,在后来的生活中看来并不是语言意义所能理解的,正像一切后来阶段的残余不是语言意义所能理解的一样。

冲动的阶段(Impulsive Stage, 1-2)。儿童的冲动有助于他证实他的独立的同一性。强调“不!”和后来的“让我来做”就是最好的证据。儿童的冲动起先是受到强制性制约的,后来还受到直接的奖励和惩罚的制约。惩罚是作为报复性来理解的。儿童对其他人的需要是强烈的,但属于要求的和依赖的;其他人是根据他们能够给儿童的东西而受到注视和评价的。儿童倾向于把人分成好人或坏人,但是这种划分不是作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判断,而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好或坏常常和“大方”或“小气”混淆起来,甚至与干净和整洁对肮脏和龌龊混淆起来,这使我们想起了费伦齐(1925)称之为“括约肌道德”的那种东西。儿童容易为身体的冲动所吸引,特别是在适当的年龄,容易为性和攻击的冲动所吸引。情绪可能是强烈的,但它们几乎是生理上的。在这一阶段,年长儿童表达他们情绪的词汇量是有限的,通常用一些诸如恼火、心烦意乱、厌倦、偏激、发怒、激动等词语。

在这一阶段,儿童的定向几乎都是现在,而不是过去或未来。如果他比较聪明的话,虽然他能够理解身体上的因果关系,但缺乏有关心理上的因果关系的观念。动机、原因、逻辑理由常常是混淆在一起的。

在冲动阶段待得时间过长的儿童可能被称作“无法控制的”或“难以纠正的”。他有可能使自己在某种场合而不是某种情境中常常看到烦恼,因而他通常会私奔或离家出走,迷信的思想也许是普遍的。

自我保护阶段(Self Protective Stage, Delta Δ)。当儿童学会了去期待直接的、短时的奖励和惩罚时,他们就会迈出自我保护 17

的第一步:自我控制冲动。起先,控制是脆弱的,需要监督和防卫,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自我保护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认识到存在规则,有些规则对冲动的儿童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有些规则则不。然而,儿童的主要规则是“不要挨打”。当儿童把规则用于自己的满足和利益时,为了控制前一阶段的冲动,来自外部的强制是必要的。

自我保护的人具有责备的概念,但他们是从其他人或情形等外部因素来理解责备的。有些孩子“感到苦恼”,因为他想躲闪“错误的人”。自我批评不是该阶段的特征。如果他承认对做错的事负有责任,那么他有可能从不应由他负主要责任的那些方面来责备自己,比如“我认为”或“我估计”。这种倾向可能有助于解释某些儿童具有的想象中的伙伴。挨打表明一种错误的行为。

小孩喜欢仪式是该阶段的一个方面。处在这一阶段的年长儿童或成人,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骗人的,并且在和别人相处时一心想到控制和利益。对这种人来说,生活不过是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游戏;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机会性的享乐主义色彩。工作被看作是繁重的负担,理想的生活应该具有大量的钱和好东西。

遵奉阶段(Conformist Stage, 1~3)。当儿童开始把他的幸福与群体(对年幼儿童来说通常是他的家庭,对年长儿童来说通常是同伴集体)同一在一起时,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使这一步发生或加强,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信任成分。生活在没有仇恨的环境中的儿童感觉到信赖。相反地,生活在诸如机会主义、私利、欺骗、受人奚落等自我保护过程中充满恶意看法的环境里,儿童就不可能成为遵奉者。也许这是一条或多或少永久的“以侵犯者自居”的道路[弗洛伊德(A. Freud), 1936]。

18
遵奉者就是按照规则行事,因为这些规则是群体采纳的规则,而不是因为儿童害怕惩罚。对儿童来说,不赞成是一种强有力的法令。他的道德准则是根据依从规则而不是根据后果(这些后果在更高的阶段是至关重要的)来把活动确定为正确的和错误的。遵奉者还没有把强制性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区分开来,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当儿童把奇装异服或头发样式谴责成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信号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此外,是有关成为遵奉者和赞成遵奉的问题,处在这一阶段的人倾向于把他自己和其他人看作是遵奉社会上许可的准则。他能够观察到群体差异,但对个体差异感觉迟钝。群体是根据显著的外部特征,诸如性别、年龄、种族、国家等来确定的。在群体内部,他把每个人都看作是一样的,至少他认为他们应该是一样的。心理测验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愿望:人应该是一样的,无论怎样,他们都是受到社会赞许的。遵奉者对于人和包括人在内的情境的看法在概念上是简单的,允许少量的偶联或异议。

当遵奉者喜欢和信赖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时,他就会狭窄地限定该群体,而拒绝任何一个外群体。界限特别倾向于对性别角色的概念抱有定型。通常,刻板的信奉产生于传统的群体,但同样的刻板信奉会使定型的标准产生于非传统的群体。遵奉和传统不是一码事。明显传统的人可能产生于任何一个自我水平(除了最低的水平之外),正像明显非传统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群体的标准可能是严格的遵奉者一样。

比起自我保护的人倾向于竞争来,遵奉者重视的是与其他人的友好、互惠和合作。但是,比起更高水平的人来,他是根据外表而不是根据感受来看待这些行为的。他是用一些平庸的措词来看待内部生活的,例如愉快、悲哀、高兴、有趣、伤心,以及爱

- 19 和理解等等。他获得的是一些陈词滥调,特别是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关心的是生活的外表,对外貌、社会承认和声望、物质材料等等感兴趣。归属使他感到安全。

自我意识水平:从遵奉到公正阶段的过渡(Self Aware Level: Transition from Conformist to Conscientious Stage, I 3/4)。由于从遵奉到公正阶段的过渡对我们社会的成年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形态的水平,因此这种过渡是最容易研究的过渡。问题是,不管它本身是一个阶段还是阶段之间的过渡,也不管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水平而不是一个阶段。在这一过渡水平,遵奉阶段的许多特征仍旧保持着;它可以被称作公正—遵奉水平。从理论意义上说,它仅仅是一种过渡,而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它好像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来自遵奉阶段的两个显著的差异,是自我意识水平有所增强,并且对情境中复杂的可能性的鉴别也有所增强。脱离遵奉阶段的一个因素是自我意识,虽然这种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与社会准则相当一致的程度。然而,对内部生活来说,这种发展的自我意识仍用陈词滥调来表达,通常是一些含糊的“感受”。这些感受典型地与下面这种情形有关,即把个体与其他人或群体联系起来,例如寂寞、窘迫、想象、自信,以及最常见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通过自我评价取代群体标准的一个前提,至于自我评价,那是下一个阶段的特征。

遵奉者生活在一个概念上简单、对每个人来说总是正确的世界里,但是在自我意识水平,这个人发现他可以选择了。异议和偶联也随之而来,虽然仍然根据年龄、性别、婚姻情况、种族等定型的和人口统计的归类方法,而不是根据特质和需要中的个体差异。意识到选择的异议,为下一阶段概念的复杂性铺平了道路。例如,在这一水平,一个人可能会说,除非人们结婚,不然

的话是不可能有孩子的。可是在下一个阶段,他们就更有可能会说,除非人们真的想要孩子,或者说除非父母真的彼此相爱,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有孩子的。

如果说遵奉者难以察觉特质中的个体差异,那么在公正阶段,人们就可能作出相当复杂的特质分类,而在这一过渡水平,人们能够典型地发现一种假特质的概念。假特质带有心情、准则或德行等性质,例如在男童子军宣誓时所说的那些东西。准则是最有趣的,因为它们揭示了这些概念的过渡性质,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正好处在遵奉者的群体定型和更高水平的人对个体差异的鉴别之间。

在这一水平,一个共同的特质是“女子气”(feminine),至少在女性中间是如此。对下面这些词来说,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涵义:消极的、诱人的、操纵的、自我陶醉的、审美的等等。这些选择接近于真正的特质术语,对下一个阶段来说,或者对公正阶段来说,它们是更加独特的概念。

公正阶段 (Conscientious Stage, 1-4)。确切地说,在公正阶段,一个人第一次发现了有赖于称之为良心的道德信号。一个处在冲动阶段的儿童要比高一阶段的儿童更容易给人贴标签,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但涵义是不清楚的,不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在自我保护阶段,责备的概念是明显的,但很少责备自己。在最低的水平,一个人偶尔也发现绝对自我拒绝,但这种自我拒绝并不是出自对活动或结果的责任观(自我拒绝可能产生于任何水平的压抑的人身上;对低的自我水平来说,这一特征所指的看来好像是相似的反应,而不是全部的压抑)。一个遵奉者如果违反了规则,他会感到内疚;而且,他是把活动分成正确的和错误的,而不是把人分成正确的和错误的。虽然自我批评不是遵奉者的特征,但人们可以说他有一种良心,因为他有内疚

感。在公正阶段，一个成年人良心的主要成分是存在的，它们包括长期的、自我评价的目标和理想、分化的自我批评、一系列责任心。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例如 13 岁或 14 岁的青少年，才能达到这一阶段。

- 21 规则的内化是在公正阶段完成的。自我保护者服从规则是为了逃避烦恼，遵奉者服从规则是因为群体支持这些规则，唯有公正阶段的人才真正是为了自己来评价和选择规则的。他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准则而不惜违背法律，我们可以在“公正的异议者”的情形里看到这一事实。因此，规则不是绝对的，这种非绝对性也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人；而且，异议和偶联是必须被承认的。处在这一阶段的人比起遵奉者来不大有可能因为违反规则而感到内疚，但是，如果他伤害了其他人，尽管这种行为可能符合规则，他反而会感到内疚。

在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犹如兄弟关系；他感到对别人负有责任，有时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他感到有责任去促成别人的生活，或者防止别人犯错误。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必然会发展到与此相关的优惠、正义和公正的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含有选择的意义，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公正者把他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

他渴望成就，相比之下，处在较低阶段的人感到工作是一种繁重的负担。不过，他也可能把某些工作看作是例行公事的、令人厌烦的和没有价值的。对他来说，成就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标准来测定的，而不像较低水平的人那样，主要是通过承认或竞争的优势来测定的。

这种独特的概念上的复杂性是在道德标准和社会方式之间，或者说是在道德的和审美的标准之间区分出来的。这些区分没有被划分成“正确的”和“错误的”。一个公正者是根据两极

来考虑问题的,他考虑的是极为复杂且又分化的两极:价值不大对重要性,爱对色欲,依赖性对独立性,内部生活对外部表面现象。

具有丰富的和分化的内部生活是公正者的一大特征。他不仅能体验到自己的内部活动,而且也能观察到其他人的各种认知上隐蔽的情感。他不是根据活动而是根据诸如特质和动机等模式来了解行为的。他对自己和他人的描述要比其他较低水平的人来得生动与真实。由于深刻理解了其他人的观点,人际关系成为可能。从其他人的观点中看出问题的能力,是在他的更为深刻的人际关系和他的更为成熟的良心之间形成的。对更为成熟的良心起作用的是长期的观察和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中探究问题的倾向;这些特征在更高的阶段上越发明显。 22

个体化水平:从公正向自主阶段的过渡 (Individualistic Level; Transition from Conscientious to Autonomous Stages, I-4/5)。从公正向自主阶段的过渡,是以个体观念的增强和情绪依赖的关心为标志的。依赖和独立的问题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问题。这一水平的特征是,人们能够意识到一种情绪的而不是纯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到一个人即使在失去身体上的或经济上的依赖时,他还可以作出对其他人的情绪上的依赖。为了超越公正阶段,一个人必须学会容忍自己和别人。这种容忍导致了对公正阶段的个体差异和复杂情形的认知。接着,不仅承认个体,而且爱护个体。这些就是自主阶段的标志。

随着一个人从遵奉阶段发展到公正阶段,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越发加强。但是,在个体化水平,这种人际关系部分被看作是与追求成就、对公正阶段的自己和他人过分道德主义和责任心相对抗的。道德主义开始被内部冲突的意识所取代。然而,在这一水平,诸如妇女婚姻和求职的冲突,有可能被看作为仅仅部

分是内部的。如果她的丈夫或社会是助人的和与人方便的,那么类似的需要就不可能引起冲突。冲突是人类的条件不到自主阶段不可能认识的一种成分。增强容忍异议和矛盾的能力,导致了更大的概念的复杂性,这可以通过对内部的现实和外表之间的差异,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之间的差异,以及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差异的认识表现出来。心理的因果关系和心理的发展,这些概念在公正阶段以下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只有在个体化水平的人身上才成为一种自然的方式。

自主阶段 (Autonomous Stage, I-5)。自主阶段的一个独特标志是承认和处理内部冲突的能力,也就是说,承认和处理冲突的需要、冲突的责任心,以及需要和责任心之间的冲突。也许,比起其他人来,自主阶段的人并没有更多的冲突;问题在于,自主的人有勇气去承认和处理冲突,而不是回避它或者把它投射到环境。如果说公正阶段的人是根据相反的两极来解释世界的,那么自主阶段的人已部分超出这些极性,把现实看作是复杂的和多面的。他能够联系和结合在较低阶段进行选择时难以达到一致的思想;对不同的意见能高度容忍[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 (E. Frenkel - Brunswik), 1949]。概念的复杂性是自主阶段和整合阶段的一个显著的信号。

自主阶段之所以这样被称呼,部分是因为这个人承认其他人对自主的需要,部分是因为它是以个人摆脱前一阶段的良心的束缚为标志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可能是允许孩子犯错误。然而,自主的人典型地承认自主的局限性,即情绪的相互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他将把爱护人的关系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价值。

公正阶段的人意识到他人具有动机,自主阶段的人意识到他自己和其他人具有动机,这些动机是作为过去体验的一种结

果而得到发展的。在发展中,兴趣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因果更加复杂。自我实现成为一种经常的目标,部分地取代了成就。在这一阶段,许多人有着角色或职责的概念,认识到他们在不同的角色或职责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种认识具有不同的需求。处在这一阶段的人能够生动地、透彻地表达他的感受,包括肉体方面 26 的体验、强烈的悲痛、存在主义的幽默(这种幽默存在于生活异议的内部)。性的关系作为相互关系中的一种生理体验得到欣赏,有时被采纳。自主的人把他的生活观作为一个整体,他渴望现实地客观地看待他自己和其他人。他持有广义的、抽象的社会理想,例如正义。

整合阶段(Integrated Stage, 1-6)。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阶段称作整合,意指一个人超越了自主阶段的冲突。就各种理由来说,整合阶段是最难描述的阶段,因为它十分罕见,人们难以发现研究的实例。而且,心理学家要想研究这一阶段,他必须承认他的局限性是理解整合阶段的一个潜在的障碍,因为研究这个最高的阶段有可能已经超出他的能力,是他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在极大的程度上,自主阶段的描述已经包含整合阶段。一个新的成分是同一性观念的加强。也许,对这一阶段的最好描述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见第六章)。

根据最低阶段和最高阶段的描述,试图把自我发展的整个序列迭在一起,是难以达到我们要说明的主要精神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从一个低水平到另一个高水平的联结实现的,其中有许多路站,它们作为生活的阶段和概念的阐述都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最高的阶段,只有展开的新的可能性。

结 论

27 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冲动的控制、性格、人际关系、有意识的定型、认知的复杂性等变化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表1是对上面讨论过的内容进行的简化。不要以为表中呈现的内容是自我发展的四个独立的方面。它仅仅是一个方面。四个描述的纵行表明一个连续进程的四个方面,至少是为概念安排的。有些作者也曾描述过这些方面,但他们主要强调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见第五章)。大多数人在他们的评论中也曾意指过其他一些方面,但详略程度各不相同。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商定一个自我发展的定义呢?学者们不可能被迫去宣布他们的差异,也不可能通过一个从性质上来说是高级的或合法的委员会来获得一个概念。通常,这些差异是通过经验主义的研究得到解决的。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有许多方法上的困难,这种研究还是问世了。但是,这种研究却没有认识到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分别测量表1中呈现的四个方面,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借以证明它们是一个连续过程中的四个方面。测量自我发展的问题,以及在一般的描述和个别实例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进行讨论。

有关这四个方面的讨论揭示了一个理由,即它可以被称作自我的发展,而不是道德的发展、认知复杂性的发展,或人际关系的能力的发展,但所有这些发展都涉及到。它所包含的如此广泛的领域并不比自我少。

表 1 自我发展的简化表

阶段	编号	冲动的控制, 性格发展	人际风格	有意义的定型	认知风格
前社会的			我向思考		
共生的	I-1		共生的	自我对非自我	
冲动的	I-2	冲动的,害怕 报复	接受,依 赖,私利	身体感受,特 别是性和攻击	成见,概念 混淆
自我保护	△	害怕挨打,从 外因看责备, 机会主义	谨慎,操 纵,私利	自我保护,苦 恼,希望,物 质,利益,控制	
遵奉	I-3	遵奉外部规 则,怕难为 情,违反规则 会感到内疚	归属感, 表面的友 好	外表,社会的 接受能力,平 庸的感受,行 为	概念简单, 成见,陈词 滥调
公正—遵奉	I-3/4	规则的分化, 目标	意识到与 群体有关 的自我, 帮助人	调节,问题,理 由,机会主义 (模糊)	复杂性
公正	I-4	自我评价标 准,自我批 评,有内疚 感,长期的目 标和理想	细致,责 任心,互 惠,热心 交际	分化的感觉, 行为动机,自 我尊重,成就, 特质,表达	概念的复 杂性,模式 的思想
个体化	I-4/5	加上:尊重个 体	加上:作 为一种情 绪问题的 依赖	加上:发展,社 会问题,内部 生活和外部生 活的分化	加上:过程 和结果的 区分

阶段	编号	冲动的控制, 性格发展	人际风格	有意义的定型	认知风格
自主	I-5	加上:处理内部需要的冲突、容忍	加上:尊重自主,相互依赖	生动地表达感受,生理和心理的整合,行为的心理原因,角色概念,自我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	概念复杂性增强,复杂的模式,容忍不同的观点,广泛的范围,客观性
整合	I-6	加上:调节内部冲突,放弃做不到的事情和念头	加上:爱护个体	加上:同一性	

有些批评家声称,对自我发展的阶段描述作如此的排列,是对社会的价值结构的一种文饰作用。这种批评并没有得到支持。所有的社会都是建立在遵奉和个体的价值遵奉基础上的。正如人们由于无法控制的冲动而不能遵奉一样,或者说由于机会主义和自我兴趣而选择不遵奉一样,人们是通过受到来自社会的严厉惩罚的良心来推动不遵奉的。看来,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自我保护水平。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在实施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游戏,也许,没有一种政权能够幸免于此。

28 另一种批评是,自我发展的阶段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愿来排列的。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自我发展的阶段在许多作者中间得到实际的认可,而且,还有其他一些证据也支持了这种排列。当我独自撰写这一章时,阶段的排列来自我和我的同事密切合作的研究[卢文格和韦斯勒(R. Wessler),1970]。人们之间的相互批评(他们具有不同的背景和倾向,其中有许多

人是熟练的临床医生),有助于抛弃人的特质概念。柯尔伯格(L. Kohlberg, 1971)曾经详细地回答了有关他的研究的一个相似的批评。

有些人认为,社会应该赞成排列,这些排列将导致更多的人把阶段置于遵奉之上。他们提出,社会应当奖励公正和自主的人,正如它现在奖励遵奉者和机会主义者一样。但是这种建议是谬论,或者说导致谬论。公正阶段的实质在于,它至少部分地摆脱了社会强加的奖励和惩罚。怎样才能使一个人操纵奖励,以便他不受奖励的影响呢?实际上,这是每一个渴望促进道德发展的父母或教师都面临的问题。人们怎样把他自己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发展的一门主要技术,是把我们引向我们的主观世界的一门诱人的技术。

当人们把发展的序列仅仅理解成不是我的价值就是社会的价值时,这样的批评是得不到支持的。在这些批评的后面存在两个问题:决定发展方向的是什么?我们怎样发现序列?我们将根据各种观点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与人格有关的发展概念。

第三章 人格理论中的发展概念

- 29 本章所提及的自我发展理论是对发展的一种特殊理解,它建立在有机体的隐喻和把结构作为一种关键概念的基础之上。在过去的 30 年间,有机体的发展概念已经得到充分的解释,主要归功于沃纳(H. Werner)和皮亚杰。而且,这些概念不断得到承认,特别在认知过程的研究方面尤为如此。用于发展心理学的结构方法是本章要涉及的。本章的第一部分分析发展的结构概念,并把它与另一些有赖于经验主义者的科学观点和人们的机械主义观点的发展概念相比较,至于后者,它是了解当前发展心理学的人们非常熟悉的领域。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发展的结构概念在从认知领域转向人格领域时有哪些局限性。有机体的隐喻在起因上是生物学的,而结构的概念,正如它在认知领域已经被运用的那样,从本质上说是形式的,它强调客体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不是客体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的内容。扎根于生物学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才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独特的人类呢?用于理解形式逻辑的结构概念,在何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理解人格?
- 30

在人格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方面抵抗着结构的论述,它们自我意识和自由体验,两者都包含在我们的自我发展的概念之中。当我们在理解人类的发展时,如果有机体的隐喻是靠机器的隐喻而取得显著进步的话,那么、至少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被忽视了,如果我们光是看到结果的话,那就有可能陷入还原论的

僵局。

发展和变化

发展是一种变化。发展和变化这两个概念同时发生,而且含有连续和稳定的成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每一种变化都是发展呢?乍一看,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多大价值;然而,它的解决却关系到相反的理论 and 哲学立场。而且,作为一种自主训练的发展心理学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却集中在这一区分上。对当前的争论来说,必要的假定是,语言的运用有损于对现实的理解,并且与此相一致。因此,语言的区分并不是变幻莫测或专断任意的,而是反映了现实的差异。

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不可能被交替使用的。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纯空间的变化:一个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不是同一的;然而,我们并没有提及发展。空间的变化是纯粹外部的,以至于不能允许我们去这样做。这种限制也同样适用于有着外部关系的非空间的变化,例如,社会性质的关系。当一个妇女有了第一个孩子时,她的母亲就成了外祖母。同理,我们不可能说她有了发展。看来,发展这一术语仅仅涉及到内部的变化。内部这一形容词比较含糊,需要给予说明和理解,但它指出了变化之间的差异,这些变化是指发展而不是其他。

不是所有的内部变化都可以称作发展。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诸如视觉适应、新陈代谢、月经过程等生理上的变化。在这些例子中,一系列事件发生在个体内部,目的是重建因为外部的或内部的因素而扰乱了的有机体的正常平衡。这一序列的最终结果

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这里,有机体和他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发展。在这些例子中,变化的可逆性跟另一个发展的重要成分并不相符,也就是说,跟稳定的和持久的程度不符。这第二个特征看来好像与第一个特征一样难以解释。绝对的稳定性将阻碍发展。在绝对的稳定性和可逆性之间,我们承认有一个代表发展的领域。

那么,能不能说所有内部的且又相对稳定的变化都可以称作“发展”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一个3岁的孩子被教会去说“ $3 \times 6 = 18$ ”。假定这一内部变化(显然,它是一种变化)也是持久的,应当归功于灵巧的强化时间表。那么,这是发展的变化吗?比起上述的例子来,这里的意见更有分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认为儿童有了发展,因为他并不“理解”乘法的意义。我们同意这样的判断,至少可以作为一种研究的假定。现在,我们就来阐述一下它的效度以及相反观点的价值(这两个相反观点是:机械学习是发展的开始——机械学习的积累并不等于理解)。

32 这个3岁孩子在学习乘法过程中并没有发展,因为他不“理解”乘法的意义。诚然,有意义的理解对发展来说不是必要的。人们在不理解他们的发展,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发展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发展。这里,理解意味着把问题的对象与系统联系起来,并考虑整个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对象。理解“ $3 \times 6 = 18$ ”意味着认识到为什么这种等于是正确的,能弄懂它的意义或它的必然性。它意味着认识到,至少在原则上认识到,这种陈述相当于“ $3 + 3 + 3 + 3 + 3 + 3 = 18$ ”,因而也同时认识到“ $6 \times 3 = 18$ ”,“ $18 \div 3 = 6$ ”以及“ $18 \div 6 = 3$ ”。它意味着把等值与计算方法联系起来的能力,并且从构成这种方法的法则观点中来考虑此类问题。

这个3岁孩子在学习乘法描述的过程中没有发展,因为这

种变化并不在于导致新方法或新结构的获得。儿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了这种陈述;他还没有学会这种陈述的其他方面。但他不是从数学的结构上来理解这种陈述的。对他来说,“ $3 \times 6 = 18$ ”不过是获得奖励的一种手段。他理解惩罚和奖励;他有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需要的满足以及他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联系起来的。在这个孩子的例子中,发展存在于从旧的惩罚—奖励的方法到新数学的方法的运作之中。发展是由一种新结构的获得或从一种旧结构向一种新结构的转化组成的。

结构和有机体

结构及其相似的术语(系统、模式、图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被运用,从建筑学到生物学,从管理学到诗歌,都在运用结构。它们总是包含着:(1)有许多要素或成分;(2)这些要素不是简单地集合在一起的,像一大堆石头那样,而是彼此联系,以至于形成一个合理的序列。这些联系的性质可以是空间的、时间的、原因的,也可以是其他别的东西,但是在每一种情形里,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组成的。这些联系提供了一个统一体,并赋予每种要素以意义,使其成为整体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当基本的联系发生变化时,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 33 像格式塔心理学反复证实的那样,所有的要素(成分)可能发生变化,而结构不变。当我们按动一个新键时,音调可以不变;当我们运用不同的材料时,建筑结构可以一样。

简言之,结构是由联系或关系来确定的,是由不依赖于要素的基本法则规定的。我们的那个3岁孩子可能具有数字的言语要素;他也许会含糊地计数,但他的能力却无法为他提供数字结

构。上述的结论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

结构不只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它们还表现出平衡性,即达到某种内部的平衡。要素之间的联系可以在一大堆石头中发现,但它们是碰巧在那里的。它们可能是不同的,我们并不感到惊奇。石头的性质,或者说任何一堆特殊的石头的性质,并不需要一定的排列或次序。需要意味着平衡,意味着从一大堆石头中区分出一个结构。在知觉领域,格式塔心理学通过“良好图形”(good form)和“简洁倾向”[pragnanz(pregnancy)]提出了同样的现象,即强调完整、自然、结构和稳定性。圆是一种形状,我们倾向于知觉圆的形状,即便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状并不很圆时,我们仍然会把它知觉成圆。例如,当圆的形状仅仅是近似的、缺口的和不完善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把它看作是完整的和完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平衡在科学理论、小说、心理个案史等方面是被公认的[波兰尼(M. Polanyi), 1958]。在每一种情形里,我们认识到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的各个要素,弄懂它们的意思,然后理解它们。结构的平衡有赖于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获得,也就是说,有赖于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规则。平衡注重结构的“自然性”,因而,它倾向于抵制变化,或者说,倾向于保持和恢复原先的状态。

34 这一思索的结果把我们引入有机体的概念。一个有机体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有生气的结构,包括与环境的积极交往。这一理解虽然过于简单,但它在强调发展的某些问题上是有用的。一件雕塑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在环境中存在,然而,它要作为一种结构持续下去,则应视环境而定。事实上,这里存在一种观念,即雕塑品是“接触”(exposed)环境的,受到环境事件的“影响”。如果环境不需要这件雕塑品继续存在,则它只好被动地容

忍外部的要素,直到自行消亡为止。相比之下,一个有机体,例如一种植物或一种昆虫,则要利用环境,以便使它的结构得以生存,并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武装自己。

这种积极的交互具有两个主要的形式:一方面,有机体为它们选择环境,另一方面,它们具有可塑性,以适应不同环境的各种要求。这两个特征是有机体的活动结果;它们是结构决定了选择方向和范围,也决定了可塑性的可能形式。环境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这对一切有机体来说都是如此。对有机体来说,环境不过是一种令它敏感和为它所用的东西,并且是由它的内部平衡的基本法则所决定的。

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可塑性对生存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由于有机体依赖环境,由于环境是可变的,所以有机体需要调节和适应,以使用一种新的反应来取代业已成功的反应,乍一看,这些反应是不同的,其实,它们出自同样的器官结构,用同样的平衡规律来表达。有机体的内部平衡是一种动力平衡。正如皮亚杰所指出的,可塑性的程度可能是有机体发展的一个指标,是有机体在进化等级上完善程度的一个指标。

选择和可塑[皮亚杰的术语是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产生于有机体的结构特征,导致了有机体的稳定性,导致了有机体结构特征的永久性。有机体的第一倾向是生存、保持原样、反对激烈的变化。然而,有机体的这种稳定性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结构的变化(按照我们的定义,这里是指发展)可能有赖于内部的,甚至遗传的过程。有时,它们可能有赖于环境的压力。当有机体的反应范围不足以应付特殊的环境时,有机体要么是死,要么是改变它的结构法则,以便迎合环境的要求。在心理的发展过程中,选择很少走向极端。这里,改变有机体结构的动力是由满足机体适当需要的愿望(诸如使自己

变得更有能力,更能充分地把握世界等愿望)和相应的动机来提供的。然而,这些动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并且存在于结构和环境之间匹配和不匹配的相互作用之中。

把发展解释成有机体结构法则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另外两个特征:内在性和稳定性。内在性并不意味着内部与外部的对立,它取决于结构的联系法则。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内在的,它受到法则的支配,并且表达这些法则。同样,有机体的概念阐明了永久性的性质和局限性,这种永久性归因于发展的变化。有机体的内部平衡隐含着自我保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机体对环境的开放和它的有限的可塑性排除了绝对的永久性。

生物有机体的概念是我们的一种指导性隐喻,不是因为唯有生物有机体才能发展,而是因为发展的最终解释是生物学的。

右生合胎性物故半因姓红,可以方名种及石上地外,出 何如左略

隐喻比较含蓄,例如成熟理论,而在其他一些时候,这种隐喻则提供了清晰而又明确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例如沃纳和皮亚杰的观点。然而,整体上看,这个在心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隐喻是机械的。这两种隐喻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的基础[里斯(H. W. Reese)和奥弗顿(W. F. Overton), 1970]。

机械主义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人的心理(不是身体而是大脑)犹如一块白板(*tabula rasa*)、一张白纸,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它对自身变化的贡献在于它的准备和接受状态。第二,人的心理只有在它的全部状态能够被刺激单位的总和完全描述时,才能受到基本感觉的影响。机械主义对什么是单位或要素(即成分)做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但是,在他们看来,整体好像是相反的观点。最终一个机械主义的假设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累积的联想和要素之间联想的“系统”以或多或少稳定的方式变化着的。联想的产生是由外部条件、事件的重现模式、强化等决定的。

当有机体积极地选择他的环境,并解释他所选择的东西时,他的这种机械的见解(空洞的和接受的)基本上是被动的。就像一部照相机那样,“摄入”眼睛所看到的東西。与其说是有机体解释了环境,倒不如说是环境解释了机械的头脑。

在这两个观点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在于理解的根源。³⁷假定人类试图理解世界,假定他们把系统的理解聚集起来是科学的任务,那么人们仍然会问:他试图理解的是什么?他把他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在那里能够被理解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把心理是什么,把心理最终经历的变化在于外部刺激等等作为全部理由的话,那么理解的根源仅仅在心灵之外,在于外部条件之间的联系。理解仅仅意味着建立因果联系:只要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引发了心理,我们也就理解了心理。

如果理解的根源在于内部,在于组成结构的联系,在于不受环境条件支配的那些东西,那么情境就会完全不同。在机械的观点和机体的观点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只要根据内部平衡就可以被抓住。机械的观点并不否认头脑中联系的存在;联想毕竟是联系。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例如,伯利纳(D. E. Berlyne), 1965],它甚至可以假定,有些联系可能是复杂的,并且按照等级或层次的方式进行排列。但是,除了环境刺激的历史外,它说不清为什么是这些联系而不是其他一些联系。联系好像是碰巧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就像在一大堆石头中间存在一样。在人格和发展的联系中,这一观点已经由米歇尔(W. Mischel, 1969)做了详尽的阐述。与机械的方法不同,机体的概念(联系的复杂性)是由完全不同于机械方法的基本的平衡法则组成的。

基本的结构法则来自何方、如何获得,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发展。然而理解早在组成结构的时候已经出现。真正的理解是在发现复杂现象的基本法则或原则时获得的。因此,不能把皮亚杰的理论看作是基本上描述性的,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构的法则和它们的连续性上,而几乎完全不顾结构发展的条件。同样,在我们这本书里,自我发展的概念也仅仅围绕基本的结构或每一阶段的一定意义,而不考虑社会阶层、家庭经历以及类似的外部因素等联系网络;而且,也正是为了这一缘故,我们不准备局限在描述上。

机械观点和机体观点之间的第三个差别在于变化的连续性,即结构之间的序列。乍一看,机械的观点把发展看作是一个匀称的、连续的变化过程,而机体的观点把发展看作是一系列激变,并且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当我们深入一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在连续的机械变化的背后,事实上是缺乏序列的,而表

面看来是非连续性的机体发展,事实上却有着深刻的连续。当所有的联结能够获得时,当心理的状态是由这些联结的总和组成时,发展在原则上能够被描述为非联结成分的增加。那个学习乘法等值而又不理解乘法的3岁孩子正在发展,每当他获得新的等值时,发展是在继续的。但问题是,他正在获得的东西和他目前的心理状态并不影响他的变化方向。依靠环境的条件,他可能获得这个等值或那个等值,也可能失去他所获得的东西,“回复”到原先状态。对那些持有机体观点的心理学家来说,一个经常性的练习首先在于通过操纵环境来改变儿童,随后通过改变条件反射的情境把儿童带回到他的原先状态,尽管表面上看来这个儿童是在发展。

然而,如果发展在于结构的改变,即脱离一个旧结构,组成一个新结构,情境就会完全不同。它不可能通过加和减来获得,相反地,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够支配部分之间联系的新的原则才能获得。同时,选择(即有机体整合有用材料的活动和倾向)可以保证发展序列中相继组织之间的基本连续。规定发展的方向有助于促进发展。如果说环境可能决定特殊变化的性质,那么有机体的结构则决定了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范围。皮亚杰在研究智力时,用一系列可以表明发展序列的规则概括了这些原则。阶段之间是有层次的,通过逐步的整合得到发展的,并且是不可逆的。

机械观点和机体观点之间的最后一个差别在于,机械的方法把发展(不同于其他变化的发展)中的任何一样东西都看作是特殊的。贝尔(S. M. Bell, 1970)总结道:“严格地说,学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变化的过程。但没有必要把它们称作发展的过程。理由之一是,它们已经有了名称,这些名称要比‘学习’精确很多,要比‘发展’、强化的模式、惩罚、消退、分化和辨别更

加精确。”(p. 243)根据这一观点,变化在持续时间、一致性(如果一致性的概念具有任何意义的话)、秩序等方面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这些差异简单地取决于环境所提供的东西。

相比之下,机体观点的支持者为发展的法则,为某些发展序列的普遍性,假定了某种“自然的”顺序,用以解释机体内部的一致性。在引用“自然的”这一形容词时,必须承认它的非清晰的涵义。这使我们想起了形而上学的幽灵,并且对数十年来逻辑实证主义和各种经验主义反复灌输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作为一门自主训练的发展心理学必须正视这些幽灵。比如“ $2 + 3 = 5$ ”、“如果 $A > B, B > C$, 那么 $A > C$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处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等陈述是真理,是因为我们周围的文化承认它们是真理,或者说是因为条件反射促使我们去接受它们? 还是因为在这些陈述中,超出文化和个体,并使文化和个体必须服从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序列,才使我们的文化相信它们是真理?

人格发展和认知结构

对心理学和发展来说,机体的方法已经获得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彻底改革了儿童心理学。它对那些构成发展阶段的结构的研究指导着观察,同时也把整体性和统一性引入行为差异。至少可以这样假设,对可理解的单位进行构造,使它有可能依次去探究抽象的序列(这些序列是不依赖于特殊的年龄和环境条件的),从而去研究发展过程“本身”的法则。这些过程最初产生于认知领域(知觉、概念的形式、语言),因为在结构主义和认知学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结构主义发展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发展到人格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它仍然运用同样的概念和顿悟。

把所有这些试图最佳地连接起来的是“认知发展学说”,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教条的理论,而是一种包括各种背景研究在内的方法。它们具有两个一般的倾向:第一,采纳由皮亚杰提出的最一般的发展概念,例如:同化、顺应、阶段、等级和普遍的序列;第二,假定认知结构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心理发展的基本因素,特别是影响到人格结构的获得。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讨论认知发展学说,讨论它们凭借概念的和逻辑的结构来解释人格结构发展的试图,讨论这一事业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我们的这一讨论将围绕着人格的三个基本特征来展开。第一个特征是,人格是独特的,它有一定的内容,有一些或多或少可以定义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人类身上可能是普遍的,但在其他种类或对象上却没有。其他两个特征是意识和自主。由于这些特征看来好像是基本的人类特质(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观点来探究),因此,用来解释人类人格的任何一种方法就应该把它们联结起来,而不是曲解它们。那么,结构主义,特别是信赖逻辑—认知类型的结构主义,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呢? 41

这些问题对自我发展的理论来说是主要的。在人格方面,自我发展被描述为“支配的特质”,被描述为能够提供更加特殊的特质和它们的意义的框架,围绕这种框架,人格的整个人厦就能够被构筑起来。这一理论与认知发展学说都具有皮亚杰的阶段概念;自我阶段被概括为平衡的结构,这些结构在一个不变的等级序列里彼此有联系。最后,自主和意识是自我阶段的性质的标志。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把本书的观点与其他两个相反的观点(机械主义的发展观和行为主义的发展观)区别开来的特征;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本书的观点与它的最接近的观点,即认知发展的观点区别开来的特征。

认知的形式和人格的内容

认知发展学说为理解人格的发展考察了认知发展的变化。例如,婴儿依恋母亲的发展是由物体恒常性的概念的获得来理解的;青少年社会价值的建立是由形式运算的发展来解释的。毫无疑问,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他所理解的。问题是,认知发展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对人格发展来说是内部的和特殊的原则。

- 42 从整体上看,认知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因为认知的原则构成了最广泛的和最丰富的结构,关于这些结构,人们是可以想象的。顿悟是认知发展学说的基础。但是,确切地说,由于认知如此普遍,以至于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问津,它不可能包含特殊联系的原则。概括的原则不可能同时又是决定的原则。对逻辑类别的理解不可能为我们理解人格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人格在其构成方面是独特的;它不可能由逻辑原则的具体事例或一系列逻辑类别构成。

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认知具有一般性和展开性两个特征,对此,有两个相互依存的理由。第一,皮亚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称之为“运算”的东西上,也就是说活动的特征和个体操纵(逐字逐句地和象征性地操纵)物体的“风格”,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特征上。风格和活动的模式要比内容更为一般。第二个理由是,皮亚杰对物体感兴趣,也就是说,对物体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特征感兴趣。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的模式上(这些活动的模式在操纵所有物体时是普遍的),并且从中获得物体的普遍性特征,例如,空间的延伸、空间和时间的运动性和可逆性,以及恒常性等等。对皮亚杰的序列的普遍性的解释都在这里了,其

中不存在遗传—成熟的机械主义观点。

根据皮亚杰理论中认知的性质,人们也许会问:怎样通过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来获得物体恒常的概念?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调查有关,由于依恋,个体和他的社会成员在情感上建立了联系,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贝尔(1970)在一个儿童群体里发现,那些依恋母亲的孩子,在形成物体恒常性之前,已经发展了对人的物体恒常性(即“人的恒常性”),而那些对母亲没有依恋的孩子,情况恰恰相反。她还发现,依恋的孩子要比没有依恋的孩子更早地形成认知的概念,但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经历同样的认知序列。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说,物体恒常性的概念并不影响依恋,因为它已经被没有依恋的孩子和认知上没有差别的依恋的孩子所证实。“物体恒常性”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个体喜欢物体,而有些个体却喜欢人,或者说,为什么人类的个体喜欢人类,而黑猩猩(黑猩猩也具有“物体的恒常性”)却喜欢黑猩猩。它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偏爱。依恋或类似的概念对理解人格来说好像是基本的,但是当我们根据认知的观点来处理这些概念时,它们仍然是含糊的。 43

一个类似于依恋,但对自我发展来说更主要的概念是价值。当人们从认知的观点考虑一般的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时,人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认知并不影响决定、偏爱、价值等原则。

最近几年,科尔伯格(1964,1969,1971)阐述了他的道德发展理论,其中,主要角色是由道德判断的序列结构来扮演的(见第五章)。在这一理论中,性质上不同的角色扮演方式,即注意其他人的观点以便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认知能力,被认为是道德结构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尽管角色扮演的结构没有逻辑结构那样广泛,而且还假定某些内容上的区别(例如,物理现实与心理现实之间的区别、被试与对象之间的区别),像逻辑一样,也是

通过推理形成的。它们不考虑任何内容(尽管每个内容都是有用的),从而构成了一个在区别性和适应性上日益增强的等级。

由于这些特征,科尔伯格总结道:道德发展不仅沿着一系列指定的阶段前进,而且还应当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从道德推理的形式到道德价值的内容中扩展日益增加的普遍性。以后,越是成熟的道德阶段就越具有一个更大的价值普遍性的特征,作为一个事实,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没有必要像科尔伯格那样把它放在认知形式的普遍性上。从这一事实出发,考虑我的同事的见解和感受是一种更为适当的了解形式,我可以下结论说,我应该选择这种了解形式。然而,通过角色扮演来了解我的邻居的感受,并没有告诉我,我是应该尊重这些感受呢,还是应该伤害这些感受。

从了解的形式转化为价值的内容不是直接的或立刻的,需要与人格的性质直接有关的其他一些前提。科尔伯格意识到,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应该是道德的?”但是,他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同一序列的另一个阶段来正视和回答,人们也许会假定,它在性质上仍然属于道德推理形式。然而,为了把道德判断转化为行动,这个问题需要放在每一个阶段并用某种方式来回答。一个人凭借他的研究,对这一回答的批评(没有必要是清晰的和有意识的),严格说来是不可能成立的,但必须涉及他的人格内容。

这一涉及到逻辑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1]的哲学发展中已经提及。维特根斯坦在其早年曾用逻辑的和科学的方法假定过一个彻底结构化了的数学命题模式;后来,他从这一逻辑领域进入艺术和伦理学。他认为,有关伦理的命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现实问题必须保持沉默[杰尼克(A. Janik)和图尔明(S. E. Toulmin), 1973, pp. 190 ~ 191]。仅

仅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认为的课题是不精确的,带有理想化比喻的情绪色彩。

然而,只是到了后期,他才认识到形式的模式,例如逻辑—语言系统。他认为,这种系统甚至在科学领域也存在。但是,这种系统并不直接给我们真正的东西,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逻辑空间”中的一系列可能性。逻辑的关系仅仅保持在形式的系统之内。为了把它们用于现实,我们需要一系列特殊的规则,这些规则既不是命题的也不是纯形式的。这些依赖逻辑和语言意义相对于结构来说的规则,是建立在应用语言的方法的基础上的,依次地,建立在更加广泛的生活形式[斯普兰格(E. Spranger)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en*)]的基础上的。维特根斯坦写道:“语言是我们的语言”(p.224),逻辑是“人的自然史的”一部分(p.223),“它是一个有关你或词语,谁是主人的问题”(p.227)。

在深刻地认识和接受两个有效的观点之后,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追随维特根斯坦:第一,当我们处理具体的决定而不是可能性时,形式系统是有局限性的;第二,逻辑和语言归属于包含的结构,即构成人类人格的那些生活形式。

在试图凭借形式和认知结构来解释人格发展时,不适当的因素是下面描述的可能性系统。越是适当和越是成熟的认知结构扩展了可能性的范围,而不是脱离这个范围,因此,与认知有关,人格是真实的和被决定的(然而,与行为有关,人格是结构的,行为是特殊的内容)。而且,由于逻辑系统存在于具体的人格之中,因此,用前者来解释后者的试图是违背基本的结构原理的,这就是说,部分是由整体来解释,但不能逆推。人格是结构的(正如斯普兰格和维特根斯坦所说,是生活形式),但这些结构本质上不同于认知结构。虽然结构的等级序列是本书的前提,但人类是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认知的结构是重要的,因为

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或多或少可供选择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人格的发展实际上是由不同的因素和不同的规则决定的。

主观性、自主和结构主义

- 46 意识和自主是必须证明的人类体验的一部分,至少在非分析的水平上是如此。杜波依斯(P.H. Dubois, 1974)写道:“我把自主看作是一种需要的和有用的信仰,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它。因为我认为自主的体验比起无法证明它的存在来,给人的印象更深刻。”(p.224)毫不奇怪,这也是哲学家中间最有力的论点。

自我意识和自主,至少在有些人身上,构成了人格的主要方面,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当前的许多理论把自我意识和自主看作是人格成熟的一大特征(见第六章)。第二章的自主阶段、科尔伯格的“后世俗水平”、黎士曼的“自主定向”、马斯洛(A.H. Maslow)的“自我实现”,以及凯尔曼(H.C. Kelman)的“内化”(1958)等等,仿佛都指出了同样的现实,再现了鲍德温、麦独孤、杜威等人有关自我的证据,即人格的发展取决于成功自主的获得。起先,自主由行动走向文化同化、社会期待和习俗。后来,经过连续的奋斗,自主免受习俗的和社会的压力。如果主观性和自主不是某些人的目标,而是整个人类的方向和目的,那么人格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能够对它们作出一种解释。

在这一事业里,结构主义是怎样指导我们的呢?乍一看,结构主义好像帮助不大。实际上,一方面,构造的方法与它的基础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构造的方法与主观性和自主的现实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观点受到两个理由的支持。

结构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系列类型和类型之间的联系,使之与现实中的机体同型。当一系列类型涉及到主体和客体时,联系是根据纯客观的关系被探究的,正如一个人区别他是有意识地体验到了要素(成分)还是没有体验到要素一样。因此,这些复杂的联系原则上可转化为数学公式,并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来表示。 47

人工智能的支持者并不认为,在人类心理活动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复制,但是他们相信,心理的形态特征、结构能够由计算机来复制。主观性和意识并没有被否认,但是它们在理解心理的结构特征时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机器可以解决问题,跟踪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些规律,但它意识不到正在从事的心理活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意识不到心理活动与非心理活动的区别。因此,如果主观性和意识存在于人的心里,如果心理的结构能够从主观性和意识中被分离出来,那么结构和结构主义并没有帮助我们去理解主观性和它的发展。

第二个理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称之为单位问题的基础上的。在结构的方法里,分析的单位,无论其内在联系多么紧密,总是抽象的。一方面,它们包括内在联系的从属单位,另一方面,它们又被更大的单位所包括。因此,结构主义者的单位,在一个水平上是整体,在另一个水平上却成了部分。例如,哲学结构是形态结构的部分,形态结构是语法结构的部分,语法结构是语义结构的部分。

当人们考虑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整体决定部分)时,这一情境对人类自主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只有在整体里并通过整体,才能获得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角色和它们的作用。如果通过结构的镜子,孤立地把一个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或者看作是一个社会成员和文化成员,那么,诸如“自

主的”、“后世俗的”、“独立的”等标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根据
48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能用“角色”或角色定向来表述人类。

解决这一两难问题需要找到一个非结构的统一性根源。意识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源,即意识不是对结构的一个简单反射,至少它是结构的一个创造者。一个人只要获得内在的统一(这种统一有着不同于结构单位的结合),那么他的意识倾向就会脱离环境,并且与环境相对立。自主和意识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发展变化中的一对搭档。

在生物学中,机体的方法和它的较一般的观点,即结构主义的观点,并不保护自主使其免遭机械论的威胁。它们的目的是解释内在的结构和有生命单位的自发活动。内在结构和自发活动是自主的基本条件;但它们本身并不意味着自主。这一机体的方法可能像机械的方法一样也是决定论的,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机体方法的许多支持者并不赞成这一结论,认为自主不会消退,相反地,它在表达自己。他们指出了机体的自发活动,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惠的因果关系,以及在相同的选择之间某种不确定程度的存在。他们还特别指出,更加复杂的机体通过“作出决定”的过程来达到活动,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能使机体作出正确选择的原则(最大限度的获得和最小限度的丧失)来加工各种各样的信息。

但是,自主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不确定的;即便当只有一种选择有用时,自主仍有可能存在。特别是当机体的经历也被考虑时,互惠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完全被决定的。作出决定的过程也没有超出对环境的“理性”判断。人们对德国纳粹的“理性”决定感到惊奇,对索忍尼辛(Solzhenitsyn)的“理性”决定感到惊奇。
49

法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刻板地运用了结构法的方法论原则和

哲学原则。诸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 - Strauss)、哲学心理学家福柯(M. Foucault)、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 Barthes)、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 Lacan)、哲学家阿尔都塞(L. Althusser)等人,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人物。且不管他们对个体的见解,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质。与结构的方法相比较,他们都依赖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思想,并且借助语言不只作为结构的模式,而且还作为从其他一切人类结构中获得的模式。

他们还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反人本主义的态度,并且倾向于否认作为现实的个体。福柯(1973)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上帝的死亡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末日……人类将消亡。”(p.385)列维-斯特劳斯则比较温和,他在《忧郁的热带》(*Triste Tropiques*)的结尾写道:“虽然我存在,但无论怎么说都不能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问题上,我除了是在社会中间进行奋斗的一个不断更新的个体之外,除了是由头脑中几百万个神经元所构成的之外,除了像一架机器那样为社会服务的身体之外,我又是什么呢……在‘我们’和‘无’之间没有个体的地位。”(p.397 ~ 398)最后,从整体上看,这个由法国结构主义传播的信息与斯金纳的《超越自由和尊严》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更加复杂和更加微妙而已。

法国结构主义者的反人本主义结论并未表明他们的特异态度,而是反映了在他们原则中的真正危险。法国学派所依赖的索绪尔的方法,有着一个极其抽象的特征。语言,作为习惯的思想倾向,是从它的具体表达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说话交谈中抽象出来的;语言也是从它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后,语言是从它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它所描绘和表示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有在它的普遍性

意义上才能被理解。这些普遍性意义超出了个体的运用,并决定了个体的运用。而且,语言不是从外在于它的世界联系中被理解的,而是从它的内在联系中被理解的。例如,“树”这一词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和树这一东西的联系,而在于它和词汇表中其他一切词的对立。为了理解一个词,我们只需要把它和其他词联系起来,正像字典中任何一个条目所表明的那样;反之,我们就不能理解词和语言,最终也就不能借助词和语言。索绪尔的抽象包含了某些重点,这些重点是结构主义的特征:第一,强调形式和联系,而不是强调内容和实质;第二,强调闭合和体系自由,这种闭合允许有机体通过内在的平衡法则来操作。

在这些前提之后,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假设方能得出法国学派的教条主义结论,这个假设就是:语言是一种在人身上必然发生的模式,就像人被生出来并能活动一样。而且,个体并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说话的,而是由非个体的和客观化的“文化”通过个体来说话的。它所说的不是个体对世界的理解,而是在语言的闭合结构中内在的意义。正如福柯在一次采访中声称的那样:“‘我’被消灭……现在的问题是发现‘存在’。存在就是‘非个体的他们’在(on)……我们不把人置于上帝处,但是我们以匿名思考,无主体的知识,无认同的理论性(整体)……我们的最终任务是摆脱人本主义。”[*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1966, 第5期,由施怀(G. Schiwy)引用, 1971, pp. 18 ~ 19]

- 51 附带说一下,这些事例表明,语言究竟是像皮亚杰所声称的那样从属于对世界的概念理解呢,还是像某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萨丕尔(E. Sapir)、霍尔夫(E. B. Whorf)、乔姆斯基(M. Chomsky)]所声称的那样是自发的并决定一个人的概念理解?这一争论并不是无关紧要或故弄玄虚。在自我发展的领域,特别是在精神分析领域,有些术语是很难转译的(见第十四

章)。因此,有关自我发展的概念是否是一个普遍性概念的问题(我们准备在第八章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个不完全是由词来创造的现实的假设。

结 论

乍一看,本章好像遵循着赛西芬(Sysiphean)模式,即第二部分取消了第一部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被取消。且不管有关结构方法的保留余地,我认为,理解发展的唯一方法在于把发展概括为结构变化的序列,而这种结构变化的序列常常受制于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

结构主义在处理人格的发展时所遇到的问题并不在于结构和有机体的概念,而是在于这个概念的背景。对人格理论来说,结构和有机体都来自生物学和数学逻辑的科学。这些学科具有两个特征:学科本身固有的必要性和方法的形式化。逻辑本质上适合于一种纯形式的处理,生物学沿着同样的方向运动。这种运动受到下面两个方面的促进:一是扩大从有机体到其环境视为一体(Umwelt)的生物调查,二是认识到数学公式和计算机模拟所具有的优点。在皮亚杰的研究中,一个相似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形式化和固有的必要性是当结构和有机体的概念用于人格时所出现的困难的根源。在自我发展的领域,需要一种能够处理对象的内在特征的结构概念(这里所指的对象包括人和物体),不仅具有对象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风格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把对象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的风格)。为了运用语言的类推,必须注意一个人所说的东西,以及他怎样表述这些东西;人们必须注意陈述的内容和它们的形式意义。

极端的结构主义者倾向于忘记、忽视或否认的是,对象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地由它们与其他对象的联系构成的。对象并不像由两条直线交叉来解释的数学点。

皮亚杰回避了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许多问题,因为他把结构看作是开放的,并且是与世界联系的。这一概念允许他去解释法国的结构主义者并未包括的发展和历史。这一概念还允许他去保持与具体情境有联系的抽象结构。但是,皮亚杰的兴趣在于儿童把对象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的模式,例如排列、分配和组合、计算等等。因此,当人们从事相应的活动时,这些东西正好处在活动的交叉点上,并且可以由数字或其他抽象的符号来代替。

当人们对逻辑的和数学的发展感兴趣时,这种方法是合理的。当对象的内在性质具有意义时,这种方法是不适当的。皮亚杰的方法无助于我们理解一切人格理论得以建立的基本区别,也就是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区别。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至多是承认区别的存在,承认有两种类型,可以分别贴上“一”和“二”的标签。即便如此,他还是强调在这两种类型之间不存在差异,它们是一样的,例如恒常性、空间和时间的次序、分类,以及逻辑可能性的存在。

53 人格的研究虽然和逻辑发展有关,但它还将对人这一特殊对象的性质,以及人和其他对象的联系进行思考。这里,考虑的是人和对象的内容特征,而不是联系的条件,除个体内部构成的联系之外。一个纯形式的结构概念和皮亚杰的逻辑运算一样,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联系上,而不是满足于对内容和内在要素的理解。结构主义要比实用主义更善于思考,它试图去获得本质而不是外部的联系。作为格式塔的视觉形式,沃纳和卡普兰(B. Kaplan)的符号方法、埃里克森的区域(zone)和风尚

(mode)的类推方法、神话的传统研究,以及其他各种主题分析等基础的结构概念,要比数理逻辑结构^[2]更接近于本书的要求,即描述自我类型和阶段。

如果人格的内部特征成为调查的对象,那么意识和自主,它们的不同形式,它们的作用和它们对个体的重要性,也将得到证实。这些特征在纯联系的和纯操作的结构主义里面是看不到的,因为比起活动来,它们是一种更高级的品质。人类意识总是受到外部的、文化结构的影响;有时,也指导和构筑这些结构。

注 释

- [1] 这里所引用的许多资料以及摘自维特根斯坦作品的资料皆来自杰尼克和图尔明所著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 1973)。
- [2] 一项区分有的时候形成于结构形式(form)与结构模式(model)间[佩雷—怀尔(Parain - Vial), 1969], 该区分似乎捕捉住了结构主义理论中的这两种说法间的差异。

第四章 基本特征

54 由于自我发展是一个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东西,因此,一个正规的定义是无法包含自我发展这一课题的。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第二章)提供了一个由该术语表示的近似概念。也许在细节上可能有错误,但其范围和舞台是被明确地限定了的。第三章揭示了发展概念的定义。本章就自我的涵义和自我发展的涵义继续对有关术语进行分析。

自我发展的特征

55 各个阶段。第一,按照各个阶段描述自我发展,意味着从极低的自我水平到极高的自我水平并不是一个平稳的过渡。相反地,它们具有非连续性。但是根据分析,那些似乎非连续的变量,可能表明含有潜在的连续性,而那些似乎连续的变量,可能包含非连续性;所以其区别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涵义是沿着这条途径的各个过渡点具有质的差异。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 variables),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 sequences, 卢文格, 1965)。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

挥。长期以来,能力一直被认为是极性变量的完美例子——在任何两个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异总是被看作为数量上的差异。按照极性模式,能力测验通过计算准确答案的数量而被简单地打分,因而它们是累计测验(卢文格,1948)。然而,皮亚杰表明,简单地列为错误的答案事实上体现某种逻辑。一种特殊的思维风格,诸如前运算的或具体运算的逻辑性,在儿童发展的某一点上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然后逐渐减少以利于继后的逻辑风格。因此,皮亚杰提出某些基本能力也是按照里程碑顺序发展的。

在极性变量和里程碑顺序的复杂性方面,存在着为什么认真而又艰巨的工作能够继续对没有揭示变量的主要轮廓的行为进行解释。在能力这一领域,明显的和最容易测量的方面恰恰是极性方面;因此当比纳(A. Binet)还没有看到儿童逻辑的连续性时,他就抓住了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实用的方面。皮亚杰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性质上不同的阶段的顺序是更加抽象和富于推理性的。

关于自我发展,情境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抓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不放,那么他将永远关注几个阶段,因为这些阶段要比作为它们基础的连续性更明显。一个决心从事行为主义和心理测量操作的心理学家有义务把这些阶段看作是极性变量。因此,许多人把遵奉作为一个极性变量来研究。一个在遵奉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人能够被假定是处于遵奉阶段的人,但是一个在遵奉量表上得分较低的人可能是前遵奉者或后遵奉者,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霍比(C. F. Hoppe), 1972]。目前尚未有这样的统计技术能够从几个阶段或阶段的几个方面的测量中构思自我发展的变量。自我发展具有极性形态(第六章),但是它们比表1所列的几个方面更抽象和更富有推理性。

有关阶段概念的其他一些涵义已经由皮亚杰和英海尔德

[特纳(J. M. Tanner)和英海尔德(B. Inhelder), 1956, 1960]所阐明。虽然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逻辑的阶段,但是皮亚杰和英海尔德已经把阶段概念的一般特征概括为:(1)具有一个不变的序列无一阶段能够避免;(2)每个阶段建立在前一阶段之上,是前一阶段的质变,并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3)对于每一个涉及到平衡和稳定的阶段来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性。作为这三个特征的结果,各阶段的连续也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性。这些研究人员把发展序列的逻辑看作像遗传因素、情境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我们的概念必然会产生极性变量与里程碑之间的差异,然而,皮亚杰—英海尔德关于阶段的概念不一定会产生,并且研究这一概念的许多人喜欢沿着质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非连续的阶段去考虑等级。

类型学。我们的概念是类型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年龄群内,它提供了一个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学并不是与连续的变化相对立的,而是与一维或单义相对立的。由于两种类型在存在形式上等于一维的存在,因此必须提出三种或三种以上的类型。即使一个年龄组内自我发展的差异被连续不断地划分成等级,它们还是质的差异,而不会完全成为量的差异。

57 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构成类型学,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观点,因为最著名的自我理论家都未能阐明这一点。奥尔波特(Allport, 1961)虽然看到自我发展的阶段与我们的发展阶段相似,但是当他讲到类型学时,却提到了体液的和其他的类型学,这些类型学似乎与自我发展毫无关系。他把重点放在一个独特的方法上,用他自己独特的术语来了解每一个人,这也是与类型学的观点相对立的。

抽象。一种既作为类型学,又作为发展序列的自我发展的

概念意味着它是一种抽象,因为人们可以从儿童心理学的教科书中推断出它不可能变为具体的可以观察到的平均儿童的成绩。自我发展与观察有关,并以观察为根据,但这不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对于严格的行为主义方法来说,它是无法利用的或不存在的。在第二章里所选择的描述,强调了通过正常阶段的儿童和处于该阶段的青年类型或成年类型之间的共同性。与精神分析学家或儿童心理学教科书中的大多数其他解释相比,年龄特殊性的情况不包括定义的描述。

一个先例是,这种现象存在于心理年龄的概念之中,它的价值是揭示和区别有关年龄和阶段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包括变化理论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它促进了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身体发展、智力发展、心理、性行为的发展,以及社会期望的辨别。

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已经在第三章里予以说明。沃纳是最早关心认知发展的人,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940)1964]。人们无法指望在儿童、原始人和病人之间具有同一性,相反地,它们是平行的。沃纳写道:这是因为生活在自己是主人并且得到良好调节的社会中的原始人、生活在顺应不良的社会中的病人,以及生活在文化进步的成人世界中的儿童,他们的环境是不同的。运用这三个原因就是抽象的发展概念。沃纳有关发展的正遗传规律既适用于认知的发展,也适用于自我:“生物形态的发展表现在日益增长的局部分化和日益增长的从属关系或层次之中。这一层次化的过程意味着对任何有机结构来说分化部分的组织是为了封闭的整体,各部分的安排和组合是为了整个有机体”[沃纳,(1940),1964,p.41]。沃纳的报告不是适用于自我发展的唯一模式,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加以说明。

自我的特征

我们的自我发展概念是由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在另外一些方面不同于其他作者的自我概念的涵义构成的。有见识的读者希望把精神分析著作中流行的概念作为特殊的桥梁^[1]。

过程。对自我下定义如同对生活下定义一样困难。水和空气并非生物。当一个人饮水或呼吸空气时,在哪方面使它成为有生命客体的一部分[这个说明摘引自弗兰克(J. Franck)1962年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所做的一份非正式的讲演稿。他利用这个问题表明,试图硬性对生命下定义是要误入歧途的]?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与环境交换的过程,这个问题就会丧失意义。同样,自我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东西。自我有点像一个陀螺仪,其垂直的位置由它的旋转来维持。如果使用另一种比喻,自我似乎像一个拱;有一句建筑上的行话:“拱从来也不会睡着。”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拱的作用和反作用维持着它的形状,也支撑着这座建筑,皮亚杰(1967)使用了运动的平衡(mobile equilibrium)这一术语——越动越稳的道理。力求掌握、结合、弄懂经验的意义不是一个在许多功能中的自我功能,而是自我的实质。

弗洛伊德最初把自我(das Ich)的概念作为一个从公共领域中取得的术语。他把意识(更确切地说是前意识)看作是来自一个无意识系统的系统本能,用以取代《梦的解析》(1900)中的自我。引导弗洛伊德回到自我概念和用本我(Id)的概念取代无意识系统的概念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在哪里产生压抑的问题?如果压抑产生在无意识之中,那么作为描述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法

而提出的心理系统的概念便失去意义,压抑的观念和压抑力这两部分的冲突是在同一系统内进行的。如果压抑无意识思想的是意识,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压抑?是否存在一个对压抑事实的压抑以及无限的回归?自我这个术语的运用是容许通过定义获得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说自我中有一个无意识部分要比说意识中有一个无意识部分更为顺当。

许多心理学家可能寻找弗洛伊德在自我问题上公认的最终的地位,正如韦尔德(R. Waelder, 1960, p. 177)的系统阐述那样:

(自我和本我之间)的界限是本能和有目的过程之间的界限,是一方面盲目推进,另一方面为特殊目的选择适当方法之间的界限……精神分析包括本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通过本我,一个人似乎被驱动去起作用,所有内在的倾向,即从背面来的力都会影响他。另一个方面,自我代表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向,即一切有目的活动……在观察本我和自我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察觉到人的本性,即冲动的内驱力和他的本性有目的地被指引……在本我中加工的计划以后会成为,简单地说,本能——本能的表示;然而自我的目的总是工作——工作——解决或试图解决。 60

自我概念的一个彻底过程能否消除假设一个自我的无意识部分的这种必要性呢?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压抑是在系统之间发生的事物。压抑是否的自我内部的问题跟空气是否在肺部或胃部的水分是否为活体的一部分的问题相类似吗?或者,换成另一种说法,是否可以这样说,自我中没有包含的东西就是压抑?我们必须放弃这个问题,因为它引出了我们的范围之外的技术问题。

结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结构的概念置于发展的概念之中。也置于自我的概念之中。大多数自我理论是结构的,也就是说,自我被看作是为自我的一致性和意图而奋斗[显然,这种阐述不是铁钦纳(E. B. Titchener)的那种构造心理学;事实上,它接近于当时所谓的“功能心理学”]。虽然这一思想在有些哲学家当中早已出现过,但是尤以阿德勒最明显。弗洛伊德也把自我说成是存在或组织,尽管弗洛伊德的自我在生活和行为中的地位要比阿德勒小。

对沙利文(H. S. Sullivan, 1953)来说,自我系统趋向于维持自身的一致性,办法是无视与现行发展水平不一致的事实。由于这些观念以沙利文的概念为中心,并能导致我们的概念的发展,所以,关于这些观念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奥尔波特(1943年及别处)总是强调自我的组织,这种自我的组织说明或者至少与动机的功能自主性有关。利基(P. Lecky)主要致力于自身一致性的奋斗,正像费斯廷根(L. Festinger, 1957)在其反面专心致志一样,那就是认知失调。结构是梅洛—庞蒂(M. Merleau - Ponty, 1942)概念的实质,他无视那种产生自我结构和维持自我结构的观点是与沙利文的观点相似的。

- 61 有关自我结构概念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菲加利特(H. Fin-garette, 1963)的学说。他开始接受这些观察和以治疗的精神分析为基础的主要理论,但他指出弗洛伊德的那些形象化的隐喻,这些隐喻把精神分析的任务看作是揭示隐藏的现实,已成为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含蓄的本体论,有时也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在内。同样的观察和同样的理论是与一个可供选择的本体论相一致的,这种本体论把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描述为有助于病人看到已知事件的新意义。成功的治疗,按照意义改组的观点,与其说是发现了隐藏在矮树丛中的兔子,不如说是看到了云中一只

兔子的形象。对菲加利特来说,使经验成为有意义的奋斗不是那种称之为自我的事;为意义而奋斗就是自我。意义不是行为和经验的事后想法;意义是经验的基础,也是由米德(G. H. Mead, 1934)发展的一个观念[精神分析治疗的意义改组观点也可以在里古(P. Ricoeur, 1970)和洛华德(H. W. Loewald, 1960)等人的研究中发现]。

菲加利特还用结构的术语把焦虑定义为,一个假设的构念而不是一种情感。为意义而奋斗的失败本身造成不了焦虑。由于意义并非都是自我所寻求的东西,所以焦虑不是自我体验的内容,而是自我的对立面:瓦解或无意义。如果人们把焦虑看作是一种情感,那么无意识的焦虑和焦虑的症状替代便成为异常的东西。如果把焦虑看作是一个假设的概念,这些困难就不会存在。“神经过敏的焦虑”(neurotic anxiety)这一术语是用词不当的。神经过敏的东西不是焦虑,而是自我怎样对它进行反应,不论是创造性的和弥补性的反应,还是限制它本身并使它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永久性结构。

为一致性而奋斗,在某些概念中,诸如在帕克(R. F. Peck)及哈维斯特(R. J. Havighurst, 1960)的道德发展概念中,似乎是没有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注重道德而不是自我发展——科尔伯格也是关心道德发展的,他具有强烈的结构倾向性。

杰琴(K. J. Gergen, 1968)认为,个人一致性的倾向在心理学的理论中曾被夸大。这里我们涉及一个长期以来反对自我概念的问题。多年来,在美国心理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倾向是特性学说,否认有一致性的个体差异。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这个观点。

在精神分析这个公认的观点方面,结构这一术语的应用,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用法。结构的观点把人格或个体分成自我、本

我和超我。这些就是结构。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我是一个组织。另一方面,本我和超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不能组织起来的,因为无意识不承认矛盾。如果矛盾是无意义的,则一致性也是无意义的(这一争论并不排除在超我或本我中有组织观念的可能性;意思是超我和本我不是互相一致的或有组织的整体。同样,自我可能含有不一致,虽然就整体而言,它代表着为一致而奋斗)。当然,结构这个词并不专属于为一致而奋斗。吉尔(M. N. Gill, 1963)使用这一术语意味着组织的程度,他下结论说,自我和本我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在较为普遍的用法上,结构意味着稳定性或半永久性,而不是意味着组织。但本我和超我的稳定性理由或多或少与自我的稳定性理由相反。自我稳定性是一个理论问题,为一致性而奋斗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要素,正如陀螺仪和拱的隐喻所表明的那样;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关系已在第三章讨论过。另一方面,本我和超我的无意识成分,由于它们的稳定性是无意识的,所以不受经验的影响,也不受一致性要求的影响。这就是动力无意识的原理(第十三章)。

63 **整体说。**当代的大多数自我理论是整体的(holistic),与二元论或元素主义相反。主要论据是人。当一个人的观念和感觉(在另一个时代),或他的特质或感觉运动功能可被研究时,他本身是研究的单元。而且,自我不是一个激励机器的灵魂或船上的领航员;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是为时代潮流所拒绝的。

在一篇趣味横溢的文章里,荣格(C. G. Jung, 1933)认为,科学的简化论,用身体的术语来表达心理,逻辑上跟早先神学时代的教义并无区别,以为物质世界不外乎是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心不会简化为身,身不会简化为心。现代的一些讨论,虽然跟荣格的论点没有矛盾,但有不同的口气。斯特劳森(P. F. Strawson、

1959)和波兰尼指出,我们没有听说过有脱离肉体的心。赖尔(G. Ryle, 1949)和谢恩(I. Chein, 1972)认为那不是两个事件系列,譬如说,玩棋或接受测验,一方面是身体活动,另一方面是心理活动,心理告诉身体做什么活动。所以人是不可分割的。“神经过程不可能产生观念,思想无法使肌肉收缩,但整个有机体,人,却能做到这两者”[安吉尔(Angyal), 1965, p. 31]。

这些争论至少部分是本体论的。自我发展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和理论的心理学课题,而不是一种本体论。既然如此,它涉及到起作用的人,而不是心与身的对立。整体的观点渗透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者的文章之中——例如,斯特恩(W. Stern)、梅依(A. Meyer)、戈尔茨坦(K. Goldstein)、奥尔波特和希伯。如果整体说的反对者仍然存在的话,他们可能是这样一些心理学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课题是不清楚的或者不是当前所关心的。然而,今日心理学的大多数主要的研究程序不是建立在整体论范式的基础上的。

自我作用(或者说心灵的作用)是否最好用整体说来表达,在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系统阐述中,只有内在冲动引起精神病;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的精神分析观点必须考虑内在冲突。哈特曼和雷帕普特(D. Rapaport)把自我看作是功能专车或“装置”,有些自我具有自主的内驱力,并且(因而?)是无冲突的,其他一些自我从中 64 立的内驱力获得能量。这种观点似乎跟整体的假说格格不入。同时,雷帕普特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人格。”(1960, p. 42)

我们怎样使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与人格的整体观念一致起来呢?人们可能会说,当自我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时,有些记忆或经验是为参照框架之外的人们所保留。弗洛伊德谈到压抑的无

意识,而沙利文和梅洛—庞蒂谈到分裂(dissociation),这个术语是弗洛伊德在早先的著作中曾经用过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并列提供了一种描述内在冲突的办法,而不是使任何一种附加的实体人格化,这些实体的性质和功能在当前的精神分析文献中引起争论。这种解决是梅洛—庞蒂(1942)精神病理学中的描述。弗洛伊德动力无意识的概念是对整体假设的修改,但这是大多数自我理论家所接受的版本。然而,它只是一种修改,而不是取消整体假设,正如梅洛—庞蒂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这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对压抑的观念情结拒绝予以承认或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不把人看作为整体,那么人们又如何解释反抗力呢[维各特(A. Vergote),1957]?

社会起源。大多数自我发展理论把自我看作是本质上社会的——人是一个社会动物——这种观点早在古希腊就有了。沙利文把下面这一观点作为他的精神病学的核心,那就是人是由人际关系组成的(第五章,他不妨用人类的或社会的关系来替代人际的关系。事实上很容易作出这种替代的,以便证实这一观点的真实性)。鲍德温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认为在自我中除了一个人的密友或“同伙”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米德认为一个人可能在隔绝状态保持他的自我,但是当隔绝状态里冒出一个人时,自我就不复存在了(第十一章)。

65 这个问题是哲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各种方式表达人是天然的社会动物,他是在社会中以及通过社会达到他的现实地位的。诡辩家、犬儒学派以及其他一些新苏格拉底派的哲学家用各种方式表达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是一个冲动的动物,社会必须约束他或阻止他的欲望。萨特(J. P. Sartre)是这一见解的当代鼓吹者。精神分析的原始动力就是把社会化的观点强加在自私的、本体的儿童身上,在这一点

上,弗洛伊德与行为主义者华生(J.B. Watson)是一致的。但是精神分析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人际性的,并且越来越承认移情和自居作用的重要性,甚至理论也变成人际的了(第十四章)。

奥尔波特(1943)似乎对这一争论抱观望态度,根据他的观点,人格完全被限定在皮层以内。另一方面,谢恩(1974)认为特质如不乞求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是无法被定义的。

目的和意义。最后,大多数自我理论是有目的的,但它并不是宣布宇宙中的一个目的,而是涉及人类生活的现象。一个人可以选择地说行为是有意义的或意义决定了行为。对立的看法,在纲领性上是机械论的,但正如奥尔波特和其他人所说,在实践上从来没有超过准机械论或自然主义,而是把行为的起因看作是完全孕育在既往的岁月中。但自我现象很难用这些术语来阐述。一切行为主义忽视目的的信念是假的。麦独孤(1908)和托尔曼(1922)具有目的的行为主义的体系。他们认为,一种机械论的观点,把本能或内驱力看作是反射弧的混合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些本能既不存在于人类,也不存在于动物。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观点与自我是根据目的和意义来活动的观点的调和是以梅洛—庞蒂(1942)哲学中的组织水平来完成的。

精神分析依然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弗洛伊德始终忠于他的生理学简化论,他有关心力的著作除简化论外难以构成任何东西,甚至当心力与体力区别开来时,情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 66 弗洛伊德的许多最杰出的著述和用作治疗的精神分析都是用“意义”、“目的”、“意图”、“欲望”等术语写成的。费路(Flew, 1956)曾指出,精神分析的贡献就是把这些术语的意义扩展到原先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现象,诸如梦、症状和误解。其他一些哲学家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例如,霍尔特(Holt, 1915)、费希尔(A. L. Fisher, 1961)、菲加利特(1963),以及精神分析学家霍姆(H. J.

Home, 1966)。

精神集中发泄的理论可能有缺点,如果它充其量是一种错误,那就很难解释它的长期流行。里古(1970)要比其他一些哲学家解释得更令人满意。他写道,精神分析的领域恰恰位于动能学和释经学(hermeneutics)的交接处,精神分析的许多关键概念证明了讨论的混合性,对力的讨论和意义的讨论:抗拒、压抑、移情作用、简约,以及做梦。所有这些都具有力和意义的内涵。力是在意义的改变中表现出来的。意义则受心力的指示而改变。心力只有通过它们对意义的影响和有意义的讨论才能为人所知。当我们承认能量隐喻的有效性时,里古对精神集中发泄、反精神集中发泄、过度的精神集中发泄等稀奇古怪的学说毫无反应。

正如奥尔波特经常指出的那样,在那些把人看作像自己一样,像寻求意义和开展目的的一样,甚至把人看作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中间存在分歧,他们把一个人的行为看作是由他的认识范围以外的无意义的力量所决定的。且不管一些批评家的主张,这种分歧并没有把精神分析从研究心理学的人本主义方法中区分开来。相反地,分歧仍然在精神分析中间存在,仍然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存在。总之,精神分析必须排在具有意义的心理学之中,因为不经过解释就谈不上精神分析。

结 论

67

阶段的序列构成了一系列人格类型,而作为阶段序列的自我发展概念,必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自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个结构,其起因在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

用,并受目的和意义的指导。发展意味着结构的改变,但有些结构主义者的机械论哲学阻碍了我们的研究课题(第三章)。我们承认意识和自由的可能性以及动力无意识的有效性;所以,自我并不是和完整的人格一样的。它是密切接近于一个人认为像他自己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概念参数;术语是为我们领域的进一步定义服务的。在我们的视野内,概念和理论分享了这些术语的极大部分,但并非老是那几个同样的术语。同样的术语将被用来描述领域内的理论差异。

注 释

- [1] 那些与精神分析的文献无关的文章,可以在下一章中读到,本章的剩余部分可以留待以后再读,也可以不读。

第五章 可供选择的观念

- 68 在文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其他领域都能找到自我发展所包含的有关人的各个阶段和类型。如果许多人从不同的前提和不同的资料出发经研究后得出一致的概念,则这种趋合就证实了一些共同的要素。然而,想据此建立一个科学的分支,其结果是混乱的,因为许多研究人员在各自的学派中耕耘,每一学派后面都有一小股追随者,对他人在研究同一问题时的理论和经验茫无所知,他们之间所用的词汇也大相径庭,甚至难以互通信息。在儿童身上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同时发展,人们对此未必感到舒坦。这些解释因为差异太大难以归并为一种解释,而其相似之处又不足以说明人类本质的不同方面。在考察
- 69 这些主要概念的同时,必须有一个建立联系的目标。

众多的解释可以这样来分类:一种是只描述发展序列的,一种是只说明分类界限的,还有一种,例如我们的解释,是包括上述两个方面的。专门强调发展的过程会导致对年龄特征的关注,而划定界限只需要我们去注意那些非年龄特征的东西。另一方面,专门强调分类的界限会忽视那些决定类型序列的生长的辩证法。在后一种情况下,序列的变量可能被看作是名义上的变量,或者里程碑可能被看作是极性的变量;这就是说,每一种类型都可能独立地被划定,而序列或多或少是任意的。

沙利文的精神病学人际理论

如果说我们的观念有祖师的话,那就是沙利文^[1]。沙利文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当他认为弗洛伊德在哲学上站不住脚的时候,他力求开辟一条新路。他发现了自我、超我和本我等精神分析的用法不能被人接受;自我体系这一术语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我”(das Ich)意义相同。沙利文认为精神病学是人际关系的研究,它“不能涉及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事”(1953,p.19)。有关人类本能的观点是荒谬的,他说,他与早期精神分析著作关于人格是本能衍生的观点发生争论:“人格是具有人类生活特征的经常发生的人际情境的相对稳定的模式。”⁷⁰ (pp.110~111)。

人类的相似之处多于相异之处,这一点给沙利文留下了印象。他认为个体的差异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发展序列中的不同阶

心理上的需要,当安全感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激起焦虑。婴儿能够学会用尝试与成功、奖励与惩罚,后来再用模仿他人的榜样等方法来对待上述两类需要以外的需要或不惬意的事情。但他没有办法去对待焦虑。他的行动没有一件能驱除焦虑,而焦虑又干扰了其他需要的满足。自我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回避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方法。

婴儿最早自我概念分为三个要素:凡导致奖励或人际安全感的是善我(good-me);凡导致轻微或中等的焦虑为恶我(bad-me);而非我(not-me)则和突如其来的抵挡不住的焦虑相结合,非婴儿的学习体验所能整合。“非我”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后来被压入无意识的创伤性事件。梦魇和精神病过程证明它们继续存在。

最初,儿童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显著性特征,母亲和母亲的代理人是一样的。婴儿只能区别好母亲与坏母亲。沙利文举出的第一个“坏母亲”的例子是焦虑的母亲,还有被迫带孩子的心怀不满的姐姐。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所有的好人是同一个人,所有的坏人也是同一个人。

由于有了诸如吮吸大拇指的体验,婴儿不仅有吮吸的体验,还有被吮吸的体验,他把“善我”与“恶我”合成我身(my body),借以与“环境”相对立。语言有助于把“好母亲”与“坏母亲”合成“我的母亲”,与代理人不再互易其位。这些合成构成了儿童时期的特征,是系列中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的人际学习基于人类的榜样,因而可以称作戏剧化。儿童先以似行动(acting-like)和似言语(sounding-like)为主学习父母的行为,再是假扮他的父母。由儿童向少年变迁的标志是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就大部分而言,这种区别产生于交感证实(consensual validation),这是一个术语,意指我们在感知现实时对其他事

物重要性的注意。

少年时期,约入学初期,母亲在同龄人之间的显著地位下降了。这种变化是发展的,并非经验的产物,因为少年与同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幻想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公认或赞同是积极的动力,人所不齿则得到相应的对待。“无视于他人价值的感受令人震惊。”(p.230)社会偏见的形成,尤其是按性别区分的偏见,是其特征。少年学会了社会上的服从与调节,他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竞争、和解与合作。这一时期理想的结果是生活定向,即长期的目标与价值,并洞察人际的需要,以及如何没有多少焦虑就能满足这些需要。一个选择是永远在赞扬声中生活,受人爱戴并以此自娱。

为了满足人际关系的需要,沙利文的自我体系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婴儿时期的需要是爱抚,其后是赞许和自尊;与满足这些需要相反的是焦虑。所以自我体系的作用在于避免和减少焦虑。自我体系构成了一个人的参照框架或世界观(这一论述在阿德勒很明确,此外,明确的只有沙利文了)。由于不一致的观察产生焦虑,因此自我体系把这些观察摒除在外或者使它们变形。所以,自我体系倾向于避免与当前的组织和作用不一致的经验的影响。这种摒除过程称作有选择的忽视,它是一种积极的关注。有选择的忽视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前意识(pre-conscious)过程: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能进入意识的中心。 72

“由于人格的一般效应,这种人格伴随着在每个发展期的早期阶段每一种新成熟的需要或能力,因此自我体系的功能性活动确实在方向和特征方面有所变化;这时自我体系专向人们期望的变化敞开。”(p.192)所以,是发展的时间表促成了变化,当变化临近时,以往因调节而产生的不幸方面或多或少能同时得到矫正。

沙利文所论的不幸的转化是“恶意的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指一个人生活在敌人中间的一种态度。孩子在被嬉弄或在需要爱抚时产生焦虑或受到打击,就可能采取一种自卫的手段。恶意的转化造成发展的部分停顿,因为这种态度把儿童和有利的经验隔绝开来,另一种发展的停顿是坚持戏剧化和“假装”(as if)的表演,或是为了避免焦虑或惩罚而表现为着了迷似的专心致志。发展的停顿不是绝对的;经验正在被同化,但速度是慢的,并且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其他有利的变化明显减少。因为焦虑的摒除的结果,普遍的尝试与成功、奖励与惩罚的训练等等在改变自我体系中的效应并不显著,不像和其他的需要拧在一起时的训练那么有效。自我体系的不能成功和没有奖励的方面可能持续一辈子之久。

在前青春期的青年人与同性伙伴的关系中,沙利文发现了从少年期的自我中心上升到真正的社会状态的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在与伙伴的专一关系中,青年人首次学会了像珍惜自己那样珍惜别人,从真实的深度上去体验情爱;与之对应的是寂寞,它把焦虑作为一种不愉快的体验。真正的协作开始于这个时期。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协作意味着感情交融,超越了他认为以利己为动机的少年期的合作。沙利文把青春前期的结伴看作是伴侣的扩展,其后果往往是无害的。许多人终生过着少年模式的竞争和妥协的生活。一个停留在少年水平的成人可能成为唐璜或“玩世不恭的人”(teaser)。

青春早期始于发身期。有意思的是,搭档从伙伴转变为异性成员。主要的需要是不受干扰、亲昵和欲望。困难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里的个体或结伴的两个成员之间,发身期的年龄大有差别。青春早期结束于较佳的生殖活动模式的获得。青春晚期则扩展到:“经由可取的机会,成为人格上与文化上的

一个完人(fully human),或达到人际关系的成熟互惠。”(p.297)沙利文对青春早期和晚期的讨论,主要涉及多种环境里各种人格类型的分龄问题。

沙利文关于自我体系的概念,即他对自我的看法,是社会的,并且是一种结构;这在他命名时已做了说明。它又是有目的的,并涉及其意义。它的作用与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的作用不相上下;这就是说,要考虑到动力的无意识或人格的分裂方面的问题。沙利文论述了发展的序列和发展的停顿,希望至少得出一种类型学。在他论述中所缺乏的是自我发展的抽象方面;他对各阶段名称的选择,即带有时代特征的术语,证明了这一点。 74

沙利文用动人的、令人信服的笔法描绘了自我的稳定性,这就增加了说明它发展的复杂性。这里,沙利文求助于逐步成熟的需要与能力,但他的论述既没有经过精心酝酿,也不足以令人信服。确实,他提及的能力与需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些本身就构成自我发展的一部分无法用来解释自我的发展,还有一部分本来是部分地或全部地独立于自我发展之外的。需要同伴和需要亲昵很显然有它们的内驱力,但这些需要的出现与自我发展的关系甚为密切,以至于不能成为动力的独立因素。性的成熟,沙利文称作欲望动力,它的发生与心力全然无关。欲望能和不成熟的人格相结合,故而不能说明发展的动力,尽管在其他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它能导致发展的进步。语言是一种中介现象,它在自我形成的最初阶段很重要,但它不能说明其后的动力(第三章)。鉴此,沙利文补充了一个关于自我稳定性和某种意义上的辩证方法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敏感理论,但他未能对了解动力作出太多的贡献。

发展的序列

自我发展的概念无疑导源于对发展序列的观察。性格学早已有了之；有些还是 2000 年之前的。发展性格学可能发生于近期。讨论的一个目标是在迄今独一无二的研究中建立起联系与对应。

- 75 费伦齐。费伦齐(Ferenczi)的《现实感的发展阶段》是一篇经典的精神分析论文,首次刊于 1913 年,因此在作出贡献与涉及自我的形成方面有它的优先权。我们希望把有关部分加以节录与概括。自我发展这一术语只限于最初阶段是很明显的:“由于认识了自然力量而引起的对儿童夸大狂的替代(经验迫使我们替代)构成了自我发展的主要内容。”[费伦齐,(1913)1965, p.185]夸大狂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夸大狂存在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全能的感受。“由于精神分析的经验,他清楚地认识到全能的感受这一症状,它是一种观察的投射,即人们必须服从于某些不可抗拒的本能。”(p.183)当胎儿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时,胚胎时期是一个无条件的全能时期。紧接着,在出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神奇幻觉的全能时期。当孩子懂得哭泣和其他需要的表示能带来满足时,他进入了一个靠姿势来表达全能的时期。当孩子第一次学会把自我与非我加以区分时,他“设法在每一件客体中找出他自己的器官和它们的活动”(p.193);这是一个泛灵时期。费伦齐评论说[(1913)1956, pp.193~194]:

为了反对精神分析,曾有过一个讥讽的说法,按照这一学说,无意识者在每一凸出物上看到一个男性生殖器,而在

每一件凹进物上看到女性生殖器。我认为这句话说明了事实的特征。儿童的心灵(还有残留在成人身上的无意识倾向)最初只是涉及他自己的躯体,尔后又联系到本能的满足,即联系到诸如吮吸、进食,与生殖部位接触以及排泄的功能等等给他带来的快乐的满足;因此,如果他的注意力为外界的因相似而唤起他可贵经验的事物和过程所吸引,又何足怪哉?

于是,人的躯体与我们称之为象征的客体世界之间便 76
产生了亲密无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延续一辈子。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儿童在世界上除了他肉体的表象之外看不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他学会了用他的躯体来表示这一五花八门的外部世界。这一象征表示的能力使手势语言趋向完整;它不仅使儿童把那些与躯体直接有关的愿望信号化,而且能表示与外部世界的变化有关的愿望。如果儿童处于被人爱护的环境中,他不必在他所处的阶段舍弃他的全能幻觉。他仍然需要象征地表示一个客体,认为这个客体是活生生的,经常“走”到他的眼前;对一个泛灵论思考的儿童来说,在愿望得到满足时,一定会具有这种印象。由于满足何时到来不能确定,他便逐渐明白有一种更高级的“神力”(母亲或保姆);假如要在作出手势后满足立即到来,他必须获得她们的宠爱。当然,这种满足并不难求,特别是在一个为所欲为的环境中。

如上节所示,精神分析关于象征表示的概念包含着早期的图式和它们的变换。费伦齐接着说,说话开始于象征性姿势,但很快就具有特殊意义。它加速了有意义的思考和延缓动力释放的能力。由于这时儿童的愿望还不多且又简单,他周围的人很

快就能猜出并急于使之实现。儿童终于相信,是想法或词语给他的愿望带来满足。这个时期是迷信、魔力和某些宗教崇拜的基础,也是那些着了迷的父母寻求归宿的一个时期。费伦齐关于自我发展的论述止于此点。费伦齐与第二章所说的阶段之间,其比较相应的部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费伦齐、埃里克森和奥苏贝尔的自我阶段

近似的自我水平	作 者		
	费伦齐(1913)	埃里克森(1950)	奥苏贝尔(1952)
我向思考	神奇幻觉的全能		
共生的	神奇手势的全能泛灵论	信任对不信任	自我万能
冲动的	神奇的词语和想法		自我贬值的危机
自我保护		自主对羞耻与惶惑	卫星化的开始
遵奉		创造对内疚 进取对自卑	卫星化
良心—遵奉			非卫星化的危机
良心		同一性对角色传布	非卫星化
个人自由		亲密对孤立	
自主		生育对停滞 自我完善对失望	

费伦齐对自我发展与心理性欲的发展的区分如下文所示：77
“我们怀疑，神经病的愿望要素，即性欲的目的和各种变化，有赖于性饥渴这一发展阶段的固恋，而神经病的机制可能是由决定抑制时个体的自我发展处于哪个阶段来决定的。”(p. 199)

费伦齐预料到自我发展中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概略地叙述了一个精神分析立场，尽管不只一个。“一般说来，现实感的发展表现为一连串的制约，这是人类被迫采取的，并非由于自发地力求发展，而是由于必需，由于对要求自制的调节。”(pp. 78 200 ~ 201)很明显，这篇文章的观点与阿德勒恰好相反。

埃里克森。由于埃里克森(1950, 1963)的《儿童期与社会》已众所周知，我只需表明它和我们课题的关系。他的观察基于他的精神分析实践、人类学研究，以及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他用一系列任务来解释心理社会的发展或自我发展的阶段，每个任务都走向一个被描述成自相矛盾的危机。有时，这些自相矛盾被说成是代表了成就；有时，他提醒读者加以注意，在每个时期结束时获得正反两极的平衡或比率；但比率可随后来的经验而变化。这种模式，虽然复杂，并且经常被引用的人搞得过于简化(这是他所抱怨的)，倒也有利于弄清发展的层次，即从调节的方面来看，它是一种特殊的危机，一种有利的选择和无利的选择的比率。

第一个任务是从三个方面求得一个有关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测量：客体世界的连续性、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个人冲动的控制。这些是前社会阶段、共生阶段和冲动阶段的问题。埃里克森方案中的下一个问题，自主对羞耻和惶惑，构成了我们自我保护阶段的特征。接着的两个时期的问题：创造对内疚、进取对自卑，看来和遵奉阶段相匹配。埃里克森用观念和思想讨论下一个问题，同一性对角色传布，这就使得该问题相当于我们所谓

的良心阶段,虽然角色的概念与同一性处在表1的后几个阶段。再一个问题,亲密对孤立,是根据加深人际关系和发展道德意识等方面去讨论的,所以,也是良心阶段的一个方面。生育对停滞以及自我完善对失望等问题可能是埃里克森关于自主阶段和整合阶段的观点(表2)。埃里克森把危机的讨论与年龄特征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例如求爱、婚姻、生儿育女、老化等,这样,就排除了年龄范围的外部局限性的问题,而在这个年龄范围内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自我发展有可能发生。作为抽象的或作为成人生活分类学方面的自我发展在他看来是陌生的。

埃里克森把自主这一术语用来表示最初的一个阶段,而我们则用来表示最高的一个阶段。他所说的有关独立性的自觉叙述是区分自我保护的被试与冲动的、依赖的被试的标准之一。对这种不一致用法的解释在于生长的辩证法,而不是语言上的疏忽。在两个时期以及其他时候都有自主的迹象。阶段的意义不能单凭名称来提取。

最初,埃里克森提到的是自我的发展而不是心理性欲的发展,但在他的部分论述中这两个题目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对年龄特征的强调又促成了这种混淆,因为这两种发展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只有在分别说明它们的特性之后,自我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最佳描述(第七章)。

皮亚杰。虽然皮亚杰在发展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有10余卷之多,但只有1卷是和自我发展的现象直接有关的,那就是《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该书对许多学者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同沙利文关于自我发展的论述与调节略有混淆一样,在皮亚杰的著作中有一些与纯认知的发展相混淆的地方,而认知发展正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一些对皮亚杰研究的批评并不恰当,因为它们反对特殊的年龄,皮亚杰认为特殊的年龄应该具有

特定的思考方式。皮亚杰的兴趣在于序列及其辩证法,而不在于建立年龄标准。与美国的心理学家不同,他对个体差异兴趣不大,加速发展并非他的任务。

皮亚杰对儿童的道德判断进行探究,他的方法是询问儿童(或叫他的合作者询问他们)什么是说谎、为什么说谎不好;在 80 一些不端行为中哪一个最坏、为什么;在一些惩罚方法中哪一种最公正、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玩弹子的游戏规则为儿童所认可。皮亚杰要他的读者做一项思维实验(1932, pp. 348 ~ 349):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社会,它的成员彼此同龄,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前一代的制约,也就没有后一代的教育……一切基本的社会现象与当今的样子迥然不同……年幼儿童对年长及其双亲怀有敬意——原始社会的敬老习俗告诉我们,他所处的社会结构越是简单,这种在个体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单方面的尊敬越是持久。没有这种单方面的尊敬,我们很难明白这种社会制约与社会遵奉的伦理和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在道德范围里,没有儿童对成人的尊敬,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些事实,诸如礼节上的义务与禁忌、道德现实主义与客观责任。但是,人们可以再进一步做这样的推测,这种“原始心理”的明显特征可以通过儿童心理与一代人加在另一代人身上的制约效应的结合来解释,因此,原始心理可能是由于社会制约在儿童心灵中的折射。与此相反,在我们的文明中,由于以合作和个体差异作为基础,儿童的我中心的心理很难介入基本的社会现象。

皮亚杰用极化来审视道德判断,一端是他律的德性,而另一端是自律的德性。然而他承认初始阶段的无目的性。起先,婴 81

儿没有规则的概念,只是任其兴之所至。但一当他的肌肉组织能够控制活动时,他用一种反复的活动图式来玩诸如弹子之类的玩具,这种活动图式主要是由材料的性质来决定的。它是礼仪的先驱,因而也是规则的先驱。

年龄稍长,儿童就试图去模仿他的父母和年龄较大的儿童。当初次参与游戏时,他并不知道游戏的要点是取胜;他的观点是自我中心的,任何事情都用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再者,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还未区分开来。事物应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受到惩罚的就是坏的。首次惩罚似乎是事物所固有的而非人之所强求的;后来,它好像是对专横无理的报复,嗣后又让位于赎罪的观念。由于儿童不明白把自己的幻想大声说出来有什么不好,所以,除非谎言已经出口且受到惩罚,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谎言是什么,因此,谎言起初只不过是一个“坏字眼”。

他律的德性出自儿童对父母的单方面的尊敬,并且是由制约来加以实现的。儿童把游戏规则看作是神圣的,是成人所规定的。要改变规则就等于违法。这些规则的外在性意味着他并不依赖地去服从这些规则。对违法和意外事件的责任是“客观的”;这就是说,可见的损失越大,过失也越大,并与意图无关。过分的夸张较之略微的夸张是一个更坏的谎话,即使它没有欺骗人。所以,要紧的不是后果,而是对儿童来说真实的东西。

皮亚杰用来描述这一阶段思维的另一个术语是道德现实主义,意指德性存在于儿童自己的心灵之外,并且独立于他的心灵。它的三个特征是:良好的德性全靠服从来体现;必须遵守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它的精神;评价行为并不取决于动机而是“客观地”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规则。它出自自我中心,出自成人的理性制约,而自我中心意味着主观和客观的混淆。

当儿童长大了一点时,他与其他儿童的合作加强了。为了

判断儿童的发展,弹子游戏最有价值,因为 12、13 岁的孩子是参加该游戏的最大年龄者。他们懂得只要相互同意就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懂得这些规则起源于儿童,不是起源于成人,懂得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规则也有所不同。在年龄相同的儿童之间出现了一种与单方面尊敬相反的相互尊重,于是有了互惠和互惠基础上的合作。互惠是自律德性的要素。儿童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接受游戏规则;这种接受导致规则的内化。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当儿童不再相信这些规则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时候依然忠于这些规则。

处于自律德性阶段的儿童相信主观责任——这就是说,过错后面的意图是应该受谴责的。谎言是错误的,因为它欺骗了人:一个真正的弥天大谎,由于儿童看来它没有骗人,所以很难加以排斥。报应的公正让位于分配的公正。如果在平等待人与惩罚过错之间有所选择,儿童可能选择平等。惩罚不能由抵罪的需要来激发;相反使互惠得以恢复。相应地,年龄较大的儿童比之年龄较小的儿童很少选择严厉惩罚,或者,在没有不同意见或对某件事情为什么错了缺乏解释的情况下,往往主张不予惩罚。

在弹子游戏的最后阶段以规则条文为兴趣。由于具有分配的公正概念,一些大龄儿童超越平等而走向公正;这就是说,我们应该考虑到特殊情况,而不是同样严格地待人。惩罚可以完全免除。

关于这几点,皮亚杰举出了一些年长的和年幼的儿童如何推理的例子。他自己不做或容许读者去做的是经验主义地根据 83 儿童的回答来考察这些课题之间的关系。当然,年龄组之间存在某种重叠;有些年幼儿童的回答如同年长者,反之亦然。按照皮亚杰的说法,阶段的序列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他还努力把

一致和平衡作为发展动力的一部分。他认为,作为自律德性基础的互惠较之权威的单方面的尊重更适合平衡。皮亚杰不赞成这种说法,即年龄较长的儿童较高的智能促使他的道德较快地发展,他宁可相信,协作的产生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可以解释儿童智力进展。例如,交际的需要能够导致儿童编造理由。

表 3 皮亚杰的道德判断发展序列

近似的自我水平	规则的实践	规则的意识	道德的类型	惩罚的概念
前社会的	活动的图式	非义务的概念	无目的性	存在于事物内部的
冲动性	自我中心的规则 模仿长者 非竞争性			武断的报复
自我保护		规则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成人制订的	他律	抵罪
遵奉	协作的规则 取胜的志趣			
良心-遵奉		彼此赞同的、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可以改变的规则	自律	恢复互惠
良心	规则条文	重视规则本身		

由于皮亚杰并不描述阶段而分别研究有关课题的道德推理的发展,所以,要和第二章的方案相一致是不容易的。表3试图把皮亚杰所描述的发展倾向加以排列并与我们的阶段相对照。他指出,大约在意识到规则的前一年就已经在实行规则了。这种不一致性自然会导致在描述和匹配阶段时的困难和矛盾(见第八章)。

皮亚杰的解释是有倾向性的。他似乎要证明儿童的德性比成人高。有一种较低的德性,即他律,以权威和制约为基础;还有一种较高的德性,即自律,以协作和互惠为基础。不同的年龄都有可能产生他律的德性,但父母与师长,由于要求服从和遵奉,有时甚至对儿童间的协作加以惩罚,这就使得走向自律的正常步骤受到挫折,而自律又是处于民主作风下成人德性的适当形式。“如果人们考虑到学生对权威性措施的故意对抗,以及儿童为逃避纪律制约而表现出来的可敬的独创精神,人们不得不认为浪费大量的精力而不能用于协作的制度是有缺陷的。”(皮亚杰,1932,pp.366~367)

用弹子游戏作为范式是精心之作。在成人看来,弹子与德性全然无关。为什么该游戏适合皮亚杰的目的,这是因为以此为界,成人脱离了儿童开始走向自己的社会。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实验,表明儿童在脱离了成人的制约之后是怎样处理事务的,但是,那些12龄童的深奥的德性在他们成为父母或师长时又会怎样?他们又是怎样失去对相互关系的价值和互惠的顿悟而坠入他律的德性?皮亚杰不希望如此。他希望父母和师长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伙伴。

与此同时,皮亚杰认为,即使在最温和的环境中,儿童必须经过他律的阶段才能达到自律。道德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年幼儿童智力的现实主义,即他倾向于用具体而又简单的方式来观察

85 事物。人们可能因为皮亚杰的论述过于冗长而指责他；儿童的认知能力一开始就限制他走向道德现实主义，我们没有必要从父母和师长的行为中去寻找其他的解释。更有甚者，皮亚杰并不忠于他们的发展逻辑，而是要求父母和师长从儿童的早年开始就平等地对待儿童。一个幼儿，当他还在努力熟悉明显不同的规范、年龄和力量时，是不理解这些的。

奥苏贝尔。奥苏贝尔(D. P. Ausubel)反对把自我的发展与精神分析中心理性欲的发展混淆起来(他对精神分析的看法既不公平也不正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追随他的思想，而不是一种认可)。奥苏贝尔说，自我不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外层。他反对儿童性欲之说，把这种学说称之为预成说或侏儒说。“自我的发展是连续的生物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没有一种能反映由内在冲动所计划的详细蓝图的展开这一事先决定的过程或事件的序列。”(1952, p. 44)

这些观点使人想起沙利文的解释；然而，奥苏贝尔所概述的自我的早期阶段与费伦齐很相似，后者强调婴儿的全能作用尤甚于沙利文，沙利文强调的是早期的无助意识。奥苏贝尔反对沙利文把母亲的焦虑作为一种早期的影响，他说：“这种明显的父母行为的水平，较之早期婴儿的潜在姿势，远未有决定性，因为只有前者才真正是可以交际的，并且与这一发展阶段的儿童的感知能力和心理社会的需要有关。”(p. 250)

86 由于全能的感受不可能产生于自我意识之前，所以奥苏贝尔反对费伦齐的两个最初的全能阶段。前语言的经验主义的自我由于同感觉印象的关联，也由于需要满足的延缓而得到发展。母亲是第一个自我形象的支架。自我与环境的经验上的区分是通过意志的官能而得到强化的。通常，一个自我全能的时期是在自我与环境第一次作出区分后才发展的。婴儿把父母急于满

足他的需要的心理误解为他自己的“意志万能”(volitional omnipotence)的证明,即使他认识到“行政上的依赖”(executive dependence)。这就是说,他认为他的愿望是强有力的,尽管他认识到他需要别人来帮助他实现这些愿望。

占有玩具是自我形成的第一步;之后,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有所觉察,并且有了第三人称的参考;最后使用人称代词“我”。于是,语言有助于巩固这个自我。

父母开始对孩子提出要求,孩子首先“懂得他的依赖性是由意志决定的,在性质上带有行政的意味,并且懂得他的父母并不因为他无助而必须为他服务。无助不再是一种意志万能的皇家绶章,而是一种仰承他人的可以觉察的条件”(p.56)。在这一点上,儿童面临着自我贬值的危机,这些危机提出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如果他要继续保持他自己的全能观念,他就会经常受到挫折,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承认他完全依赖别人,这就会使他自己的贬值,那是痛苦的,也是他承受不了的。通常,儿童避开这两种选择,而把全能归功于他的父母,这就使他成为父母的一颗卫星,他的自尊由于光的反射而被保留下来。

奥苏贝尔评论说(pp.57~58):

对于解决自我组织的危机来说,卫星化的好处在于它有能力供给儿童以安全和适合的内在感受。他解脱了以实际的行为能力为基础的证明他的适合性的负担,而事实上这种能力是贫乏的。作为替代,他获得了一种间接的身份,这一身份与他处理现实的能力无关,而是取之于他依赖父母的事实,在他看来,父母在这方面是无所不能的。此种认同的结果是他并未如替身般地拥有了父母的力量,但分享(以高倍稀释的方式)了父母的伟大——如同一位有权势者

的扈从对身为权势者的臣下感到极度光荣。

大多数儿童的卫星倾向如此强烈,以至难以阻止,即使在教养儿童时有着诸如过分纵容的错误。有两种父母教养模式能防止卫星化,即拒绝儿童和外在评价。内在评价的儿童是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而受到评价,外在评价的儿童是因为他的良好特质而受到评价。但是,儿童的成长不能没有卫星化,卫星化的丧失可能限制一个人成为完善的人,其结果有焦虑神经病、违法、自私等等,当然这有赖于父母—孩子关系的各种相倚。

最后,成功的成熟取决于非卫星化,取决于儿童重新获得自主和新近成熟的实现能力。父母权威的废黜始于儿童进入学校,因为那时已经具有第二个权威。卫星倾向转移到家庭以外的新权威是第一阶段。有些人从未走远一步,而这种停滞代表了成熟的另一次失败。

非卫星化包括回到外在评价。意识到个人价值的儿童来自父母光辉的反映,他发现自己的价值仍在他本身能做些什么。在顺利的情况下,工作本身就是报酬。在童年后期,非卫星化适当地发生时,非卫星者可能暂时胜过卫星者;由于他的竞争,比之卫星者仰人鼻息来,得到的就更多。不过,从长远来看,最适的自我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那些开始是卫星者而后来成为非卫星化的人来实现的。

因此,自我发展中的两个危机是童年早期的自我贬值和童年后期与青春期的自我成熟。每一危机都具有失败的可能性,只不过结果不同。拒绝要比外在评价更为不愉快,因此更有可能可逆。如果父母的态度改变,或者能够找到折衷的办法,遭到拒绝的孩子通常是热衷于卫星化的。如果拒绝伴随着不管而不是敌视,则孩子的自我就有可能完全贬值。儿童本身的执拗或

屈服也有可能孕育某种后果。如果拒绝和不管相当严重,开始不一定出现全能的幻想,而是严重的情绪上的枯竭。

与卫星者不同,外在评价的孩子不必放弃他的意志万能。这是由他面对明显实施的依赖,其愿望不断得到满足来证实的。卫星者的自尊是靠他父母的评价来维持的,非卫星者的自尊只有靠他自己的成就才能维持。因此他过早地进入成就定向,然而,由于经常涉及到他自己的自我提高,这种定向很容易被歪曲。

卫星化是三个人生定向之一。另外两个是结合和探究。卫星化(satellization)是一种自居形式,在这种自居形式里,地位是通过依赖、服从和遵奉获得的。结合(incorporation),正如奥苏贝尔所使用的术语一样,是自居的一种形式,包括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并把他作为一个榜样借以加强自己的自我地位,并不伴随情绪上的依赖性。探究(exploration)把掌握任务定向作为它自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在儿童早年就已存在。通常,它在成熟期占支配地位,但各种成熟的失败能阻止这一步的产生。结合在卫星化之前发生,并对非卫星者是重要的。奥苏贝尔有时称儿童的三种类型,有时称每个人的三种潜力。

卫星化和非卫星化是自我发展的机制;其实质是享乐主义动机减弱、延缓满足的能力提高,行政上的独立性增强,以及道德责任心的发展。其中每一种都像一个极性的变量(见第六章)。

在成人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找到以真正的成就为基础的安全感。一个有过卫星化时期的人有着内在安全感的持久残余。非卫星者必须为建立在权利、地位、财富和特权基础上的外在安全感而奋斗。神经症的焦虑,这是经常由于对自尊的威胁而引起的,按照奥苏贝尔的说法,对非卫星者是一个主要危险,但对

曾经渡过卫星时期的成人来说其危险性似乎小些。

奥苏贝尔关于良心发展阶段的描述重复了他对卫星化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与我们的方案相对照(见表2)。在前卫星化时期,行为的制约和控制是建立在预期和避免惩罚的基础上的。其间并无内疚感。在早期的卫星化阶段,儿童同化父母的评价。真正的良心开始于这一时期,因为儿童接受评价而不是仅仅为了害怕惩罚,但他对遵奉的责任心是初步的。内疚,需要准确的自我知觉来觉察行为与内在标准之间的差异,也是初步的或缺乏的。在卫星化后期,不仅有父母的标准的内化,而且有遵奉这些标准的道德责任。自我批判的能力增加了。内疚作为一种对行为的制约和调节变得重要了。它由父母的责备而唤起,使儿童自主地假定他做错了事。最初的过失是反抗。卫星化的高峰期大约在8岁,从这时起,儿童开始用一般的词语来思考有关正确与错误。在早年,正确与错误是针对特殊情境而言的。皮亚杰的道德绝对论适用于这一时期,也就是说,道德责任是单方面的而不是互惠的,并且规则具有不言而喻的正确性。

在非卫星化时期,儿童获得了有关理性良心的所有主要成分。他变得很少自我中心和更多的自我批评;所以他用像其他人一样的框架来判断自己的行为。道德绝对论减弱了。他的良心变得很少权力主义和更多的互惠。道德绝对论原则获得更大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道德责任性由社会的基础替代了父母—孩子的基础。在青春期,非卫星化时期的变化走得更远。结合和探究的定向是强烈的。结合的定向来自更大的需要,即达到外在的地位。探究的定向关系到独立性、平等和自作主张等需要。同辈群体是外在的胜任感受的来源,但它也是主要的权威和残余的卫星化倾向的对象。与前青春期的那些人相比,青年人的道德信念表现出更多的权宜和遵奉,更加关心外在的地位,对成

人有更多的冷言冷语和侵犯行为,但也更为宽容和灵活。奥苏贝尔关于良心发展的解释到此结束。

像沙利文一样,奥苏贝尔把自我成熟看作是对成人人格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和危机的结果。与皮亚杰不同,他关心个体差异。然而,奥苏贝尔的自我发展观点主要是发展的而不是维度的,虽然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他并未将自我发展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用那些针对阶段和类型的普通术语提出来,也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结构。而他所描述的成分跟我们方案里的成分相似,他对各种成分的发展分别予以描述。

奥苏贝尔给人的印象是他能够隔墙进行观察;他知道每一儿童离差的因果,也知道正常发展的序列。偶尔他也承认体质上的差异可能是决定结果的一个要素,因此,其结果不完全由父母的实践和态度来决定。数据是很难引证的,因为只涉及到枝节问题。有人一定以为奥苏贝尔如同临床医生、父母、教师、学者和身历其境的观察者一样汲取他的经验。他从许多学者那儿汲取观念,但他并非总是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例如,埃里克森曾把他的心理性欲发展的方案称之为渐成说(epigenetic),这很难与奥苏贝尔的预成说(preformationist)相一致。正如奥苏贝尔所说的那样,早年的性欲并不意味着儿童和成人的性欲是一样的。人们可以不理奥苏贝尔,因为他误解了精神分析,曲解了它的术语和思想,并不主张动力无意识顿悟,但他对某些现象的盲目性可能加深了他对其现象的顿悟。卫星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遵奉的动力。

性格学

有些学者曾把自我发展的主要方面作为在特定的年龄群中,通常是成人中性格类型的出发点。至于发展过程中的差异问题可以不问,或者可以假定复杂的相倚解释了不同的结果。我们使用类型学或性格学这一术语的目的,标志着我们已经冲破了对智力和人格的心理测量法的因素逻辑。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看一下表1,立即设想各栏中或多或少独立的因素能够分别予以测量。与此相反,一个潜在的统一体中的各种迹象和现象,本身是不能直接测量的。

弗洛姆。弗洛姆和他的追随者黎士曼,主要关心社会性格,即在不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结构。这种关心导致他们强调社会和经济对性格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他决定因素。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1941)用自由和自发这些术语提出性格发展的基本问题。当一个孩子从共生的对母亲的依赖中解脱出来时,他便从强烈的约束中获得自由。于是他就面临一种抉择,即在无意识遵奉和成为一个真正的有自主的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前者的情况下,他形成一种权力主义者的性格或潜在的性格。在后者的情况下,他形成自主、获得自由来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表4表明与自我阶段近乎相应的情况。弗洛姆的概念是一种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发展的序列,因为,在权力主义性格和自主性格之间决定性差别被看作是在社会影响下童年期的道德的或存在主义的选择。权力主义的遵奉不能看作是走向自主的一个必要的发展步骤。

表4 弗洛姆、黎士曼和格雷夫斯的自我类型

近似的自我水平	学 者		
	弗洛姆(1941)	黎士曼(1950)	格雷夫斯(1966)
我向思考			我向思考的行为
共生的	共生		
冲动的		无目的性	泛灵论的存在
自我保护的		传统指引的遵奉	警觉与恐惧 攻击与权力
遵奉	遵奉	他人指引的遵奉	社会中心态度
良心的		内部指引的遵奉	攻击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	自主		和平主义的个人主义
自主的		自主	

在弗洛姆的论证中,正如其他许多人的论证一样,例如罗杰斯(Rogers,1959)的论证,有着对卢梭(J.J.Rousseau)的仿效。儿童来到人间被看作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这种自发性不一定会被母亲或父亲的严厉所压垮。也有一种假设认为每个人在原则上都能达到最高的自我阶段。与此相反,我们有关自我发展的假设,意味着规则制约冲动的控制是人格从冲动发展到自主的一个必要阶段。自发性的增强,习惯或自然地对待冲动,的确是自我发展最高阶段的一个标志,正如许多评论所赞同的那样。

如果贸然作出结论说严厉控制的中间阶段可以绕过,那是不公正的。

93 黎士曼。在《寂寞的人群》这本书中,黎士曼及其合作者(1950)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性格类型。黎士曼的无目的性的人和自主的人易于与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相匹配(见表4)。然而,在他的讲解中,主要强调保证遵奉的三种方式,这种遵奉涉及到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古代社会的特性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占统治地位的性格类型是传统指引的遵奉。这种遵奉方式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已经减弱。先是死亡率下降,结果是迅速的人口增长,在这期间内部指引的性格占统治地位。在高度的文明发展期间,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占统治地位的遵奉类型是他人指引的遵奉。

在传统指引的人群中,遵奉是由他们遵循传统的倾向来保证的;羞耻是情感上的制约;重点放在行为与习惯上。在内部指引的人群中,遵奉是由生活早期获得的内化的目标来保证的,这些目标像一只嵌入的陀螺仪一样活动;内疚是主要的情感制约;重点放在良心、性格和自我改进上。在他人指引的人群中,遵奉是由他们对别人的期望和偏爱的敏感倾向来保证的;焦虑是他们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尺;风尚取代了良心,人格取代了性格。“认可本身,不管内容怎样,在这种情境里几乎成为唯一不含糊的好办法;——一个人被认可就是好的。”(黎士曼,1950,p.66)“传统指引的儿童谋求父母的好感;内部指引的儿童要么跟父母斗,要么表示屈服;他人指引的儿童要么摆布父母,要么反过来被父母摆布。”(p.70)

黎士曼关于内部指引要比他人指引居于更早的社会进化的假设并不直接和我们的假设相抵触,我们的假设认为遵奉者要比良心者在个体发展上处于较早的阶段。这里无须个体发生的

规律。然而,在某些方面,黎士曼的描写跟我们的方案的抵触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程度。他在当代美国社会发现了大量内部指引和他人指引的类型,正如我们发现遵奉者和良心者的类型一样。黎士曼认为内部指引的人对物质更感兴趣,而他人指引的人更关心感受。我们则发现遵奉者对物质更感兴趣,良心者对内在感受更感兴趣。然而,黎士曼所提到的感受主要是赞成和不赞成,这些确实吸引遵奉者,而不是良心者。 94

黎士曼关于传统指引的概念是一种有影响的概念,它导致了对我们方案的修改。当冲动与遵奉之间的阶段最初提出时,被称之为机会主义阶段。当享乐主义和眼前利益仍然作为特征时,机会主义在用于通过这一阶段的正常儿童时仍然是一个贬词。我们有关年长儿童和成人的资料把这一可供选择的特征提供给自我保护阶段。然而,即便使用这一术语,仍感到用于这一适当的年龄的观点太嫌狭隘。年幼儿童通常表现出一种走向遵奉的仪式主义,这很容易从黎士曼的传统指引的人身上看出来。皮亚杰对儿童学习游戏规则的观察也表明仪式主义是冲动与遵奉之间的小站。

阿道诺、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莱文森(Levinson)和桑福特(Sanford)。第一个研究是获得组成自我发展核心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自我功能,即《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阿道诺(Adorno)和其他人,1950]。加利福尼亚研究小组创立了对种族中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测试,所用的方法我们不必过问,该测验在各种组织、机构和学校的男女中举行。对总人口的最高和最低的四分位数中的被试做深入的谈话。在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Frenkel-Brunswik)的引导下,两组被试的谈话数据,即那些偏见较高的人和那些偏见较低的人,被编码并予以评定。那些偏见较高的人其反应更为独特,也就是说,他们要比

那些偏见较低的人彼此间更为相似。

- 95 组与组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当前自我的态度和认知结构。那些在偏见方面得分高的被试倾向于传统遵奉、思维定型、热衷于陈词滥调、能容忍模棱两可、对那些不附和传统的人给予道德谴责。他们的人际关系通常是利用性和操纵性的,关心事物甚于感受。他们用观念化的但陈旧的词语来描述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他们有关性别角色差异的概念是传统的。他们用竞争、权力和地位来考虑他们的工作,有时还机会主义地依赖父母。

那些在偏向上得分低的被试通常是非传统的或非遵奉的。他们能容忍甚至珍惜个体差异。他们的人际关系是由寻求友谊和爱心所决定,爱心有时强烈到无法满足的地步。他们承认甚至过分地研究不利的特质和自身的冲突,包括性别角色的冲突。他们的父母被描绘成具有好的特质和坏的特质的真正的人,并且公开承认他们之间的冲突或对他们的冲突结果感到内疚。得分低的人描绘别人和他们自己的内心体验要比得分高的人更为生动。得分低的人倾向于用成就或社会价值和观念来思考工作。得分高的人在为目前的自己感到荣耀时,只看到与童年的不同;他对他的童年很少自发地做一些追溯。得分低的人对他的童年做自发的评论,并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目前的自己,在一般情况下用社会的和心理的术语解释人类的行为。得分低的妇女可能形成一种冲突,一方面在情绪上依赖男人,另一方面力求独立,以便与男性竞争。

谈话中主要的收获是根据几十例取样,男女各 40 名。男性均匀地取自高偏见和低偏见群体,但女性在高偏见群体有 25 名,在低偏见群体有 15 名。试图按年龄、政治和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背景来平衡得分高的被试和得分低的被试。

- 96 加利福尼亚的调查人员从一些有关偏见的心理动力理论开

始。谈话时间表的制订把重点放在理论上派生的“基础问题”(underlying question),并对直接提问只提出建议。读完谈话纪录后设计评分手册,所以细看一下便能把握所得到的发现。得分类别是可以推论的。例如,在男性特质的自我评价里,可供选择的是,“假男子气、决心、精力、勤劳、独立性、果断、意志力、不承认被动性等等”,大抵为高变式。“对被动性、软弱、怯懦等等自我接受的认可”,大抵为低变式(p.422)。作为另一个例子,要求评定者来判断被试的自我评价和他的自我概念是否一致。

上述有关他们的发现经过相当的筛选借以跟我们的发现相比较(第九章)。他们力求从每次观察中作出最大限度的推理。正如许多临床医生所做的那样,相比之下,我们试图在最低限度的推理水平上陈述观察。差别不仅在于这里,报告的一个发现,在为谈话数据编码时,他们的评定人员被指导去考虑不被承认的、无意识的和压抑的倾向。不管这些推理是否正确,方法论是不同的。上述概括的发现是和观察有关的发现,而不是涉及到解决恋母情结或自我、本我、超我之间关系的方法。一般说来,在我们的方案中,那些偏见高的人有着遵奉者和自我保护者的特质,那些偏见低的人有着良心和更高水平的特质。

阿道诺报告了高偏见群体和低偏见群体中“类型和综合征”,然而,与从前的发现相比,并未提及导出的方法或肯定这些描绘。类型和综合征这些术语似乎用得比较随便,并且可以互换。

在高偏见中,他提出的第一个综合征是表面怨恨。这种类型的人从外部接受偏见作为现成的公式来克服他自己的困难或使这些困难合理化。例如,他把自己的经济失败归咎于某人从而感到愉快。然而,对他来说,偏见并不是十分里比多(libido)的。 97

第二种类型是传统的综合征。这种类型也是来自外部,并倾向于定型,但它被整合为一般遵奉的一个部分。不满意已不像先前的类型那么重要,接受流行的标准是更为重要的。坚持传统的性别准则是显著的。这种人是不邪恶的或烈性的。

第三种类型是权力主义,被描述为施虐—受虐狂的、冲动的和矛盾的。对他来说,倾向性的定型是极为无比的。他一方面乐于服从,另一方面又喜欢别人服从。他具有一种过于刻板的但外在的超我;例如,有一个被试说通奸是错误的,但只是在被发现后才算是错误的。极为关心权威和控制。权力主义者和传统类型是高度偏见中最普遍的两种类型。

下一种类型被描述为“反抗和精神变态”,但最好称之为精神变态的反抗。属于这一群体的人倾向于用反抗来取代,以权威自居。他们有一种强烈爱好来宽容过度的行为,诸如酗酒和公开的同性恋。他们并不刻板,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偏见,但他们是稚气的和不合群的,因为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性虐待狂。包括在这一类中的有“硬汉”、流氓阿飞和从事法西斯暴行的无赖。当然,谈话情境并不能揭示那些行为的例子,但确实得出有关人身攻击的材料。

脾气怪僻的人是一种患妄想狂的孤僻类型的人。偏见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作为逃避精神病的一种方法。跟别人分享他的偏见,为攻击群体外的成员提供了一种社会合法性。在这种类型中可能发现一些神秘主义和迷信。

最后,还有一种操纵型,这种类型在商业、管理和技术群体中人数很多。这种人只关心有效地实现他们的任务而不管其目的之正当与否。与权力主义类型相比较,他们更加自我陶醉和空虚浅薄。对一个这样的人来说,忠诚是他所关心的唯一的道德品质,他们反对从希特勒德国逃出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不忠

于德国。

在那些偏见较低的群体中,第一种类型称之为低刻板。他们被描述为偏见者表面怨恨型的复本,虽然这种对比的根据是什么并未说清楚。刻板的人像他的对立面一样倾向于陈词滥调。他反对偏见是根据广义的、绝对的原则来陈述的,例如:“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跟某些偏见类型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对其他人的特征毫无宽容余地(曾引证过的一个例子,吸烟和酗酒)。

下一个综合征的例子,即抗议型,是完全受良心指引的。他试图纠正由偏见造成的不公正。他把每个人都看成是有罪的。他可能由于自我怀疑而感到压抑、神经过敏、害羞或苦恼。

低偏见的冲动型有强烈的冲动,但不是毁灭性的。他为各种不同的事物所吸引;因此群体内对群体外的不同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一群人包括浪子和吸毒成瘾的人、妓女、非暴力的刑事犯罪分子和部分精神病患者。这些人的思维并不定型,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能否清楚地概念化。

懒散的低偏见综合征据说与高偏见操纵的综合征相反。这类人一切听其自然,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他既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想破坏什么,但又不受约束。他并不持有定型,但也懒于作出决定。他的体验是敞开的。在非偏见的人群中最普遍两种类型是懒散型和抗议型。

最后,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这种人有强烈的个人自主感和独立感。他不能容忍别人来干扰他的信念,也不想去干扰别人的信念。他把自己个体化,也把别人看作个体。像冲动的低偏见者一样,他是易动感情的,但也是富有同情性并看重别人,把别人看作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具有道德勇气的特征。

在表5中,每一种亚类型在第二章中被严密地匹配。脾气 99

怪僻的人是被引入自我保护阶段。有关自我水平分类的信息并没有提供；也许各种自我水平的人都可能成为脾气怪僻的人。具有表面怨恨特性的人也不是很清楚地指定的；他可能属于遵奉阶段，虽然他责备别人的倾向意味着较低的水平。在低的自我水平，我们能找到有偏见的类型和无偏见的类型，而在高的自我水平，只有无偏见的综合征。高偏见者的两种最普遍的类型显然代表了自我保护阶段和遵奉阶段。无偏见者的两种最普遍的类型显然代表了良心—遵奉水平和良心阶段。存在于一个阶段内的显著不同的综合征导致亚类型的问题（见第八章）。

表 5 阿道诺的有偏见者和无偏见者的类型

假设的自我水平	高偏见型	低偏见型
冲动的	心理病态的反抗者	冲动的
自我保护的	脾气怪僻的人 操作者 * 权力主义者	
遵奉者	表面怨恨 * 传统的	严格的无偏见
良心—遵奉		* 懒散者
良心		* 抗议者
个人主义		纯粹自由主义者
自主的		

* 符号指常见类型。

出处：《权力主义人格》，第 19 章（阿道诺、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莱文森、桑福特，1950）。

在提出阿道诺的类型和综合征时,我省略了他对导致综合征的家庭群集的评语,以及对恋母情结、本我、超我的评语。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关系只有通过被试的眼睛才能知道;所以他们似乎没有提供另外的数据。反对有关内在心力和结构的推论是严肃的。本我和超我的术语是意义不明确的,在那些报告的研究中没有东西能够把它们固定在行为之中。 100

在我们的概述中省略家庭群集还有一个理由,作者可能感到心理动力的解释是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本书延伸的是别人用心理动力的术语来解释的群集,乃是普遍发展序列的阶段。为什么有的人没能比他发展得更远,需要有一个解释,但是即便他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不再变化,他的性格的许多方面仍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一个自我水平较低的人不会区分他的自我观念和自我理想,但他并不需要动力的解释;低水平的人根本不具备概念的复杂性。他们并未抑制分化;他们从未有过这种分化。很清楚,自我水平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遵奉者或阶段较低的人成为有偏见的,而有些人则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自我保护的人成为脾气怪僻的人,有些成为权力主义者,有些成为操纵者。然而,许多心理动力的解释是指向由发展序列所决定的群集。表5扼要地阐述了必须加以考虑的内容。姑且承认在自我水平和心理动力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成为有偏见的人。例如父母的偏见、群体的影响、他自己的能力、经济利益等等。但是在那些高偏见者与低偏见者之间主要的群体差异涉及到自我发展的性格,并且最常见的综合征是按照不同的自我阶段来排列的。

在《权力主义人格》一书中,阿道诺和他的同事明确否认有偏见的被试比无偏见的被试在某种程度上较少成熟。然而,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在研究有偏见的儿童和无偏见的儿童的人

101 格时,注意到与偏见有关的人格测验的项目是与区别年幼儿童与年长儿童的项目一样的。她还注意到偏见的儿童与皮亚杰(1926,1932)所描述的年幼儿童之间的倾向是相似的。“某些与种族中心主义有关的倾向是一些必须加以克服的自然的发展阶段,如果要想达到成熟的话。”(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1951,p.406)她预言研究人格的一个最有希望的方向是把发展的方法与人格的动机方面和认知方面同时存在的利害关系结合起来。

格雷夫斯。大多数商业总经理对违背工作标准的现象提出解决办法,包括调换经理或工作人员。格雷夫斯(C. W. Graves, 1966)在一篇受到普遍重视的文章中建议说,解决的办法在于更适当地把工作人员、经理和工作规范匹配起来。他的提议是作为对其他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项目而提出来的,诸如布莱克—摩顿(Blake + Mouton)的经理战略表格和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戈尔(Douglas McGregor)的公式。

在格雷夫斯看来,麦克格雷戈尔认为大多数经理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一般人都讨厌工作,如果有可能就逃避工作。他们缺乏志向、只寻求安全、宁愿受人指导。所以,他们必须受到控制,强迫去工作。麦克格雷戈尔认为如果管理建立在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之上,即努力工作是正常的,那么生产就能得到改进。外来的控制和威胁不是最理想的工作条件。如果一个人的自我需要和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就会运用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并表现出想象力和独创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树立责任心。用我们的话来说,麦克格雷戈尔是在促使管理者放弃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工人是在遵奉水平以下工作的,并促使管理者重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工人是在遵奉水平以上工作的。

格雷夫斯经过14年的研究,提出他的可供选择的观点;但他并未提出他的数据或研究方法。他把他的观点描述如下

(1966, p. 120):

成熟的人类有机体的心理是一种展开的或显露的过程,其标志是旧的行为方式逐渐服从较新的、较高级的行为方式。成熟的人类随着他的生存条件的变化当然倾向于改变他的心理。每一个相继的阶段或水平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人们通过这种平衡状态走向另外一些平衡状态……他的活动、感受、动机、道德、价值、思想和偏爱管理等等都适合那种状态…… 102

一个人并非生来或体质上就为正常的向上方向的变化做好准备,如果他的生存条件变化的话。在特定的条件下,他可能通过一系列按层次排列的行为方式到达某个终点,或者他可能安定下来,并在层次的任何一个水平或几个水平上度过一生。而且,他可能用一种特别积极或特别消极的方式表现一个水平的行为,或者他可能在某种紧张的情况下退回到层次中较低的行为方式……

在这种对人的概念中,一个雇员不是由一套一般的管理原则来驾驭的某种东西。他应该由适合他的行为水平的原则来驾驭……因此,当违背工作标准的现象出现时,我们应该先看一下生产者的心理水平和管理者风格之间的不协调现象。

格雷夫斯列出7个“人类生存的水平”,但声称大概还有更高的水平。第一种水平称作我向思考的行为。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只能含糊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为苟且偷生、疾病、生育、争吵而操心。不可能期望他们多产,他们只对赐予和照顾作出反应。这一类型的雇员很少处于有利的经济地位,但他们在不发达的

地方是颇为常见的。

103 第二种水平是泛灵论的生存。这种人相信巫术、迷信和禁忌。有关时间、空间和数量的概念发展缓慢。因此,他们只能在严格的监督下工作。做的工作是质量不一的和零星的。这些雇员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过得并不理想,但在有些工作上倒能应付,譬如美国和平队。压力和压力的威胁可能用来促动这一水平的人,只要不去触动他们的禁忌。压力对我向思考水平的人是不起作用的。

第三种水平称作“觉醒和害怕”。处在这一水平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害怕、冲动和世界的令人迷惑的力量。他们渴望一个有秩序的、可以预言的、不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位置。他们生活在一个由道德规定的世界里,并对严格规定和严格推行的准则作出反应。这些人对自主和参与并不十分欣赏。如果让他们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会选择专制。

第四种水平是用寻衅和权力的术语来描述的。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并不把自己看作为必须符合一种规定的组织计划。如果他能够,他有权来改变事物。生产可以由足够的刺激来维持,但真正的奋斗是为了权力而不是物质利益。

第五种水平是用社会中心态度的术语来描述的。当一个人获得某种基本的物质和生理的安全感时,他的兴趣转向社会而不是生理的或物质的事物。他需要一种志趣相投的气氛和舒适的工作步调,因此他可能比第三种水平或第四种水平的人少生产些,他不再像第三种水平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工作是他的道德义务。然而,集体努力能使生产率上升,尤其是当集体受到鼓励去参与和接受新的观念来弥补亏损时,情境更是如此。如果管理者用这种态度影响工人,强调增加生产率而忽视工人的人道

要求,结果是危险的。如果管理者属于第五种水平而工人则属于第三种或第四种水平,则结果更糟。如果管理者试图讨好工人,为的是满足他们受人爱戴的愿望,那么对第四种水平的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尽量“取悦”管理者的邀请,而第三种水平的工人则感到厌恶。

第六种水平被描述成寻衅性个人主义。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并不是由人的普遍恐惧来促动的,而那些处在较低水平的人则是由害怕生存、害怕上帝、害怕老板,或者害怕社会上的非难来促动的。他是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他愿意接受管理者规定的目标,但他不希望别人告诉他什么时候、怎样或什么地方去完成他的工作。他不愿遵循标准的操作程序。他是一个优秀的生产者,只要管理者提供工作,而且不用跟他商量就能计划或组织他的工作方法。大多数管理者不了解这种类型的人。如果这些管理者是属于第四种水平的权力主义者类型或第五种水平的社会领导者,则他就会威胁着他们的观点。因此,这种水平的人可能被开除或下放到某一个岗位让他的天才埋没掉。 104

第七种水平的人,可以用和平的个人主义的术语来描述,他们跟第六种水平的人相似,但较少对抗性。他的工作对他是重要的,他反对压制、反对压迫、反对约束;他在信任和尊重下顺利地成长。

类型学的提出是应用于成人的。当类型学具有层次时,格雷夫斯并不把他的各种水平跟童年的正常发展加以比较。它们显然是不同的,他的第三种水平和第四种水平等于我们方案中的自我保护阶段(见表4)。用寻衅和权力等术语加以调节,尽管更为有效,但比起“觉醒和害怕”所能做的来,也许阻碍了更有决定性的进步;然而,在成人生活中也不可能导致更大的进步。第六种水平和第七种水平就寻衅而言相差很大。和平的个

人主义可能包括良心阶段的一些人,并且更有可能包括较高阶段的所有的人。

当格雷夫斯对别人强调的自我发展不愿多谈时,却对调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用于管理和生产时,他开拓了一系列课题,这些课题都是未经探索的。当我们用一个有关自我水平的普遍量表来看待教师和他们的学生、社会工作者和他们的委托人、精神病医生和他们的病人、父母和他们的子女时,能揭示出什么呢?

发展的性格学家

105 许多学者把自我发展说成是一个序列,他们看到其过程在成人生活中有着重要的结果。这些性格学家知道每种类型必定有某段历史。沙利文(C. Sullivan)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性格中的个体差异显然不同于有关的成熟。本节的解释把该论点推进一步,使类型与阶段一致起来。

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我们的方案是从沙利文、格兰特(M. Q. W. Grant)和格兰特(J. D. Grant, 1957)的方案中脱胎而来的,他们称之为人际整合水平,但也可以称作“一般的心理发展”。他们和他们的同事曾对少年犯罪问题颇感兴趣。^[2]

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假设了一种人格的核心结构,包括在某种或多或少整合的认知方案里的经验、需要、期望和知觉。这种人格的核心是突然生长的,具有相对稳定的间隔期:“虽然在文化传播中学习是重要的,但它本身无法说明所传播的东西的特征和风格,就人对环境的情感的关系而言,也不能说明人类心理的整合特征。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文化移入和直接的学习

过程外,一个人还在他自己的内部建立起一种唯一能使他满足的,也是他能控制的目标、价值和愿望的整合系统。没有这种简化和整合,则激动着他的刺激的复杂性将是势不可挡的”(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1957,p.374)。

发展促进了对他人的认识,促进了知觉和认知的区别,促进了精确的知觉和更有效的操作。在每一个连续发展的水平上,他们描述核心问题,儿童在正常时间通过一个阶段的特征,处在该阶段的成人的特征、典型的焦虑,以及违法的可能性。 106

在水平一,核心问题是分离的整合。婴儿必须先掌握自我与非我的区别。他们对现实、不可思议的思想、迷信,以及立即得到满足的共生关系的需要等等,都不易理解。不大有人试图去完成或解决问题。处在这一水平的成人总是陷于困难之中;他们有时进了精神病院,或者进入诸如流浪汉营地那样的边缘团体,但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并非全是精神病患者或流浪汉。

在水平二,核心问题是非我区别的整合。开始区分人和物的差别,但两者都被看作是使自己满足的手段。处在这一阶段的人不断提出需要。“在他掌握物体、情境和人的需要里,他将屡次落入一种不成熟(*crude*)的操作模式,倾向于把别人作为工具,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感受,也没有顾及对他们或自己的后果。”(p.378)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结果就会发怒、焦急、离开现场,或者表面上显得屈从而内心却郁积一团怒气,但跟别人没有实际的交往或予取。法律、规则和惩罚被解释为仅仅是拒绝满足。当这一水平的人进入成年生活时,违法和流浪是常见的。

在水平三,核心问题是规则的整合。处在这一水平的儿童发现世界是由规则治理的,但规则是任意的、独特的,并且是施行控制的一种法宝。处在这一水平的成人“把了解别人的行为

纯粹作为一种对他自己操作的反映,并寻求最终的和绝对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将确定哪些东西是他所期望的、哪些东西是他必须避免的,以便他以后能够乞求于规则来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如此才能控制别人,正像他感到被人控制那样。”(p.379)

107 在这一水平有两种成人,骗子(即欺诈的人格类型)和遵奉者。两者都对迅速而又容易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感兴趣。他们都害怕因违反规则而被捉住,他们并未体验纯粹的内疚感,虽然他们可能说他们有这种感觉。所以处在这一水平的人有一种客观化的超我。他们不承认有问题或情绪,他们在表面上是心理健康的,没有典型的神经病症状。人际关系被想象成人们彼此把对方变成傻瓜,至少水平三的骗子是这样的。他们倾向于从权力角度看待人和事,其反应或者是表面屈从(遵奉者),或者是挑战、斗争和篡夺权力(骗子)(沃伦,1969)。

水平四的核心问题是反应的个体化。处在这一水平的人,把自己看作是不同于准则和不同于具体的人,而不是把自己与准则一致起来(沃伦,1966)。水平四的人的早期特征是“紧张、怀疑、迷惑,有时敌视,总是焦虑不安”(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1957,p.382),现在则作为神经症的亚类型(见第八章)。

在水平五,核心问题是持续性的整合。人们是根据模式来看待自己的行为 and 别人的行为。他具有神入和分化角色概念的能力。当他开始从过分紧张的自居中解放出来,他能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别人,把他们作为复杂的个体来反应。“然而,他自己的角色的模棱两可性可能唤起他的焦虑不安;他可能为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不相容性而感到心烦;他可能感到泛化,即对他的角色哪一个基本的,哪一个是‘真我’而感到疑惑。”(p.384)

在水平六,核心问题是自我一致的整合。这种人具有自我一致的意识,而不管他所扮演的角色有否变动,也就是说,他跟

别人的关系有否变动。把自我和角色分开,使成熟、长期目标和人的关系成为可能。

在水平七,核心问题是相对性、运动和变化的整合作用。这种人在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看到整合过程,增强了他理解应付那些在较低水平上起作用的人的能力。这些阶段跟我们阶段的

108

表6 沙利文、格兰特、格兰特、帕克、科尔伯格、布尔、佩里的自我阶段一类型

近似的自我水平	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的整合水平	帕克的性格类型	科尔伯格的道德基础	布尔的道德类型	佩里的智力—道德范例
前社会的	1. 分离性				
冲动的	2. 非我的区别	非道德性的	惩罚与服从	无目的性	
自我保护的	3. 规则(骗子)	权宜的	朴素的工具主义	他律	两重性
遵奉者	3. 规则(遵奉者)	遵奉者	良好关系和赞同	社会法则	前正统的多重性
良心—遵奉	4. 冲突和反应		法律与秩序		多重性
良心		非理性的良心	民主契约	自律	关系主义
个人主义的	5. 连续	理性的一利他主义的	良心的个人原则		
自主	6. 自我一致性				信奉
整合	7. 关系				

最有可能的匹配见表 6。

- 109 解释这些水平与别人研究之间的许多区别的一种方法是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对每一水平上顺应不良者的研究,而其他一些研究,包括我们的研究,主要涉及到顺应良好的研究。他们并不提供愉快的、本性良好的、信赖别人的、高尚的遵奉者,也不提供顺应良好的、有责任心的、成就定向的良心者,这种良心者缺乏那种能把自己升到水平五或更高水平的顿悟;但这些可能是一般成人人口中两种最普通的类型。沃伦和帕尔默的近期研

上有许多表现形式。这些表现水平可能具有易变性,但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这种特征水平,也就是说最高潜力,是相对稳定的。发展的连续性要比其他生长序列长些,也许进入生命的第四个10年。

在最低或 Z(Zeta)水平,这种人在感情上处在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婴儿的水平。很少有成人在这水平上操作,除非在生病或极度紧张时。处在这水平的人能够从知觉和理性上但不是从感情上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幻想表明还不能在自己与别的客体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甚至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作出区分。“处在这水平的幻想趋向于贫乏、无生气、非人格。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感受,或者影响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在这水平只有一点儿‘生活的规则’,而这一点是无法适应世界的真正复杂性的……感情上的盲目性如此局限,以至于处在这水平的人在试图理解和预料他们周围的事件时,往往产生混乱、迷惑和毫无头绪。在某种程度上,对较为发展的人来说所能看到的环境的一部分,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不存在的。”(p.16)

在 ϵ (Epsilon)水平,感到自己跟别人有所不同,但没有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相互作用。这种人看到他自己的需要和困难,但没有满足或求助别人的可能性。感受可以像处在更高水平的人那样紧张,但“它们是无意识的,被接受的,没有具体的人类对象,虽然与部分客体发生关系。满意和满足都在自身内部,而跟别人无关……在幻想中,甚至身体的相互作用都不存在”(p.18)。

在 δ (Delta)水平,认识到人际的影响,但它们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作用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相互作用。反应是看不见的。111
不像 Epsilon 水平的人那样,Delta 水平的人不仅想要什么东西,而且主动争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别人自居和真正的社会参与

是其他一些新的因素。幻觉包括(pp. 19 ~ 20):

从别人那里得到或被别人剥夺掉;控制别人或被别人控制;作出努力以保证进一步获得;拼命去获得满足,不惜陷害、坑人、抢夺、欺骗、越轨;或者在得到别人的便宜时避免被人捉住。这里既有顽强和抗拒,可能也有服从,主要是出于害怕的反应。

被证实的影响是高度人为的,而不是非人为的。影响包括羞耻、厌恶、害怕、焦虑、发愁、愤怒,或任何一种其他东西,这些都需要相互作用,但不需要理解或考虑对方。当看到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时,他们都倾向于被看作为一个人:这总是一般的而不是个别的。当看到一群人时,就把他们看作具有统一的心理和统一的感情反应。这里有一种倾向,即把人看作是属于群体,因为还没有看到独特性.....

戏弄人、恶作剧、骗局、惩罚,或使用暴力是控制的方法.....跟别人竞争似乎代表了一种控制的获得,或权力的获得。有时是使自己的安全免遭伤害的一种方法,或者保证食物供应或其他满足。竞争可以采取对自然力的抗争形式或经济施予的一般倾向,但即使这些,其中也有斗争的因素,以保全被压服和被控制.....当认明接受者之后,可能出现某种行善和给予,所以象征性的对自身行善,或给予自己是行得通的。

112 在 γ (Gamma)水平有一种双向的人际关系的知识。形式和法则对冲动的控制来说是重要的。Delta 水平的人体验到自居,怜悯别人,Gamma 水平的人却能真正同情别人。按照艾萨克斯

的说法, Gamma 水平是社会上为数最多和占支配地位的水平, 艾萨克斯描述 Gamma 水平有如下说法(pp.21 ~ 22):

把别人作为一个人来考虑, 认为他也有需求, 也有个人的感受, 而且两者可能跟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有所不同, 这一事实为行善、给予、爱某个人、跟我们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提供了基础。施舍变得跟获取一样重要, 虽然获取在施舍之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人们通常把现在的给予以便随后的获取看作为潜在的动机。等待获取的能力已经得到发展。Gamma 水平的迹象是: 开始替人着想、和蔼、体贴别人、慈悲、助人、细心照顾别人、合作、愿意跟别人同甘共苦。达到 Gamma 水平的其他一些迹象是对 Delta 倾向感到内疚, 讨厌自己或别人有 Delta 倾向。

在 β (Beta) 水平, 有一种“从给予和获取的倾向性升华到一个更客观的境界, 即不受自身的局限, 用某种观点看待自己周围的活动, 包括自己的活动”(p.23)。这种人对自己和别人的感受有一种较为分化和复杂的知觉, 并觉察到人际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模式。或许是因为“努力克服了获取的罪恶感”(p.23), 他们对内疚很少关注。“这一水平的中心是把自己和别人最后从内部心理上分离开来。在试图修正和重新整理早先自居的各个方面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着对那些暂时把自己内部的斗争力量人格化的人开展斗争”(p.24)。 β 水平为从内部限制中解脱出来而进行的奋斗看来可能与 Delta 水平为反对自我界限的侵犯而进行的斗争相像, 但仅仅是表面相似。随着自己和别人的现实知觉日益增强, 对别人的体谅也更为真诚, 比之较低的水平来, 对真正的长期的自身利益也更为有利。

在人际成熟水平,即 α (Alpha)水平,“为个性而奋斗已经过去,因为自己的个性和别人的个性都已被认识……不再像 Delta 水平那样为自由而奋斗,也不像 Gamma 水平那样为内疚而奋斗,更不像 Beta 水平那样为控制和规定自我界限而奋斗”(p. 26)。“不再像 Beta 水平那样为别人的感受所限制,不像 Gamma 水平那样要求帮助别人,或者像 Delta 水平那样要求控制别人。”(p. 28)从早先水平的斗争和需求中解脱出来,使 Alpha 水平的人“有大量热情可派上用场,而且能以充分的感情鉴赏其他人的个性,并且意识到其他人的人格的不同方面”(p. 27)。

艾萨克斯认为,他的概念不是一个隐伏着混乱的行为主义的概念。他并不把行为分成预期特质的迹象和样本。当前的人际关系并不表明关系能力,因为他的目标是前意识的感情态度。然而,除行为外别无接近之法。对 TAT 的反应是行为,但行为是被用来作为一种迹象而不是引起争论的特质的一个样本。这里已被省略的艾萨克斯的许多主张,使用了这样一些术语,它们无法揭示能为他提供信息的行为(包括所报告的幻想)。

在表 7 中,对艾萨克斯的阶段和我们的阶段做了一个比较。他对他的 Beta 水平比起良心阶段的特征容许更多的自我顿悟;他的有关 Beta 水平的说法与良心阶段到自主阶段的过渡十分一致。他对 Alpha 水平的描述,像许多阐述中的最高阶段一样,是过于理想化的,好得几乎无以复加。遵奉者用 Gamma 水平来代表,但良心者由于缺乏对自己的顿悟而没有列入这一系统,这种疏忽,我们在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的文章中也注意到。表 7 和图 1 取自他的表和图,表明某种发展的内在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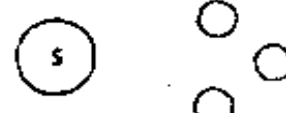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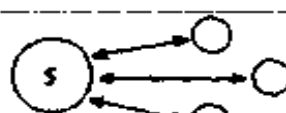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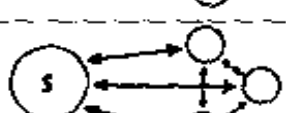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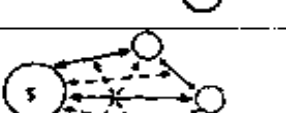
帕克(Peck)。在有关正常青少年的纵向研究中,帕克[帕克

表 7 艾萨克斯关系水平的特征

近似的自我水平	艾萨克斯水平	自制的基础	关心别人	理解别人	客体、关系、能力
前社会的	Zeta z	并非内在的基础			无客体的关系
冲动的	Epsilon ϵ	害怕惩罚			部分客体
自我保护的	Delta δ	害怕惩罚	害怕；有求于别人	自居（认同）	尝试全部客体
遵奉者	Gamma γ	为了相互满意	反应形成，同情	同情	解决全部客体
良心	Beta β	对别人情感的鉴赏	认识自由	神入	非自居（认同）的客体
自主	Alpha α	尊重自我概念的个性	尊重个性	神入的升华能力	内在客体不再重要

出处：《关系，一种建议的结构和证实它的方法》（艾萨克斯，1956）

和哈维斯特（Havighurst），1960]曾提出过一种道德品质的动机概念。他的思想受到弗洛伊德、荣格、沙利文、霍妮（Horney）、弗洛姆的影响。帕克描绘了五种人物类型，每一种类型代表心理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五种类型打算囊括所有可能的适应模式。他把这五种类型与心理性欲发展的阶段相对照（艾萨克斯否认这种相关），引出的一个课题留待第七章讨论。帕克的概念强调在行动中表达出来的控制和动机模式，看来这和艾萨克斯的非行为的强调相反；然而，帕克和哈维斯特的评定人员被鼓励去包括“未能足以导致明显表达的动机”（帕克和哈维斯特，1960，p.228）。

近似的自我水平	关系水平	人际图解
前社会的	Zeta ζ	
冲动的	Epsilon ϵ	
自我保护的	Delta δ	
遵奉者	Gamma γ	
良心	Beta β	
自主	Alpha α	

注: S 指自我; O 指条件

图 1 艾萨克斯的关系发展图

由于每个人的行为都含有易变性,这 5 种动机模式也就构成了个人性格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按照占支配地位的组成部分来分类。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并非所有的例子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们是按照组成部分的模式来分类的。请记住,没有一个人完全是一种类型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帕克对作为纯粹的或理想的类型的每一个阶段所做的描述。

非道德的类型相当于心理变态的人格。他是冲动的、难以管束的、自我中心的。他没有内化的道德原则或良心。把别人看作是满足他自己的工具。如果一个处在非道德水平的成人基

本上是敌意的,则他可能成为违法者或刑事犯;如果他不是敌意的,则他可能会讨好别人,但毫无责任心。这种类型在出生后第一年是正常的。

权宜类型也是自我中心的,也没有内化的道德原则或良心。他把别人的反应和幸福仅仅作为进一步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手段。当他的个人目标包括有利可图的名望或社会表扬时,他的行为有可能像较高水平的行为,表面上遵奉道德原则。与非道德的人相比,他看到遵奉社会规范的好处,但他可能在遵守规范和追求私利这一矛盾的情境里失检,并且不会被人捉住。这种类型在许多年幼儿童中是常见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用奖赏和惩罚来控制。

117

对遵奉类型来说,一个普遍的内化原则是群体中其他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严格地遵循具体的行为准则。当他犯规时,他感到痛苦的不是内疚而是害羞,害怕别人非难。他有基本的良心,因为他对犯规感到不安,但他没有抽象的道德原则,也不关心他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如果遵循规则得罪了别人,他不感到内疚,也没有责任心。他可能对有些人友好,对另一些人残忍。这种类型发生在童年的中期和后期,与皮亚杰的他律道德相像。

非理性—良心类型有内化的和抽象的道德原则。当他违背了这些原则,他感到内疚。这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别人的非难使他痛苦,而是违背了他的刻板的超我。非理性—良心类型被判断为像遵奉者一样的发展水平。

理性—利他主义类型有稳定的道德原则,现实地评价他的行为结果,并且按照有利于别人幸福和自己的幸福来行动。他的良心或超我是坚定的,但他在实行规则时又是灵活的。他能认识到别人的感觉,但他并不会丧失观点,从而以别人自居。他

具有顿悟,并正确地对待自己。他对工作抱建设性态度,并把社会生活看作是对共同目标的协同努力。他能判断一个人的特殊行动,而不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赞赏或谴责。他尊重每个人的完善,并且对所有人都如此。他是自发的和有理性的,他的情感是适当的,没有非理性的焦虑或内疚。“他是成熟了的,在情绪上‘善于调节’,并尽力发挥他的建设才能。”(p.9)帕克和哈维斯特承认理性—利他主义的类型是理想化了的类型,也许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并稳定地保持它。表6呈现了与帕克的每一种类型近似的自我水平。

帕克的概念既不包括最低也不包括最高阶段。而理性—利他的人则有一些最高的自我水平的特征,他有的是美德,并无问题。至于处理内部冲突的问题(有别于痛苦的冲突)、角色概念的问题、同一性的巩固问题等等在这一方案中是不出现的。因

被试“是根据他们的类似于这一模式的性格比例而被鉴定的,运用这些方法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期男孩和女孩的年龄”(pp. 9 ~ 10)。这种说法意味着年龄相倚的评分,这就违背了发展性格学的逻辑。

科尔伯格。科尔伯格的理论著作(1963, 1964, 1969, 1971)为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中心概念。由于他的观点广泛可用,我们的综述是简洁的。科尔伯格关心的是道德品质的发展。119 不像帕克,科尔伯格着重把思想意识而不是行为作为结构的核心。当他解释皮亚杰理论的细节时,他肯定了他的影响,也肯定了鲍德温、麦独孤、米德的影响(第十一章)。科尔伯格断言儿童道德判断是在一个预先注定的序列里作为一种认知和情绪的重组功能而发展的。他把他的观点和社会学习理论相对比。社会学习理论代表了不同的道德风格,它是由训练来直接标志的,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内在的逻辑而无须父母和其他权威施教的东西来发展的。

所有研究人员必须确立有关他们结构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研究道德发展的人必须与哈桑(H. Hartshorne)和梅(M. A. May, 1928)早已闻名的发现竞争,哈桑和梅认为儿童的欺骗和不诚实的情境无关,并且和儿童对他们的错误所表示的看法无关。科尔伯格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重点从道德判断的内容转移到它的形式。那些随着年龄而变得日益有道德的东西,不是受谴责或赞许的特殊活动,而是儿童的理智及其对情境的构造。科尔伯格证明自我变量受到成熟过程的影响(有时他把这一过程确切地描述为自我发展,有时又称作自我力量,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因为埃里克森和别人已警告过,自我力量基本上不是一个成熟的变量。儿童有他自己的适合其年龄的自我力量)。

科尔伯格的主要手段是采用典型的、不完整的道德两难故

事。例如,一个男人的妻子如果不服某种药就会死去,而他没钱去买此药。他是否该去偷?故事是在个别谈话时呈现的。要求儿童读完故事并提出他们的理由。仅仅是根据提出的理由来打分。对阶段或类型的最初阐述来自 72 个正常的男孩,年龄为 10 岁、13 岁和 16 岁;后来又对不同文化的各种对象进行研究。

120 科尔伯格从麦独孤的道德发展阶段开始(第十一章),他把它概述为前道德水平、世俗的角色遵奉水平、自我认可的道德原则水平。在这 3 个水平中,科尔伯格又将每一水平分成 2 种类型。这 6 种类型的道德定向代表了他的阶段。

他区分出大约 30 种道德方面,诸如道德活动的动机、人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基础、尊重权威的基础。有时他把它们称为“方面”(dimension),但他是在假设一个方面,其他许多方面只是表现形式而已。这 6 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在道德的每一个方面有一个表示态度的特征。在他的记分手册里记录着对每一个阶段的反应进行打分的文字说明。

类型一是惩罚和服从的定向阶段,除了由外来约束所强制的具体规则,没有责任或道德的概念。惩罚被想象为不具人格的报复行为。地位高的人或权威是不受规则约束的。权威是由年龄、大小和权力来衡量的;尊重权威仅仅意味着服从。并不关心别人的幸福,除了避免禁忌的活动之外。人生的价值可能和物质占有的价值相混淆,或者根据人的地位来标志。

类型二是朴素的工具性的享乐主义,遵循规则是为了获得奖励和好处。这是相互作用的开始,但严格地建立在针锋相对的基础上。有权从别人的错误中获得好处;他对别人的痛苦没有责任。权力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至于行使这种权力可能干扰别的权力那是管不了的。如果已经有了物质上的赔偿或者其他的解决办法,惩罚是不需要的,抵罪性的惩罚被解释为受

害者的报复。

类型三是和别人保持友好关系并获得别人赞许的好孩子道德,他循规蹈矩以避免受人非难或惹人讨厌。对别人有真诚的同情,喜爱别人,并且保持忠诚。责任是根据习惯式“自然”来定义的,但为了忠诚偏离规则也是允许的。人没有权力去做坏事。道德的互惠是基于感谢而不是一对一的交换。权威是理想化的。 121

类型四是维护权威的道德,人们循规蹈矩以避免受权威的谴责和造成内疚。法律要求不折不扣的服从,因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它维护分配的公正。偏离规则是对遵循规则的不公。对整个社会最好的东西具有合理的评价。就地位身分而言,触犯道德和法律是不正当的,但就情境而言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惩罚被看作为抵罪,支付所欠的社会债务。惩罚教育了罪犯,他做错了事就得让他感到追悔。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否认道德冲突的可能性,正如处在较低水平的人所做的那样,除了规定的角色责任外,他们并不感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有责任。权利就是要求,是一种合法的期望,通常是挣得的。在一个有关权利和责任的明确的道德或宗教的秩序中,生活有其神圣的地位。

类型五是契约的道德和民主地接受法律,人们遵循法律以维护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根据社会的幸福来进行判断的尊严。法律要求服从,因为法律是民主过程的产物。互惠实现了社会契约。分配的公正是根据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来设想的。权威的地位不同于掌握地位的特殊人物;对权威的尊重是基于选择的质量而不是其身分。惩罚有助于恢复名誉;实施惩罚对法官来说是一种契约的义务。人们除了坚持角色和身分的权利外,还有一般的人权,包括生存的权利。

类型六是良心原则的道德,一个人遵循原则以避免自我遭

122 责。责任是良心的内在动力。一个人要对他的行为结果负责,也要对该做而未做的行为负责。道德原则是普遍的原则,从中可以派生出具体的规则。互惠不是根据契约而是根据需要,以维护个人的信任,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条件。人生的神圣代表了尊重个人的普遍价值。

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问题上使最高自我阶段的轮廓弄模糊了,从道德态度来看,最高自我阶段和良心阶段是没有区别的。自觉处理作为一个内部问题的道德冲突,对我们的自主阶段来说是典型的,在类型六的描述中却没有强调,但在说明该思想的水平中仿佛是强调的。在科尔伯格的阶段和我们的阶段之间近似的对应表 6 中显示。

科尔伯格提出了与阶段的序列和序列的不变性这些方法论问题有关的证据。他的被试被归入和他们的思维形式水平相一致的阶段,大多数在形式阶段以外打分的思维存在于他的被试的两个邻近的阶段(科尔伯格,1969)。一个纵向的研究表明,在测试错误的限度内,被试或者停留在同一水平或者在水平上前进。然而,为了维护这一模式,必须对阶段的定义略加修正(科尔伯格和其他人,1973)。他测量道德发展的方法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进一步考虑。

布尔。布尔(N.J. Bull, 1969)提醒我们,道德发展的概念大部分是 20 世纪的。在以往几个世纪里,一直认为儿童的良心是先天的,结果,他们的不端行为被粗暴地裁定。布尔把道德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无目的性、他律、社会法则和自律。在从每一个阶段步入成年生活的人当中具有各种类型,每一个阶段坚持一种道德判断的模式,直到它超过这一阶段。所以,这种概念是一个真正的发展的性格学。布尔把良心看作为是起源于社会的,并且是人的一种功能。在他的概念中所缺乏的是结构的见解。

布爾的被試是 360 個學齡兒童,男女均有,從 7 歲到 17 歲。他給他們一系列測驗,大多數是通過個別談話來提供的,但也用某些紙和筆測驗作為補充。許多道德問題是通過類似皮亞杰的談話方式來呈現的。它們包括偷竊、欺騙、說謊和生活價值等問題。布爾表明兒童的水平部分取決於情境或問題。他並未提供方法把亞測驗中的發現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一個人的起作用的特征水平。123

無目的性是一個前道德階段。行為是本能的,受愉快和痛苦的制約。在這一階段,由於愉快和痛苦的引導,出現了某種學習和適應。在某種意義上,他把這個階段說成是權宜的,不過這個標籤在邏輯上更吻合下一階段的描述,或者階段與階段之間的過渡。

布爾提醒我們說,康德認為他律(heteronomy)這一術語是指來自外部的德性,自律(autonomy)是指自由地接受的德性,因為是由內部引出的。他律是外在的道德。它的約束力是獎勵、懲罰和害怕被發覺。他律的目的是訓練兒童來控制他天生的衝動。在它的初始階段,過錯是用懲罰來鑑定的。過錯不被發覺或不受懲罰,則做壞事就算不了什麼。當原來的特殊禁令成為普遍的規則時,他律就向下一階段發展,即向社會法則發展。

社會法則是外部—內部的道德。它包括這樣一個階段,道德判斷是由和別人的關係,特別是和伙伴的關係來形成的。因為涉及到合作,自我中心減少了,一個人感到自己是群體中的一分子。開始有義務和責任感。自尊開始取代害怕而成為道德行為的動機。制約是稱贊和責備,公眾意見代替了父母和其他權威人物。其他一些動機包括害怕在社會上孤立,包括同情和建立互相友愛基礎上的利他主義。在社會法則階段,內部發展開始了,意識到別人、和別人的關係、對他們負有的責任,以及行為

的法则。社会法则是社会遵奉的阶段。皮亚杰所说的可逆性大部分属于此,虽然这一术语本身有点含糊不清。可逆性既可以用于严厉的报复,以眼还眼,也可以是真诚的合作。内疚取代了害怕,作为这一阶段的一个制约,转而为下一个阶段的更加发展的良心开路。

124 最高阶段是自律或内在的道德。情绪自律意味着脱离家庭的束缚。价值自律包括批评传统的规则。行为自律意味着自己作出决定。自我判断、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是自律的所有方面。在这一时期,良心的成长包括非理性的超我,抑制和压制冲动,有意识的自我理想,以及来源于爱而不是害怕。

布尔反对皮亚杰关于他律是自律发展的绊脚石的看法,他律是自律必不可少的先行者。据布尔认为,皮亚杰过分重视相互尊重而对自尊作为道德自律的基础却重视不够。布尔坚决主张自律是以他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可逆性为基础的,正如皮亚杰所认为的那样,看来这与承认可逆性或社会法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阶段颇不协调。布尔的“紧跟父母、教师和传道士”似乎跟皮亚杰的“打倒父母、教师和传道士”一样具有倾向性。

布尔的阶段和我们的阶段之间的近似之处在表6显示。布尔并不关心我们的最高阶段的特征问题,确实,他提出的道德发展在17岁之后就不再发展了。

关于布尔的经验主义的发现,也许最有趣的是女孩在年龄13岁到15岁这一时期比男孩成熟得更快。他进一步证实了皮亚杰的发现,即儿童并不认为欺骗是道德过错。这一证实是重要的,因为许多关于道德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哈桑和梅的研究基础上的,即把欺骗作为典型的道德情境。

豪。豪(L. p. Howe)的发展性格学出现在一些著名的性格学之前,但大部分未出版(霍尔特,1948;豪,1955,1970)。她可

能是第一个注意到米德和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理论作出相似贡献的人,对此,我们将加以讨论。像帕克一样,她在自我阶段和心理性欲阶段之间建立了一个暂时的一致性,但我们决定把它省略,因为这也许是错误的,并且肯定是没有经验根据的。 125

豪的第一个自我阶段称作自然阶段(physical),其动人的原则是被动—依赖的婴儿对其主动、哺育的母亲的一种原始的移情的自居作用。关于这个阶段,和所有其他阶段一样,她认识到某些贯穿生活的早期痕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积极—消极的方面,导致帮助、支持和保护。这个阶段的病理学形式是基本上无责任感。虽然豪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的,但人们可能假设她所说的病理学形式是指沙利文的含有恶意的转化,以及超过适龄时期仍停留在某个阶段。自然阶段相当于我们方案中的前社会阶段和冲动阶段。

豪的第二个阶段是力量依赖阶段。对占有的兴趣、控制、受控制、反抗是这个阶段的重要方面。社会现象包括师徒关系和尊重大人物与传统。病理学形式包括权力主义、对作为威胁的地位和权力的成见、强迫的仪式主义。这个阶段相当于我们的自我保护阶段。

豪的第三个自我阶段称之为平等寻求。服从有权势的人部分地为尊重规则所取代,规则是人人要遵守的。社会现象包括尊重真理、正义、光明磊落和群体团结的意识。病理学形式包括种族中心主义、过分遵奉、反抗遵奉、偏见、妒忌竞争。这个阶段相当于我们方案中的遵奉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目标定向。目标部分地取代了作为个人和社会组织基础的规则。社会现象包括合作和指向民主协商的目标的技术过程。在平等寻求阶段,甚至更多地在目标定向阶段,对成人的自居作用在功能上是以关系的相对性,而不是像前两个

阶段的情况那样,以个人的和感情上的联结为基础的。豪把两种类型的自居和弗洛伊德的主要过程与次要过程之间的区别联系起来,早先的形式显然是荒谬的,后来的形式显然是合理的。

126 目标定向阶段近似于向良心阶段的过渡,可能也包括良心阶段。

在豪的方案中,最高阶段称作价值定向。它具有理想、正确观察、承担义务、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不断扩大兴趣和价值的可能性等特征。这个阶段相当于我们方案中的良心阶段以上的所有水平。

佩里。在所有的自我发展的方案中,对大多数大学生最具刺激性的是佩里(W. C. Perry, 1970)的方案。他报告了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哈佛大学研究商议所有顾问会见了 1957 届四年级的 17 名学生。谈话未经组织,开始提一个问题,例如:“请你讲一讲在这一年中你最突出的是什么?”第二个一般性的问题是:“照你刚才说的,你是否记得任何特殊的事例?”提问者的进一步话题都是在学生提供的论题中找到的线索,并试图弄清他的一系列思想。

佩里的方案是一系列方式的编年史,学生从中分析他们的体验,特别是有关知识的性质和来源,有关价值和责任,即思想变化的发展。由于受到加利福尼亚有关权力主义人格研究的影响,佩里和他的同事开始探讨学生的类型或世界观,从那些纯两重性的和绝对论的思想到那些相对论的和相倚的思想。在研究了 1957 届的完备的谈话纪录后,佩里发现了一组有局限性的立场,学生是从这一立场来观察大千世界的。而且,还有一种发展的序列,它是由立场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连续谈话的顺序来规定的。然后把这个方案应用到对 1962 届和 1963 届学生的研究,结果令人满意。

佩里简略地介绍了他的论题(1970, pp. 1 ~ 2):

让我们假定一位讲师,他宣布今天将考虑 3 个理论——(不论他的论题是什么)。学生 A 总是认为知识含有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每个问题应该有正确的答案,教师解释这些答案以供学生学习。因此他来听讲师陈述他该学习的那个理论。 127

学生 B 作出同样的假设,但认为教师有时提出问题和步骤,而不要提供答案,“这样我们能学会靠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因此,他把讲课看成是一种猜谜游戏,要他“猜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猜谜游戏是很公平的,只要讲师不要把问题阐述得太晦涩。

学生 C 认为一个答案只有根据其上下文才能称作是“正确的”,而上下文或“参照构架”是不同的。他假设一首诗的几种解释,一个历史发展的说明,或甚至有关物理学中的一类事件的理论可能“有赖于你怎样去看它”。虽然他觉得在这样一个万花筒的世界里有些不自在,他还是假定讲师可能提出 3 种合理的理论,这些理论能够检验它们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的范围、它们与各种数据的吻合程度、它们的预示力等等。

不论讲师怎样做(根据自己的设想和意图),这 3 个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体验,涉及到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和责任的不同评价……

B 的假设形式包括 A 的形式;而 C 的假设以不同的更广的形式包括 A 和 B 两种形式。很明显,在这一讲师要做的事件中,每个学生的不同处境是符合其他学生的预期的。例如,学生 C,面对着 A 或 B 的任何一个所预期的讲演,在准确地解释这一体验时没有多大困难,不需要修改他的关

128

于学习性质的基本假设。他的假设合乎逻辑地扩展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特定的讲师可能“有这样的观点”,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然而学生 A,面对着 B 或 C 所预期的讲演,或者修正他的基本假设,或者用这样一种方法,即“讲师到处讲演”或“这跟课程根本没有关系”来解释这一体验。

因此,阶段的序列不是任意的,也不是选来迁就佩里的个人价值体系的,而是由情境的逻辑来决定的。而且,个别的学生倾向于从 A 的立场发展到 B 的立场再发展到 C 的立场。对阶段序列的一个比较微妙的证据看来和该序列的偏离有关。

立场一,是基本的两重性,世界是用两重的术语来描述的,正确对错误、好对恶、我们对别人。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权威人物是知道的,他们的任务是来教导别人。知识和德性是通过服从和努力工作一点一滴地积累的。差异是看不出的。

立场二,是前正统的多重性,学生看到意见分歧,但不作为合理的不确定事情的迹象。他可能把多重意见看作是权威人士布置的一种练习,“这样我们才能学会如何来发现答案”,或者把分歧解释为别人的混乱和错误的象征,即别人是错误的。这些遵奉者屈从于这样的一种立场,把自己对权威人士的自居看作是正确并且具有绝对的真理;他们认为别人是糊涂的和错误的。具有相反立场的人可能把权威看作是错误的和糊涂的,“我们是对的,反对权威的”。

129

立场三,是从属的多重性,学生把意见分歧和不确定的事情看作为在某些领域里是合理的;也许权威本身“还没有找到答案”。他被这些领域里的评分标准搞得不胜困惑;也许它是“说对了”,也许是油嘴滑舌,也许是胡扯。

立场四,有两个选择,相关的多重性和从属的相对主义。在

相关的多重性里学生看到两个领域,在一个领域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权威,正如前述的立场那样,在另一个广泛的领域里,意见分歧是合理的,并且不确定性占优势——“任何人都有权利表明他的意见”。这一多重性的领域是与自身关联的,被体验为混乱的、解放的或好奇的。一个持有异议的学生可能竭力扩大多重性领域,因为在那个领域中,“他们”没有权利使我们感到内疚。在从属的相对主义里,学生已经发现有关上下文的和相对论的推理的东西,也就是说,数据能够表明与一个命题相一致,命题可以表明彼此之间相一致,或者是与一个合乎理论的立场相一致。这被看作是“他们要我们如何去思考”知识的性质,而不是这些事物是知识的性质。

在立场五,可供选择的是相对主义的关联、相对主义的竞争、相对主义的传播。这里,相对主义是一种观察、分析、评价的方法,不是因为“他们要我们这样来想”,而是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承上启下的和相对的。两重性的正确对错误的思想是一个从属特殊的例子。在相对主义的关联中,世界被分成各个领域,在有些领域里权威是有答案的,像物理学一样,在有些领域里必须使用相对论,像英语一样。在相对主义的竞争中,相对论是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其两重性答案作为一个亚类,但这一观点和早期的立场是交替的。最为充分发展的结构是相对主义的传播结构,在这里,相对论是普遍地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信奉。没有绝对性;权威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相对的宇宙,在这一宇宙里,事物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并且是遵循参照的构架的。

立场六,是预知的信奉。在这一立场,不再简单地相信有绝对的确定。相对论作为知识的性质的一部分被接受。为了使自己在相对的宇宙中定向,学生意识到个人的信奉在逻辑上是必要的,或者感到这是一种需要。这一实现可能带来渴求、失望、

混乱或接受。

立场七,是最初的信奉。学生在某个领域里作出信奉或肯定,在他自己的经验或选择中接受它的起源,并决定有多少跟他过去的价值相连续,有多少他将与之决裂。信奉“涉及到一个在世界上被看作为相对主义的肯定,也就是说,在分离、怀疑、有选择的觉醒之后,个人选择的经验成为可能。它是一个经过生活考验的行为,而不是一个未经生活考验的行为”(p.136)。就宗教而言,无异议的信念的丧失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信念的开始。区别无异议的信念和有异议的信念的决定性标准和接受相对论是—一个人对待和接受那些具有其他宗教信念或毫无信念的人的态度。

立场八,是信奉涵义的定向。立场九,是指发展的信奉。这些立场并不是用定性的措词来加以区别的,但包括进一步发展有关立场七的问题和从信奉中产生的同一性。

沿着这一序列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佩里描述了对生长的三种选择:拖延、退却、逃避。拖延意味着停留在任何一个立场达一年之久,典型地意识到前面的步骤。退却发生在多重性出现之后,并涉及到主动否认别人观点的合理性。变化包括顽固的反动派、教条主义的造反派,和否定论的、消极的抵抗权威,但说不出任何原因。退却典型地使人退回到一种绝对两重性的立场。逃避典型地使学生陷入中间立场。这里,相对主义或多重性被用来为疏远或冷言冷语服务,或者它可能永远被改装,用来为权威的目的服务。

131 当这些可能性似乎在取消序列的证据时,一个严密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证据:“那些我们认为‘进取的’学生对他们自己的成熟的意识很清楚,并且对之颇有满意之感。那些我们看到站着不动的,或靠边站的,或往后退的学生,承认他们在回避某种

东西或否认某种东西或反对某种东西,他们经常觉得不安或不满,近乎于感到耻辱。有些人谈起这些时期,感到自己‘走得太快’,已经变得令人吃惊地混乱。总之,学生们完全有意识地体验到朝向成熟的迫切感,,这和我们在他们的报告中所学到的形式的进展是相一致的。”(p.50)

在其他时间和地点,正常的青少年强烈要求反抗权威,这具有鼓励序列进展的效应。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具有相似环境的学校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学校使它的权威披上相对主义的、反对权力主义的外衣,部分是由于个别教授和学校本身信奉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教授之间观点分歧的结果。对这些倾向遵奉的人来说,这种气氛使得克服权力主义倾向更为容易,因为他们能把容忍分歧同化到“他们要我们做什么”中去。对一些持有异议的青年来说,在这些情况下,反抗使得这一异常的过程回到权力主义的两重性的观点上来,很清楚这不是大学所想鼓励的。

佩里在他的谈话纪录中发现了发展过程的动力(pp.51 ~ 52):

动力(对生长来说)似乎混合了许多“动机”:十足的好奇;力求胜任,这只能从了解一个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呈现出来;一种从不一致、不和谐、反常的体验中理出头绪的强烈愿望;一种被人类群体视作成熟的愿望;一种在人际关系中追求真实性的愿望;一种发展和肯定同一性的愿望等等。它把所有这些动机集中到一种走向成熟的强烈愿望, 132
把所有这些动机置于内部的标准之下,对这一标准来说,人人都负有责任。

如果组成这种激励进步的动机是促使学生发展的唯一力量,那么当然就没有问题的平衡,没有需要勇气的戏剧性

事件,标准也就没有意义。成熟确实有其发现和扩展的乐趣,但其道德意义来自补偿力量的挑战。每前进一步,都要求学生“大胆应付”局限性、不确定性、业已建立的信念的取消,而同时要求新决定和承担新的责任。

这种补偿力量的群集似乎包括这样一些倾向,例如,希望保留早先的满意或安全,希望维持家庭或家乡价值和思想方法的一致性,不愿承认一个人做错了事,怀疑一个人能否胜任新的不确定性和责任心,而最重要的是要维护一个人所感到的自我[安吉尔(J. R. Angell), 1965]。贯穿在所有这些守恒动机中的是对一种变化可能迅速引起另一种变化的理解。

物质世界与心理学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心理学理论是反省的;确实,判断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方法是问一问理论家自己的行为如何。根据这一准则,自我发展的理论要比简化论好得多。对此,佩里做了如下的描述(p. 203):

作为讲究来龙去脉的实用主义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哲学假设是加倍地反省的,举一件事,在我们的方案达到最高点时,我们大多数学生被描绘成用那些和我们方案本身的哲学观点非常相似的术语来谈论世界。再举另一件事,我们把同样的假设用于我们的亲属(也是调查人员),用于研究的数据。但是,由于在我们讲究来龙去脉的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框架内,我们看到推理由于最终需要是循环论证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双倍的反省看作为德性一致性的表现形式,而并未把这种循环看作为一定的坏事。我们只关心这种循环能说明足够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关心这种

循环作出足够的扫描以产生建议,这些建议结合了各种经验,并对测验可能是敏感的,至少在有些方面是如此。

表6表明我们的阶段和佩里阶段的相似之处。在他的解释中没有与冲突阶段相对应的,也不会期望处在该阶段的人会到哈佛大学去。佩里发现正常的哈佛毕业生很有可能在某个阶段产生一种信奉,这一发现与格雷夫斯的发现形成令人扫兴的对照,格雷夫斯发现,那些不久就要加以研究的正常的商业经理在思想上可能是权力主义者。

结 论

有人说每一种分类都是不公正的。这对于把一个人归入任何一种自我水平来说并不言过其实。不公正在于把一位心理学家体系中的阶段跟另一位心理学家体系中的阶段混合起来排列。上述方案的作者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谈论同一个变量,但在所有的解释中难免有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现象,对此他们给予不同的接近方法。这一积累的效应,部分应当归功于观点、预先假定、实例、问题、接近被试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在于某种潜在的现实性。而且,还发现了许多看法,正如我们在许多地方所发现的那样,我们毫不怀疑还有许许多多。 134

有些作者把人际关系作为他们的核心或主要论题,有些则作为道德判断或品质,有些则作为认知方面。在以人际关系为主要论题的那些人当中,H.S.沙利文、埃里克森、奥苏贝尔是发展主义者,格雷夫斯是性格学家,艾萨克斯、C.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是发展性格学家。在那些以道德品质或判断为主要论

题的人当中,皮亚杰是发展主义者,布尔和科尔伯格是发展性格学家。性格学可以在这些未审查过的经典文献中找到。在那些主要关心认知方面的人当中,费伦齐是发展主义者,黎士曼、阿多诺、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莱文森、桑福特都是性格学家,佩里是发展性格学家。

从表2到表7,概述了阶段和类型的对应性,可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它们鼓励过早的结束复杂的论争。要想确切地说出一个系统中的什么阶段或类型对应于另一个系统中的阶段或类型,目前还做不到,鉴于同样的理由,目前还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每一阶段或类型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将在第八章考察这些理由。很明显,单有关键词还不足以匹配阶段,例如“自主”在量表上是可上可下的。

许多看法已被省略。哈维(D. J. Harveg)、亨特(D. E. Hunt)和施罗德(H. M. Schroder, 1961)有时把他们的变量称作认知复杂性,有时称作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类型和我们的阶段之间的联系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运用。有些研究人员将目前的工作大部分建立在这里所评论的方案之上,例如,建立在科尔伯格和我们的方案之上。邓代尔(Van den Daele)曾从事理论的再建工作,介绍了许多新的参数。塞尔门[1974, 塞尔门(R. Selman)和伯恩(D. Byrne), 1974]和布劳通(J. M. Broughton, 1975)都寻求连续统一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基本的源泉或者说是自我和道德发展的先决条件。塞尔门的理由是,扮演别人角色的能力是人际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在这种能力中寻找阶段。布劳通的理由是,认识论,尤其是自我、心灵、知识的概念,是先决条件。他从鲍德温的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思想与事物》(*Thought and Things*, 1906 ~ 1915)中汲取了一些观点。布莱西(A. Blasi, 1971, 1976)曾提出责任感的发展阶段。他坚决主张使一个变量成为

基本的东西也在某种意义上使它成为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是,一个人是否把提高他的能力作为他自己的责任(见第三章)。

本章中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自我发展与调节和心理病理学的关系是什么?它怎样才能和其他发展区分开来?怎样对它进行测量?这些将成为以后各章讨论的主题。

注 释

- [1] 沙利文观点的最完备的版本是《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搜集了他在1949年去世前最后几次讲演,此书在他死后的1953年出版。本文下面的引文都出自该书。有一个早期版本《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1939)流传甚广,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概念的形成时期。
- [2] 多年来,他们的工作基地是圣地亚哥的伊利安营地海军研究指挥部,在那里他们对违法青年进行研究,大多数是青春后期的青年。最近,该组的一部分成员受加利福尼亚青年组织的赞助,这个组织对加利福尼亚州的违法男孩和女孩有管辖权。关键人员有沃伦(M. Q. Warren, 即前一位格兰特)和帕尔默(T. Palmer)。

第六章 最适生长和心理卫生

- 136 我们已经回顾了作为一系列阶段质变的自我发展的概念,现在根据极性变量转向自我发展的补充概念,也就是说,在发展期间不断增加的自我特点。阶段概念在中间范围最为明显,在上限则倾向于逐渐模糊,而极性变量按定义是固定在它们两端的。任何一种可以测量的特质都能看作是一种极性变量,但是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属于自我发展的极性特点。例如,遵奉是一种特质,许多人已经找到方法来测量自我发展的中间范围的峰值[霍比(C. F. Hoppe), 1972; 哈拉喀尔(C. M. Harakal), 1971]。显然,在婴儿期已经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开端。上限的识别是更成问题的。不同的学者甚至就哪些人可以作为最适度的例子
- 137 有不同的看法。自我发展与诸如调节和心理性欲发展等其他变量之间的混淆在上限处为最大。

自我发展的极性特点,最高阶段的特征,以及自我发展与心理卫生的关系等课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本章的目的在于丰富自我发展的概念,引申出新的特点,并划清其界限。关于认知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的界限问题留在下一章讨论。

极性的方面

弗鲁格尔(J. C. Flugel, 1945)将鲍德温、麦独孤、皮亚杰等心理学家的顿悟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和其他人的见识结合起来,得出一种广义的“道德进步”的发展概念。他不分阶段,也不作出孩提时代的详细类比。他根据 8 种一般的倾向描述道德进步:第一,道德进步是从自我中心向社会发展的,是从只顾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向逐渐意识到别人的要求发展的。有关他人的圈子不断扩大,一直扩展到社会内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人不是直接认识的。第二,道德进步是从无意识向有意识发展的,也就是说逐渐使大部分生活为个体所意识和控制。第三,道德进步是从我向思考向现实思考发展的。第四,道德进步是从道德抑制向自发的德性发展的。然而,儿童身上已经有自发的德性;精神分析特别强调过度抑制和约束的害处。在中年,正如弗伦凯尔[后来是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E. Frenkel-Brunswik)]和惠斯柯夫[后来是惠斯柯夫—乔生(E. Weisskopf-Joelson), 1937]所表明的那样,意愿和责任趋于结合,从而导致自发的德性。第五,弗鲁格尔说过,道德进步是从寻衅向容忍和慈爱发展的。第六,道德进步是从恐惧向安全发展的。他指出焦虑是一切形式的精神病和神经症的特征。他并不认为从恐惧到安全通常是随年龄而进展的。第七,道德进步是从他律向自律发展的。最后,道德进步是从道德判断向认知判断或心理判断发展的;这种倾向可以被解释成是从寻衅到谅解的进步。弗鲁格尔说得很清楚,上述 8 个内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从 8 个方面或方法来探究一个问题。

儿童思考现实的能力的发展是极为明显的,以至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弗洛伊德的术语是主要过程的思考和次要过程的思考。主要过程是少年儿童的思维特征;主要过程的思考受意愿和恐惧的制约,而不受现实考虑的制约。这种形式存在于成人的无意识之中,在睡梦中很明显,并且在对神经症症状和口误(slips of the tongue)作精神分析治疗时足以得到证实。因为,弗洛伊德并不认为儿童的思想可以作为成年期失败的推理,而是应该把它看作本身具有的意识。白劳兰(E. Bleuler, 1912, 1916)区别了现实的思考和我向(aulistic)的思考,后来称之为孤僻思想(dereistic thought)。沙利文(H. S. Sullivan)区别了未分化的方式(prototaxic mode)、不完善的方式(parataxic mode)和综合性的方式等思想。最原始的思想和经验方式是未分化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中,并不察觉以前或以后的情境。不完善的思想方式是违背逻辑的,是少年儿童的特征和症状形成的特性;它很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主要过程的思考。综合性的思想方式是经双方同意的思想,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次要过程的思考。皮亚杰本人一直是研究智力发展的,他追踪思维活动,从感觉运动的图式经过前运算思维 and 具体运算思维到形式运算思维。这些区分也许不能确切地与弗洛伊德、白劳兰和沙利文的区别相比较,但我们应该记住儿童的智能在每一个阶段的限度,限度的意义需要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确定。

139

有一个关键性的术语,即内化,许多学者已经发现它是有用的;内化这一术语往往被用来描述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极性特点。它是卡勒(E. Kahler)《记叙文的内化》(*Inward Turn of Narrative*, 1957, 1959)中的一个中心术语,该书包含了从最早的史诗到18世纪的文学概论。卡勒把艺术看作是对人的自我意识和他赖以存在的现实的纪录。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逐渐从纯

粹描写外部事件(最初还不是人类的所作所为,而是神鬼的所作所为)转而描写他们自己的内部世界和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内在意识的展开同时也是我们赖以存在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展开和客观化。由此可见,卡勒的书是借世界文学的发展来反映我们意识中的自我发展。

马斯洛: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

马斯洛(A. H. Maslow, 1954, 1962)的课题一直是动机。他曾说过所有人的动机可以根据本能需要的层次来描述,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归属和认同的需要、尊重和自尊的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是缺乏的需要。高级的需要具有不同的类型;它是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这些需要构成一个层次,因此其序列是重要的。在较低级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它们便会占居优势;当较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时,较高级的需要就占居优势。基本的或本能的需要特征是(马斯洛, 1962, p. 20):

(1)它的缺乏导致疾病;(2)它的存在防止疾病;(3)它的恢复治愈疾病;(4)在某些(极复杂的)自由选择的情况下,被剥夺的人对它的愿望超过其他满足;(5)它在一个人衰退时是不活动的,或者在健康的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另外两个特征是主观的,一个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渴望的心愿,另一个是缺乏或不足的感觉,一方面仿佛失掉了什么,另一方面又津津有味……最初的动机标准,除了行为心理学家之外,一切人类仍在应用的标准是主观的标准。

马斯洛的许多追随者把他的需要层次作为类型学的一个基础。就这方面来看,与自我发展的阶段相一致是相当清楚的。生理的需要对应于前社会的和冲动的阶段;安全的需要对应于自我保护阶段;爱和归属的需要对应于遵奉阶段;尊重和自尊的需要对应于良心阶段;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应于自主阶段和整合阶段。对马斯洛来说,重点在于每个人的所有需要的存在。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是在低于自我实现的水平上活动的,他称之为正常的精神病理学。

有一次马斯洛发现和研究了许多自我实现的人。由于他们在大学生中所占比率约为 1%,用调查法来决定案例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从朋友和熟人当中挑选案例。由于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发觉他的征询是想研究他们从而感到为难,所以他最后研究了知名人物和文坛巨匠,这些人可以在公开的文献中找到。按照马斯洛的说法,自我实现的特征是:并非固定的状态而是变化的过程,所以是广开发展之门的;更有效地知觉现实,亦即“更少盲目性”;内部生活的有效性;对外部世界的生动知觉;处理抽象和具体的能力;容忍模棱两可的话,有内疚感和责任感;自发的能力,而不是强制的努力;反对敌意的取笑;快乐,尤其在性生活和其他爱情关系方面;克服矛盾和极性;承认现实;更大的整合、自主和同一性;增加自身的客观性、独立性和超越性;民主的性格结构。有一次,他曾认为广博的、神秘的、审美的经验在这一群人中间是普遍的,但经证明并非如此。由于马斯洛的描述

141 对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整合阶段有用,所以他的主张,即这一代表心理卫生的最高状态,是跟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心理卫生与自我发展并不是一回事。矛盾被马斯洛把心理疾病作为对立极的保留意见给纯化了;他喜欢用的术语是人类的还原(human-diminution)。

后来马斯洛对他所称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发生兴趣,这是一个人能够回忆起的最奇妙的经验或最入迷的时刻。他的兴趣部分在于这些经验本身的特征,部分在于他的前提,即普通人在这一时刻的体验近似于自我实现的人经常经历到的体验。

心理学家差不多都接受这一前提,即所有的行为都是被激发的;马斯洛提出,人在未被激发时,他是最真实的,享受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经验,正如在高峰体验时那样。这些体验诚然可能会有结果,但这些体验是由他们自己寻求的,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的。这些时刻是存在的而不是形成的。处在这些时刻的认知有一种不同于普通的缺乏激发的认知(称为D认知)的特征。在B认知,即存在的认知或高峰时刻的认知,人们撇开通常的倾向,按照用途把对象分门别类以便加以利用。事物是作为独特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分门别类中的成分供他们自己欣赏的。知觉是较为丰富的,对象是被充分照顾的。在那种时刻,知觉是被动的和接受的。在时空上可能有一种悬而未决的定向。也存在一种暂时抛却焦虑和抑制的倾向。因此高峰体验可以被认为是克里斯(E. Kris, 1934)所说的“在自我服务中倒退”。在那种时刻,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界线,主要过程和次要过程之间的区别似乎已经消除。

马斯洛的解释,强调在所有阶段对一切人来说动机继续存在,至少作为潜力,这一解释有效地纠正了这样一些理论,即现阶段的自我发展作为不可逆的成就的一部梯子,像数学的一系列课程那样。同时,马斯洛的观点和他的研究方法是这样的,遮掩了进步中的类似成就的因素。由于未能把他的观念跟任何发展方案协调起来,马斯洛留给我们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他的自我实现的人物是成熟期的极限,但是他也体现了一个良好调节

或最理想的心理卫生的定义。良好的调节或良好的心理卫生可以表示任何年龄的人的特征,而成熟期则否。诚然,马斯洛所列举的那些自我实现的人物都是年过 50 的人。为了澄清成熟期和心理卫生的关系,所需要的是一个不考虑年龄而适用于良好调节或心理卫生的概念。

马斯洛在缺乏动机(只寻求解除痛苦)和发展动机(寻求锻炼和实现)之间的区分是具有独创性的,但也使人感到困惑。我们立即就认识到,正如我们所意指的那样,大多数实验心理学是建立在由于缺乏动机而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学习理论,如同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样,倾向于忽视发展的动机。然而,发展的动机是从生命开始就存在的,而动机的层次是随时间而发展的。婴儿在有意义的使用自尊或认同的概念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竞争以求发展。谁能说婴儿和儿童缺乏高峰体验?至少,在婴儿和儿童方面,马斯洛认为,当缺乏的动机由于某种矫正或修正得到满足时,发展的动机就开始活动。我们不得不跳过马斯洛以便把他的见解跟自我发展的概念和理论协调起来。

斯切特尔:知觉变形

正如斯切特尔(E. G. Schachtel, 1959)的《变形》(*Metamorphosis*)一书所宣称的那样,他的基本论题是发展;他特别提到了情绪、知觉、集中注意力和记忆。让我遵循他的论点。这一讲解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斯切特尔先是解释了弗洛伊德的一些论点,然后又反驳了他的论点。

143 按照斯切特尔的说法,生命的最早冲突在于迫切要求生长和为从原始根基中解脱出来感到焦虑这两者之间,在弗洛伊德

著作和许多学习理论中普遍存在的紧张减弱的快乐模式,导源于绝对强调根基影响。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虽然比早期的精神分析更加强调来自本我的自我的自主,但仍保留紧张减弱的模式作为其基础。哈特曼(E. Von. Hartmann)学派认为自我是自主的,也就是说,自我的发展并不是本我与现实之间冲突的结果,肯定有一个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相反地,斯切特尔认为人是向世界敞开的并且是享受世界乐趣的;快乐不能还原到取消激动,每个人的奋斗也不都导源于性欲和寻衅。另一方面,人的才能的训练不可能没有冲突。

弗洛伊德把影响看作是对活动的干扰和选择。与此相反,斯切特尔认为世上不存在没有影响的活动。渴望和热情就是活动影响的例子。斯切特尔把影响与紧张的发散性释放的结合称作根基影响(embeddedness affects);鉴于这种情况,快乐可以定义为从紧张中得到解脱。纯粹的根基原型是胎儿的生命和睡眠;在这些情况下,一切刺激都会妨碍安静。活动的影响可以从托儿所幼童的那股劲儿上观察到,可以从幼童凝视着发亮的东西,然后去拿该东西时观察到,还可以从幼童学习走路中观察到。

斯切特尔区别了两种模式的知觉。在自我中心模式(auto-centric mode),重点放在感觉的质量上,放在人所感到的快乐或不快乐上。在异体中心模式(allocentric mode),重点放在对象究竟像什么上。就婴儿而言,所有的知觉开始是自我中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转向异体中心模式。一些比较低级的感觉,诸如嗅觉和味觉,几乎完全是自我中心的知觉。视觉是异体中心感觉的愿望;听觉也主要是异体中心的;触觉是两者都适用的。由于自我中心的知觉并不密切地与快乐相连接,因此,快乐的知144
觉和现实的知觉是完全分开的,这就大大地反驳了弗洛伊德的说法,即现实的原则是绕过快乐原则而出现的。

肌肉的触觉体验中的快乐并不是生来就是性欲的或寻衅的。这些体验是游戏发展中的步骤,原本是无对象的。后来从游戏中出现了对象。所以,婴儿从自我中心模式的体验出发,其中刺激最初是无快乐可言的,进而发展到一个占优势的快乐状态。于是,一种对客体的异体中心兴趣逐渐支配了有关刺激的自我中心兴趣。同时,集中注意的能力也在增长。感觉接触的快乐感受是联系现实的一条纽带,而不是试图摆脱刺激,正如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模式所意指的那样。

这里存在一种熟悉的影响,即对曾经看见过的事物进行重新感受的快乐,它先于自觉认识的发展。婴儿看到母亲的脸色就微笑是一个例子。把体验分成熟悉的体验和新的体验是导致渴望根基与渴望遭遇和探索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异体中心模式的知觉要比自我中心的知觉更容易自动回忆起来,这是因为它较为客观化,也就是说,它是用熟悉的思想类别来表达的。

成人生活中的许多知觉是由斯切特尔所说的次级自我中心所支配的。在初级自我中心,知觉带有喜欢和不喜欢的色彩,而且至少在最初,对新的刺激的反应是消极的。在次级自我中心,知觉局限在对人的需要和目的有用的客体上;这种知觉有助于人去回避现实中遇到的新概念。科学作为对其目标的预言和操纵力量典型地属于这种性质。对其他人的知觉,次级自我中心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根据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的人。次级自我中心的最常见的形式是凭标签和原型(stereotype)来看待一切事物。与次级自我中心相对应的是,在人的亚文化中存在一种次级的根基。

145 所以,儿童对世界的异体中心的开放在大多数成人身上已经消失。斯切特尔用社会中心知觉(sociocentric perception)一词替代了自我中心知觉。当次级自我中心和社会中心知觉占优势

时,它们便与异体中心知觉和成人水平上的自我中心知觉相冲突。通俗地说,以原型和标签为基础的思想和知觉客观世界的现实知觉和感觉世界的充分享受相冲突。

人类对世界的兴趣不同于动物的爱好,因为人类的兴趣涉足广泛,内容丰富。在斯切特尔称之为异体中心态度里,存在一种对客体和转向客体的兴趣;它包括整个客体和观察者的存在。对客体的异体中心兴趣导致了对客体的全面知觉,但它不同于婴儿的全面性,婴儿的全面性融合主体与客体,或者说不同于幼儿早期,在幼儿早期,客体的独特特征是知觉不到的。相反地,它预先假定客观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客体来欣赏客体。创造力不是用约束可以抑制的,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标签和成见对我们开放世界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斯切特尔对克里斯的创造力概念来自“在自我服务中倒退”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创造活动的内驱力内容是多样的,不是决定性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乃是在与客体遭遇时的开放程度,这和内驱力颇为不同。

有关一个客体的观念的发展取决于意识聚焦的发展。当婴儿注意到一个客体时,其未注意到的背景颇似抑制的概念。当然,差别在于迅速而又自觉地转移注意力的可能性。正如弗洛伊德所假定的那样,对现实世界的思想和兴趣的能力并不是绕过满足本能需要这条道路而发展的。相反地[这里,斯切特尔接受了哈特曼、克里斯和洛文斯坦(Loewenstein)的增补部分],思想是在对客体的需要和自发兴趣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的。如果需要太强烈,则无法产生最适度的发展。弗洛伊德的假定是,婴儿早期未得到满足的冲动导致幻觉的产生,这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关婴儿发展的说法是相背的。婴儿无法对母亲的乳汁或奶瓶引起幻觉,因为婴儿还没有那样的知觉。婴儿渴望和幻想的东西是满足的全部经验;这可能是往后生活中的幻觉祖先,但它不

是次要过程思想的祖先。对客体的游戏性探索,没有内驱力的需要,乃是次要过程思想的发展基础。

弗洛伊德根据儿童的性压抑解释了婴儿和幼儿大多数记忆普遍健忘的现象,但不清楚什么样的性记忆的抑制会导致其他事件的抑制。斯切特尔特别强调了一个不同的因素。成人思想的类别和图式既不适合于保留幼儿期的经验,也不适合于对它们的回忆,一个解释性的机制使经典的弗洛伊德抑制论黯然失色,而不是直接予以反驳。幼儿期的健忘是针对自传性事件的,而不是针对不断使用的词或技能的。当人们试图回忆梦境或儿童言语的语法错误时,可以观察到记忆中的一个类似的困难。每次连续的回忆使它听起来更像正常成人的思想和言语。禁忌和抑制作作为抑制性欲和快乐体验的工具,比之在儿童的心灵上施加社会标签和类别的准教育手段所实施的那种微妙腐蚀来更糟糕。“记忆不可能完全从人身上消失,他对经验的接受能力不可能完全靠图式化来抑制。它存在于这些超越文化图式的经验之中,存在于这些超越传统的记忆图式的经验记忆中,每一次新的顿悟和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产品都有它的由来,这样才有进步的希望,才能扩展人类行为和人类生活的范围。”(斯切特尔, 1959, p. 322)

- 147 斯切特尔的书由于把自我发展和知觉联系起来,从而丰富了自我发展的概念。马斯洛称之为高峰体验的一个要素,就是斯切特尔所描述的随即而来的开放。我们不妨假定,保持和重获一种高水平的异体知觉的成人是那些自我水平较高的人,因为对人的生动描述和对感觉经验的生动描述只能在那些水平上找到。所以,斯切特尔提供的是自我发展的辩证观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成熟者的态度比之中等自我的人来更像儿童。

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讨论。人们对经验的开放是否从儿童期和青春期一直保留到成人生活,或者是否会丧失,然后又由某些人重新获得?对经验的开放是否因为获得一个高的自我水平的结果,或者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偶尔促进自我生长的条件,所以与高的自我水平相关?这些问题超出了自我发展概念的论题,进入到它的力学理论。

詹霍达:积极的心理卫生概念

多年来,“调节心理学”(psychology of adjustment)和“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是大学心理学课程中的重点。近年来已不再着迷于对那些课题的传统方法。调节或多或少意味着调整现在的缺陷以适应世界。心理学家越来越怀疑遵奉是否代表着人类的最高地位。斯切特尔和马斯洛是讨论最适生长和“积极的心理卫生”的两位杰出代表。詹霍达(M. Jahoda, 1958)曾总结了许多专家有关这一论题的观点。

她一开始就确定了心理卫生的三个标准的不适当性:没有精神病、正常状态和适应或健康。我们将遵循她的讨论,包括她参考其他作者的资料,除了在措词上和例证上有些变动之外。插话放在括号内。正常状态在统计学的均数意义上作为心理卫生的一个定义是有许多欠缺的。限于人口范围,取一个均数或就某些特质取一个均数,人们已含蓄地对心理卫生赋予某种意义,所以貌似客观性实际上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是触犯常识的。如果在某个年龄上的均数成员患有高血压,那并不能把高血压作为健康的指标。把健康或顺应用作心理卫生的定义,其困难乃在世间还有压迫、剥夺、痛苦等情境,一

个心理健康的人也无法使自己去适应这些情境;尽管,对个人的幸福和健康具有忍耐的品质是心理卫生的一个可能因素。最为困难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把积极的心理卫生定义为未患精神病。诚然,精神病学家巴顿(W. E. Barton, 1958)在詹霍达的专著上附了一个不同的意见,大意是积极的心理卫生这一术语最好用于非精神病的领域。詹霍达宁可把没患精神病作为一个积极的心理卫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

詹霍达把积极的心理卫生的标准归纳成6个类别,这6个类别体现了以往一些作者的精神,但在逻辑上并不是确定无误的。

她列出的第一个类别是人对自己的态度;在这一类别下面包括自我意识的接近性、自我概念的正确性、自我认可,以及同一性。她提出了马斯洛在这一论题上讨论的问题,即健康的人是否无法体验自我—异己的冲动,或者他是否承认这些冲动。很显然,这就是在该标准下承认的自我的整个结构。埃里克森有关自我同一性的讨论、麦独孤有关自尊的讨论(见第十一章)也属于这一类。对易变的环境影响来说,达到同一性或多或少是自主的,怀特(R. W. White, 1952)指出这一成就只有在成熟期才是适当的标准,在儿童期则否,这在讨论积极的心理卫生时是一个颇为普遍的问题。

149 詹霍达的第二个标准涉及生长、发展和自我实现。包括在这一论题内的有勤奋工作和非个人收益的社会价值。她把自我实现(self actualization)这一术语归功于戈尔茨坦(K. Goldstein, 1939),后者认为在自我实现里存在着有机体的动机[然而,这里所说的自我实现跟杜威的自我实现(self realization)有何不同仍不清楚,自我实现这一术语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别在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会继续存在下去

吗?】。奥尔波特(G. W. Allport)、罗杰斯、弗洛姆都相信斯宾诺莎,把这一概念视作中心思想。不能把对自身之外的价值的信奉这一标准解释成自我中心的标准。她揭示了有些理论家的一个逻辑困难:“有时这个术语用来意指一般的生活原则,适用于每个有机体;有时特别用于心理卫生的功能”(詹霍达,1958, p. 31)。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自我实现的原则,那么毋庸置疑,心理卫生就能实现。

詹霍达的第三个类别是整合,它有时作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或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有时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标准。在近代的精神分析家中间,这些观念作为心力的平衡和可塑性是包括在这一类别内的。奥尔波特(1937)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把统一的人生观看作是成熟的迹象。统一的人生观的任务是调和两种冲突的倾向,那就是自我扩展或正视世界和自我客观化或对自己抱超然态度。最终的整合是抵抗压力。近代学者强调的不是没有焦虑,而是把处理焦虑的能力作为心理卫生的一个标准。 150

第四个类别是自主的标准,包括内部行为的调节和不为直接的环境压力所动,这一点是哈特曼(1939)和马斯洛所强调的。詹霍达指出,这一类别的涵义在于,通过自主能够部分地防御来自外界的坏事。自主能力包括适当的遵奉能力;有些学者在这方面提出把平衡也作为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最大限度的遵奉要比最大限度的自主更能代表最适的调节。

詹霍达的第五个标准涉及现实的知觉;在这一课题下包括神入或社会感受性和不因个人的需要受到歪曲的知觉自由。她指出,现实知觉在心理卫生文献中常有人际的涵义;它总是涉及到由别人提供的现实。詹霍达意识到用真实的知觉定义心理卫生的难处,因为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现实?大多数人可能把从哥伦布到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到索忍尼辛的最有远见和最原

始的念头斥之为不现实的或精神错乱的。

第六个标准是环境的掌握,包括人际关系的胜任,处理爱情、工作、娱乐的能力,以及适应、调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哪些东西构成了健康以便适应于诸如监狱那样的恶劣环境,对这个标准来说是一个难题。另一个问题是要避免把心理卫生跟生活中的成功混为一谈。

上述这些标准不一定存在矛盾,虽然在某些情境里,一个标准的极端可能跟另一个标准不相容。在监狱内服刑,一个人不可能既自主又调节;这个人既然献身于理想主义的目标,就需要防范他的幻想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有一个调和不同标准的办法就是估计不同类型的人,各个人凭自己的做法来发现他的心理卫生的最适度。另一种调和不同标准的办法是采用某种复合的标准。不同的作者对复合的标准有不同的方法。例如,埃里克森把不同的要素看作是在不同的时期成熟的。几个要素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综合征,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境会显突不一。

在一一讨论了詹霍达的标准之后,很清楚地,如果它们不加以修正,就无法适用于儿童;儿童的心理卫生也像成人的心理卫生一样是重要的和意义深远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詹霍达的观念里,积极的心理卫生并不是精神病的对立面。这两个问题只有通过承认詹霍达和她所总结的其他学者关于综合征是针对自我发展的最高水平才能被解决。如果人们只看到极端,那么这

151 概念的丰富涵义就丧失了,而其发展过程的性质也被歪曲了。

罗杰斯:作为一个量表的心理治疗过程

罗杰斯(1961)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辨明心理改变过程中的

共同要素,特别是心理治疗。他发现有关结果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治疗的效应不是从稳定经过改变从而发展到新的稳定,而是从稳定发展到变化。病人怎样诉说他的感受和问题是一个用来诊断他的连续统一体中所处位置的线索,对这种连续统一体来说,其一端以不变为特征,它远离感觉意识和缺乏感觉意识,另一端以可变为特征,它密切联系感觉和即时意识到这些感觉。尽管病人可能在他生活的不同领域或不同阶段表现出正常之举,但他的行为基本上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

罗杰斯用七个阶段来描述连续统一体,但这些阶段的界限并不清楚,概念似乎是极性变量而不是真正的阶段概念。在第一阶段,按凯利(H. H. Kelley,第十二章)的说法:个人的构念是刻板的和固定的。在第二个阶段,感受是无主的或过去描述过的。在第三阶段,有了某种自我的概念化,个人的行为选择通常被看作是难以强加于一个人的。所谈论的感受常常不是当前的感受;许多不能被接受的感受被认为是可耻的、恶劣的或反常的。个人的构念是刻板的,但可能被看作是思维体验到的且常常不被接受的感觉,个人的构念受到认可,开始对这些构念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在第五阶段,现实的感觉被自由发挥,但感受的直接性是令人吃惊的和吓人的,而不是愉快的。有了自我发现的兴趣。在第六阶段,主要接受即时的、强烈的感受,其意义也被清晰地区分开来。一俟经验与意识之间的不协调进入到协调时就能主动地被体验到,而有关的个人构念也就同时消失。第七阶段是根据与第六阶段类似的语气来描述的,但它代表更高的境界;而且,对行为过程的选择变得更为现实和有效,因为经验的要素对人是有用的。

152

表8中罗杰斯用来描述治疗过程各阶段的段落可以与卢文格和韦斯勒(R. Wessler,第四章,1970)所概括的造句测验中自

我水平的表现形式相对照(见第九章)。选出的段落强调相似和平行,而不是表达这两个相对照的连续统一体的。罗杰斯是完全依靠病人与治疗者之间的谈话,卢文格和韦斯勒是依靠正常(非病人)妇女的书面纪录,所以无法期望两者之间有更大的相似之处。

按照罗杰斯的看法,大多数心理治疗涉及到他的第四和第五阶段。由其他标准判断为成功的实例要比不成功的实例在这一量表上显得更有倾向性;而且,较成功的实例在这一量表上完全清楚。

艾萨克斯(K. S. Isaacs, 1956, 见第五章)报告说,他所知道的几百个实例中没有一宗随着心理治疗在关系水平上有所提高,即使是成功的、广泛的、精神分析的治疗,也是如此。由于艾萨克斯的关系量表,像罗杰斯的心理治疗量表一样,是自我发展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变量,因此他有关治疗后没有改变的说法似乎跟罗杰斯关于在这个范围内治疗后有所改变的说法相矛盾。由于注意到罗杰斯关于任何一个病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从最低阶段到最高阶段的特殊声明,由于他承认更加成功的病人在量表上比较高,因此这一矛盾变纯了。后一种观察跟艾萨克斯的观察相符,即更加成功的病人一开始就能生动地和有区别地描述自己和别人;这是艾萨克斯在这方面的最初线索之一。艾萨克斯用最高水平来表示原始纪录或病人,而罗杰斯也许在谈论核心作用水平。艾萨克斯承认一个人在心理治疗之后要比在心理治疗之前,更有可能在最高水平上活动。所以他的主张,即在一个人经过治疗并没有改变的原始纪录中发现的最高水平,跟罗杰斯的主张,即核心作用水平在成功的治疗中确有改变,这两者是不相容的。

罗杰斯观点中的一个弱点在于,他把有关成熟和有关调节

的观点等同起来,把两者与自我和经验之间的和谐等同起来(罗杰斯,1959,p. 207)。自我和经验之间缺乏和谐看来只是一种顺应不良,或者说仅仅是一种能够处理的或罗杰斯感兴趣的病人中心治疗。首先,顺应不良有某种更简明、更具表现型的参照;这是在病人中心治疗以前就有的一个普通术语。认为所有顺应不良都是这一形式需要证据;唯一的证明办法是从一个不同的顺应不良的定义开始。

表 8 罗杰斯的心理治疗过程与自我发展的比较

	自我发展	心理治疗过程	
阶段	说明	说明	阶段
I-2	自我倾向于把世界分为二;定型是最明显的迹象。	个人的构念是刻板的。	1
	影响被视作身体状况或冲动,而不是分化的内在感受。	感受和个人意义未被认识或承认。交往只限于外部形式。	
	情绪范围有限。	没有问题被承认或察觉到,没有寻求改变的欲望。	
	烦恼同一个地点相联而不是同一个情境相联。	问题被看作为是外在于自身的;自我意识不到对问题负有责任。	
△	自我意识不到本人对烦恼或失败负有责任;一个人的交运或倒楣,别人对此负有责任;或者说责任是外界的或非个人的。		
△/3	遵奉和服从的准则是简单的、绝对的规则。	个人的构念是刻板的、被看作是事实,而不是构念。	
	情绪被看作是准生理学的。		

阶段	自我发展 说明	心理治疗过程 说明	阶段
I - 3	笼统提及内部生活,感受被否认或含糊提及,捉摸不定,或不表明意见。 内部冲突可能是明显的,但不被承认。	个人意义和感受的分化是狭隘的和世俗的。 矛盾可能被表示出来,但并不被看作是矛盾。	
I - 3/4	具有自我意识和初步的自觉和自我批评的特征。 比以前更强烈地意识到感受。自我更能意识到个人在态度、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但仍旧使用世俗的和平庸的措词。	充分表达自我,与自我有关的经验,以及从别人身上反映的自我。 感觉和意义的演变比以前略深刻并较少世俗。	3
I - 4	自我看到情境中复杂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有相倚、例外和比较,虽然是世俗的和平庸的。 自我具有丰富的分化的内部生活;经验是经历到的和意识到的。 自我意识到冲动及其控制的问题。	承认经验中的矛盾。 过去的感受被描述为强烈的;现时的感受仍然是怀疑的和可怕的。	4
I - 4	人际关系是紧张的。 自我意识到行为模式,并对构成行为基础的素质这一个体差异具有鲜明的意识。 对人的描述更为现实,因为自我觉察到更多的复杂性。	感受、构念和个人意义不断分化,寻求象征的精确性。	

	自我发展	心理治疗过程	
阶段	说明	说明	阶段
I - 4/5	自我意识到自己,反映自己,并用反省的特质来描述自己和别人。自我把意向和动机看作是行为的结果。 自我还分为潜在的感受和外表。 自我有强烈的责任感。 自我把生活看作是可供选择的;他掌握着自身命运的起源。 在1-4,自我看到极性的、不相容的对立面,在1-4/5,自我更有可能看到一个反论,一个本质上的准矛盾,而不是一个强制的选择。 自我意识到冲突的或矛盾的情绪。 人际关系的概念有更大的复杂性。交往的观念和感受的表达被深化并更加复杂。心理的因果关系代替了在较低水平上有关“理由”和“问题”的含糊陈述。自我用生动的和个人的观点代替了较低水平的陈词滥调。 自我能分清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分清外表与现实。坚持自己的个性看来是一个问题。	自我关心经验和自我之间的矛盾和不和谐。 对问题具有自我责任的感受,虽然这些感受是被动的。 在经验方面,有越来越清楚的矛盾和不协调的表层。 感受紧张地联系着体验。 对个人的构念有新发现,并对它们有批评性的考察。感受和意义的分化日趋精确。对问题的自我责任感日益明确,内部交流更为丰富。 自我感受日益为个体所有,希望成为“真正的我”。	5

自我发展		心理治疗过程	
阶段	说明	说明	阶段
I 5	自我感受到内部冲突的力量,试图去处理它或超越它。	体验到既直接又丰富的新感受。	6
	自我关心交流的感受。情绪被分化,并生动地得到交流。自我表现出自发性,真诚,强烈。	体验的分化是敏锐的和基本的。改变感受为个体所有,基本上信任自己的进程。	
	自我能够容忍模棱两可;冲突的选择被看作是许多面临的生活情境。	个人的构念系统地得到阐述,但保持松散。	7

结 论

在本章里,我们浏览了具有极性变量形式的各种论题,这些极性变量是根据它们的极端被定义的,与我们前章所概括的用复杂阶段或类型来定义的变量相反。就该目的来说,一部分是实在的,进一步丰富了对自我成长的理解;一部分有助于差异的定义,也就是说,承认经常提出的有关自我发展的构念和其他知名理论与研究线索之间的同异等问题。差异的定义将在下章继续。还有一部分是方法论的,用来区别极性变量和里程碑变量,以便为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讨论测量问题做准备。自我发展和心理治疗的关系几乎是偶然冒出来的,主要是因为在有些文献中经常把自我成熟与良好的调节和积极的心理卫生混为一谈。其他一些概念则把自我发展的领域与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讨论。

第二部分 方法论

真理不是空洞的梦。当我们以为抓住她的时候，她不过是一种虚幻。当承认她在上面主宰我们的时候，她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能够接近她，但无法最终驾驭她。

——霍布豪斯(L. T. Hobhouse)
《道德的发展》(*Moral in Evolution*)

第七章 智力的、心理性欲的 和自我的发展

自我发展与那些根据道德、性格、人际关系、由权力主义所描述的认知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的维度,以及其他一些变量所描述的发展序列是同一回事,或者说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不是人格发展的全部。如果我们认为它包含全部人格发展的话,我们就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即一种难以名状的和没有差别的概念上去。在最后一章,我们描述了修正的界限,而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描述智力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的界限。概念上的区别必须先于相关或因果关系的研究。 161

让我们思考一下身高和体重。一个孩子不但会在长高时正常地增加体重,而且在成年人中间,身高和体重也是显著相关的。然而,概念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测量一个人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是容易的。在测量自我水平时,人们就不能那么肯定不受其他有关变量的影响,正如我们在讨论方法论的困难时所表明的那样(第八章),但是我们争取把概念上的区别弄得像身高与体重之间的区别那样清楚。当然,区别抽象的变量,例如区别自我发展与有关的变量,要比区别具体的变量,例如区别身高和体重困难得多。 162

发展变化的模式

发展这一术语所包含的过程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不同的(卢文格,1966b)。我们将讨论五个正规模式;它们的结合能产生另外一些可能性。这五个模式在速率、最终成就和最终年龄变化方面的不同,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致命的发育障碍的效应在这几个模式方面也是不同的。另一种差异是,发育是否被假定为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有关年龄的函数是不会降低的。

对头四个模式来说,年龄由横坐标(X轴)和纵坐标(Y轴)的发展量表来描述。一般说来,心理学并没有量表能在同一时期将一种功能的增值与另一种功能的增值做直接的比较。也不容许将发展初期的增值与后期的增值做直接的比较。司盖蒙(R. E. Scammon, 1930)证明了初生婴儿脑发育的曲线在头两年中发展得极快和性器官在发育期发展得极快之间的明显不同。这一类的比较在这里所提出的模式中没有相对应的东西。如果在Y轴上扩展或收缩量表,发展的测量就不会起任何变化。因为该量表一开始就是任意的。由于这个缘故,任意简化曲线,诸如直线,将被用来代表发展的过程。把这些“曲线”转化为代数方程式是不能允许的。

在模式一(图2)中,发展的速率虽不同,但是最后达到的发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达到发展的年龄是不同的。骨骼年龄,即松果腺(epiphyses)的骨化,具有这种形式。对每个人来说,松果腺最终会完全骨化,但是完成这个过程的年龄因人而异。当人们了解到一个特定儿童的身高时,他们就会知道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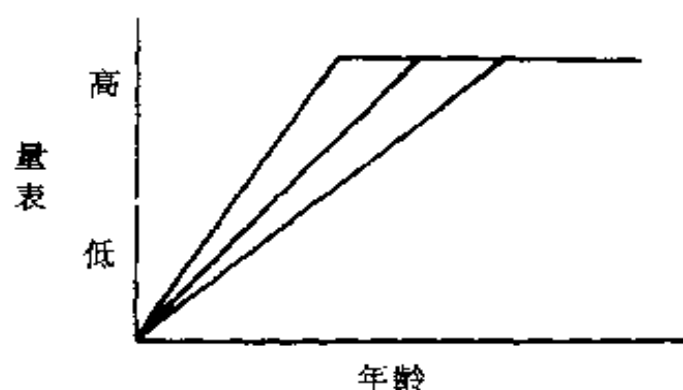


图2 模式一的发展

个儿童已经达到成人身高的多少。按照通俗的说法,当我们提及一个“发育缓慢”的儿童时,意味着这一模式具有某些心理上的特征。关于这一模式有几个例子:一个急剧升降的坡度,在发展的完成年龄有显著差异,或许在发展开始上升的年龄也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最后完成阶段却根本没有差异。走路、根除溺褥等情况都沿着这些曲线,就行走而言,成年人生活中所有这些差异几乎与第一次能行走的年龄差异无关。

在模式二(图3)中,发展的速率是不同的,但是发展的最终年龄是不变的。一个人在其整个童年期或成年期里他的年龄段 164 倾向于保持一个不变的地位,因而童年期的个体差异就成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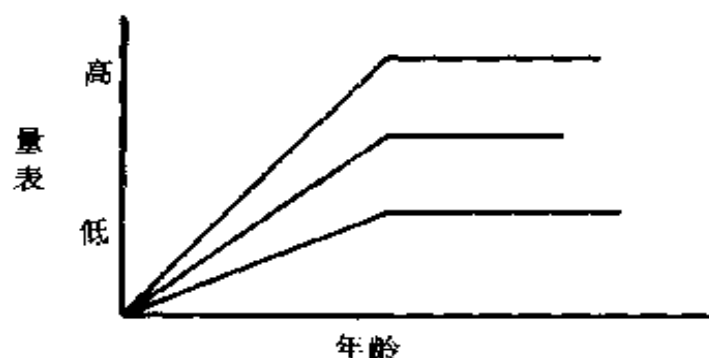


图3 模式二的发展

年期差异的预兆。在计算智商时,用实足年龄(CA)除以智力年龄(MA),人们无疑会用模式二。对 1937 年的斯坦福—比纳(Stanford-Binet)测验来说,16 岁是一切实例的最高实足年龄,因而 16 岁被假定为智力发展的年龄。实际上,人们知道这一假设并不精确。在继后的年分中,仍有证据表明智力在继续发展,特别是那些超常智力的个体。有关低能的人,他们的发展是否结束得早些,其证据是含糊不清的。避开模式二的假设,智力测验在个体的年龄组内通常是按照百分数等第或标准记分来表示得分。但是如果把一个年龄段里的状况看作是对以后状况特别是对成年期状况的预示,正如通常所反映的那样,那么模式二仍然是有深刻涵义的。

在模式三(图 4)中,不同的人其速率是相同的,但是发展的最终年龄是不同的,因而成年的差异反映了发展停止的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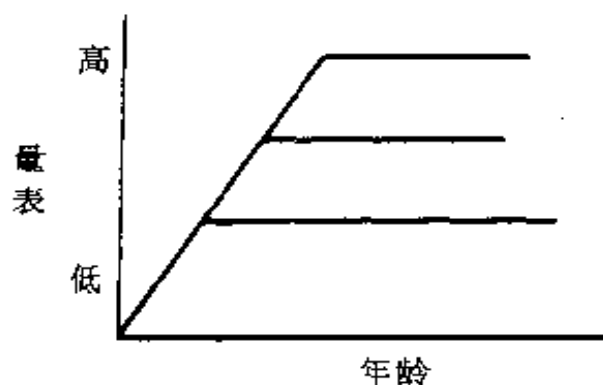


图 4 模式三的发展

这一模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对一个特定的年龄来说,早期童年的差异是小的,不能作为成年差异的预兆。这个模式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当它能够同模式一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得出成人所达到的发展的百分比时,它就能再次预测成年的状况。童年期的身高差异是成年身高差异的预兆(模式二),但是这种预测可以通过把骨骼年龄考虑进去而加以改进,从而对发展终

止的年龄进行预测(把模式一和模式三结合起来)。

有关模式三过程的一个清晰的实例不容易表明。模式三意味着发展序列,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其速率也大致相同,但是终点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或者发生在该序列的指定时间,或者注定永远也不会发生,并且发展就此停止。教育的成就如果按照所能达到的最高学业等级测量,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示达到第一流的近似值。

在模式四(图5)中,我们武断地把所有那些发展曲线加以分类,最后的成年状况并非最高值。胸腺达到它的最大尺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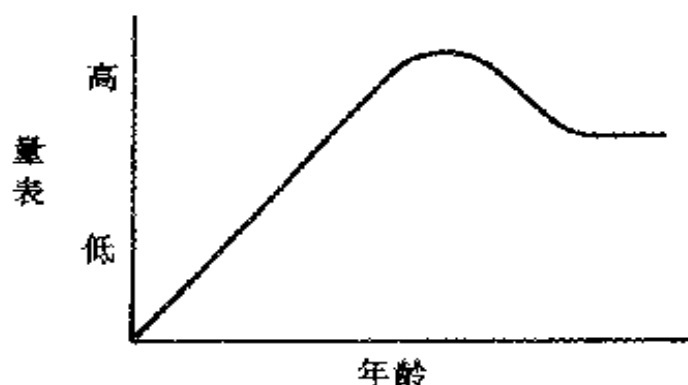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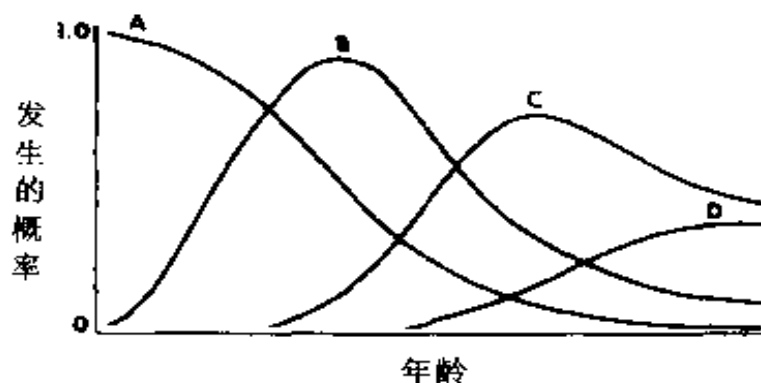


图5 模式四的发展

约在12岁,这是一个来自身体发展的例子。许多心理功能具有这种形式。大多数身体的和认知的测量达到成熟的最高峰,但是人格的非认知的方面,例如兴趣,典型地沿着多值的进程(模式四)。图5并不描绘模式四功能中的个体差异。它们可能有几种类型。曲线可能因峰龄、峰龄的量表值、发展的速率或衰退的速率,或成熟的量表值而不同。在图6中描述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几乎所有的智力测量都有一种微妙的偏见,有意把能力看作是递增函数(模式一、二或三),而不是看作为多值函数(模式四)。这种偏见被引入智力年龄(MA)的概念中,测量的量表根

据不同年龄的平均儿童的成就来定义。因此,平均儿童的发展曲线必定是通向成熟的一条直线。



(注:A、B、C和D是连续阶段的符号)

图6 里程碑序列的模式

皮亚杰有关认知发展的研究揭示了更复杂的情况,一种能够在其他时期看到的情况。皮亚杰通过下列阶段追踪了智力的发展:感觉运动时期的6个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一种研究这一序列的方法宣称它限定了发展的量表,以便构成模式一、二或三中的纵坐标。皮亚杰从未告诉我们这些模式中哪一个适用。是不是所有成人即使在不同年龄也能最后到达形式运算阶段(模式一)?是不是儿童以不同的速率取得进步,而且在青春期大约同时达到平衡(模式二)?是不是儿童以大约相同的速率取得进步,直到他们达到最高的潜力,然后达到平衡(模式三)?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来回答。实际上近来的研究表明有些人不可能达到形式运算的思维[布莱西和霍菲尔(A. Blasi and E. Hoeffel), 1974];因此,模式一可以取消。

很显然,在这一量表上各连续点的限定与衡量的标准并无相似之处,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推理过程,比智力年龄(MA)的限定更复杂。人们不能仅仅通过对正常儿童的发展进行观察简单地获得这类量表。

考察皮亚杰有关认知发展的一系列阶段的另一种方法是把这些阶段看作为一组可分的模式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是以某一年龄的推理水平为标志的,超越这一推理水平的进入下一阶段。图6呈现了一个有关各阶段的假设图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作为标志。请注意,这一系列符号的最大概率在很少有人相继到达较高阶段的前提下降低了。最早的阶段具有一切婴儿的特征,并且是一个有关年龄的递减函数,虽然没有必要把年龄减少到零。最高阶段的符号是一个有关年龄的递增函数,但是它从未达到高概率,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最高阶段。有些符号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时可能出现不规则的波动;这些符号已被部分省略,以便简化图解,但主要是因为这些符号由于模棱两可已从任何测量手段中被省略了。

模式一、二、三和四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每个例子的发展是根据沿着一个单一量表的进步和退步来描述的,虽然量表的单位一般说来并不相等,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再者,量表的解释必须与年龄无关。如果评分标准本身与年龄有特殊的关系(即随年龄而变化),年龄之间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向两个 CA 不同而 MA 相同的孩子提出斯坦福—比纳量表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得到同样正确的答案。在所有智力测验上,不管评出的答案正确还是错误,都跟儿童的 CA 无关。不存在与年龄相倚的分数。因而,作为从模式一至模式四的纵坐标而出现的发展的量表都是抽象的东西。特殊年龄的符号,即在一个特殊的年龄解释一个特定的阶段的东西,一定不可用作对纵坐标各点(或各阶段)的解释,如果这些模式有任何意义的话。相反地,量表上的各点必须用适当的术语加以解释,年龄可以不论。因此,5岁儿童的 MA 正好是平均5岁的智力年龄,一个聪明的3岁儿童的智力年龄和一个呆笨的8岁儿童的

智力年龄相仿。

模式一至模式四所描述的有关发展的一个有趣的但并不完全清楚的问题是,一般说来,并不严重的发展障碍可以在没有干扰发展的模式或影响成年状况的情形下得到补偿。这个观察是根据发展的高度确定的(特纳,1963),而相似的结果可能解释 IQ 和类似的测量中的某种变化。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对称的假设,即刺激认知发展的应急措施将不会有长期的效果。

至于模式五(图 7),比起上述几个模式来,发展的干扰永远影响该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连续的阶段是由不同的器官、器官系统或功能的支配程序来限定的。当任何一种发展的障碍出现时,它就会影响在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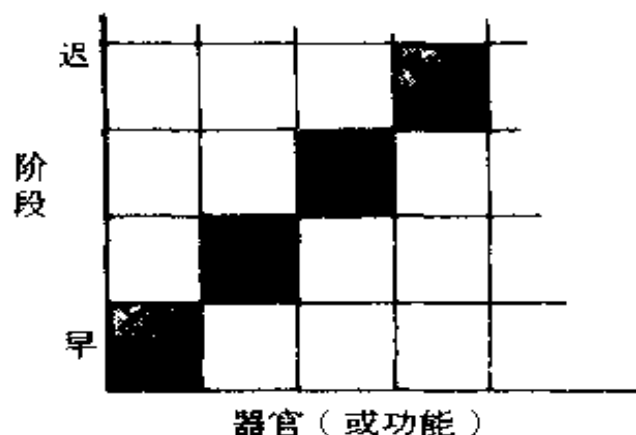


图 7 模式五的发展

个时期占优势的器官或功能。器官过度增大或增肥,而且一般说来变化也是永久性的,这就影响了所有继后的模式。这一模式适用于胚胎发展,有效地防止尚不致命的发展障碍,然而畸形的情况是罕见的。因此,对胚胎发展的描述应该说是可行的。

169

埃里克森已经用模式五的修订本描述心理性欲的发展(1950, p. 84)。他根据一个矩阵来描述该发展,按器官占优势的次序所代表的区域排列,口唇、肛门和生殖区(这样的描述尽管详细但并不确切),这些区域显然与胚胎发展的器官系统相似。运用一个占优势的特定区域来确定对应的阶段。矩阵中的格子代表着模式,这样安排是为了使适合每个区域的模式尽可能落入对角线。例子是适合口唇区的模式被结合,适合肛门区的模

式被保留和排除。发展中的偏差在于,当进而向新模式发展时,仍然采取墨守老区域不放的形式或未成熟就过早进入新模式。

心理性欲发展和胚胎发展的相异性跟其相似性一样令人注目,而且似乎是埃里克森未曾论及的。在产前发展和产后发展之间一个明显的对比是产前环境的一致性随着出生丧失了。再者,心理性欲发展远比身体发展更能对环境的影响起反应。发展模式中的存活变化是规律而不是心理性欲发展的例外。在性心理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怪异。埃里克森并未阐明他的描述是否适用于应该成为怎么样的发展,通常该是什么样的或是通常近乎什么样的。

模式五既是约定俗成的,也是描述性的,而且描述具有年龄 170 特性。每个阶段是根据哪些东西适合或不适合一个特殊的年龄来描述的。一般说来,不可能存在某个年龄的一种模式恰好适合于另一个年龄,这是所有其他模式的基础。在模式五过程中明显的促进或延迟总是意味着模式的改变。所以,不可能把测量的量表列入模式五的过程中。如果人们谈到这一发展的测量,必须对每一个阶段施以不同的量表。确实测量心理性欲发展的试图已经导致一系列量表的出现。但这不是上述模式意义上的测定。

总之,发展序列可以分成这样一些序列,在那里变化基本上存在于沿着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模式一、二、三、四)的促进和延迟之中;每一个脱离规范的变动都是畸变(模式五);成熟的变异最小(模式一)或最大(模式二、三、四和五);有关年龄的单值(模式一、二、三)和多值(模式四)函数;成熟的状况基本上是速率(模式二)或发展的最终年龄的一个函数(模式三)。

沃尔维尔(Wohlwill, 1973)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模式的问题。

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功能的发展,因为有一个足够精确的测量量表,因此在发展功能中个体差异能够被描绘出来。我们在这儿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自我发展的测量或有关的变量不可能达到这种精确度;在第八章我们将考察精确度为什么不能达到的某些原因。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把模式的发展局限于自我发展的概念和测量上会有哪些启迪。

自我发展的模式

171 埃里克森在唤起人们注意和解释自我发展的特征的精神分析学家中间是一个先驱者。在这样做时,他主要依赖模式五的另一种修订本(埃里克森,1963,p.273)。他根据连续的“核心冲突”(表2)来定义自我发展的连续阶段或描述其特征。其中,每一个冲突像图7那样用矩阵的对角格子来表示,再一次呈现连续阶段的排列。但是矩阵中的格子代表什么?原则上每一格子都含有核心冲突的早期预兆和该冲突得以解决的后期结果。然而,这一模式能够承受使之与更适合于心理性欲发展的模式相匹配的气氛,在心理性欲发展中,不同的器官或身体各区域确实涉及到连续的时期。可是,自我像一个单一的器官。每个核心问题的先兆能够被看作是前一时期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埃里克森曾提出过非对角线排列,那只是为了识别青春期的危机。

对自我发展来说,模式五的应用涉及到它在用于心理性欲发展时遇到的各种困难。这个模式既是约定俗成的,又是描述性的。他没有清晰地考虑到阶段之间的比较,从而也就没有考虑到某一年龄的人可能具有一种适合于另一年龄的模式。没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示在一个阶段或年龄里所发生的事情和下一个

阶段或年龄里所发生的東西之间的关系。在把模式五用于自我发展时还有一个困难,因为一个人很难说出在自我发展中哪些东西对应于模式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胚胎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之间缺乏自我发展的联结。

当然,埃里克森并没有对他的公式中的数学精确性自命不凡。他的解释具有文学上和哲学上的优点。毫不奇怪,他也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解释自我发展,“它是一个从童年期、青春期走向成熟的路站,也可能成为早熟的终点站,或未来退化的路站”(1964, pp. 225 ~ 226)。这似乎是对模式三的逐字阐述,与模式五的涵义颇为不同。

沙利文对自我系统的发展的描述显然是追随模式三的。每一个过渡有一个适宜的时期。当它没有出现时,这个人就会在以后各个时期遇到这样或那样不成熟的问题。他承认环境有利于发展的恢复,包括长期的心理治疗,但是业已中断的发展的恢复要比正常发展更罕见和更成问题。 172

自我的发展曲线的形式问题是一个适合经验主义研究的问题。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将取决于适当的测量手段(第九章)。目前可以运用的证据是模式二的过程和模式三的过程的结合,人们在发展的速率方面不同,而且他们在发展停止的年龄方面也是不同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上述的讨论用于我们的变量。自我发展的量表可能被看作是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量表相似,后者在性质上持有不同的观点,即序列是由年龄决定的。每个阶段的迹象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模式四的过程,正如图 6 所示。每个迹象在其发生的概率里上升至某一点,随后下降。这些迹象便成为一个里程碑的序列。在这样一个图表里,横坐标既可以看作是年龄也可以看作是阶段。如果把阶段作为横坐标,则图中的

曲线将成峰状,因为同一年龄的人有可能处在不同的阶段。为了测量自我发展,我们将这一推理广泛运用,把那些由被试显示的迹象作为他的可能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指标。

心理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区别

自我发展的现象已经成为近年来一种剧烈竞争的基础。一方面,有些人贬低弗洛伊德学派,认为心理性欲的发展是对自我发展的一个补充未免言过其实。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把自我发展的事实与业已确定的心理性欲发展的各个阶段融为一体。前者认为自我现象是一个总现象,而心理性欲的现象属于自我的领域,包括阿德勒、戈尔茨坦和罗杰斯等人都持这一观点。最近的看法可以在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J. D. Grant and M. Q. W. Grant, 1957)著作中找到。

有些人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第一次对人格做了意味深长的一瞥,可能就此对心理性欲的发展概念留下了印象,以至于使他们感到难以把自我发展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然而,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甚至在早年就说过自我发展与心理性欲发展是各自独立的。不过,面对着自我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面对着它的抽象和难以捉摸的方面,许多心理学家在把它比作身体各区的具体序列时找到了安慰。这一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哈特曼(H. Hartmann)引发了一场精神分析的实际革命,他坚持自我功能有自主的内驱力(参见第十四章)^[1]。然而,这种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却没有探求出阶段的概念。

虽然对埃里克森来说,心理性欲和自我发展之间的概念区别是清楚的,但是他的著作可能在读者中引起混乱。首先,他没

有强调序列的可分性和可变性到了什么程度。其次,他把自己性心理发展模式的形式特征作为他的自我发展或心理社会发展模式的框架。最后,由于他的解释是一种规范的解释,在这一意义上是描述平均发展的趋势,还是描述理想的趋势,尚不清楚,所以他的解释仍意味着一个不合逻辑的互相贯穿的时间表。埃里克森的解释是用年龄特征的术语来表达的。每一个发展的危机是根据年龄适应性问题来描述的,例如上幼儿园、约会、婚姻等等,而不是强调那些由年龄不同但阶段相同的人所共有的抽象方面。由于各种发展必然会同时发生,因此描述平均儿童中事件的正常过程并不能分清发展的几条路线。

174

在这一点上,沙利文的描述是有用的。然而,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即他的基本概念是对弗洛伊德概念重新命名的修订本,他的自我系统的发展概念显然与区域的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不同。他可能确实低估了对完整人格的区域需要和满足的影响。

我们就从这些前题开始:自我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肯定对人格产生影响。它们在概念上有明显的界线,不但在实质上有区别,而且在形式的特征上也是有区别的。对自我发展来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之上。内驱力的顺序是由有机体的基质决定的,而不是由逻辑的联结决定的。如果自我发展某一阶段中的问题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可克服的,例如外伤、剥夺、溺爱、环境的限制或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在这点上停止不前,或者发展得很慢。以后遇到一些问题,就会用适合早期年龄的自我结构来解释。在心理性欲领域内,无论怎样注视一个处在某阶段的孩子,他仍然会在指定的时间里突然处理下一阶段的内驱力。他可能遇到障碍,但是他不会不去尝试。

自我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的相关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心理

性欲发展并不构成连续统一体,例如在一个水平上起作用的迹象,在另一水平上不一定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人都具有在每一个水平上起作用的迹象。这种情况与自我发展和智力发展形成对照。研究自我发展有各种方法,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是完全研究该现象的;其中有一种方法是把它作为一系列成就来研究,或者作为一系列日益复杂的世界观来研究。似乎没有一种方法与心理性欲的发展相对应。因此,用测量心理性欲发展的任何一种方法与测量自我发展或智力发展的方法相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在自我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之间还有许多可能的关系,解释这些关系要比解释相关更具广泛性。有关儿童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许多解释,正如在哈特曼及其合作者,在埃里克森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样,表明了大量的相互关系。在这些解释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人类才智,但是根本没有人会去尝试总结它们。我们在这里探索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梗概,而不是具体的内容。

根据一种观点,内驱力是一切行为的动力,因而是一切自我发展的动力。根据另一种观点,自我是内驱力的对抗者;然而,自我又是部分地由内驱力构成的。这些观点是准哲学的或心理玄学的,没有多少内容。在一个更为特殊的水平上,内驱力的变化可以通过扰乱先前获得的平衡来引发自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他一些可能性包括内驱力的变化促进或阻碍自我发展的变化,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处在社会期望的阶段。

以往发生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可能性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被搞混了。其中一个最普遍的谬误是把最高的自我阶段与一切良好的特征,特别是与良好的性调节和心理性欲成熟合并起来。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否需要心理性欲的完全成熟是一个尚未

确定的经验主义问题。

智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由于认知复杂性的增加是自我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认知和自我发展之间概念上的区别就不是简单的或明显的。我们直觉地了解的自我水平与智力水平并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东西。更为令人信服的是,回忆几个罕见的才华横溢的人,他们的自我水平是低的,而一些智力有限的人,在人际关系方面却具有异乎寻常的才智。这些解释听起来好像奇闻轶事,但作为证据并非微不足道。一个实例能够确定这两个序列的水平差异的可能性。 176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可以不顾他的智力或成就,都具有均等的机会达到高水平。大自然并没有答应给我们一个互不相关的世界,即一个列管列、栏管栏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一种可以辨别的物质在统计上与其他一些特质无关。一般说来,人们可以想象,高的智力至少有助于高的自我水平,而智力缺陷则严重地限制自我水平。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智力和自我发展具有什么关系?虽然从一些特殊的和有限的研究中获得若干相关系数,但总的说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这些理由并不是为了心理性欲发展而提出来的。

考虑一下 MA 和 CA,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问一个六年级教师,她很有可能报告说在自己的教室里存在一个负相关;而这个学校的校长则报告说全校存在一个正相关[我把这一例证归功于诺曼(W. Norman)]。如果我们排除年龄的影响,用 IQ 或某种制止年龄的分数来表示智力,则我们仍然会发现不

一致的情况,这位六年级教师将报告一个负相关,而校长将报告一个零相关。这说明相关的任意性质。选择适当的样本可以获得不同的数值。

在一系列未经发表的研究中,自我发展的造句测验(第九章)和 IQ 之间的相关大约在 0.1 和 0.5 之间,其数值取决于异质性和抽样方式。在这一情境里,人们自然会把智力看作是一种自变量,而把自我水平看作是一种因变量,但是对智力的特殊测量可能会受到自我水平的影响。例如一个自我水平低的人可能在这一测验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大多数教育家一定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促进自我发展,但是,更为明显的是,自我水平决定一个年轻人是否要待在学校里,特别是在高中期间。一个处在中学水平或大学水平的功利主义者有可能作出这一抉择,但是比起那些处在遵奉水平或更高水平的人来,他又不大可能去尝试它,因为对教育来说,延缓满足是必然会发生的。未得到调节的冲动有可能在中学期间导致退学或被开除出校。很少有人冲动阶段考进大学。因此,要想解开相关的因果因素可能是困难的。

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是对各种不同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微观分析,也就是说调查一个更为特殊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统计发展序列之间的相关。这个更为特殊的问题是把智力特征降至最低限度,以便达到每一个自我水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概率问题或相关问题,而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问题。下面的思考是为经验的研究做准备,而不是代替它们。

我向思考阶段的发展仿佛需要对客观世界的稳定性树立信心,即便共生的人际关系也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存在。客观世界的建构成了皮亚杰(1937)一系列实验的研究课题,特别有关的是感知运动发展中第四、第五和第六阶段的现象。在皮亚杰的

观察中,第四阶段大约在第八至第十二个月,第五阶段大约在第十二至第十六个月。在第四阶段,儿童将在 A 处寻找一个他曾看到藏在那儿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物体后来藏在 B 处,他仍会在 A 处继续寻找这物体。在第五阶段,他将在 B 处寻找他曾看到藏在那儿的物体,尽管他以前在 A 处找到过这一物体。然而,他不会跟踪看不见的移置。在第六阶段,儿童想象看不见的移置,从那些失去物体的地方寻找它们,而不是从他最后看到放置物体的地方去寻找它们。通过许多这样的实验和观察,皮亚杰表明婴儿怎样把客观世界看作是不受自己动作和知觉支配的世界。从知觉活动构成的世界,即我向思考阶段的世界,到客体恒常性的世界的逐步演变表明了一个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发展。此外,在感觉运动的智力水平,智力的发展和自我的发展大概是难以区分的。

178

把对母亲的建构和理解作为一个截然不同于整个环境模式的客体也许是成熟的共生状况的一个条件。然而,由于连续的和日益增长的对母亲独立活动的知觉,共生现象就正常地淡化了。在正常情况下,对看不见的移置的理解可能是共生结束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可能出现否定的概念——我是我,不是母亲;母亲是母亲,不是我。斯比策(R. A. Spitz, 1957)大约用了 16 个月的时间探究否定的开始,在这一时间内儿童总是摇头躲开他不爱吃的食物。

由于“不”可能是从共生到冲动阶段过渡的关键词,因此“为什么”看来是从冲动阶段到自我保护阶段过渡的关键词。从事这一过渡的儿童一定会想象事物必定有原因或理由,冲动和行动是分开的,因此人们总是可以延缓和控制行动的,不管怎样短暂。皮亚杰(1926)根据前因果关系的概念描述了儿童的最早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自然法则的因果、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心理动

机三者尚未区分的结合。心理动机中的“为什么”居支配地位,直到大约7岁。但是由于儿童的自我中心和泛灵论的思维模式,意向和自然法则的因果大约直到那个年龄也还不是清楚地分开的。

179 皮亚杰(1932)发现了遵奉者的态度,即认为规则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年龄在6~7岁的儿童具有这一特性。大约7岁左右出现了对因果关系的更为分化的思想,然而这并不说明儿童增强了遵守规则的能力,因为遵奉的特性恰恰是缺乏逻辑的合理性。在这一年龄儿童的思想中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有一个变化似乎和遵奉者的智力前提最有关,那就是逻辑上的从属观念。人们除非知道哪些规则可用,否则就无法适应这些规则。这就需要正确地把自己归类,是儿童还是成人,是男孩还是女孩等等。同样,人们也必须对情境进行归类,包括对同伴的态度,例如对运动场上非遵奉者的态度,以及游戏时对母亲的方式等。最能表示理解规则的单词是“但是”。正如皮亚杰(1928)所指出的那样,异议的存在意味着规则的存在。在皮亚杰的被试中,“但是”在7岁前很少作为不一致的连接词来使用。

要成为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人需要放弃自己幼稚的自我中心,根据别人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智力的或认知的自我中心得到矫正之前,自我中心的看法是很难得到矫正的。皮亚杰根据“兄弟”这个词研究了儿童对互惠关系的理解。只要儿童用“兄弟”表示班里的同学,特别是将其和男孩同义,他就不具有理解互惠关系的能力。在皮亚杰的被试中,用“兄弟”表示互惠关系的正确用法出现在大约10岁左右。关键词的测验并不在于弄清儿童是否知道他有多少兄弟姐妹,而是他是否知道他的兄弟姐妹,这就需要他改变观点。人际关系的互惠和名副其实的合作是与青春期和成熟期的遵奉态度相一致

的,也就是说,是与不断强调外部规则而不是内部责任相一致的。由于所有的正常成人都能正确理解“兄弟”这个词,因此一些关键性的例子只能是智力迟钝的人。他们在不清楚“兄弟”这个词义的情况下能达到良心阶段吗?

最高自我水平的特征是处理矛盾,包括处理矛盾的作用和义务。正如皮亚杰反复表明的那样,年幼儿童没有必要处理矛盾。他对并列或者对无关的或矛盾的观念的结合感到满意。在大约7~8岁时,自我中心主义下降,而相应地增强了对矛盾的敏感性。但是只有在大约11~12岁,儿童才逐渐能够进行形式推理,并且能够辨别和调和矛盾的观念(皮亚杰,1928)。在这一阶段的特征中间,皮亚杰所讨论的是形式推理的可逆性、促使逻辑发展的能力,以及对那些违背自己信念的假设进行推理的能力。所有这些特征是以前各个阶段或多或少缺乏的。诸如“虽然”这个词,它是一个把不一致连接起来的词,比之较含糊的“但是”这个词来,部分地代表了该阶段的智能。因此,这类条件句可以看作自主阶段智力的一个先决条件。 180

上述的思考,虽然是以皮亚杰的研究为基础的,即便不直接产生矛盾,也是与他的某些思想相违背的。皮亚杰反复强调在智力的成就量表上驱动儿童的是社会压力,与上述的讨论相比较,这里所说的智力成就是指受到智力水平限制的自我水平和社会反应。在皮亚杰看来,儿童意识到这种需要,即在与同伴争论时,根据别人的观点来解释自己的意见。令人信服的是,皮亚杰的观点像临床观察一样,认为人的智力发展远远胜过他的自我发展。处在遵奉阶段或自我保护阶段的大多数成人已经完全明白互惠关系和条件从句。科尔伯格(1969)在其道德判断的几个阶段里也涉及到智力的先决条件。

结 论

181 为了重温一下自我发展与其他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智力发展和内驱力的发展,本章强调了方法论的问题和各种概念的正常特征。统计上的相关几乎不值得研究,除非在特殊的研究中作为基础比率。传统的结构逻辑,由于它把相关网络作为一个测验所测东西的定义,因此它在发展的变量范围内未免太粗糙了,以至于成为心理测量方面不可知论的一种形式。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精通理论的经验主义去研究。

注 释

- [1] 近年来,已有人对内驱力概念的有效性提出疑问。我们把这个暂时搁置起来,直到第十四章重新提出,我们在这儿运用该术语意指生活和经验的一个方面。

第八章 划定阶段和类型的问题*

一个明智的心理学家在读了第五章里有关显然相同的发展序列或最起码说是一组密切关联的序列的许多看法之后一定会感到恼火。为什么不用经验的研究来解决这些有争论的问题？如果阶段真的存在，并且构成了发展的序列，那就来证明它。如果阶段的序列存在着差异，那就提出证据来解决它。学者们如果对阶段的内容或某一迹象出现的时间持有异议，那就去观察儿童，借以决定谁是正确的。当人们从事某些有关的研究时，就有许多涉及到经验研究的困难。我们可以从一些特殊的和具体的难点着手，进入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看来，在具体描述的直觉要求和达到普遍性的抽象要求之间存在的冲突将是本章的主题。

182

划定阶段在方法论上的难点

183

第一，在特殊的行为和潜在的特质或素质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任何一种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都能通过许多途径来达到，也能由于种种理由而被接受或抛弃。或许有例外，但不能认为

* 此章为作者与布莱西(Augusto Blasi)合著。

任何一种行为都与自我水平有明确的关系。不存在绝对确定的有关任何一种水平的迹象,只有可能的迹象。当然,有些迹象比其他一些迹象在一个特定的自我水平上具有较高的概率,这些迹象可以作为测量的手段。这一点就是布伦斯维克心理学概念的基础[托尔曼和布伦斯维克(E. C. Tolman and E. Brunswik), 1935; 哈蒙德(K. R. Hammond), 1966]。

第二,人们希望了解自我水平,不然,就无法开展任何研究。一种既不是结构的测验又不是非结构的测验会得到最明显的迹象。如果测验是结构的,它投射的是测验编制者的参照构架,而不是被试的参照构架。但是被试的参照构架却是揭示他的自我水平的东西。大多数被试在选择反应时,宁可选择一个由最高的自我水平自发给出的反应[雷斯特(J. Rest)、特里尔(E. Turiel)和科尔伯格(L. Kohlberg), 1968]。由于这样一些反应很少在无反应的情境里产生,而通常是在多方选择的情境里被选出来,因此测验的这两个类型是不相等的。然而就一个非结构的测验来说,人们无法控制一个人选择能揭示他自我水平的东西。测验者能成为一个解释最低限度迹象的专家,但是被试总是有机会把一切隐藏起来,比如通过选择、偶发事件,或者为了某种原因用某种方式反应出一个不同的自我水平的特征。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一个被试群体引起敌意的情况下实施测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被试会给予反应,这些反应通常只出现在自我水平较低的被试的材料里。

第三,各种发展在儿童身上是同时发生的。一种行为可能反映不止一种发展;确实,人们必须假定,在一般情况下,点滴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在将各种发展分类时,无论是理论的发展还是行为的发展,不存在完全无误的方法。自我发展与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智力发展及心理性欲

发展有着相互关系。甚至可能没有心理测量学家所谓的“局部独立”；也就是说即使一群同龄人也可能在自我发展和智力发展或心理性欲发展之间有着关联。如果这种关联存在，它会导致变化的混乱，以至于全部资料无法解析它的组成的来源。如果我们全部依靠经验的方法，那就完全受混乱的变化所摆布了。理论必须指导同时搜集起来的资料，而资料可以用来澄清理论。

第四，在辨别自我水平的可能迹象和相关的可能迹象时，不存在完全无误的方法。正如第一点里宣称的那样，只有可能的迹象而无绝对肯定的迹象。关于另外一个与自我发展相关的发展变量，在第四点仅仅重复了第三点，有点相关不是发展的，例如社会经济状况或可能的调节。在社会经济水平最低的社会中，自我水平低的人要比自我水平中等和高的人似乎要多得多。例如，让我们来检验一下诸如粗鄙的和猥亵的反应等行为，这些反应在自我水平低的被试材料里要比在自我水平中等和高的被试材料里更为常见，尽管这些被试都处在较低的经济水平的社会。我们该怎样来确定这些反应是否应该被作为自我水平低的迹象？如果这些反应的出现仅仅是因为那些被试是低级阶层的成员，而不管他们的自我水平如何，那么事实上，把这些反应作为自我水平的一种迹象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变化的混乱，并且它是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特殊的事例。实用主义者只想预示或识别自我水平低的被试，他们可以不顾第四点，因为它意味着稍低的概率，然而，为了了解这些水平的主要特征，这些考虑是关键性的。

第五，通常每个人不只在—个水平上表现行为。每一个行为样本——一个测验是一个行为样本——必须被假定不止在—个水平上表现。在把变化转化为单一分数时，不存在独特的心理测量策略。连续阶段的不同情景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心理测量

策略造成的。然而,不同测量所选的不同的行为样本可能比心理测量的差异更要紧。

第六,为任何发展水平指定一个行为迹象时遇到的内在困难恰恰是因为潜在的连续一直在发展。一个在尝试阶段或胚胎时期表示某一水平的迹象,当它在日益清楚和明了时期就会表示较高的水平。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一个小孩学会了走路?当他在别人帮助下迈开第一步或自己走第一步的时候呢?还是当他蹒跚行走不愿爬行的时候?或是当他信心十足掌握走路技能的时候?对于较难捉摸的道德生活和人际生活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

第七,一种行为迹象也许只能从一个方面来进行辨别,既然这样,在确定一种迹象为某个特殊水平时就会存在模棱两可性,虽然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有些水平通常找不到迹象。再借走路来做比喻。走路的技能是幼儿时期身体发展的标志,但4~5岁以后就不能以此来鉴别了。假使我们有一个身体完善的量表,我们将“熟练走路”这一项目放在哪里?如果我们把它放在3岁水平,则15岁的儿童也处在这一项目的3岁水平上。我们能否折衷地把该项目放在8岁水平?那么正常的3岁分数就会在该项目的8岁水平上。在一个有赖于发展里程碑的量表里,这种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比纳(A. Binet)在编制一个年龄量表时遇到了心理测量的困难,但是在自我发展的年龄量表里所出现的困难,在MA量表里不会出现。无论如何,没有人编制过自我发展的年龄量表或有关的变量,也没有提出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心理测量的方法。

第八,当我们把一种迹象放在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就有两组概率,通过这两组概率,我们可以计算出错误的概率。一般说来,两组概率决定一种迹象被置于不同的水平。第一组是以那

些表现出特定迹象的被试为基础的;第二组是以样本中被试的分布为基础的。在第一种情形里,我们问:即使有这种迹象,被试来自一个特定水平的概率是什么?或者,换一句话说:即使有这种迹象,被试反应的期望水平是什么?就一个特定的样本而言,这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但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样本的组成。大多数样本只包含极端水平上的少数事例。因此,人们也许会发现遵照这组概率,没有一种迹象能够被置于极端的水平。

人们也许仅仅用这组可供选择的概率来为安置阶段信号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即使一个特殊的自我水平,表现这种阶段信号的概率是什么?跟随这组概率会导致许多错误,因为极端的事例很少会在继后的样本里出现。而且,由于极端事例总是比较罕见的,由于它们与其他事例在各个方面要比自我水平方面更不相同,因此有关极端水平的特征迹象的结论将不可避免地以少数事例为基础。即使由于其他联合的变量而不存在系统的错误,我们也只能受少数人的特性所支配。下面是一个有关系统错误的例子。为了获得大量的遵奉阶段以下的成年人的例子,人们必须去监狱、教养院和慈善机关,在那里这些人约占1/4或一半,而在其他地方这些人所占百分比比较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是失败者或被捕者,他们能代表不在此类机构中生活的自我水平较低的人吗?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个结论,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形里,理论是对数据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

第九,在第五章里提到的大多数作者是临床医生。对大多数临床医生来讲,从第一点到第八点的概率思考或多或少来自他人的思想。一个临床医生依靠自己的顿悟,倾向于思考完全由病人的特质和情况所决定的每一个行为。他可能把一个特定

的自我水平的概率迹象看作与自我水平无关,他的这一见解也许是正确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迹象。或者他可能把它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迹象,把特殊情境中的所有相反的事例都考虑进去了。当然,一个临床医生能够避免面临的相反事例,而研究人员则不能。研究—心理测量的参照框架本质上不同于临床的参照框架(卢文格,1963)。

为什么临床医生的直觉可能引入歧途,有其更深奥的原因。每一个发展水平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水平基础上的,是由前一个水平转化而来的。在任何一个水平,其态度的无意识成分与早先水平的态度是一致的。由于临床医生对他的病人要比研究人员和日常同伴有更深的了解,因此他就可能误判一个人的水平或一个特殊迹象的水平。一般说来,临床医生比较了解我们的人性水平,在这一水平上个体差异降至最低限度。但是在自我发展方面个体差异恰恰是最大的。因此,虽然有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证明,加之理论、测验和实验数据作为适当的依据,临床医生的观察还是像法院里的最后上诉那样失败了。

只有一个来源的假设

上述各点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定第五章里提到的阶段设计的作者都真正表明了他们的有关一个发展序列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细节方面会有如此不同呢?假设是,对所有假设的发展序列和类型来说,只有一个来源。要考虑的是一个作者和另一个作者之间在上述9点上解释的差异,并考虑到即使一个调查者编制出两种类型的测验来测量他自己的变量,也会产生差异。

当然没有什么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一个来源的假设。考虑到各个解释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也表明要反驳它是多么困难。它不能被看作是科学的结论,把它作为心理学这一复杂领域中不可动摇的观点也是愚蠢的。然而,它是一个起点,一个能起作用的研究假设。 188

如果这一假设是基本的,那就一定有某些可供选择的论断。已经提出设想的大多数作者,可以被看作是反对者,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研究冠以道德发展、人际整合、认知复杂性等名称呢?当然,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名称问题,而是道德品质或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否脱离自我发展而独立发展的问题。

一种选择是,在自我发展中包含着几个或多或少自变量的方面,表1提出的假设在早期的观点中已流传多年[卢文格,1966b;卢文格和韦斯勒(R. Wessler),1970]。不同的研究者试图发现这些方面,但没有成功[例如兰伯特(H. V. Lambert),1972]。但这不是反对解决这些方面的某种新方法的令人确信的证据。

科尔伯格和塞尔门(R. Selman, 1971)也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1971)。他们认为至少有几条有关发展、认知、人际和道德的线索,而且它们彼此处在不对称的关系上。对一个特定的认知发展阶段来说是必要的条件,不一定是人际发展阶段的充分条件,并且后者与道德发展处在同一关系上。自我发展不是一个中性术语,也许它要比其他术语组织得更为松散或含糊不清。还不清楚科尔伯格在第五章的解说中分辨出多少这样的发展线索。怎样来划定对应的阶段是个问题。把什么作为两个发展序列的对应阶段,取决于一个序列内的阶段是对应于另一个序列内的阶段的假设是否为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或者取决于这些假设是对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测量还是对密切有关的序列的测量,因而在系统上是关联的。所以,在划定对应的阶段和对应的 189

规则之间存在着迂回性。

类型问题

有关一个来源的假设的一种激进的选择是把自我发展的阶段或类型以及所有其他方面说成是空想的,或者是统计的结果,或者是年龄差异的产物。根据特性学说(doctrine of specificity, 第十章),只有特殊的行为,而没有潜在的素质。个体差异的类型和范围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自然学家的研究对象。上述9点表明,汇集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是多么容易。确实,它们是证据,是对特殊观点的真实描述。但特性学说导致我们把儿童发展看作为是一系列无定形的事件和偶联,于是本书的主题就所剩无几了。

另一方面,心理学的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寻找一个类型,用某种简化的方式表达人类性格的差异。特质是一个单一的方面,每个人是可以被安置和测量的,人们之间的差异通常能够被完全表达为量的差异。通过对比类型,把每个人置于数量有限的模式之中,每个模式由几个彼此联系的量的术语来定义。我们希望获得的基本要素在量与质之间没有区别,或者在连续的差异与中断的差异之间没有区别,但是在单一的特质与特质的模式之间存在区别。模式意味着几个特质或其他一些特征是有联系的。

190 达尔斯屈姆(Dahlstrom, 1972)曾讨论过类型学和它们对人格理论的涵义。他指出,有关类型概念的部分困难是类型这一名词具有各种意义,有时意味着像分配方式那样的东西,在其他情况下意味着极值。目前,能够接受的统计方法完全指向可以

测量的一维特质,以至于有点冒险,即把那些对划定类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变量排斥在外。

达尔斯屈姆继续指出,类型概念是建立在对动力概念的类推的基础上的,这些动力概念来自两个相邻的学科概念,即生物学上的种概念和医学上的症状概念。生物学上的种类是由内部群体的能育性和跨群体的无育性来分类的,知道了一个个体所属的种类就能传递有关大小、形状、发展过程与环境的互相作用等大量附加的信息。一个综合病症包含病人的疾病、生理迹象和临床发现,例如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或尸体解剖。凡是可以鉴别病源的地方,例如病源有机体或特殊的化学不平衡,表面上不同的迹象的相同方面是能够被确立的。综合征的概念还带有附加的信息,例如预测能否治愈和治疗时可能出现的反应。一个有机体只能属于一个种类,这是无法改变的,但一个人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综合征(“并发症”),并且一个综合征是按一个典型的路线蔓延的,通常不是恒定的或不变的。

人格类型可以在种类或症状模式之后来确定。盖伦(Galen)、克雷奇默尔(E. Kretschmer)或谢尔顿(W. H. Sheldon)关于心理的特质与体质的特质有关的经典类型学是接近于种类概念的。疾病分类的类型学是接近于症状概念的。明尼苏达多重人格调查表(The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MMPI)最初是建立在含蓄的疾病分类的类型学基础上的;它的每一个原始病理量表是这样编制的,把一个诊断类别里的人和一般人之间的区别扩大到最大限度,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即可以把一个人描述成是一种体型。然而,在一种MMPI病理量表上获得高分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量表上也获得高分。一种疾病分

会出现中断现象,因为结构通常不会混杂在一起。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格类型的中断。由于任何类型都是可以测量的,因此它们是一个程度问题。表面相似的行为,例如过失,可能表明种类的一种性格类型或一种病理学的综合征,在这些情形里,适当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同;所以达尔斯屈姆所做的区别是有价值的。

在第五章里,有一些类型是以综合征模式为基础的,有些类型则是以种类模式为基础的。许多作者已经提供了详尽的和相互排斥的类别,在这些类别里,每个人都能归纳进去,虽然在这一点上还不够详细。弗洛姆时常提供一些新类型,他一定会提到临床类型,也就是综合征。谢皮罗(1965)的“神经症风格”(neurotic style)是综合征的极好例子,它使我们把自我发展领域内的许多东西具体化了。

有些类型在数学意义上是“退化的”,包括权力主义者对非权力主义者,生源对死葬(弗洛姆,1973)。退化的类型是由两个极端来定义的,虽然可能有许多或者甚至占优势的中间事例。最后,退化的类型与特质是一致的,即使它们被概括为复杂的结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类型的哲学问题,然后再转向由假设亚类型所提出的问题,正如一些作者所做的那样。

作为认识论问题的类型和阶段

在运用类型和阶段时所出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怎样为类型下定义?在了解心理现实时哪些类型最有用?能够运用的一个特殊类型的客观范围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由

科学家慢慢地尝试着回答。然而,有些问题,由于太普遍和太基本,以至于超越了任何一门特殊的学科。这些问题无法由科学来回答,但适宜于哲学的领域。有这样一个问题:类型和阶段是统计的产物还是理论家任意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它们能有效地代表心理世界吗?说明一个问题的性质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然而,通过这样做,问题被置于恰当的前后关系之中,争辩明朗化了,包含在每一种解法中的假设也暴露出来了,从而能够分析每一组假设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

一方面,在类型和阶段之间有着基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概念。对前者的异议与对后者的异议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一,事物是具体的和个别的,而阶段和类型是抽象的。具体的东西是无法被描绘的,而且不同的事物可以被看作是相等的。第二,现实是连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变化可以在客体中观察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是察觉不到的。类型和阶段通过把连续和变动强加在任意的类别和中断上来改变它们。最终类型和阶段用另外的方式歪曲了现实,也就是说把那些通过知觉无法观察到的东西硬塞进去。由于类型和阶段是以结构的解释为基础的,所以它们不容易接受经验的证据。证据是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十分喜欢的。

这些异议是普遍的,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但它们又是古老的,因为构成它们的基础的问题,即一与多的问题以及一般概念的问题,已被哲学家讨论过至少 25 个世纪了。

一与多的本体论问题,即构成事物差异的是否是一个基本的统一体,在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中间占居着中心地位,它标志着西方哲学探究的开始。解决的方法来自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一元论。他认为只有一是存在的,有和无之间不存在

中间状况,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辩证法里,他认为没有两件东西是相同的,即便同一件东西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也是不相同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并不直接关心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把认识论的问题和本体论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质上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世界,如果事物是不同的,并且在连续不断地变动,那么我们的认识要么是特殊的,也就是说是非概念化的,要么是根本不适应的。

一般概念的问题几乎与一和多的问题一样古老,它使我们开始观察到我们的许多言词是可以归类的,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来论断各种含糊的客体。在具体与抽象,即个别与一般之间似乎有差距,这就对该论断的效度和我们的概念知识提出疑问。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有许多,从柏拉图的极端现实主义(认为一般的客体是真实存在的)到休谟(D. Hume)的极端唯名论(认为不论在世界上还是在头脑里没有一般的东西,这是专门针对同一个词可以表示不同的客体这一论断的)。然而,哲学家一般都赞同这些观点。第一,没有一般的事物;事物是具体的和个别的。第二,论断和科学定律是一般的,具有普遍的价值;没有个别的科学。第三,这样的论断不是武断得出的,而是以事物的性质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我们头脑的性质为基础。

如果说类型和阶段的有效性是了解人格的基础,那么我们认为科学的知识必然是概念的,也就是说抽象的和一般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有效的一门科学。试图去否认它的有效性或者对它的有效性表示异议,只能是自相矛盾的和武断的,最后注定要被驳得哑口无言,落得与激进的相对论和怀疑论相同的下场。如果推理的线索仅仅涉及到概念,这样并没有确切地证实类型的作用。然而,它解决了关于类型和阶段所持的异议,同样也解决了对所有概念思维所持的异议。

这些激进的异议来自以感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者的认识观点。古希腊哲学家在他们讨论一和多以及一般的概念问题时已认识到这一点：巴门尼德关于真理和观点的区别，柏拉图关于知识和观点的区别，以及承认和接受感觉印象、外貌、表面差异等，同样，现实只能在这一水平之外，即在形式、结构和观念的水平上才能被研究。

亚类型和普遍性

第五章所讨论的设想比较适合某些人，而不适合另外一些人。有些人不适合某些作者的类别，但适合另外一些作者所描述的类别，这里，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么？没有一个作者拥护这种解决方法或者对他们的概念的应用加以限制。人们也许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或多或少普遍有效的概念；之所以“或多或少”，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西方文化以外的普遍性。科尔伯格(1969, 1971)直接讨论过这类问题，并且为他计划中的跨文化的有效性提供证据[对我们在日本和库拉考(Curacao)的研究来说，库塞苏(O. Kusatsu)和拉斯克(H. Lasker)已经发现了跨文化的有效性]。我们的自我发展概念明确指向或多或少普遍的有效性，虽然我们并不感到我们必须取消一些东西，如果对根本不同的文化来说修正是必要的话，有些人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比其他人更典型，但没有例外的情况，因为原则上人们不可能被分类在量表的任何一点上。一个人可能隐瞒信息，或者我们可能从我们获得的信息里作出错误的推论，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它，因为在把每个人适当地分类后，他在量表上只有一个位置。困难的案例，即那些不适合的案例已由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方法处理

了。有些人扩展了阶段的定义,有些人假设了亚类型。大多数人不顾这一问题。让我们看一看处理困难案例的一些方法。

最普遍公认的类型是遵奉者,最成问题的类型是嬉皮士(老一辈人称之为颓废派或生活放荡不羁派)。汉恩(N. Haan)、斯特路德(J. Stroud)和霍尔斯坦(C. B. Holstein, 1973)的研究发现,嬉皮士这类人在科尔伯格的第三阶段占优势,或者在过渡到第三阶段或者在超出第三阶段中占优势。就自我阶段而言,嬉皮士经测验显著高于自我保护阶段但低于良心阶段。虽然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先前测验过的任何一个组的典型反应,但是在我们的计划中,他们的最合适的位置在于良心—遵奉的过渡水平。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他们基本上处在遵奉的位置。因此,对那些生活风格属于非遵奉的人来说,我们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根据自我发展的方案,他们可以归入遵奉者;根据科尔伯格的方案,他们可以归入习俗水平。许多人都注意到嬉皮士有时遵守反遵奉的刻板准则,然而这种观察并不排除自相矛盾,除非我们愿意词不达意。非遵奉或反遵奉与遵奉或习俗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当前者成为一个刻板的准则时,根据具体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至少基本上称作遵奉者。在某种抽象的水平上,这些行为可能渐渐消失。但遵奉这一概念却具有不同的更加抽象的意义。

恰恰在这一点上,为了把维度转化为能使每个人毫无例外地分配在一个特殊的水平上,就需要给这一维度的各点以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意义。为了使嬉皮士—遵奉者自相矛盾的解决具体化,可以把遵奉阶段解释成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活的中心问题是遵奉—不遵奉—反遵奉。一旦我们扩展了该定义,一种超遵奉就被确定下来了。典型的习俗者仅仅是该阶段的一种可能的类型或现实。

处理这些困难案例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将每一阶段和类型分成亚阶段或亚类型。科尔伯格用各种方法对他的6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不仅对过渡阶段的人指定了混合的或中间的分數,而且还假设了亚类型。亚类型代表一个持续的特征,该特征无须与原始纪录中的变异性或过渡有关。按照科尔伯格的观点,每一阶段的人都能分在亚阶段A(根据规则或功利的结果来确定的)和亚阶段B(根据光明磊落或公正来确定的)。后者包括那些角色采择的倾向或理想自我的倾向。亚阶段B比亚阶段A更为复杂,更为内在,更为普遍,在B阶段,每个人都已经历过A阶段,但不能逆推;人们可能从亚阶段A到亚阶段B,也有可能到下一阶段的亚阶段A。

在佩里的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的量表里,从基本的两重性通过相对论到承担义务的这9种状态中有一些是根据可供选择的亚类型来定义的。例如在第五种状态里,可供选择的是相对主义的关联、相对主义的竞争、相对主义的扩散。人们可能以说理的方式询问佩里,他似乎太过抽象了一些,并且描述那3个概率中共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同一个状态来构造。但佩里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比其他研究者更直截了当地承认困难案例的问题。对他的9种状态来说,他加上了三个概率:妥协、逃避和退却(退化)。当每一个学生处在原有量表的某一状态时,后述3个类别只能应用于某些学生,并且有否定的涵义。因此,佩里所做的是概述一个种类的概念,包括对某些状态来说可供选择的亚类型,并且附加了3个综合征类型。

有关自我亚类型的一个研究程序的主要例子是沃伦、帕尔默(T. Palmer)和他们的助手的研究。沃伦(1976)指出建立I-水平

中得出的,而是对过失者常见模式的观察中得出的。在 I-2 的过失者(对应于我们的冲动阶段)中间有两种类型,它们是自私的寻衅型和自私的被动型,前者用要求和敌意来反应挫折,后者则用抱怨、诉苦或退却来对待挫折。在 I-3 的过失者(对应于我们的自我保护阶段和早期的遵奉阶段)中间可以分出三种类型,它们是不成熟的遵奉者、有教养的遵奉者和操纵者。不成熟的遵奉者对权威表示服从;有教养的遵奉者的反应与过失者同等的群体相似;操纵者试图削弱权威或篡权。在 I-4 的过失者(在我们的方案中显然是指良心—遵奉者)中间可分出 4 种类型,它们是神经过敏做作型、神经过敏焦虑型、情境性情绪反应型和有教养的认同者。两个神经过敏的亚类型对潜在的犯罪作出反应。情境性情绪反应型对个人和家庭的危机作出反应,而有教养的认同者用不正常的价值系统来鉴定自己。虽然沃伦关于人际成熟的概念有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和普遍的应用性,但这些亚类型在违法或过失领域是特定的或特殊的。在这些亚类型里,原概念的抽象性质消失了,因为没有提供线索来说明一个水平中的亚类型与下一个水平中的亚类型是如何衔接起来的。例如,在 I-2 和 I-3 水平中有没有神经过敏型呢?

198

科尔伯格的亚阶段是维度内的和不对称的;佩里的亚类型是维度内的和对称的,他还有像症状那样的亚类型;沃伦的亚类型是维度外的和对称的。这些亚类型试图把过失毫无例外地置于每一个水平上,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它们与正常人的类型在相应的阶段上假如有关系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科尔伯格和佩里是通过小样本的纵向研究来达到他们的亚阶段和亚类型的。沃伦和帕尔默已研究过大量事例,但是亚类型的定义在资料积累时没有改变,他们没有描述亚类型的原始资料。

运用科尔伯格和佩里的方法,人们能够形成简单的理论,这

些理论适用于手头上的少量事例,但是对用于一般人的广义定义的量表来说并无多大价值。而且,科尔伯格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推断每一状态的内在逻辑。沃伦(1969)与帕尔默(1971, 1974)是经验主义者,搜集的形式资料是:对这一实验条件下的亚类型来说,当测验依据的是后来的逮捕的标准,而不是定罪的标准时,其结果要比与之匹配的控制组更为有利。科尔伯格方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成为事实不易渗透进去的教皇的披风。沃伦—帕尔默方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聚集起一堆事实而不是导致科学的归纳。在这些方法逻辑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亚阶段和亚类型到底能解决多少有关困难案例的问题。

第五章里的概念是怎样发现的?可能每个作者开始注意到几个例子,即在看来完全不同的特质的整个模式中人们之间彼此相似。不同的作者也许是以那种方式的稍微不同的巧合开始的。逐渐地,每个人注意到一些可供选择的模式,这些模式在逻辑上和经验上是互相排斥的。尔后,他观察到他正在思考的概念的力量和广泛的有用性。然而,如果他对资料 and 批评作出反应,那么他肯定已经遇到过并不适合其他类型的事例。如果他仍旧用综合征的模式工作下去,那么问题就不会打扰他。如果他已经转向种类的模式,那么他可以在类型或阶段的各种广义定义,或者在定义各种亚类型或亚阶段之间作出抉择。我们并不反对运用资料反馈来修正这个方面。相反地,在下一章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规划的程序。所提出的问题是亚阶段和亚类型究竟能解决多少阶段和类型的概念所提出的方法学上的问题。

199

亚类型的现实问题恰恰与类型的现实问题相同。不论有多么详细的类型学,总是有困难的案例。亚阶段,例如科尔伯格的亚阶段,提出了阶段的中断问题,并对这个方面予以详细的说

明。结果,它们提出了皮亚杰称之为差倾角(décalage)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问题,或者甚至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问题的倾向。维度内的亚类型,诸如佩里的亚类型,揭示了许多问题,例如一个阶段的亚类型与下一阶段的亚类型之间的关系,需要大量事例来回答。维度外的亚类型,诸如沃伦和帕尔默的亚类型,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的发展并不包含每一个重要的特质,但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增加新的维度来处理,这些维度是由原来的维度独立地来定义的。因此亚阶段和亚类型是暂时的或可变的。

促使一些最积极的研究团体去求助于亚阶段和亚类型的原因,如同第五章里提出的许多概念一样,也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唯有抽象才能把阶段、类型和亚类型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抽象才是科学的东西。

特殊事例

在讨论我们的概念的有效性时,经常会出现两个特殊的事例:具有特殊天赋或训练的人和具有临床案例的人。提出的问题是,人在一个领域的活动水平,即他的特性或他的病理,与他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水平是否不同。如果不同的话,那么自我结构的概念是否该取消或者至少在哪些事例中需要矫正?作为答案,我们一定要牢记自我结构不是特殊的具体的行为的属性。它是一种结构,一种抽象作用。同时,如果它与行为毫无联系,它就不会引起我们长久的兴趣。

特别在一些有严重的情绪或精神障碍的人的案例中,他们在某些领域内的活动水平与在其他领域内的活动水平之间有着

显著的差异。然而,在这些事例中,只有通过巧合,各种线索才与表1的各项相对应。与冲动的控制、人际关系以及有意识的成见的不同水平相比,下面一些东西更有可能在不同的特殊情形里有不同的水平,例如:性生活对工作,与男人的关系对与女人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对与雇工的关系,或者一些甚至更加特殊的和更加特异的模式。压力之下的退却可能发生在表1定义的各个方面。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把一个人进行归纳意味着那是他一贯活动能力的最高水平。在有些事例中[见第五章艾萨克斯(K.S. Isaacs)讨论],这种能力与其说是现实能力,还不如说是潜在能力,但通常这种对照理应接近。因此,自我结构的概念不需要矫正,以便适合易受责难领域中作用较低的事例,也不会和任何阶段的独断的观念和冲动的行为的可能性产生矛盾。

有天赋的人是什么样的?难道一个道德哲学家的作用在科尔伯格的测验里不会比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作用更大吗?难道一个诗人在造句测验(即诗歌方面最高的反应)上的作用不比他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作用更大吗?难道一个未受过教育但温柔的妇女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不比她在纸一笔测验上的反应更有效吗?关于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研究结果,但是我们承认每个事例中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至关重要的东西被丢掉了呢?我们承认即便自我发展或道德发展的测验也不是无差错的,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其错误要比一般事例中的错误可能更大些。

但那些异议毕竟只是猜测。那些提出异议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人的行为在易受责难的领域或专业领域与他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是不同的。然而,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那些差异符合不同的可以测量的自我水平。也许,他们的非正规的印象要比标准化测验更加容易被蒙骗。

即使差异明显地采取不同的自我水平的形式,仍然有这样

一种可能性,即有争议的行为不论是退却的和症状的还是熟练地完成的,都可能带有某种提示,标志着这个人的最具特征的水平。既然如此,水平的正确推论就有赖于测验打分者的敏锐性了。

结 论

我们已经推测过,在第五章里,提出概念的作者是通过综合征的模式来指导观察并开始研究工作的,由于他们确实相信概念的普遍性,从而转向诸如种类模式那样的东西。然而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造成了模式的混乱。而且,特殊的细节使得一幅肖像栩栩如生,却降低了它的普遍性,为此,不得不凭借亚类型来保留具体细节的活力而不牺牲覆盖面的宽度。亚阶段增加了差倾度,而注意力不再转向潜在的连续,它们只做短暂的拖延,并未克服困难案例的问题。亚类型或亚阶段的现实性问题与原先类型的现实性问题是同一回事。

202 我们正在处理这样一个假设,这里所描述的大多数发展的和类型的变异性完全是由单一的来源造成的。纠正各种方案的欠缺和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是一回事,但障碍重重。有些障碍在布伦斯维克的方式里被看作是素质与活动之间内在的概率联系的东西。有些障碍在认识论上可能被看作是概念和事物之间具体的现实。

没有概念和抽象,科学就成为一件可怜的或者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们的自我发展的概念和其他一些评论过的方案之间的差异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可以商榷的。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与

众不同的,而且我们提出的概念和科学的方法是不容商榷的。这在下一章将会变得更加清楚,因为我们要概述我们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设计一个关于自我发展测量的精确概念。

我们承认有些人被某些作者充分地描述,其他人被另一些作者充分地描述。这些差异说明描述的多重性,但它们并未证实概念的多重性。也许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人们会形成品格结构?为数不多的儿童渴望在道德哲学上占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一定发现他们正处在困难的和混乱的世界之中。品格结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形成的。一个人的品格在其形成初期,他的品格结构可能起伏波动,他的行动时常与品格不相符合,但是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品格结构。一个驾驶员(或罗盘或地图)就是自我,结构是它的初级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概念只要它们是结构的,就一定是自我发展的概念。可能有许多精神上的亚结构,有些(例如公平和正直的概念)与自我结构密切相关,其他(例如有理数的结构)则与自我结构毫不相关。那些亚结构也许比特殊个体的自我结构甚至一般人的自我结构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谈到品格结构,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自我结构。

第九章 测量的问题和策略

203 长期以来,差异心理学的心理测量,给发展心理学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皮亚杰的革新以前,发展心理学家一直满足于用已经取得的成人研究结果来评估儿童。多年来,差异心理学的主要思想由桑代克(E. L. Thorndike)概括如下:“一个事物如果存在,它就具有一定的量,也就可以被测量出来。”(1914, p. 141)这个观点的不良后果,导致了特质名称和测验的猛增,其数量超过了对人性的合理的认识范围。也许没有谁说过,凡是可以命名的事物,都必定以某种意义存在。但是对这个假设,也未曾有
204 过任何明确的反驳。因素问题成了差异心理学竭尽全力研究的中心问题。因素分析成了唯一的手段,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技术上的关注,并且产生了一整套连大多数心理学家都难以理解的论述,但是却很少涉及心理学的本质。

激进的发展观与经典的心理测量观是对立的,前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点:存在于人性中的一切,必定是发展而成的,而且其发展可以被追踪。这一论断意味着,逻辑极性作为特质理论和特质测量的传统基础,极少或表面上与发展踪迹相符合。此外,发展的过程除了测量以外,既有趣又重要。为了测量个体在某个发展序列中的进展状况,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发展的过程。也许,差异心理学的这个武断成分,即凡是可以命名的事物,都是可以测量的,能够通过发展的现实而不是统计的分析来消除。

对差异心理学来说,一个激进的发展的方法,能够对众多的测量做筛选,使至今未能解决的因素问题不再成为个体差异领域中的核心问题。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抛弃逻辑极性,热衷于寻找发展的序列,那么我们将如何反过来测量非任意杜撰的逻辑极性呢?这就是本章的论题。首先,我们要讨论心理测量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与每一个计划的心理测量联系起来讨论,但目前很少这样做。在自我发展的概念中,这些问题与实质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其次,我们的一些试图,即测量自我水平以及与其相关方面的试图,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测量问题。在那一部分里,假设基本构造的效度,并论及测量的策略。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不完全的和尚未建立的,所以这一讨论将会遇到阻碍。

基本的心理测量问题

如果谁满足于说,任意指定被试人数,或任意选择测量结果,可以称作心理测量的话,那么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能解决心理测量的策略问题了。但是,对于那些选择不同测量模式的人来说,这是行不通的。我选择的观点是,严格意义上的测量,不可任意指定被试人数或任意选择测量结果。排除任意的因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需要不断地更新顿悟。我们关心的课题可以归结为一系列问题:即使被试及其测量结果具有差异性,是否就存在一个与假设的变量相符的、分明可辨的模式或综合征呢?即使假设的综合征分明可辨,它是否就比解释行为的可供选择的方式更显著呢?那些等级、阶段或点是否就沿着维度正确地

或最佳地排列着呢？这个维度是连续的，还是断断续续的？各种客观上有用的符号是与这一维度不变地联系着的吗？

综合征。第五章中各个作者的描述集中表明，他们一开始就对标志综合征的各种问题或一系列与不同的阶段或类型相符的综合征感兴趣。测量应该有助于解释和阐明这些综合征。

显著性。任何一种训练中的基本变量就是那些能够用来简洁地表达函数关系和规律的变量。相比之下，根据测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测验的传统评估，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许多变量能够可靠地和有效地被测量，但不一定是基本的或显著的。就个体差异的一个方面写一本书、一篇专题文章或设计一个研究程序，意味着相信它的显著性和重要性。本书就是强调自我发展的显著性。凡是把自我看作是构成的人，就不会对自我作为个体的一部分这一显著性提出异议。但是，这里所说的自我发展不是指所有自我功能的发展史，因此，提出自我发展的显著性不可能只停留在自我的重要性上。一个变量的显著性的产生，是在某种定义范围内无论观察所有证据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排除在外，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些不完整的证据表明，自我水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至少在成熟的早期是如此。此外，还随着教育、智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这是有关基本变量的提法的一种证明。

序列。自我发展的设计量表是序列量表。是否能找到一个相应的间隔量表的问题几乎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与增加或减少自我水平相对应的操作。有些研究人员认为，确实存在阶段，它们组成了一个有顺序的量表。他们大体上同意对阶段的描述，但是对阶段的顺序，却仍然意见不一。C.沙利文、格兰特(J. D. Grant)和格兰特(M. Q. W. Grant)把他们的1-3阶段分为反对阶段和遵奉阶段。他们的1-3反对阶段与帕克(R. F. Peck)

的权宜阶段、艾萨克斯的 Delta 阶段和表 1 中的自我保护阶段这 3 个阶段的实质部分极为相似。遵奉阶段要比上述 3 个阶段都高一点。另一方面,帕克和哈维斯特(R. J. Havighurst)不同意非理性的良心阶段会比遵奉阶段高。对非理性良心阶段群体的描述与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的 1-4 阶段的描述也极为符合。因此,后者认为,非理性良心阶段肯定高于遵奉阶段。这些个体完全符合我们设计中的良心—遵奉的过渡,可能也包括我们的良心阶段的某些个体。

表 1 中的序列是由理论推理和经验数据得出的。例如,在造句测验中,典型的遵奉阶段与自主被试的相似程度就不及典型的良心阶段与自主被试的相似程度。同样,典型的自我保护阶段与冲动阶段被试的相似程度要超过遵奉阶段与冲动阶段被试的原始纪录的相似程度。

有关序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断来自发展的研究,或是纵向的心理测量研究,或是实验的研究。科尔伯格(1969)通过各种纵向的和实验的研究宣布了他的序列,这些数据尚未公布。但是,霍尔斯坦(C. B. Holstein, 1973)对她自己的纵向研究的基础提出了疑问。纵向研究由于各种心理测量的困难,包括测量和测验结果本身的不可靠性,而受到阻碍[雷德莫尔(C. Redmore)和沃尔德曼(K. Waldman),1975]。显然,对阶段的序列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既不是细微的,也不是容易克服的。

连续性。即便存在阶段,即便阶段的序列是可知的,那么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是跳跃的,还是连续的? 因为每一个阶段都含有它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用托尔曼(E. C. Tolman)的话说,如果必要,你可以创设一个情境,把一个认知地图换成另一个认知地图。目前还没有一种足够精细的测量仪器能断定发展的过程究竟是跳跃的还是连续渐变的。

按照一种测量方式,一个过程可能表现出非连续性,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是通过连续的阶梯发展的。进一步的分析可能揭示,明显的连续性是一系列非连续性变化的总和[特纳(J. M. Tanner)和英海尔德(B. Inhelder),1960]。皮亚杰在谈到他与英海尔德合作研究认知阶段时说:“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些阶段,这些阶段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年龄都具有一定比例的个体。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发现亚阶段或中间阶段,但是,当我们试图控制这些中间阶段时,我们就被许多亚阶段或中间阶段迷惑了,因为这些阶段是不稳定的。其他一些有组织的阶梯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因而能够称之为‘阶段’的,正是这些阶梯”(特纳和英海尔德,1960,p. 122)。第八章中谈到的对亚阶段和亚类型的看法不一致,证实了皮亚杰的观点。

当人们把第五章中的不同方案综合在一起时,就能发现,在一个方案中是一个阶段,在另一个方案中却是两个可以认知的阶段之间的过渡。因此,综合各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可以认为阶段是连续的,尽管由于被试的特征或研究人员的偏见对这些差异可能有其他一些解释。

208

单一性。人格特质必须被假设为具有极性和里程碑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不同的变量看作是基本的或组织的构成物,那么用来解释人格领域的一种方法的极性或变量就是一个里程碑。遵奉作为一个广为研究的变量,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是曲线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里程碑。这些作为自发的变量(帕克和哈维斯特,1960,p. 88)和冲动的表示伴随着一个互补的曲线[韦伯斯特(H. Webster)、桑福特(R. N. Sanford)和弗里德曼(M. Freedman),1957],该曲线位于自我量表的低和高两个终端的偏高处,在若干高遵奉之间的偏低处。

区分里程碑顺序和极性变量对我们的自我发展概念是必不

可少的,也是测量过程的一个环节。既然自我发展具有极性和里程碑两个方面,那么不管测量技术多么不完备,都必须运用适当的技术区分这两个方面。心理学应该选择极性变量作为它的主要变量,这是无须争辩的。我认为,当自我发展被定义为极性变量时,它的最容易观察到的表现形式就是里程碑。正是那些里程碑被解释成是极性变量,并且在人格研究的主要倾向中构成了主要概念。遗憾的是,迄今尚未有设计、程式或计算机能替代心理学家去确定什么是主要的变量,什么是这些变量的辅助的表现形式。有一个民间的心理测量学派主张用因素方法来区分和解释这些主要变量,但是因素分析在这种情形里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这种方法只能处理像极性变量那样的变量。因此,如果投入因素领域的项目或分测试(subtest)包括许多里程碑,而不是自我发展的极性功能,那么自我发展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因素出现。此外,人们也无法期待得到可感知的或明显地可解释的结果(卢文格,1965)。

虽然没有一个统计方法能够确定什么是里程碑,什么是极性变量,但是,只要有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明确的设计,并且搜集适当的数据,那么就有方法或可能有方法来检验这些问题的假设。我们越是努力寻找在最低推理水平上能够观察到的自我发展的表现形式,并因此而适用于测验项目,不论是自我报告或由他人做等第评定,我们就越是能趋向于里程碑,而不是极性的观点。我们越是努力探求或编制作作为极性变量的自我水平的索引,就越会发现自己赞同推理的变量,而不是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心理测量的基本原则是观察,无论是观察自己或是观察别人。因此,适用于处理里程碑顺序的心理测量技术是必要的。

评价技术

心理测量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定量策略和记分算法。定量策略是一种把质的观察转换成量的差异的方法。由于把单一的观察作为一种将人群分类的方法(如同将其他任何事物分类一样)并不可靠,由于一组观察肯定会有离差,因此就必须有某种规则来缩小量的差异,使之成为一个分数或一个类别;这就是记分算法。

除了研究人员的自我水平之间和有关概念之间具有差异以外,在自我水平和概念之间还存在形式上的差异。这些形式上的差异规定了不同的记分算法。一个概念类型有着与潜在能力相似的自我水平;与这种概念类型相一致,记分算法是最高的记分符号。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自我水平,人们必须已经通过所有低于该水平的水平。这些水平可能表现在行为上,甚至表现在包括幻想在内的比较显著的行为上,但是行为不可能反映出尚未达到的水平。艾萨克斯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

第二个概念类型是素质测验图。按照这一观点,自我成长的涵义并不像前面那个观点等级森严,对每个自我类型都能列举一组在所有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素质或动机。表示每个人特征的就是他的分数测验图,它反映了每一个独立的水平。马斯洛的动机种类的概念提供了这种形式,帕克和哈维斯特的测量方法遵循了这一模式。

第三个概念类型是根据一个有结构的或有组织的整体的核心功能来看待自我水平的。不少作者就是这样设想自我水平的,沙利文、J.D.格兰特和 M.Q.W.格兰特特别运用了核心功能

这一术语。这个概念得到了精神分析概念的支持,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沙利文和另外一些学者的结构概念把自我看作是一个组织(我也同意这种观点),皮亚杰的守恒观念也支持了这一概念。可以观察到的符号在核心功能水平的上方或下方呈离中趋势,它是符合这个概念的。遗憾的是,核心功能概念没有转换成独特的记分算法。形式的功能水平是一个可能的形式,科尔伯格就采纳了这个形式。 210

在考察测量自我水平和有关变量的方法时,我们进行了解决概念类型问题的讨论、定量策略的讨论和记分算法的讨论。我将简要地讨论其他研究人员采用的测量方法,以及我和我的同事在探究测量方面的两条研究线索。我们之所以强调我们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关于心理测量的问题要比其他人态度鲜明,另一方面是因为迄今为止读者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写成了如此厚的一本书。序列是任意决定的,正如每个研究人员或小组似乎不受别人的影响而制订出自己的评估技术一样。不过,我们受到了格兰特-沃伦小组的影响。

艾萨克斯:评定主题统觉测验的相关性。艾萨克斯(1956)把他的人际相关的构成看作是一种潜在能力,即在一定程度上人际关系复杂化的能力。由于缺乏机会、情感阻滞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这个水平不可能表现在目前的功能中。他认为,该能力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之前,必定先在幻想中表现出来,因此他把主题统觉测验作为一种能引导出人际关系幻想的手段。每张主题统觉测验(TAT)卡片上的故事配备一个等第评定,并符合其中表现出来的相关性的最高水平。这样,个体的最高水平是根据指定给他的故事来确定的。理由是,个体并不理解超越他本人的人际作用水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也就不可能表现出高于 211
他本人相关性的水平。个体不可能获得过高的评定,除非等第

评定本身有差错。但是,当个体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表现不出他的最高水平时,他就可能获得过低的等第评定。

艾萨克斯的方法导致了一些困难。改变一个故事的分数,可能改变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然而,心理学家早就知道,无论是被试的变化或是评定人员的失误,问题的不可靠性最好是通过增加个体分数赖以建立的观察次数来解决。在实践中,艾萨克斯用确定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的次最高分,而不是最高分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般说来,这两个最高分是一样的。另一个困难是,最大限度的等第评定受到长度因素的干扰,也就是说,个体在接受一个有着5幅图片的主题统觉测验之后,无论怎样评定个体,他在接受一个具有5幅以上图片的主题统觉测验之后评出的等第,至少是一样高的,也许还会高一些。在临床方面,检查者往往因为病人没有表现出他们充分的潜力而增加图片,也会因为病人缺乏感染力而停止测试。

相关性的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到自我功能的许多方面,但是记分方案只取决于一个方面,即上述的人际关系复杂性。用内化标准测量一个有关成就的故事,如果故事中没有提及其他人,就会任意评出较低的水平,因为对这成就来说,其他人的赞许是一种指示。然而,按照我们的自我发展方案,前者是良心水平的反应,后者是遵奉水平的反应。每一个测验,至少是每一个持续的测验,必须有一个“省时循环性”(saving circularity)。艾萨克斯测验的省时循环性是这样的:用最高的等第评定作为记分算法,只对那些最具诊断性和最明确的指示物进行评定,而不管概念中含有多少人格特征。艾萨克斯可能已经发现,人际关系的复杂水平是一个有效的和可靠的指示物,虽然他对这一断言尚未提供证据。对上述那些碰巧没有提及两人以上的故事作系统的偏低的等第评定表明,即使反应的其他方面可能

表现出高的自我水平,只要单一的故事显示高水平的相关性,也不会影响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如果是两个故事,则最高评定算法就被改作为次最高评定。)。艾萨克斯的记分手册一直没有发表。在一些同事中传阅的一个油印件是一个样本手册,它提供了不同水平等第评定的实例。由于缺乏适当的记分手册,艾萨克斯的贡献的价值无疑受到了限制。然而,这毕竟是有关潜在能力概念类型的最明显的例子。

帕克和哈维斯特:动机测验图。帕克和哈维斯特(1960)围绕五种性格类型组织了他们的研究;每个类型代表一个适应的模式、一个动机模式和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的阶段,简言之,代表一个“理想的类型”。同时,每一个模式是每个个体的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与艾萨克斯不同,而是像大多数研究人员那样,假设优势模式是最能表示个体特征的模式,并且把这一模式用在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上。这样,他们的基本定量策略就建立在动机测验图上。他们用主题统觉测验、造句测验、谈话法、社会测量和其他手段以及等第评定,研究了正常的青少年,没有用建立在单一手段基础上的等第评定。他们的报告结果主要是以他们的工作人员检查了所有的有关材料后所作的整体评价为基础的。为了使每个个案都获得一组等第评定,对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异作了调整。

他们研究的基本的定量策略,是把每一个性格类型看作为一个极性变量;每个评价者在十点量表上评估被试具有的动机模式占多少。事实上,评价者考虑了所有的数据,然后在对不同的测试、观察、谈话等作直觉加权的基础上,编制个体动机模式测验图(其实就是自我水平)。由于把里程碑顺序看作为一组极性变量而引起的模棱两可的数据,在他们对评价者的训练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权宜阶段的一个高的等第评定并不含糊时,他

们就把在权宜阶段等第评定低的被试描述为：“或者倾向于满足一时的冲动而不考虑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最终结果，或者因为内化的原则或考虑到他人和自己的利益而遵奉道德规范……”（帕克和哈维斯特，1960，p. 231）。换言之，该变量的低位意味着道德水平要么很低，要么很高。评价者之间的差异在个案讨论时得到调整。这个步骤的结果是，每个被试有 5 个评定等第，它们代表了每个动机模式的多少，这是根据被试的行为或潜在行为的表现推断出来的。

记分算法的问题在于把 5 个等第评定压缩为一个分数或一个等第评定。他们的方法包括把每个个体的 5 个分数回复到一个分数，按这个分数，把个体置于八点量表上，这个量表是以个体的形式评定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个或两个以上大致相等的高分，只须调整一下，没有必要求出平均数。8 点中的 5 点是他们开始研究时的那 5 个性格类型，而且次序也与原先的一样，余下的 3 点插在这 5 个类型中间。这样，他们就从原始的发展量表开始，把每个量表点转换成极性变量，然后再用比原始量表稍微扩展的量表，把一组极性量表综合起来。

这个程序也有问题：帕克和哈维斯特的评定人员是否如他俩所设想的那样编制出测验图或分布表？要编制一个真正的测验图，各个等第评定必须在实验上是独立的。在一个真正的分布表中，等第评定的次数是固定的，以至于一个水平的等第评定的次数越多，另一个水平的等第评定就越少，后者用于下面要提到的 36 个项目的造句测验中，这 36 项目的等第评定总是分布在可能的等第评定的水平中间。用来达到一个真正的测验图的一种方法是让被试回答一组独立的项目，借以评价每个水平反映被试特征的程度。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有一组观察，无论这组观察多么复杂和多么不同。在评估每一个被试的每一种动机水

平时,所有的数据都要考虑到。原则上,每一个观察都可能有差错;当两个等第评定或分数是以同样的观察为基础时,则它们的差错是相关的,逻辑上就不可能断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谁要是断言这个研究产生了动机测验图,谁就等于断言他已经知道了这两个动机水平的强弱关系,这个结论是与这些数据不一致的。既然这些数据不能构成真正的测验图,那么它们也就不能构成真正的分布。要是评定人员勉强把被试所有等第评定的总和定为一个常数,那么这些等第评定肯定会直觉地构成某种分布。一个被试的所有等第评定的总和是 17,另一个被试的所有等第评定的总和是 26。这个差异导致了一个问题: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动机,是否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多的动机? 214

测验图的应用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所有年长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在自我水平方面表现出离差。从这个和其他应用测验图的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测验图除了中心倾向的测量外,还包含有效的信息。在用不同的技术得出的测验图(或分布,或离差)之间找不到相关。帕克和哈维斯特本身也只把测验图作为一个方法来确定优势的性格类型,他们用这个方法寻找该类型与其他变量的所有相关。

沃伦、格兰特、帕尔默和其他心理学家:违法者自我水平的评估。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1957)的论文是有关发展类型学的最早、最明确的一篇论文(第五章),它是多年来许多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研究犯罪的开创性著述(沃伦,1969,1976;帕尔默,1974)。他们至少运用了 4 种不同类型的测量手段,包括谈话法、造句测验、客观测验(自陈)和行为等第评定量表。

谈话法的基本定量策略是用不受限制的问题引出参照框架,在这个参照框架中个体觉察和整合人际关系。任何谈话内容对评定来说都起作用,评定人员凭借自己的颖悟进行推理。 215

不论是通过直接交谈还是依据谈话录音,评定人员主观地考虑离差,并整合成一个有关个体功能如何的印象。概念类型是核心功能;评定人员对谈话结果确定单一的I-水平的等第评定,由此确定被试的等第。既然只有一个等第评定,因此也就没有记分算法。

在使用造句测验中,他们只对整个原始记录确定一个I-水平的等第评定。唯一可用的记分手册[杰斯尼斯(C. F. Jesness)和韦奇(R. F. Wedge),1970]描述了每一类型的个体对每个项目的具有特征的反应。他们似乎并没有把从项目反应到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编纂成规则。他们有逆向的手册。如果评定人员已经知道自我类型,就能从手册中查到预料反应。但是,评定人员的任务恰恰相反,应该从反应中评估自我类型。一个逆向的手册尽管有助于评定人员对整个原始记录做直觉的等第评定,但是它不适合于心理测验的研究。

冈德森(E. Gunderson)、沃伦(M. Q. Warren)和其他人曾经编制独立的客观测验来评定每个被试的每个I-水平的强度,测验中只需要被试控制他的反应。各个项目都是单一刺激类型。在为每个水平编制不同的测验时,研究者必须把每个水平看作是一个极性变量。每个个体在特殊水平上的分数是得分的项目加上相应测验的数目。在这一方式里,由于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反应,每个水平的分数在实验上独立于其他分数。因此,这组分数就可以作为I-水平的测验图来解释。然而,他们所要表示的目标是针对一个核心功能的概念类型,而不是测验图的概念类型。最高分很可能被解释为被试的特征水平,但是并不明显。基本困难有两个:第一,是否任何一个客观测验都能替代自由反应测验以确定被试的参照框架?第二,是否客观测验不会造成基本上无意义的测量,从而把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阶段转变

成一个极性变量？这个问题与我们前面在讨论帕克和哈维斯特等第评定中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当一个高分可能有意义时，低分就是含糊的，表明不是高于自我阶段就是低于自我阶段。测量中哪怕掺杂了一点点误差，整个测验就会一团糟。我们将会看到，杰斯尼斯改进了这个方法，但是仍然没有克服逻辑上的困难。 216

他们设计的另一个评定手段是行为等第量表，使用者熟悉他们的被试，但没有必要了解他们的概念。这些量表提供了对可以观察的或容易推理的行为的描述，假定这些行为能反映各个水平的特征。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种记分算法的明晰描述，但是某种形式的或最高的分数则是可以假设的。大多数心理学家对行为等第量表颇为欢迎，他们乐意谈论可以观察的行为，怀疑诸如自我发展那样的抽象概念。即使那些对自我发展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也要求见到编制的证据，见到诸如造句测验和直接观察行为的主题统觉测验等思考样本的手段之证据。行为等第量表为这种意图提供了明显的证据。杰斯尼斯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但是，仅就显而易见的而言，从理论上考虑就有三个困难（我和我的同事在对那些从事社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研究时采用了这种手段，深深体会到这些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评定人员觉察的程度是不可知的，因为这个程度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自我水平，而不是正在接受评定的被试的自我水平。第二个困难是，在任何一种行为和任何一种自我水平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除了冲动性有可能之外。即使特殊的行为和其他的自我水平之间也很难找到概率的联系。第三个困难是：评定人员倾向于用社会上期待的措词来描述他们感到满意的任何一个被试。

杰斯尼斯：统计分类 (Actuarial Classification)。杰斯尼斯

(1974;杰斯尼斯和韦奇,1970)按沃伦的9个亚类型整理并改进了违法青少年的分类(见第八章)。他运用了杰斯尼斯调查表,该表是一个自陈核对表。他还采用了杰斯尼斯行为核对表的两种形式,即自我鉴定表和观察人员评定表。虽然他编制过谈话法和造句测验的记分手册(杰斯尼斯和韦奇,1970),但是这两种手段都因为太费时而中断了。杰斯尼斯调查表有155个真—假项目,这些项目产生10种人格特征的分數,量表是根据项目分析或群集分析设计的(这些项目是由两个以上的量表来提供线索的)。此外,量表中的线索取自每一个沃伦亚类型。这样,杰斯尼斯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一个测验图的概念类型。从大约2000个已被归入亚类型的受法院监护的青少年开始,对I-水平和亚类型做多项区别分析。分析的结果被用来建立一个计算机程序,其用法如下:为男孩提供杰斯尼斯调查表和杰斯尼斯行为核对表中的自我鉴定表,把该男孩的反应输入计算机,计算机根据各个记分线索计算他的分数,并且从杰斯尼斯行为核对表中的自我鉴定表算出他与3个I-水平和每个I-水平的亚类型的矩心的相对距离。在进行输出时,首先按最大的概率确定I-水平,然后在那个I-水平内,按最大概率选择亚类型。为了提高这些概率的精确性,采用了附加的大样本。

以下是一个效度的研究:咨询人员、社会工作者和教师用杰斯尼斯行为核对表(Jesness Behavior Checklist)的观察形式对一组男孩的行为做等第评定。这个等第评定是作为对观察的行为的测量来使用的。7个I-水平的专家,用Q-分类技术,按期待的9个亚类型中每一亚类型的出现频率,对行为核对表中的80个项目进行分类,从而获得期待的行为。对其中7个亚类型来说,获得实质性的效度系数,从0.54到0.80。然而,对未成熟的遵奉和神经过敏的多动症这两个亚类型来说,效度系数大约为零。

困难在于似乎无法运用这些数据去改变或改进这种方法。在继后的研究中,对无效区别和高效区别似乎是同样处理的。这样,这种极端的统计方法就和前述极端的方法一样,没有为用数据方法矫正概念或理论留下余地。杰斯尼斯的目标是实用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这种方法也许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从理论观点上来讲,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218

科尔伯格:模式的道德推理。科尔伯格和他的助手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测量道德成熟。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测验有三个连续的记分手册,至少有两个附加的测验是雷斯特(J. Rest)制订的,他曾经是科尔伯格的学生。下一节将讨论雷斯特的研究。科尔伯格关于个体完成整合的概念是与概念的核心功能类型相一致的。他的主要手段是借不完整的故事进行提问。正如皮亚杰及其助手在临床询问中一样,特殊的问题可能作了改动,以便引发被试的推理。然而,目前的一个标准形式是设计问题。这个标准形式有时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科尔伯格已经在他的文章中发表了他曾使用过的几个故事,但是详细的记分技术只见于油印形式,只有经过长期的监察的实践,才能对此作出鉴定。个人之间的交流情况,目前尚未见诸科学文献。

基本的定量策略就是使等第评定量表上的每一个记分单位对应于6个以质命名的阶段。每一个道德问题,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相应的位置,问题的数量,或者说“问题系统”(issue system),并非每每相同,但大约是9个左右。其中最重要的3个问题是惩罚和约束、责任和义务,以及生活的价值。通过推理,一个特定问题的位置与一个特殊阶段联系起来,虽然人们可以假设,对许多男孩作推理,其经验有助于形成起始的观念,然而这个推理原则上还是先验的。过去一直没有系统的程序,以使用更多的数据去改变记分方案,要设想出这样一个方案,也不是轻

而易举的事。然而,有些观点假设若干亚阶段,试图应付那些与原来阶段并不十分相符的情况(见第八章)。

219 最初的记分方案以“思维单位”(unit of thought)作为它的记分单位,多少相当于一个句子,例如,评论天气将不予记分。这种方法只对属于道德化的方面记分,只对明显不符合一个特殊的道德规范记分,只对明显不符合自我发展的其他方面记分。既然每一个被试完成若干故事,并对每一个故事作出若干可以记分的评述,那么记分算法的问题就变得紧迫了。科尔伯格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核心功能水平将由他的等第评定的分配形式来表示。然而,在某些分析中,他按照任何一个反应是否在他的两个最高阶段上发生,将被试分类,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用最大限度规则,该规则与一个潜在能力的概念相符。

记分手册的第二个方案是以故事或两难推理作为记分单位。按主要阶段记分,即故事中推理用得最多的阶段;必要时记小分,即通常比主要阶段用得少的一个阶段。手册中也一定运用了诸如思维单位之类的其他记分单位。

至于目前的记分手册方案[科尔伯格、科尔比(A. Colby)、里伯曼(M. Lieberman)和斯拜奇—杜宾(B. Speicher-Dubin),1973],分析单位就是讨论问题中的“点”或“由被试详尽阐述的观念”。测验形式有A和B两种,每一种形式包含3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旨在说明两个问题。对这些故事和询问做了一定的安排,使每个记分问题出现在两个故事当中。A、B两个形式是平行的,内含同样的问题。被试在反应一个问题时通常只表达一个点或观念,但是,也有可能对一个问题表达两个点,或者对两个以上的问题只表达一个点。一个观念或点,只有出现在那个故事的记分手册中,才被认为是可记分的。

记分步骤大致如下:首先就一个特殊的问题寻找阶段二的

推理符号,如果出现一个,它可能在一个点上,就记1分;如果在两个点上,就记2分;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就记1.5分,在两个以上的点上,也记2分。然后寻找阶段三的推理符号,一直到被试的最高水平为止。如有必要,回过来寻找阶段一的推理。然后,对每个问题记一个阶段分;这就是该问题的推理模式。次一形式的推理,只有当它超过该问题推理的25%时,才能确定为第二推理形式。用这两种形式得出的分数分别为主分(major)和次分(minor)。看来,记分问题的数目是可变的和可以任选的。 220

道德成熟分是取两个以上问题的平均分作为个体的整个原始记录分。已经记了纯分数的问题加权3,主分加权2,次分加权1,道德成熟分的分子是问题分加权的总和,分母是加权数的总和,这样,就把原始记录引入像阶段量表那样的关系,通常是阶段数目的100倍;也就是说,一个个体的阶段正好是3,那么他的道德成熟分就是300。把记分算法订得如此复杂,其原因尚未说明,它的全部内容是如何把这一形式应用于求整个原始记录分的问题分和问题分的加权平均分。

科尔伯格的心理测量存在几个困难。首先,他并不研究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类型。确切地说,当他研究核心功能时,有时就用适合于潜在能力和测验图概念类型的方法,把这形式作为基本的算法,是与核心功能的观念相一致的,正如求道德成熟分的平均值一样。他说(1969, p. 387),人们倾向于把大约一半时间用在对他们的优势阶段的推理,而把另一半时间的大部分留着,用于对高一阶段或低一阶段的推理。他的意思是指思维单位分散在整个原始记录的评定等第的周围,还是把点的评定等第分散在问题的评定等第的周围?

有时,科尔伯格把分数的分配似乎看作是一个测验图(人们 221

无法断定这些分数到底是问题分数还是“点”的分数),把每个阶段的分数频率看作是表示该倾向强度的一个分数。这样,他把一个图表称为“阶段使用测验图”(1969, p. 387)。有时,他把不同阶段的频率联系起来,从而像处理分数一样处理频率,这就进一步证明他把分配和测验图混淆起来了。然而,目前在那个研究小组里,道德成熟分已经用测验图代替了推理。里伯曼(1973)进一步运用定量逻辑设计了一个方法,把道德成熟看作是一个能用若干故事或问题来评估的潜在能力,他在这个基础上探索着改进记分参数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记分手册中,各个独立的问题分数是否在实验上独立,尚不清楚。有些评定人员可能关注与被试交谈时的一段话,并在联系不同的问题时,不只一次地对那段话做等第评定。对一段话重复记分会产生不真实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只对一个与设计的问题有关的问题记分,似乎才是可行的方法;因此,对同一段话就不会两次记分。但是,由于记分时考虑到上下文,存在着复杂的、捉摸不定的相倚,这样就可能产生某种有意识的光环效应。

雷斯特:客观的道德判断测验。雷斯特(1973, 1974)设计了几个可供选择的道德判断测量。第一个可供选择的测量是理解测验,把科尔伯格概念中隐含的潜在能力引发出来(雷斯特、特里尔和科尔伯格, 1969)。他认为,个体应能理解他自己阶段的推理,理解所有低于该阶段的阶段的推理,以及某种程度上高于该阶段的一个阶段的推理。雷斯特自发地运用了科尔伯格测验中的那个阶段来判断个体的阶段。作为道德理解测验,他提供了若干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故事,伴有可能的解决方式,要求被试用自己的话复述论据。对每个阶段都提供论据,借以支持每一个可能的选择。例如,一个贫困的男子,为了救妻子的命,要

么偷窃药物,要么让她去死。对一个特定的故事来说,不同阶段的论据导源于同样的问题,例如动机、规则或生活的价值。被试在论证中正确复述某一阶段的推理,其论证的比例决定他在这一阶段的分数。这个形式比之科尔伯格的测验有个优点,那就是对被试的每一个反应都能直接记分,而不参照他的其他任何反应。雷斯特就是这样做的。一般说来,科尔伯格的阶段逻辑已经得到证实,即被试在回答低于他们自己阶段的问题时,往往有 50% 以上的正确率,而在回答高于他们自己阶段的问题时,正确率低于 50%。

雷斯特认识到科尔伯格测验在心理测量学上的某些弱点,例如,记分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学习如何记分的困难,以及提供测验和为测验记分费时较长。理解力测验保持着自由反应的程式,因此同样受到这些困难的干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雷斯特(雷斯特和其他人员,1974)设计了一个客观测验,即问题定义测验(Defining Issue Test),其程式如下:给被试一个道德两难故事,然后让其在两个选择中任选一个,例如,是去偷窃药物,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因缺药而死去。要求被试作出选择,或者说明他一时决定不了。接着被试翻到下一页,看 12 个与抉择有关的问句或问题,在五点量表上记下对被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23 二、三、四和所有原则阶段,因为原则阶段证明加上一个合成分数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易辨别的。一个阶段的分数是代表该阶段问题的重要性等级序列的百分数。第一级加权 4,第二级加权 3,以此类推,不评级的问题加权零。阶段二、三、四和原则阶段的分数之和必须是 100%。至于合成分数,阶段二的分数加权 1,阶段三的分数加权 2,阶段四的分数加权 4,原则阶段的分数加权 8。显而易见,把和除以 8 就得出标准因素。对这一系列加权的理论基础,尚未阐明。分配在原则阶段的分数,其分数值从 0 到 95,尽管忽略了开头 4 个阶段的全部效应而在直观上缺乏说明力,但是它与作为一个全面测量的合成分数的效应大致相同。在一个样本中,由于年龄方面的差异,科尔伯格测验的整体分数与问题定义测验的原则分数的相关达 0.68。在一个成人样本中,问题定义测验的原则分数与雷斯特的道德判断理解测验的相关是 0.52。在年轻人的样本中,由于年龄关系,两个变量的变化甚大,从而出现更高的相关(雷斯特,1974)。

问题定义测验的基本假设是:个体把符合他们自己水平的问题看成是最重要的。然而,他们自己的水平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含糊的观念。雷斯特(1976)认为个体首先是根据爱好,其次是根据理解,最后是根据自发来采纳一个道德判断阶段的。爱好和理解可能与自发一样,也是随之发生的,例如在选举中。

雷斯特(1976)讨论了各种记分算法。他偏爱的算法是应用原则推理的频率。他按照最高阶段的实质性应用、放弃低阶段以及特殊应用等三种方法,探索了阶段类型的划定。第一种方法当然是对极限算法的矫正,第二种方法没有被明显采用,第三种方法假设某些阶段的推理永远不可能占优势。当一个人的推理或爱好最符合某个阶段而不是其他阶段时,他就被认为是属于该阶段的。这样,这个过程就是对算法形式的一个矫正。雷

224

斯特根据各种定量策略和记分算法所做的实验,将激励新的测量方法,促使人们更周密地思考有关该领域的测量。

卢文格、斯威特和恩哈特(Ernhart):权力主义家庭态度的客观测验。我最初像其他许多研究人员一样,试图划出人格特质的一般范围,特别是探究那些由精神分析理论所预示的特质。我的研究范围是母亲对日常家庭生活问题的态度[卢文格,1962;卢文格和斯威特(B. Sweet),1961]。斯威特和我综合了一组项目,使这些态度尽可能广泛些,项目内容涉及到各年龄的各种活动。我们牢记假设的各种性格类型,它们符合各个心理性欲阶段,也符合有关惩罚—许可和其他特质的共同感觉或折中的临床假设。

在以前的研究中有不少发现,它们指导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心理测验方面普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反应偏见(卢文格,1959,1965)。我们的项目是精心编制的,用以控制反应偏见。每个项目表达了有关家庭生活某个问题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尽可能运用持这一观点的个体的语言,这样,就不会老是出现逻辑上或语法上的矛盾。被试的任务是选择更接近于他本人的那个观点。由于每个被试选择同样数量的陈述,因此作为反应偏见的默认这一问题就被排除了。被试并不表达他们的赞许程度。可以假设,极端的态度会在标志着一个特定方向的大量的项目中表现出来,许多临床测验人员不相信这种概率推理,不愿意放弃潜在的有关感觉强度的信息。然而,这些表示赞许程度为“信息”(information)所包含的误差与信息本身一样多,因为这些信息受到了反应偏见的污染。我们试图用两种方法来缩小“社会性愿望”(social desirability),所谓社会性愿望,就是根据社会上可以接受的外表作自我描述。第一个方法是,对一个项目作出两个可供选择的赞同的措词;第二个方法是,寻找中等程度的通

225 俗性项目,这些项目的两个可供选择的被选次数大致相等。尽管预先作了这些安排,但是开头的一些结果似乎还是反映了被试的社会性现象。我们在设计测验方法时已经注意到,我们所寻找的不仅仅是测验情境的人工制品,而且是有关个体反应的真实情况。此外,开始的几组被试是学校护士,公立学校母亲组的成员和范萨尔学校的毕业生。小组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探究的特质并不完全是人工制品。

卢文格、格莱瑟(G. C. Gleser)和杜波依斯(P. H. DuBois)在1953年用同质方法分析了由202个妇女组成的非同质样本的反应。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因素方法,但是却产生了若干同质的项目群集,这些项目具有最大的区别作用,而不是假定的因素。虽然设计同质的方法产生各种独立的大致同样重要的项目群集,但是在五个项目群集中,有一个基本上是一般的因素。通过分析这些包括的和没有包括的项目的内容,揭示了该研究的主题,即权力主义家庭意识(Authoritarian Family Ideology, AFI)。然而,直接涉及到惩罚的一些项目与权力主义家庭意识没有关系,而那些具有权力主义内涵,但没有直接涉及到惩罚的项目,则是项目群集的一部分。

拉佩里尔(K. Laperriere, 1963; 卢文格, 1962)在一个新样本的交叉效度研究中,证实了AFI的同质。对一个原始样本中AFI的29个项目的修订, KR20[库德—里查森(Kuder-Richardson)第20号公式]的同质的相关系数是0.83;在交叉效度样本中,运用同样的记分方法, KR20的相关系数是0.85。同质增强可能是由于更大的离差之故。在交叉效度的样本中,另外3个项目群集有较小的同质的相关系数,这是预料中的回归效应;而最后一个项目群集在交叉效度上没有同质。

后来对1000多名妇女做了研究,其中大约20%是黑人妇

女。从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讲,恩哈特(恩哈特和卢文格,1969)证实 AFI 的可靠性。把同质方法用于修订过的项目,AFI 像以前那样,再次作为中心群集出现,这个中心群集具有实质上相同的内容和大多数相同的项目。在 934 个个案的关键样本中,AFI 有 49 个项目,KR20 的系数是 0.89。在 104 个个案的独立的交叉效度样本中,系数是 0.88。还发现了 4 个附加的但较小的项目群集。关于它们的内容及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恩哈特终于发现了在心理学上似乎说得通的描述和解释,这跟我们以前研究的家庭问题量表(Family Problems Scale)一样。但是那 4 个次要的项目群集无法复制以前研究中的任何一个项目群集,只有 AFI 可以令人信服地被复制。 226

从 AFI 的项目中获取的综合征是复杂的,但却是可信的,它是无法用任何一个简单的词语所能说明的。一个在 AFI 上评定等第高的个体,“在儿童教养的许多方面采取惩罚和管制的态度;她体会不到儿童的内心世界;她认为家庭生活既具有等级观念,又是感情用事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位母亲在相关群集上也得高分,那么我们认为她还具有以下这些特征:她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持有僵化的习俗的概念;她不信任别人,从而感到焦虑;她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也许还对妇女的生理功能有些‘相反’的看法”(卢文格 1962, p. 113)。从数据中反映出来的这个群集的显著性,与惩罚—许可的特征不符。然而,其他一些研究儿童教养思想的作者,通常就是这样表示相似特质的特征的,这就使该特质在他们的研究中必然成为显著的特质。惩罚的概念和许可的概念无法解释有关儿童内心世界的项目的显著性,也无法吸引有关情感的平庸表达。这个综合征与权力主义的人格相像,尽管我们的研究并不涉及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也不涉及种族偏见,而阿多诺、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莱文森(D. J.

Levinson)和桑福特(R. N. Sanford)却是以此为起点的,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妇女,而他们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男子,他们的研究结果受到两个反应偏见的干扰,一个是赞许的程度,另一个是默认,而我们却避免了那两个反应偏见。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拉佩里尔、奥苏里欧(A. Ossorio)和我假设:AFI能够测量自我发展。我从拉佩里尔和奥苏里欧那里知道,虽然不成熟的个体可能具有极端的权力主义标记,但是,不成熟的结果却无法用极端的权力主义来标志。得低分的特征表现为混乱的、冲动的和极端自我中心的生活风格。一个真正的权力主义性格是尊重和符合一个权力主义的序列,它代表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进程。概念上的极点是一个发展的中点。

为了检验有关AFI的发展假说,拉佩里尔测验了生育过的妇女样本,以胎次(头胎、二胎或三胎)、宗教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受教育程度(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大学),把她们分层。每个层次有5个个案,除了没有读完高中的犹太妇女之外。总共有100个个案。AFI的分数随着胎次、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不同而明显不同,但与宗教信仰无关。妇女中的权力主义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胎次的增多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在拉佩里尔的样本中,AFI与年龄的相关是-0.28,这里指的年龄是与胎次和受教育程度混合在一起的。而且,在保持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做了协方差分析,即使除去年龄因素,教育和胎次的作用仍然明显。

恩哈特(恩哈特和卢文格,1969)再次研究了方差分析,把胎数扩大到四个水平(1个、2个、3个和4个孩子),把受教育程度扩大到五个水平(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大学、大学毕业),宗教信仰不作为分层的依据,只是继续去探究有关它的变异性,并且把白人和黑人作为分层的变量。恩哈特再次表明:AFI随年龄

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她证实了拉佩里尔的发现,即在白人样本中,AFI 随胎数的增多而减弱,但是在黑人样本中,胎数不起作用。AFI 与年龄的相关仍然是 -0.28 。在协方差分析中,所有的作用,包括种族与胎数间的相互作用,在年龄不变的情况下仍然明显。至于恩哈特方差分析样本中的白人亚样本,与她的解齐次方法的样本部分重叠,恩哈特发现,AFI 的齐次系数是 0.87 ,在相应的黑人妇女亚样本中,相关系数是 0.82 。恩哈特设计了一个方法,在分层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来确定同质或相关,这些变量包括种族、受教育程度、胎数或它们的任何组合。用传统的方法计算整个样本,同质的相关系数是 0.88 ;当所有分层变量不变时,小组之间的同质系数是 0.80 。这个发现进一步证明了 AFI 的稳定性。 228

恩哈特用自己设计的统计技术检验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存在于很少得到承认的全部因素分析研究之中,即假设项目与被试之间或测验与被试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力量和价值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一般的范围内,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个体样本都会出现同样的因素。中心问题是应该使因素摆脱所测样本的偶联,但是这仅是一个信条,而不是一个已经证明的命题。因素是由测验之间的相关模式决定的。如果谁能证明,在一个广泛的、相当典型的样本内,对亚群体的选择,并不取决于量值,而是取决于相关的模式,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因素分析的基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恩哈特就是这样做的。项目与被试之间和测验与被试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直接测验出来,但是恩哈特表明,在亚群体与项目或亚群体与测验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作用;毋须置疑,与被试肯定具有相互作用。这个结果给人格测量和个体差异的整个特质—因素方法带来了问题(第十章)。

把 AFI 作为自我发展的一种测量,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它的

229 特征。基本的定量策略是去发现一组二元的或二分的项目,这样,自我水平越高,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的标志就越少。记分的反应就是选择两个陈述中指定的一个。记分的单位就是二分项目。记分算法就是得分项目的数量。项目的内容涉及到权力主义的家庭意识和家庭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从经验上看,这些问题与明显的权力主义项目相关甚高。为了提供一个测验的自变效度,这里所说的测验是指自我水平的测量,纳特尔(E. Nettles)研究了 AFI 和对自我水平做直觉记分的造句测验之间的相关,发现了适度的相关系数 0.39(未发表的研究,华盛顿大学,1963),这个研究导致了下一节将要描述的一系列研究。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第一,认为从那个由心理性欲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派生出来的差异心理学中可以得到某种指导看来是错误的。有关心理性欲阶段的测验没有一个是很成功的。在家庭问题量表的研究中,没有一个项目的子集能够进一步证实有关心理性欲阶段的假设。也许心理性欲阶段不是那种通过测验能弄清的事情。首先,精神分析是一种探索我们共性的研究,尽管表面上我们可能具有差异。另一方面,心理测量是一种整理我们差异的方法。当我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性的研究时,分析本身就转向自我心理学了,正如我们自己的数据促使我们那样做一样。

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假设因素的方法能够划定人格的范围,从广义上讲,包括同质方法。因素的方法在测验结构、测验同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方面有其价值,但是在发现来龙去脉方面,它们无法替代心理学家。唯有心理学家才能综合许多证据线索,从而构思一个新的假设,或者发现一个新的物质或综合征。因素的方法尤其不能处理变量之间的非单一相关的问题,该问题是测量人格发展的要点。

卢文格、韦斯勒、雷德莫尔和其他研究人员：用造句测验对自我发展作等第评定。有关自我发展的概念的大致轮廓一旦成为中心，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别人已经分辨清楚的概念，而没有对它进行可以接受的测量。以前一直运用造句测验的方法，但缺乏一个记分手册。记分手册的编制^[1]是随着我们的概念的发展而不断改进的，它是我们的特殊贡献。因此，我们对心理测量的方法学作详细论述并不脱离本书的主题。指导我们的规则包括记录每种情况，对每个反应作等第评定，以及为每一个等第评定提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证据。 230

第一条规则就是尽可能记下每一个细节。我们企图避免建立一种具有专职评定人员的机构，他们在科学文献中没有留下他们业已获得的适当的技术资料，正如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对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进行评定的骨干人员一样。当然，在每一个判断中，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成分，并且任何一组指导都可以用不受意图干扰的方法逐字记下。写下规则而不是口头交流，会促使规则的书面化。另一方面，为评定人员写下规则和指导有许多好处。第一，给予指导的人在落笔时，首先要思想明确；有些矛盾在口头上不易察觉，但在书面记录上就一目了然。第二，当评定者或记录员混淆不清时，或碰到有旁注的个案时，可以提供纪录给予指导。第三，一份详细的、经签署的记录对于撰写报告和论文是极有价值的。最后，书面指导要比口头指导产生的误解少。 231

另一条基本规则是：对每个反应都得记分。令我们惊讶的是，两个评定人员对没有作出反应的被试人数难以作出一致的意见，他们对200个个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进行了记录。遗漏是明显的，而且对一个不完全的反应怎样记分持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有些评定人员为了弄清遗漏的主题，准备对所有遗

漏的项目记分。我们没有发现对遗漏项目的任何一种记分有什么用处,我们整理了一个不完全的反应怎样记分的情况。当一个主题被遗漏,或者反应不完全,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给予记分时,我们就在遵奉水平打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废纸篓类别”(wastebasket category)。我们的一个“省时循环性”(saving circularities)是:我们希望得到每个原始记录上遵奉水平的分数;给遵奉水平的某些反应记分并不妨碍对整个原始记录记任何其他的分数。因此,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不会因为对遗漏的或无法评定的反应随意给予遵奉的评定而过分受到影响。

我们因为制订了对每个反应进行等第评定的规则而受到批评。理由是:有些反应不含有自我水平的信息。有许多反应,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们与自我水平有什么关系,但事实证明,它们与我们希望诊断的反应类别一样有效,甚至更好。要是我们对我们以为无关的反应不予评定,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小发现了,正是这些小发现充实了我们的观念。对每个反应进行等第评定的另一个好处是:每个原始记录都有相同数量的项目评定,也就是36个,因为我们总是运用36个句子主题。

232 我们的记分手册已经发展成3种类型,它们是样本手册、分类手册和合理分类手册。当我们开始设计手册时,我们运用了4种记分水平:I-2、I-3、I-4和I-5,借助于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的体系,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冲动、遵奉、良心和自主4个阶段。每个评定人员把反应直觉地分为这4个类别,然后我们协调不同的意见。样本手册(exemplar manual)是由每一个I-水平的一系列反应组成。但是这个手册从未用过。相反地,把每一个水平的例子组合成类别,从中删除明显的或不必要的例子。这种方式有助于评定人员注意到反应的特征,该

特征决定了反应在量表上的位置。类别本身不是目的,它们无法对有用的信息编号。它们为等第评定提供了方便,它们对手册的修订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修订手册是我们整个事业中的核心操作。分类手册在若干研究中被运用。当我们在阐述和解释这些类别时,我们编制了合理分类手册(rationalized category manual),试图从经验上和理论上为每个记分决定提供证据。只要该目标未达到,它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事业的具体内容。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因为反应一个主题的每个样本总会包含一些独特的反应。当样本被扩大时,有些反应会重复出现,但是,随后又会出现新的独特的反应。只有当一个反应重复出现,或者重复类别中的一个部分时,才能从经验上去研究该反应的记分是否正确。如果一个反应仅仅是一个个体作出的,我们就无法断定他的整个原始记录的水平就是指定反应的水平;该水平对他来说可能过高或过低,因为每个个体都表现出变异性。在已出版的手册中,对几乎每一个主题的记分水平都有简要说明,指出内容中我们能够分辨的基本原理,该内容包含在对那个主题的那个水平之中。有关其他造句测验和其他投射测验的大多数记分手册属于样本类型。

在我们开始编制记分手册时,我们以为在不同的水平上所讨论的内容将存在明显差异,但结果表明这只是部分正确。不同水平的人讨论同样的事情,常常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并且意思上也有细微的差异。此外,随着我们技巧的提高,我们懂得了区分比原先的四个水平更多的水平。因为一个水平与毗邻水平之间的反应,其差异是细微的,所以需要有一个精细的计算操作。这个操作就是我们的手册修正计划。这个计划有某些小变化,采取了以下形式。

一开始,我们把测验的表格发给一个大的非同质样本,被试

全是同一性别的。早先,我们的样本全是妇女和女孩,最近我们采用了男子和男孩样本,也有几例采用男女混合样本。在某个具有不同长度的测验的实验之后,我们从大多数测验中确定了36个项目,这些项目证明,它们足以揭示出被试的合理形象,并且不会使被试感到厌烦。只有打字员才能看到原始记录,他们在打字时,删除了所有等同的信息,如有必要,还删除了有些反应的部分内容,使之简洁明了。例如,在一个特殊的研究中,如果年龄差异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那么所有有关被试年龄的参考必须删除。唯一能识别的,就是一个随机的编号。如果有若干亚样本,就随机地把它分散在整个样本中。这在比较样本时是极为重要的,对预试和后试或者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也同样重要。接下来,把被试对单个项目的全部反应打成一行,除了样本名称和编号外,但不包括信息。对36个项目,都一一采取这个步骤。两个评定人员对项目的每一个反应进行等第评定,记下类别和该反应被评定的水平。在完成了对一个项目的所有等第评定后,讨论并协调任何一种差异。对36个项目,按此逐个进行。在对全部项目的所有反应进行等第评定之后,由三位评定专家对整个原始记录进行等第评定,每一位都记下他自己的评定,然后协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整个原始记录上最终取得一致意见的评定,就是该原始记录的标准评定。

接着,打字员开始编制我们称之为译码单(decoding sheet)的东西。对每一个项目来说,样本中的所有反应是按照它们在手册中的位置被打印出来的,而不是按照随机的编码次序被打印出来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个记分水平,都列出类别名称,并且在每一个类别名称下,列出评定人员放在该类别中的那个特定样本的反应,在手册中不写例子,并且把作出反应的被试的编码和他的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集合起来。在类别中,各反应

按照原始记录评定的递增次序打印。这样,一眼就能看出在一个特定的类别里被试作出反应的标准评定与已被安置的类别水平的相符程度。现在手册编制者着手编制工作。对每个类别,必须作出以下决定:该类别是否应该安置在现在这个水平,还是应该向较高水平或较低水平移动位置?该类别是否应该分成两个或更多的类别?如果在内容里存在与被试的标准评定差异相对应的差异,那么这就证明把该类别进行分割是正确的。同样,也有合并类别的可能性;被认为能够辨别自我水平的细微意思,可能经不起新样本的交叉效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并类别,从而减少评定人员的辨别次数。评定人员偶尔也会误解类别的名称,尤其是在较高水平上的类别名称;当手册编制者看到反应不恰当地归入该类别时,这种情况就确定无疑了。这样,就得修改手册的简要说明,或澄清该名称。最后,在先前没有归类的反应中,可能发现新的类别。

这个程序是一种依靠自己力量的操作。只要我们一开始就不依靠运气,我们就能通过重复运用这一过程,去发现我原先预料到的各种水平的信号,促进先前注意到的信号的分类。只要改进项目的等第评定,我们就会对后来项目的全部原始记录作出更好的等第评定。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的高精确,可以为我们改进项目的等第评定提供更好的标准。

在完成记分手册之前,布莱西(A. Blasi)和我各自按水平查阅了36个项目的类别名称,目的是对每个阶段和每个过渡水平做修订。一些大的改动必须得到我们两人的确证。例如,我们以前一直称之为机会主义的那个阶段,事实上很少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反应(正如我们的许多评定人员一直告诫的那样),而较多的却是自我保护和素朴的享乐主义反应。因此,这就夸大了那个水平的概念。另外几次在概念中出现了许多变化,第二章

所阐述的就是扩大微效过程的结果。这个用数据来提炼和阐述基本概念的过程,使我们的概念在有争议的阶段的细节方面具有权威性。

基本的定量策略是把每一个评定过的项目与一个等第评定的量表相匹配,该量表由若干点组成,每个点都以定性术语来定义。原则上,同一个定量策略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思维样本或行为样本,或者应用于个案史。任何一个行为样本都能采用,只要它在允许被试去投射时,以及让评定人员去察觉被试的参照框架时是非结构的。量表上的每个点代表了一个性格类型和知觉风格,按发展顺序排列。在实践中,大多数评定人员能够在记分手册中发现大多数反应,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基本的逻辑;当一个反应以任何一种方式偏离了手册中记载的反应,就要求凭借这个逻辑去判断那个偏离是否影响所给予的等第评定。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特殊的内容,而是由该内容揭示出来的思维结构。

由于制订了评定每个反应的规则,因此记分算法就成了一个把 36 个项目的评定转化成 一个总的原始记录评定的规则。我们最初查阅了整个原始记录,试图凭直觉重新确定留下记录的被试的类型。在这个步骤中,项目评定只用作大致的依据。然而,为了弄清楚每一个评定的规则,我们不停留于此。接下来的一套规则是描述各阶段中的典型个案。我们仔细研究了典型个案,但是对那些与任何一个阶段的描述并不完全匹配的个案,提供的指导实在太少了。

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算法是把每一个记分水平转化成与它的顺序位置相对应的一个数。用分数来表示每一个项目评定,项目的评定之和就是整个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留下的问题就是对每一个记分水平指定一个摊派分数,以便最大限度地适应直觉的原始记录的等第评定。项目的累积记分在许多研究

中已证明是有价值的。例如,在研究人员的赞同或测验—复测的效度等方面,并不一定需要摊派分数。尽管项目累积算法很有用,但是对它仍然有直觉的和逻辑的异议。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个顺序,而且还需要—个间隔的测量量表。对自我量表的这个要求,不但没有理由,而且很可能是无意义的。逻辑上的困难是:原始记录中一定量的原始材料没有必要与高水平的等第评定相悖,一方面是因为被试一定已经通过了前面所有的阶段才达到目前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冲动的灵活性和可用性可能就是高的自我水平的标志。在实践中,高水平原始记录中的低水平反应并不会达到歪曲高分的程度。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冲动的表示作出诸如反映被试的自我水平的调节形式或者由于在较高水平上给许多反应评分而对偶尔的低水平反应评分过高。

目前已经设计出一种算法,像项目累积一样,运用反应的全部分配,但是不用间隔量表。由于它用了累积的分配,所以叫作递加规则(*ogive rules*)(卢文格和韦斯勒,1970)。它不用典型个案,而是用摊派分数表示不同水平的特征,所以对每个个案都得进行分类。在有些研究中,递加规则表现出较佳的结果;在有些研究中,项目累积算法表现出较佳的结果。

最后,从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可以看出方法与理论的关系。该问题是:对混合的反应应该怎样评定?所谓混合反应是指那些具有两个以上部分的反应,每个部分又是一个可以评定的反应。对这种相倚,我们总是有规可循的,并且我们始终认为,经过对这些规则的每次讨论,我们理解了这些规则,并且彼此间意见一致。有一次讨论后,我们要求一位助教写下这些规则。为此,他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由于我们对他写的东西不满意,次年,另一位工作人员尝试了这项工作。几年中这

这个过程重复过好几次。从最后写成的规则可以看出,为什么阐明这些规则是困难的,为什么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

评定人员首先必须判别假性复合反应,它们或者是陈词滥调,或者是重复。陈词滥调的例子如:“一位妇女——当她衣着整洁时——感到舒心。”“一个好母亲——具有爱和理解。”这类反应在遵奉水平上被评定,除非对它们来说在另一个水平上存在一个特殊的类别。一个重复的假性复合反应有:“我的主要问题是——有时我太羞怯,自我意识过强。”这类反应常常组合了在同一类别里被评定的两个反应,这两个反应应该分别予以评定。真正的复合反应包含两个以上对比的观念,或者涉及到对一种情境的两个以上的选择。当这种组合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水平时,该反应就比最高成分评高半级。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称为半级。这个规则只适用于遵奉阶段以上的阶段。偶尔在遵奉阶段可能有两个对比的观念,它们产生一个良心—遵奉(自我意识)水平的反应,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良心—遵奉水平上的两个对比观念经常产生一个良心水平的反应。3个对比观念,至少有一个处在良心—自主的过渡水平,就产生一个自主阶段的反应。一个例子是,“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但不时感到气馁”,便在良心阶段予以评定。“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处于良心—遵奉过渡的反应。“我——不时感到气馁”将在同一水平但不同的类别上予以评定,即属于“为生活感到忧虑,为未来感到忧虑(含糊不清,一般化)”这个类别。一个人可能是基本上快乐的,但有时也气馁,这种观念使反应提高到比单个反应更高的复杂水平。有关复合反应被归类于良心—自主过渡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我得不到我想得到的东西,那么——我设法忘了它,自我安慰地说,没有它我也行,或者我设法得到它而不损害他人。”第一个想法(设法忘了它)可以归类于良心—遵

奉水平,其他两个想法归类于良心水平。当复合反应中观念的组合并不产生较高的概念复杂性水平时,反应就根据低水平选择或高水平选择来评定。通常这两种考虑是一致的。如果高水平高出遵奉水平,就一直运用它。当一个要素被评为遵奉水平,而其他要素被评为较低水平时,遵奉水平的要素常常是较经常发生的要素,就做较低的评定(常见的类别在手册中标明)。以低频反应为主,是因为原则上它包括更多的信息。在疑惑不解的情形里,才运用较高的评定(详细说明见卢文格和韦斯勒的第五章,1970)。

这一讨论说明等第评定工作的复杂性和利用书面形式使每条规则清晰的法则变式的重要性。组合一个水平的两个不同的反应产生出一个位于高水平的反应,我们所以会有这个顿悟,是因为在编制手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类别。若要条理清楚地写下这些评定复杂反应的规则,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力图写明这些规则的过程中,我们也随时注意新的类别的出现。最终的规则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单凭先验的推理;这些规则反映出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的经验,并且改进了测验的辨别力。最后,这些数据表明了一个可能的理论,即个体怎样从一个水平发展到高一水平的理论。从遵奉阶段开始,个体头脑中会共存两个相反的或相对的观念,每一观念与个体自己目前的水平相一致,这可能就是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个体获得了看到下一个更复杂水平的能力。

结 论

我们的概念是:自我发展中质的变化是以有序的准数量变

239 量或方面为基础的。测量自我发展的问题,就是确定个体在该方面发展的情况。从逻辑上说,主要的定量策略就是寻找与最低水平(或者在逻辑上等同的最高水平)相符的信号,并且把质的反应与量表上所有可辨别的点的质的描述相匹配。第一个策略导致了累积测验,并直接转化成项目累积的记分算法。对权力主义家庭意识记分的家庭问题量表和雷斯特把原则的反应用作问题定义测验中道德成熟的测量就是两个例子。

当定量策略把反应与用质定义的点组成的量表相匹配时,记分算法的问题就成了中心问题。量表的主要原则必须事先提供,作为观察的框架。至今还没有谁提出过一个客观的技术去达到这样一个概念上的框架。当我们编制一个造句测验记分手册的方法是一个使量表更为精炼的、编纂的和准客观的方法时,这个方法不起作用,除非先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每个被试的反应样本,每个反应对应于自我量表上的某个点。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表明被试所处的地位的特征呢?主要的可能性就是使用分配模式,采用最大值或整个分配中的某个参数。艾萨克斯采用了修正的最大值算法,科尔伯格采用了修正的模式作为他的主要算法。造句测验的递加规则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算法,这个算法运用了被试的反应分配,但是对每一个水平有一个不同的摊派分数,而不用中值作为它的代表值。

把原始记录中分数的分配看作是代表了个体自我结构的特征测验图,看来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想使之有效的分配参数是测量某个中心的或最大的倾向。没有一个人在个体测验图或变异性等方面就他的手段寻找过独立的证据。变异性很可能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个体功能。任何个案中,在反应的记分规则和
240 从反应评定的分配推知整个原始记录的评定的规则之间,有个

“省时循环性”。

尽管递加算法在直觉上引人注目,但是经验表明,用项目累积分也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果。项目累积分是以间隔量表的假设为依据的,科尔柏格的道德成熟分就是如此。在证实该假设的过程中,它得出了与其他方法同样令人满意的分数,几乎不产生大的偏差。系统误差的变化,诸如社会阶层和言语流畅,才是造成研究结果偏差的根源。

有些测量性格发展的方法在这里未做评论,但是它们很可能是上述技术的变式或组合。既然发展变化的测量有许多困难,那么上述的不少看法就有许多缺陷。它们并没有把概念类型与记分算法协调起来,而是混淆了分配与测验图,并且应用变化莫测的规则和参数。测量作为科学原则的先锋,必须具有理论解释,必须具有明确的结果作为修正理论的反馈。大多数方法在理论、方法和数据之间缺乏充分联系。

尽管人们对效度问题感兴趣,但我还是回避了它。关于自我发展或有关变量的测量效度,其证据构成的问题进一步涉及到方法学的问题,例如,顺序性、结构效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实践性预示等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注重特殊研究将陷入诸如样本的可靠性、随机性和非同质性、动机等问题的迷津。因此,并不要以为是在肯定或批评上述一系列测验的效度。

综上所述,没有一个测验像基本构念那样可信。然而,作为探索该构念和研究与此有关的关系网络的手段,这些测验已证明是有用处的。

注 释

- [1] 过去数年中,改进和整理了我们的造句测验记分规则的主要是纳特尔、拉佩里尔和德查姆斯(H. G. de Charms),他们得到沃尔德(V. I.

Word)的协助。此外,还有一些已出书的作者(卢文格、韦斯勒、雷德莫尔)。还有许多人作为评定者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中有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已婚、未婚和离婚者,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或无神论者,新老移美居民,各种社会经济背景 and 不同地区的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在我们概念的某一点上留下了标记;各种各样的背景为我们概念的普遍性作出了贡献。

第十章 结构模式的选择

我们的自我发展概念的特殊要求在于,它既是一个发展的 241
序列,又是个体差异的一个方面。本书大部分涉及到发展心理学,但最后一章和本章则涉及到差异心理学。把我们的课题看作是个体差异的一个亚领域,便能允许我们把我们的方法和建立在其他模式基础上的道德发展和自我发展的测量相对照。这里,如同把有关发展的方法进行对照那样,不同的方法代表着对人类性质和科学性质的不同看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所产生的模式和数据就不一定相称。不过,我们可以考虑,可供选择的模式是否提供了有关它们数据的一致和简约的描述。

个体差异的领域开始于智力研究。虽然对人格理论家来 242
说,这是一个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的、无须思议的课题,但对那些可供选择的模式却有过热烈的争论(卢文格,1951)。当注意力转向人格的个体差异时,用于研究智力的方法是从外国引进的,有时并没有考虑到客观材料的差异是否可能需要方法论的差异。

桑代克的学说认为,存在于人性中的任何事物一定具有某种数量,这种数量是能够被测量的(第九章),这就导致了困难,因为它含糊地意指许多可以测量的特质。为了寻找最经济的方法,用以说明一系列测验上个体样本的分数,曾设计了各种因素分析的方法。有些方法,倾向于分析数据,借以找出差不多同样

重要的各组因素；其他一些方法倾向于找出等级排列的因素，也就是说较一般的因素包含着较特殊的因素。

因素分析家对因素的解释各不相同。有的分析家把它们看作是将难以概述的一系列测验分数使之成规，这里，分数是真实的东西。其他一些分析家则强调测验分数的任意性质，并把因素看作是解释的变量，所以是更为真实的。在因素解法上所做的努力，意味着要寻求真实的、非任意的方式；因素现实性的问题与类型、阶段和概念的现实性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第八章）。

桑代克用他的特性学说对因素的非现实性采取极端的立场。当他编制一种智力测验时，他称之为“智力 CAVD”，规定的任务如下：填充、算术题、词汇、领会指示（桑代克和其他人，1927）。他断言，能力测量只是存货报表或已经完成的任务。有些心理学家仍然坚持像桑代克那样的立场，哲学家称之为唯名论（nominalistic）。例如，劳德（F. M. Lord）认为，一个测验的全面效度不是一个基本的心理测量学的概念，“一个特定的被试对一个特定问题的测验的辨别力才是真正的基本概念”（劳德，1955，p. 509）。

243

特性的假说被汤姆逊（G. H. Thomson, 1939）和特里昂（R. C. Tryon, 1935）作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他们深深陷入了因素的统计方法，因此有几分专志于若干行为现象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一般因素或群体因素都是所采用的统计法的产物。他们所发现的、可以接受的、解释的构思不是假设特质而是特殊的要素，诸如基因、神经弧，或经验的各个部分，正如特里昂（1935）所指出的那样，是心理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数学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理论，每次测验要抽取大量的要素，而测验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出大量重叠的要素。因素它是由机会或假定来说明的，这里的假定是指基本的决定因素或多或少被组织到重叠的“智力分

库”(subpools of the mind)中去(汤姆逊,1939,p.50)。在任何一种基因或神经弧和测验工作之间从未建立过联系,所以这些解释像任何一种假定的能力一样是假设的;此外,现代神经病学使这样一些假设无法接受。

上述这些思想曾首先被应用于智力测量,并扩展到人格测量。自我发展的测量看来是一个晚近的观念。皮特尔(S. M. Pittel)和孟德尔松(G. A. Mendelsohn, 1966)曾回顾了早期的道德价值测量。他们发现了3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道德价值是借助纸一笔测验来测量的,大多数测验被设计用来区别正常儿童和青少年罪犯。这些测验倾向于道德知识的测验;关键答案或正确答案是事先就提供的。在这些研究中,最杰出的研究属于哈桑(H. Hartshorne)和梅(M. A. May)。第二个时期具有更加广泛和更为理论的特征,将道德问题安置在更大的行为和人格的来龙去脉上,不管观点是属于认知的、行为主义的,还是精神分析的。他们将皮亚杰所著《儿童的道德判断》列入这一时期。在第三个时期,采用投射测验,通常是故事填充。然而,皮特尔和孟德尔松所引证的例子主要是根据超我的强度、投射的内疚强度等来解释的;他们没有包括科尔柏格的认知发展方法。所以他们的解释对第九章所讨论的测量提供了历史背景。 244

本章的其余篇幅将讨论以两种心理测量的模式为基础的测量和研究程序;通常在米歇尔(W. Mischel)的著作中作为例子的桑代克的特性论模式和道德发展或自我发展转变为一组或多或少独立的特质。我们的目的是用对照来突出结构概念,不是对可供选择的模式作出一个完整的调查。

特性模式

道德发展的第一个主要的经验主义研究是哈桑、梅和其他协作者的研究(1928, 1929, 1930)。他们的研究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在大量的儿童身上进行研究的。他们试图去发现构成五年级至八年级学龄儿童道德行为测量的单一因素。他们的第一个研究, 而且是最常被引证的一组研究(哈桑和梅, 1928), 是有关在学校、家庭和集会等等各种情境里抵制欺骗、说谎和偷窃等引诱。一般来说, 他们发现在欺骗与学校或家庭的环境之间具有较低的正相关, 相关的大小取决于任务的类似性和容许欺骗的时尚。在同一环境的相似情境里, 相关约为 3, 数值越低, 情境和环境的差异越大。他们发现, 这些相关属于同一量值, 正如智能特征测验之间的相关一样, 也按照任务的类似程度而有所不同。在他们的第二组研究中, 有关服务和自我控制的测量, 也得出相似的结果[哈桑、梅、马勒(M. S. Maller), 1929]。

245 在他们的最后一组研究中, 涉及到品格的组织[哈桑、梅、舒特尔华斯(F. K. Shuttleworth), 1930], 他们发现了一个并不经常引证的高相关。为了测量欺骗, 他们进行了两次测验, 一次是有机会偷偷摸摸的欺骗, 例如, 让儿童给他们自己的考卷打分, 一次是不给机会的欺骗测验。假设是, 如果儿童在复试卷上得分较低, 那么第一次他给自己考卷的打分一定是欺骗的。第一次分数超过第二次分数被认为是对欺骗的测量。分数是标准化的和正常化的, 所以量表在从一次测验和情境到另一次测验和情境是相同的。从事整套诚实测验的每个儿童获得诚实分数的分配, 其标准差是他的整合分数。总体上, 他们对诚实与整合之间

相关的估计,经修订得出 0.78(他们给出一个未经修订的值 0.52)。他们考察了人为的各种可能的根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联系是真实的和具体的。他们认为诚实通常是一个综合的特质,但不诚实常常是随情境而变化的。

这些研究几乎总是被引证作为对特性学说的支持。作者们是意识到这种解释的(桑代克是他们的直接监督),但他们也有另一种概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独特的行为和品格的组织之间存在差异。他们研究的主要目标,笼统的名称是“品格教育调查”,所表明的是当时流行的道德品质的教学方法。全日制学校的学生和加入男女组的学员接受品格教学,对儿童的诚实分数没有一贯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把诚实或道德的教学作为一套清规戒律对品行没有影响。

在那些回答特性研究的人中,有奥尔波特(G. W. Allport, 1943)和科尔伯格(1971)。奥尔波特指出,青少年在许多小型游戏和测量中涉及到最低限度的自我卷入,类似的研究已经被引证用以支持特性的观点。事实上,奥尔波特支持心理学中自我概念的重要性是以此为根据的:当人们深深地卷入自我时,他们表现得更为一致,正如克莱因(G. S. Klein)和熊菲尔德(N. Schoenfeld, 1941)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哈桑、梅、马勒(1929, p. 446)提出过相似的观点。科尔伯格认为,并不存在所谓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这类事,存在的只是那种或多或少符合活动者道德原则的行为。他指出,他自己的一些实验,可以根据他对被试的说谎和欺骗来解释,因为他欺骗他们,把实验的真正目的瞒着他们,然而大多数人不会从这类事件中得出结论说他缺乏道德品质。同样,不付所得税可能是企图欺骗政府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高度的道德原则问题,正如威尔逊(E. Wilson)或梭罗(H. D. Thoreau)正在调查的良心事件一样。

一个提倡特性观点的近代人物是米歇尔(1966,1968),他有关道德行动或顺应社会行动的典范,是抵制即时的小报酬而期待更大的延缓的报酬。他特别喜欢的课题是实验事件对更大的、延缓的报酬做百分比选择的影响。米歇尔放弃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创立另外一种物质或个体差异的类型学,他的兴趣在于证实特殊情境相倚的重要性。他把他的数据连同别人以前的发现解释成是支持“自控行为不同方面的特征……而不是任何一个潜在的单一的道德媒介”(1966,p.115)。那么,为什么米歇尔和他的学生要花上几十年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些特性呢?在下一页,他通过假定与心理病态、色情、受虐狂、抑郁和性虐待狂等方面的发展有关的重要性证明他研究的正确性,把所有这些都解释成是对己对人都不适宜的奖惩规则,他显然把这些与不适宜的自控等同起来。米歇尔似乎用耐性这一术语来证明他研究的正确性,而耐性的存在意味着该研究是要遭到非难的。一个近期的发现是[米歇尔和埃布森(E. G. Ebbesen),1970],托儿所的儿童能容忍延缓的报酬,如果他们分散注意要比经常向他们提醒报酬为好,正如米歇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发现既不与常识相抵触,也不与精神分析理论相抵触[但它可能与赫尔(C. L. Hull)的学习理论的一个要素,即“期待的目标反应”相抵触]。我们能得出结论说,在儿童等待吃饭时让他们看电视就能促进道德发展吗?

247 米歇尔把他的反对者称之为“状态—特质理论家”。他所谓的特质理论主要是指本章所称的特质理论;他所谓的状态理论,主要是指心理动力的和精神分析的理论。提倡特质和精神分析的人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是同盟者。他们的共性表现在,把可以观察到的反应作为信号,而不是单单作为推断行为倾向的实例,因而也就成了米歇尔攻击的真正目标。科学的标志就是避免除

了最明显的和低水平的理论推断之外的所有推断吗？这是一个违背当代自然科学的观点，并与本书激励的观点直接相背。

为了回答情境—特性观点，鲍威士(K. S. Bowers, 1973)指出，实验的方法在其性质上着重情境效果，正如相关的方法着重个体差异一样。他引证吸烟、同性恋和我向思考等是属于不易用情境的操纵来矫正的。凡在被试相仿而情境大不相同的地方，行为将是情境的一个函数，反之亦然。鲍威士将一套运用变异分析的研究列表来估价情境和人的变量的相关影响；它们表明在个体差异方面有稍大的影响，但由于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其影响则更大。在讲授相互作用的较大影响的理论涵义时，鲍威士指出，人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他自己的环境，部分是通过他怎样来解释环境(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但也因为他给别人创造了一个环境，别人也相应地作出反应。鲍威士为最后的声明引证了许多经验性的原始资料，作为一个例子，凯利(H. H. Kelley)和斯坦赫尔斯基(A. J. Stahelski, 1970)的研究采用了一个抓俘虏的两难游戏。合作者当他们的搭档采取合作策略时，他们也采取合作策略，而当他们面临一个竞争的搭档时，便采取竞争的策略。竞争者采取一个竞争策略，不论他们的搭档做什么。而且，竞争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他们发现的只是竞争搭档。所以，人们不仅通过如何察觉别人来维持他们的行为，而且他们也真地唤起了符合他们性格的行为，这是瓦切特尔(P. L. Wachtel, 1973)提出的观点。所以环境对性格结构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有贡献的，这一课题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

米歇尔(1973)曾改变他的立场来承认认知因素对反应的影响，当然他从未否认过个体差异的存在，正如他批评过的那些人从未否认行为主要是由情境来决定的一样。可是米歇尔仍然是

一个特性论者。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中随便摘几句话来加以证明：“与其谈论‘行为’，毋宁将各个行为相倚单位(behavior-contingency unit)概念化更为有用，行为相倚单位是把特殊的行为模式和可能预期它们的条件联系起来。”(米歇尔, 1973, p. 278)有关自己和别人的含蓄的人格理论可能处在最稳定的和处境自由的结构之中，这是他承认的。本书的要点是，道德发展与这些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承认这一点，也就大大削弱了他对道德发展的处理方法的攻击。

特质模式

- 249 霍根(R. Hogan, 1973)提出一种道德发展的维度观点；对他来说，道德成熟包含五个独立特质的成熟和最佳化。其中三个特质是社会化的移情作用(empathy)和自主，他认为这三个特质基本上是发展的，但最后两个特质不是发展的，它们是道德知识和在一个方面对他来说是独特的，即良心的伦理观对责任的伦理观。霍根认为社会化先于移情作用之前发展，移情作用又先于自主；但一个发展序列的结果并不系于下一个发展序列的开始，正如皮亚杰的阶段序列那样。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在霍根看来是独立的事件。霍根选择的手段是一种客观测验或一种用客观测验的方式来记分的半投射测验，也就是说计算特殊信号。他的道德成熟测验是通过计算有多少涉及个人尊严的项目来记分的，注重精神(而不是法律条文)、社会的幸福，或观察问题的正反两方面。他的被试通常是大学生，数据在测验之间通常是相关的。

霍根的特别兴趣在于良心的责任方面，为此，他曾设计了一

个测验,即“道德态度的调查”。霍根看到两种主要的道德理论,这些道德论假定一种更高的法律,用以对付一个特定的社会法律,而法律的条文和社会的权威不能对之提出上诉;他把前者称之为良心的伦理观,后者称之为责任的伦理观(不免有些偏见)。道德态度的调查是由一组认为与这些道德论的每一个理论相一致的陈述构成的;对每一个陈述来说,被试在一个五点量表上表明他的同意的程度。霍根引证了下列有代表性的项目:“(1)所有民法应按照一个更高的道德法则来判断;(2)正确与错误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有意义地被定义;(3)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就不会被人遵守;(4)没有法律,则人的生活将是卑鄙的、兽性的、短缺的。”(1973, p. 225)虽然霍根把责任伦理观的分数打在他的量表上高的一端,但他自己的数据则认为良心伦理观更成熟。他报告道德态度的调查与移情作用的相关为-0.2,与自主的相关为-0.3,与道德判断的成熟性相关为-0.4。只有社会化,即另一个有关社会遵奉的测量,与之具有正相关。该问题看来是一个小问题,只需把有关道德态度的调查的打分倒过来就可以解决的。相比之下,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整个模式倒塌了。

良心对法律的问题使许多人为科尔伯格和我们的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所吸引;我们的方案是把良心伦理观放到比霍根称之为“责任”的法律和秩序的伦理观更高的阶段。确实,他把良心伦理观看作比遵奉伦理观更成熟的相反看法深深地置于他的基本理论之中,这种基本理论起始于“人作为一个制订法律和奉行法律的动物的概念”(1973, p. 217)。霍根承认,最成熟的道德可以在良心对责任的问题上找到某个中间的或折衷的位置。但是他的模式,即把道德成熟分解为一组特质的模式,如果一个特质不是单义地与道德成熟建立联系,则该模式就大大地被削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构模式应运而生:为了它自己而信奉法

250 律,并直觉地反对不公平,被最终和最理想地整合到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之中,坚持公正的抽象原则通过对结果的现实估计而受到锻炼。霍根的模式既未概念化,也不允许对那些复杂的整合进行评估。

另外一个方法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小组,他们一直从事于心理社会成熟的测量[格林伯格(E. Greenberger)和其他人,1974,1975]。他们的理由是,在所有的社会中,心理社会成熟包括有效地起作用的能力,与人适当相处的能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能力,总之,要具有个人适应、人际适应和社会适应的能力。个人适应包括自信、工作态度的确立和同一性;人际适应包括社交技能、明确的信赖,以及扮演主要角色的知识;社会适应包括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态度,以及对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容忍程度。在这些论题中,每一个论题还可以再分成几个亚题,每一个亚题由各套独立的项目组成;然而,记分的亚量表与上述9种特质相对应。项目为一致性的程度,被试根据一个四点量表作出答覆。例如,有关同一性的亚量表是:“我经常改变我的感觉方式和活动方式,以至于我有时搞不清谁是‘真’我。”对此打否定分。他们的大多数分析是根据九个亚量表来进行的。

他们还在测验的B形式的188个项目上实施了层次因素分析。如果他们的模式被完全证实,该分析将得出每个亚量表的第一级因素和一个与个人适应、人际适应和社会适应这3个主要类别中的每一个类别相对应的更高级的因素。第一个分析,强使其得出9个第一级因素,由于不适合他们的结构,终于被抛弃;第二个分析也是如此,强使其得出6个第一级因素。第三个分析做完,并未强使其得出第一级因素的数目,除了一个有关最大残差的技术要求之外。该分析得出一个仅仅适合社会适应的

模式。没有一个第一级因素能支持这些假设的个人适应的亚量表,第二级因素最紧密地符合个人适应,包括那些来自社交亚量表的项目。人际适应并不作为一个因素出现(格林伯格和其他人,1974)。这些结果对他们的模式来说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顺利,尤其是因为头两个分析由于不适合该模式并无明显的理由就被摒弃了。正如第八章和第九章所回顾的几个作者那样,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计划来利用他们的数据去修订他们的模式。 251

乔塞逊(R. Josselson)、格林伯格和麦克康诺契(D. McConochie, 1975)与一组十一年级的男孩和女孩进行交谈,这些孩子代表了心理社会成熟的极端,并用个人适应和社会适应的量表进行测量。学生来自一个稳定的白领和蓝领居民区。他们的目的是想选取水平最高和最低的25名学生,但水平最高的大多数人是女生,最低的是男生。所以他们分别挑选12名水平最高和最低的男女生。提供的数据总共是41名被试。他们发现,成熟水平较低的女生类似于我们的自我保护和遵奉阶段,而成熟水平高的女生则类似于我们的良心阶段。由于他们对男生没有作出这样的陈述,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男孩身上发现了什么。

成熟水平低的男生是非内省的,只顾眼前,关注的是娱乐、汽车、摩托车、女孩子、对他们叫嚷的成人、不介入麻烦,尤其是不介入酗酒、吸毒、违规驾车等麻烦。他们多数提到打架,一副强硬、火冒三丈的样子,然而这些男孩又是比较被动的,上大学或找工作依靠别人来决定。在他们的空闲时间里,他们就等着事情的发生。他们一心想着受到别人喜欢,大多数人早有比较可靠的女朋友。他们重视自制,感激管理他们的人。他们把父母看作是软弱无能之辈或是暴君(这也许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概念结构和他们父辈的性格,这一点是作者未能指出的)。他们当

252 中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已经使父母感到失望。他们重视朋友,因为“他们帮助你”。他们的目标是有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家庭、一所房子、一辆汽车、许多钱;他们并不关心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

对成熟水平高的男生来说,学校是比较重要的,同样,个人嗜好和宗教兴趣也是比较重要的;他们很少把注意力放在过分的男子气概的追求和名望上。他们认真对待未来,关心将来成为什么样子要甚于他们将有什么。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做什么和希望做什么,而不是来自伙伴的赞许。他们要比成熟水平低的孩子更现实地评价自己,更怀疑自己。他们承认和容忍个体差异。大多数人还不够踏实。对他们来说,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理解你,他热情地帮助你摆脱困难。他们不大善于控制冲动,虽然有些人谈到他们过去曾努力去克服过冲动。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变化的和发展的。他们有着跟父母不同的观念,包括对他们父亲行为的心理因果的思索,正如作者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在成熟水平低的孩子身上是不会发生的。然而,这些孩子缺乏反抗精神,据作者说,他们过分注重善良。

因此,成熟水平低的孩子似乎在自我保护阶段占支配地位,具有毫不含糊的冲动阶段的残余,而成熟水平高的孩子似乎在良心—遵奉水平占支配地位,具有明显的朝向良心阶段的可能性。与他们期望相反的一个结果是,成熟水平低的孩子比成熟水平高的孩子更易卷入异性关系;在这方面两组女生没有差别。这一发现无法从他们的假定中来预示,该假定是:心理性欲成熟和心理社会成熟是并存的。也无法从我们的假定中来预示,我们的假定是:心理性欲成熟和心理社会成熟大体上是独立的。虽然它更接近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好还是用遵奉和良心阶段的比较严格的冲动控制特征来解释。

总之,格林伯格小组并没有证实他们自己的模式。他们有

关成熟水平高和成熟水平低的青少年的画像倒是证实了我们的阶段描述。所以,即使他们开始用了九个方面的概念,他们也没有跨出我们的一个方面的概念。这就支持了本书的主要声明,即自我发展的单一变量为大量数据提供了简要说明。 253

另一个方面,贝拉克(L. Bellak)、赫维切(M. Hurvich)和吉迪曼(H. K. Gediman, 1973)也提供了有关自我发展的观察资料。他们的一览表有 12 个自我功能,包括现实测验、判断、世界和自己存在的现实感、内驱力、情感和冲动的调节和控制、客体关系、思维过程、在为自我服务时适当退让、防御作用、刺激障碍、自主作用、整合作用,以及精通一胜任。他们提供了一个谈话的程式和一个在七点量表上评定每一个自我功能的编码方案。他们的重点放在侦察和测量由我们的量表表明的症状;对极端的症状有一个等第评定,对正常的或平均的症状有 6 个等第评定,对最佳的功能有 7 个等第评定。不管他们是否对病理的程度感兴趣,尤其是精神分裂症,他们的功能一览表与格林伯格及其同事的功能一览表相重叠,在某种程度上与霍根的功能一览表相重叠;可是,人们必须走到标签的前面去看特殊的内容和引证的例子以便建立对应。为了我们的目的,应注意到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其中自我发展被想象成 12 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方面。

在试图把自我发展进行维度研究的人中间还有帕利林格(E. Prelinger)和齐默特(C. N. Zimet, 1964),他们像贝拉克一样,也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还有赫斯(R. D. Heath, 1965),他的主要维度是图式、技能和动机。问题在于是否任何一组维度都能明显地加到我们的自我发展的一维的解释力或预示力上去。

结 论

254 假定我们从布伦斯维克(E. Brunswik)的透镜模式的观点, 及他有关知觉方式的共同形式的概括描述和托尔曼(E. C. Tolman)有关行为的描述来看个体差异[哈蒙德(K. R. Hammond), 1966;托尔曼和布伦斯维克,1935]。对托尔曼来说,一个有机体用来达到目的的行为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和可以替代的,像赫尔的习惯一家庭(habit-family)的等级一样。对布伦斯维克来说,一个有机体用来重新构筑客观世界的知觉线索也是多种多样的和可以替代的,即一个线索一家庭(cue-family)的等级。由于运用概率性结构,特别是由其他有机体提供的环境;由于行为是整个有机体的一种功能;由于一种倾向有着各种各样可以相互替代的表现形式,所以只有在极其偶尔的情况下,一个特殊的行为才是一个特殊倾向或目的的明确指数。特殊的行为和特殊的知觉线索的模棱两可的意义是布伦斯维克透镜模式的精髓。该模式的透镜是可供选择的行为和可供选择的知觉线索的外壳。对知觉来说,透镜的焦点是环境中的物体和理解的知觉。对行为来说,目的和一个人的倾向集中在有机体内部的一些方面,而成就是透镜的另一个焦点。布伦斯维克(1952)认为,心理学理论的焦点应该位于发生在有机体和环境之中的心理事件。

个体差异的特性理论研究透镜模式的透镜,也就是说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不外乎是素质的模糊线索。由于在素质的可供选择的表現中只发现低相关,特性论者就错误地作出结论说只有微不足道的素质因素,而没有看到特殊素质与特殊指示物之间的关系是概率性的。所以有关个体差异的特性观点不

同于特质理论和结构理论,正如布伦斯维克所说,在结构理论方面,我们的理论和科尔伯格的理论把注意力放在不同的阶层。我们不妨来考虑一下特性方法的一个例子,该例子是布伦斯维克追随怀特黑德(A. N. Whitehead)的结果,称为“误置具体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它似乎不是代表一个真实的理论,而是一个废除理论的观点。 255

米歇尔在对科尔伯格研究的批评(米歇尔和米歇尔,1976)时指出,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形式的序列发展是由有关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化实践相互作用的序列来扼要地解释的。米歇尔贬低科尔伯格在欺骗和道德成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的证明,因为处在低阶段的那些人有一半并不欺骗(很明显,他们归咎于科尔伯格相信原罪)。有些道德行为可以从科尔伯格的测试中来预示,他们说,具有约0.3的系数,恰好是预示这种行为的其他测量所发现的值。所以,米歇尔宣称,他的观点与结构的和特质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经验的差异,他几乎在有关经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的许多段落都强调这一点。然而,更仔细地看一下,该研究只针对要求很高的几个方面,例如道德推理的成熟可以通过认知成熟加社会化来解释,但数据却未能支持这一点。科尔伯格对其测量的结构效度的要求并不取决于与任何特殊行为的高度相关;他的注意力放在道德判断上,而不是放在行为上。行为的情境特征是和科尔伯格的理论相一致的。如果用科尔伯格的测验来预示道德行为跟用其他测验(这些测验明显地指向预示)来预示道德行为一样好,那就是一个有关道德判断概念的显著的和有力的证据。

另一方面,米歇尔和米歇尔批评科尔伯格的推理如下:一个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的12岁的少年犯和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在测验上无疑会被不同地打分。一方面是因为教授的高级

256 认知和语言成熟促使他更清晰地阐述他的理论;另一方面,“对于教授来说,道德推理显然朝向博得别人的赞许和信奉传统的权威,这样他就不可能会获得奖赏,不可能受到重视,因而也就不可能被采用”(1976)。恰恰是因为他想依赖社会赞许,所以教授的所作所为听来好像他不是那样的!动机的转变被定义所排除了。无论教授的动机看上去是怎样的,它毕竟是一个社会赞许的问题。这就是我称之为本体论谬误的例证(第十七章)。

把道德发展和自我发展分解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独立的特质、功能、维度,正如霍根、贝拉克、格林伯格等人的研究一样,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有机体观点(整体论)的否定。因此,这要比实际争执更危急。在把特质模式和结构模式相比较时,我们必须回过来区分级性变量和里程碑顺序。事实上特质是极性变量,这是根据它们的极端来解释的。结构的发展序列是一个里程碑顺序。根据结构的观点,特质是作为结构的线索来解释的,而不是作为个体差异的基本实体来解释的。有些特质,诸如自发性和适应性,可能表明对结构改变的维度具有曲线的关系。一旦我们承认在某些特质的分数和自我发展的维度之间具有多价的曲线关系的可能性(有关它们的意义和性质,我们正在调查研究),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因素分析无法发现这样一些维度。整个传统的心理测量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即看到的测验分数是与基本的潜在的決定因素有着线性的关系。这种假设是与所论证的曲线关系不相容的。所以,接受特质理论的心理测量方法,连同“一般的线性假设”[科亨(J. Cohen),1968]和线性分解的手段必须被抛弃或在该领域加以修订。特质模式无法充分地代表更高阶段的复杂整合。

在结束本章时,根据结构的转化检查我们的论题,我实际上是反对用一组较小的特质或一组较大的环境—有机体的相倚来

检验的。充其量这些是科学范式方面的差异(第十二章),它们无法由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因为不同范式的支持者承认不同的数据。这些测量手段对结构概念的建议是有不足之处的(第九章),部分由于该领域固有的困难(第八章),但是特殊手段的不足之处不应该被解释成对结构模式的反证。不同的模式反映人性的不同看法、不同的科学哲理,和个体气质的差异。 257

第三部分 理 论

除非可以断言说人类一无所知,直到逻辑学家教导他们……应该承认,甚至创造力、敢冒风险、独立思考等等,比起对前辈思想家和人类集体智慧的尊重来,不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特征。人类有哪些看法,即他们对一切性格和气质、一切偏见和成见,以及在不同的地位、教育、观察和探究的机会中一切变化的看法;没有一个探究者能包罗这些看法;每个探究者,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富有的还是穷苦的,患病的还是健康的,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沉思的还是活跃的;无论是诗人还是逻辑学家,古人还是现代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是一个好思考的人,还具有他个人的思维方式的附属特征。每一种环境为一个人的生活塑造性格,伴随着特殊的偏见;为察觉某些事物,忽视或忘却其他事物提供了特殊的手段。但是,由于观点的不同,察觉到的是不同的事物;他看不到的,别人极容易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他却看到了。

——穆勒(J. S. Mill)

《边沁》(Bentham)

第十一章 早期理论:前精神分析

对自我发展的动力理论来说,三个主要的问题是:自我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是怎样保持稳定的?它是如何改变的?在每个问题当中都有从属的论点;例如,改变提出了方向和动力这两个问题。自我作用的问题似乎和稳定性或改变相似,还没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较为重要的贡献。 261

作为第一个近似的解法,自我发展理论的形式要求是那些在形式上并非完全相同的序列的连续事件,假定的事件序列是由内在逻辑来联系的。这些要求使概念有别于理论,而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序列的连续事件之所以不完全相同,意味着某种阶段的观念,虽然阶段这一术语应该怎样严格地解释并无说明。事件的序列由内在逻辑来联系是为了说明阶段的概念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理论。理论必须有主语和谓语;阶段的序列就是主语。 262

本章的目的之一是重建第五章已经提出的那些概念之前的历史。由于这一课题没有被看作为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因而有许多观念一代接一代地被重新发现,并作为新观念提出。第二个目的是描述精神分析的部分背景,即当代自我理论的主要根源。

19 世纪的哲学心理学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之前,我们的论题主要列入伦理学的范围,很显然,它是作为道德发展来研究的。19 世纪的伦理思想有两大学派:直觉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起源于英国联想主义学派。

一般说来,功利主义者认为心灵中什么也没有,除非通过感觉而输入的东西和由准机械的感觉材料的联想演化而成的东西,感觉的材料包括环境和感受两者信息。

我们所关注的是明白的或含蓄的心理学,而不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边沁是一个著名的功利主义者,在第一章中我们已领教过他的学说,那就是“活动的原动力”完全可以用快乐与痛苦来描述。边沁的“享乐主义演算”现今仍存在于以奖励—惩罚和刺激—反应为基础的心理学中;我们对它的看法是有选择余地的。

最著名的直觉主义者是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把有前提的命令与绝对的命令区分开来。有前提的命令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属于科学的领域。绝对的命令属于道德领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做什么;主要是良心。一种绝对的命令是指每个人应该从事的活动,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人类的法则。这就是道德的全部内容。决定道德的不是活动的后果,而是它所承担的善意。善意像一颗珍珠,凭自己的光发亮,即使当它追求的目标不能完全得出良好的结果时,情形也是如此。行为的效用不能增减其道德价值。无论对康德的哲学和心理学有什么别的说法,我们必须承认他

正在恢复人的概念,他不但是环境力量的马前卒,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选择的根源。现在让我们转向道德行为的某些发展的观点。

亚当·史密斯(A. Smith),一个以经济学家著称的苏格兰人,1759年出版了一部论述道德的专著《道德情操的理论》。他写道,良心或道德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能使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体会别人的感受。当一个人能像别人所做的那样作出反应,就会赞成或同情别人。有了这种体验,一个人就能认识到别人对他也是作出同样反应的。这样,一个人就学会了像别人看待自己那样看待他自己。最终,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标准或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旁观者”,这就是良心。如果一个人置身于社会之外,他就不可能判断他性格的善或恶,正像他没有一面镜子就无法判断他尊容的美或丑一样。社会给了他一面镜子,即别人是怎样来看待他的镜子。在对自己作出判断的过程中,一个人既在评判别人又被别人所评判,或者说他既是旁观者又是当事人(史密斯,1759)。

培因(Alexander Bain, 1818~1903)是第一部标准心理学教材的作者,该书在19世纪后半叶曾被广泛使用。他有关责任感发展的观点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培因(1859)的第一个阶段是儿童只对直接的、立刻施加的愉快或痛苦作出反应。在第二阶段,儿童不仅对保护自己的利益作出反应,而且对保护他所爱的人的利益作出反应,他的责任感因而转化为自发的良心。它是一种内在的和理想的权威,是内部的政权制约着外部的政权。这一种转化也导致义务感,所以它还涉及到法律的意图和意义,而不仅仅是从事某些特殊的行为或不从事某些特殊的行为。

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认为是功利主义者,但他是从广义

上来解释功利的,是以发展自身的长期利益为根据的。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他对边沁的“享乐主义演算”的批评;良心和凭自己的智能臻于至善的愿望是列入这些要素之中的,他发觉这些要素在边沁的活动源泉中是缺乏的。穆勒在其论自由的文章中[(1859)1962,p.188]补充道:

在有关人生正确地追求完善和美化的著作中,最最重要的是人自身。假定凭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有可能建造房屋、播种、打仗、审案,甚至建筑教堂和做祈祷,那么用那些现在居住在世界上较文明地方的男女,以及由于自然的原因和人为的原因而产生的忍饥挨饿的样本来交换这些机器人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人性并不是从模子里压出来的机器,会精确地按照工作指令去做,而是一棵树,需要在各方面发展自己,按照内在力量的倾向使之成为有生命的东西。

穆勒把个性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善行,而把习俗的压力看作是专制的形式。他说,大多数人是遵奉者;他们并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即使在私事方面亦如此。他们问自己的仅仅是那些适合他们地位和环境的東西。“我并不是说他们选择的是在适合他们自己的倾向之前的习俗。他们从未想到有什么倾向,除了遵奉习俗外……味觉的嗜好、行为的怪僻,是同犯罪一样被回避的。由于不能遵循自己的本性,直到再无本性可言;他们的天赋才能因此枯竭和衰退了。”(p.190)

在基于良心的道德和基于大多数人的幸福的道德之间,穆勒认为没有矛盾。良心是对责任感的内在制约,而不论其内容如何。良心来自同情、爱、恐怖、宗教感受、儿童时代的回忆、自

尊、希望别人尊重、自卑等等，并与之相联系；这种复杂性导致神秘的性格，直觉主义者将其归之于良心。穆勒认为良心是获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过它是自然的，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它是人类官能的一种自然派生。人类的社会感受，希望成为其他人当中的一员，在穆勒看来，是良心的一个重要基础，虽然他并没有把良心还原为同情。

穆勒指出，正义感的一个要素是对这样一种人施以报复或报仇的愿望，这种人曾经伤害过我们所同情的人。然而，这种报仇的愿望无道德可言。仅仅在它成为社会利益的从属部分这一程度上，它才成为正义感的一部分，从而富有道德意义。

促使哲学和心理学发展的动力起因于斯宾塞(H. Spencer, 1820 ~ 1903)，而不是达尔文，或者不妨说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贡献的巧合。斯宾塞在他的早年，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之前，就提出了发展的观点。进化或发展的思想促使他把发展的观点作为生命的普遍原则。他看到进化从不明确的、不连贯的同质通过连续的分化和整合发展到在结构和功能上明确的、连贯的异质。他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应用了这一原则，并发现了有关例证。只有他的伦理学适合我们的讨论。

杜威(Dewey)和塔夫特(Tufts, 1908, pp. 358 ~ 359)把斯宾塞的伦理学概括如下：“责任的意识——独特的道德意识——是由 266
遥远的目标来控制近期的目标，由复杂的目的来控制简单的目的，由理想或典型来控制感觉或表象。——一个未充分发展的个体或种族只顾眼前；成熟的个体或种族则是由对未来的预见所控制……智力和文化的每一步发展，不论对个体来说还是对种族来说，都取决于将眼前的、简单的、自然方面现实的倾向和目标从属于遥远的、复合的、仅仅是理想方面现实的倾向。”道德的约

束是从约束的形式中发展起来的,约束的形式并不就是道德。原先,人被外来的权力所制约,不得不对遥远的结果存有戒心。一个特定过程的长期的内在的影响,原先只与直接的外在约束有关,最终成为决定他行为的支配力量。在这一点上,人就按道德行事。最后,德性发展得甚至更远,以致责任本身成为乐事。对斯宾塞来说,所有这些是由自然律产生的。对他来说,进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斯宾塞是进化论发展的哲学家,19世纪还有一些变革发展的哲学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黑格尔(1770~1831)。黑格尔的发展公式是辩证的;对每一个论点来说都有一个对立的论点,矛盾的解决达到一个更高的综合。这个综合依次成为一个论点,为一个对立的论点所反对,并且又由一个新的综合来解决矛盾。这个公式是他的逻辑,是对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推理的一种选择,但它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理论;历史的每个阶段破坏、保留和改进前一个阶段。黑格尔的观点读来好像是在描述类似自我发展的某种东西。然而,他的描述风格过于晦涩,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大的帮助。

267 孔德(A. Comte, 1798~1857)提供了一个理论或人类智力发展的三阶段规律。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描述和一种智力发展的规律。这三个阶段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肯定的或科学的。在第一个阶段或神学的阶段,自然现象是通过万物有灵地和拟人地与人类心灵的类推来想象的。现象被人格化;事物被看成是有灵魂或意志的,赋予事物以生气,以便能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在神学阶段,第一个亚阶段是拜物教。在这一阶段,物质对象被认为是具有生命的,具有它们自己的目的和感受。第二个亚阶段是多神论,认为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看不见的神在统治着各种现象。第三个亚阶段是一神论,认为只有一个神创造和统治

着宇宙。在第二个大阶段,即形而上学的阶段,替代灵魂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宇宙被一些精华、倾向或潜力所充斥。神、“理智”或“大自然”提供了事物的最终原因,它们作为自然现象的原因和理由而操作。由于现实主义者和唯名论者对抽象概念的争论,导致这一阶段的结束。在最后的或肯定的阶段,抛弃了对绝对原因的形而上学的探究,人们转而寻求描述事变规律性的法则。这最后的阶段是一个固定的阶段的痕迹。个体发展的时期符合同样的阶段。“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如果他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在儿童时代是一个神学者,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形而上学者,在成年时代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孔德,(1842)1956, p.126]

本世纪初的美国心理学

铁钦纳(E. B. Titchener)出生于英国,受教于冯特(W. Wundt),在本世纪初是美国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学派称之为构造主义(structuralism);它涉及到概括化的成人的心理。其方法是内省;试图发现心理的内容。根据感觉和表象所做的心理分析是借助联想来联结的,这是对英国联想主义心理学派的元素主义和德国传统的内省分析的继续。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成为自我发展理论的历史先驱,是与铁钦纳的构造主义相对立的。

典型地说,20世纪初的美国思想学派称作机能理论(functionalism),相对于铁钦纳的构造主义。詹姆斯(W. James)是机能主义学派中众所周知的成员。虽然他在《心理学原理》(1890)书中写了好几章论述自我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论题,但只涉足我

们课题的边缘。他严谨地描述了自我的等级:物质自我、社会自我或本身,以及精神自我。他有关意识流的描述,其中没有一个观念能精确地重复前一个观念,是一个反驳构造主义要素的论点。

机能主义学派可以用安吉尔(J. R. Angell, 1907)在“美国心理学会”所做的理事长讲话来总结和解释。按照安吉尔的观点,机能主义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学派有三个概念:第一,它可以被看作是与心理操作而不是心理要素有关的心理学;这一观点与构造主义相对照。第二,机能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与意识的效用有关的心理学;根据这一观点,心理或意识使有机体适应环境,尤其是适应一些新的环境。第三,机能主义的最广义的观点是作为整个心身有机体的心理学。安吉尔反对把机能心理学限制在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相反地,这三个领域是相互依存的。

在确立机能主义观点中最重要的文章是杜威的《心理学反射弧概念》(1896)。要理解这篇文章,我们必须首先重建其论题,即反射弧。元素主义者的传统鼓励把行为分解成各个要素;新的进化论运动鼓励把行为追溯到原始的本源,通常与动物具有同一本源。反射活动是早就知道的,作为行为激发和基本单元这两种形式的反射弧观点,显然出自 19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合成的复杂行为。大约在 1890 提出的神经元理论,认为有三个神经细胞为反射弧的先验代表,一个是传入神经元,一个是中央神经元,一个是传出神经元。根据这个方案,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感觉器官作用于传入神经元;另一个神经元把刺激输送至中央;于是,传出神经元引起肌肉或腺体的适当反应。

在杜威看来,这种情景是不真实的。行为的要素不是由一个反射弧联结起来的刺激和反应;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共济的官能,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刺激和反应。反应有助于构成和创造“刺

激”。而且,反射活动不是彼此独立的;一次活动的结束是下一次活动的开始。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循环的反应。把活动拆成感觉和反应忽略了活动的机能;机能是活动的来龙去脉。

杜威的共济官能已经成为皮亚杰的感觉运动图式(第十二章)。皮亚杰曾详尽阐述了杜威的顿悟,即刺激是由反应构成的,有机体在反应之前并不存在刺激,循环反应的概念也是如此。说来奇怪,杜威的机能主义称自己为构造主义者的现代观点的鼻祖[皮亚杰,1970;梅洛-庞蒂,(1942)1963]。当时,杜威的共济官能被解释为行为结构,不过,增加了不少内容(见第三章)。尽管杜威的文章色彩鲜明并具有直接的冲击力,但是他把行为还原为反射的心理学。条件反射的思想学派首当其冲,甚至弗洛伊德称反射是行为的基本单位。从反射活动的发生到承认它们是行动的方式,这是一大进步。与此相对应的心理学(来自英国联想主义学派)认为,心或意识是行为的消极的旁观者,它必然起源于感觉。本书的主题是根据杜威的论文展开的。当代的反射论后裔把心灵描述成是对输入的消极的接受者或者是别人程序的加工者。

鲍德温:个人成长的辩证法

270

鲍德温(J. M. Baldwin, 1861 ~ 1934),心理学的伟大理论家之一,他在20年代初出版的有关心理发展和社会与道德发展的书中例证了进化论观点。鲍德温(1897)把“个人成长的辩证法”作为他的自我发展理论的核心。首先,婴儿学会把人同其他物体分开,鲍德温称之为(这种用法跟流行的用法不同)投射阶段。其次儿童学会把自己看作是许多人当中的一员,但是,他不能从

别人身上观察到特殊的感受;鲍德温称之为自我意识发展中的主观阶段。然后,儿童学会了把别人看作是也具有他在自己身上觉察到的那些感觉;鲍德温称之为折射阶段。由于这些过程的连续重复,即用别人身上觉察到的光环来看待自身,并从自身所能感受到的东西来推断别人,他的自我发展进入到儿童期和青春期。作为一个结果,自我的内容和改变几乎是一致的;一个人想象自己如同他想别人一样。

年幼儿童的行为显示出一种极性;他模仿强者并欺侮弱者。他对那些有权势的人,看来是利他主义的;这是他的顺应的自我。但对比他小的弟妹,他就会表现出攻击和自私;这种态度成为他的习惯的自我。然而,逐渐地,他建立了理想的自我,最初是模仿周围的人物,尤其是父母,但逐渐地通过智力的操作,形成原则,对这些原则来说,即使是他的模仿也需要坚持。模仿,作为一种本能,是发展的动力。鲍德温评论道(1897,p.42):

271

这里,最初的大量限制为个人的自由设置重重障碍,只有“复制”的形式才是他的个人权力或法律。这是“投射的”,因为他无法理解它,无法预期它,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它。他只有通过模仿把它复制出来,从而获得一种知识使他明白它是什么。所以它是“模仿的复制”……它并不是我,但我得适应它。这里是我的理想的自我,我的最后的榜样,我面前的“应该”形象。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是理想的,他们虽各有不同,然而在默认这一法律上似乎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我才习惯于像他们那样依法行事,使我的性格塑造成与之符合,唯有如此,我才是好样的。因此,像所有其他模仿功能一样,它只有通过刺激活动来教授它的课程……但是正如我这样做时取得进步一样,我永远发现有新的榜

样摆在我面前；因此，我的道德悟性必须总是发现其深刻的表示，在这种表示中渴望预期，但不能超过理想。

当孩子能把自己看作是两极的时候——一会儿是放肆的和自私自利的人，一会儿是无私的和随和的小学生——他看到别人同样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了这种认识，他学会了把活动归类而不是把人归类，然后使自己适应时机。人们不能说是自我本身还是利他主义本身更为真实；真正的自身是两极的自身，是社会的自身，是集复杂性于一身的自身。随着一个理想的自我的产生，已经增加了某种新的东西。儿童学会服从命令，即使他不愿这样做。这种态度不同于与人方便自我，那是乐意模仿别人。新的自我为旧的自我订出法律；这样就产生了遵奉的自我和良心的开始。虽然儿童一直在学，并且只有通过模仿来学，但他复制一个摹本的试图有着发明的成分和解释。儿童对社会确认和对力量意识的需要的相对强度各有不同，前者导致适应性，后者导致创造力。

社会判断和私人判断在鲍德温看来实质上是相等的。鲍德温在“选择思想”的标题下写道：每当个人的态度涉及到一个判断时，“个人自身的组织是选择真实的独特的思想的基础”(p.130)。272 社会因素影响这种选择；需要社会认可是随着个人成长的辩证法而来的[这些观念在沙利文的有选择的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和一致的有效性(consensual validation)中得以重视]。

人的一生，其道德意识大部分为社会的。社会赞成导致自我赞成，社会反对导致自我反对，不管它们正当与否。这种反应不单单是对公众判断的反映。相反地，由于自我和改变的相似性，另一个人的判断必须唤起全部道德意识。

按照鲍德温的观点，动物生活中的精细的直觉在人类身上

并不存在。人的遗传素质是可塑的。然而,他坚持动物和人的连续性。例如,在狗身上可以观察到同情甚至妒忌。在狗和婴儿身上可以观察到的有机同情不同于反射同情,反射同情是与自我意识共生的,是从自我和改变的相似性中派生出来的。然而,从有机同情到反射同情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

鲍德温说,直觉主义的道德学派是以心理学上的虚伪假定为基础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人和动物的连续性。功利主义的道德学派,他们的逻辑有赖于将同情的冲动还原至利己的冲动,也是虚伪的,因为同情的冲动和利己的冲动都扩展至动物。而且,道德意识不是根据同情而是根据公平;这两种需要并不一致。道德的或理想的意识克服了反射的同情和明智的追求私利之间的对立。道德的理智发现,纯粹地追求私利或纯粹地利他主义都是非自然的和没有道理的,因为自我和改变是相等的,只有自然的和合理的才是尽职的。

273 鲍德温发现了这里称之为自我发展的许多结果。他说有三个划时代的行为,即自发的、理智的、理想的或伦理的。在那些时代里,行为的许可依次为冲动、愿望和权利。第一个脱离冲动的许可是趋向愉快和痛苦的享乐的许可,作为一种对纯粹冲动的抑制。在愿望的时代中,行为的动机和许可是相等的;理智活动的许可是抑制冲动的许可。客观地讲,行为的许可是这一时代的成功。在大约2~4年的时间里,活动是由攻击的自我来控制或批准的。当儿童初次知道他是有智慧的,并能运用智慧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时,“他就会欺骗比他小的孩子,愚弄他的侍者,想法诓骗他的长辈”(p.395)。有些成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利用他们的社会环境为个人谋私利。但是,对处在这一时期的正常孩子来说,他的天性的另一方面也继续控制他的品行,导致了同情的、无私的品行,这种品行也是通过其成功来认可的。由

于这一时代的发展,儿童认识到作为事实的事情和作为愿望的目标的事情之间的区别。于是,快乐本身成为愿望的目标。因此,在这个时期有一个真正的“享乐主义的演算”。模仿的适应和发展倾向于思想的统一和组织,导向伦理时代,在这一时期,认可成为良心所绝对必要的,这是准冲动的,正如鲍德温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它预示了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

由于鲍德温如此侧重于把模仿作为动力原则,我们就不难推测,他在处理超过遵奉阶段的自我发展阶段时要比讨论早先的阶段困难得多。他曾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一个人可能逐渐形成一种跟他的社会的实际观点相冲突的道德情操,但原则上,良心始终是社会判断的一个内化的看法。“人的伦理观代表了他个性的基本的和最高的成果……社会的确认代表了人的集体活动的最高成果……如果这两者之间有矛盾,那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这是最后的和难以回避的社会矛盾。”(pp. 566 ~ 567)然而后来,鲍德温(1906 ~ 1915)在一个不太知名的认识论的研究中表现出对更为成熟的阶段的某些方面的深刻理解。

库利:反省的自我

274

在社会关系中,自我的起源是一个与库利(C. H. Cooley)有关系的论题,他在《人性与社会秩序》(1902)一书中用了“镜中的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这一术语。库利说,没有相应的你的意识,我自己(mself)也就没有意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感觉是由他想象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来决定的。这种自我观念有三个主要因素:“我们的形象在别人的想象中怎样;他对那种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诸如骄傲或屈

辱。与窥镜相比简直不能提出第二个因素,即十分基本的想象的判断。”[(1902)1968,p.90]

而且,“作为社会的人,我们是把眼光放在我们的反省上生活的,而不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水域的平静。在巫术时代,通常认为如果有人秘密地做成别人的蜡像,并用针去刺它,则那人就会遭受病痛,如果把蜡像融化,则那人就会死去。这种迷信差不多在私人本身与其社会反省之间的关系中实现。它们看来是独立的,但冥冥中是统一的,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对另一个人发生影响”[(1902)1968,p.141]。

自尊意味着一种较高的或理想的自我,这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理想的自我是在社交中由想象一个人如何看待受人羡慕的人而建立起来的。这些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同伴,但他们自己可能是理想化的英雄。别人的花园比自己的花园更为有趣,一个人总感到自己的花园需要改进;这对自我也是一样。关于这一种自尊,库利把它与歌德(J. W. Goethe)的术语自敬(self-reverence)和爱默生(R. W. Emerson)的术语信赖自己(self-reliance)等同起来。显然,这种理想自我的概念是公众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德的发展

275 在20世纪的初期,道德发展引起人们极大兴趣,以出版霍布豪斯的两卷本《道德的发展》(1906)和韦斯特马克(E. Westermarck)的两卷《道德理想的起源和发展》(1906,1980)为顶点。这些著作有着许多相同的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许多人追求一种兴趣,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著作出自文化人类学的新领域,

大部分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发展。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进步的观念是 18 和 19 世纪的特征,把道德看作是历史地被调查的自然现象是一种新的看法。现代人类学对这种兴趣已略有消退,它至少部分地是探索性的和轶事性的,这些论题可以用更严格的方法来处理。儿童的发展和人种的发展之间的类比,用 19 世纪的口号来概括,即“个体发生重演了种系发生”(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这一说法已被否定。而且,把原始人看作像儿童般天真已被诬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然而,根据我们的观点,忽略这条思路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它可以把其历史上的重要性包括在内。

作为这一观点的代表,我们将提及杜威和塔夫特的《伦理学》(1908),这是那时一本很普及的课本,大多数大学生都选修伦理学课程。该书取材于鲍德温、霍布豪斯和韦斯特马克的第一卷。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讨论。

ethos 和 mores 这两个术语,按照习惯,是伦理学(ethics)和道德(morals)这两个词的词根。在原始社会,习惯与道德标准之间是没有差别的。原始社会中的品行大部分是由集体的习惯和一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来决定的。当有人违法时,整个集体都负有责任。品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来自本能和基本需要。它可能导致符合道德规则的行动,但这一层次并不是由道德判断来指导的。它的动机是位于道德目的之外的。第二个层次是由社会标准来控制的。这是习惯和社会动机的层次。行为只含有第一个层次的品行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即便在野蛮人的生活中,社会动机也是占优势的。在原始社会无需通过体罚来使标准得以执行,因为凭借禁忌、宗教仪式和公众的意见就足够了。276 第三个层次是良心层次。在这一层次里,品行是社会的和理性的;它是要受到考察和批评的。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做

的事情导致了合理化和社会化的努力;它们不一定是道德的,但它们是必要的先行者。预见能力、冲动的控制、目的连续、建立习惯等等开始都是为了去实现非道德的需要,然后形成道德的基础。

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的进化,有许多因素需要和导致社会协作,诸如劳动的演变、艺术和手工艺,甚至战争。战争导致了勇敢、效率、权力意识和成就。艺术和手工艺把秩序或形状的概念用看得见和听得到的方式体现出来。分工走向合作,这使家庭生活增添了同情与和睦。有些情况表明集体标准的重要性,并使集体控制自觉化。它们包括青少年的教育、调节冲突的利益、约束集体中难以驾驭的成员、危机和危险的偶发原因。

道德进展的发生是权威和集体利益与个人的独立性和私利之间冲突的结果。道德成长的原因是秩序与发展之间的张力,习惯与改革之间的张力。个人主义发展的最先结果可能是标准遭到破坏,但个人主义是道德发展的条件。导致个人主义发展的力量是经济力量。农民不像猎人,他们必须为遥远的未来种植;因而需要预见和计划。与别的集体的贸易导致了交换货物,也导致了交换思想,使集体中的成员有可能扩展活动的范围。科学通过对一些以习惯为基础的信念表示怀疑而导致个人主义的发展。艺术和工艺不仅创造可能导致变化的有用制品,而且由于鼓励技术可能进一步促进个人主义。在导致个人主义的许多心理力量中有着对性生活的要求和兴趣,有着对占有物和私有财产的要求,有着对荣誉和社会声望的欲念,并且还有着为了权力或为了自由而进行的奋斗。而宗教在其效应方面通常是保守的,为了宗教自由而斗争是由宗教成员来进行的。

希伯来人和希腊文化均对现代世界的道德发展有所贡献。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良心是与上帝的意志相联系的,在希腊文

化中,良心是与理性标准相联系的。犹太先知者赞美公道,而希腊哲学家则颂扬测量与和谐。智慧或顿悟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主要德性,而在犹太《圣经》中,对上帝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

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契约代表了一种超越习惯的道德进步,成为道德准则的根源。宗教准则成为个人神性的指令;因此,过失是个人不服从,不是家庭或集体的倒运或责任。上帝的指令不是武断的而是公道的。赎罪与和好的观念引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公道不仅是遵奉一套规则,而且是一个精神问题。精神要不断地重建,并有更新的可能性。公正、爱情、和平成为犹太人的社会理想。看到他们的统治者一方面是宗教仪式的热情奉行者和传统宗教的保卫者,另一方面却贪婪、压迫人民、垄断土地,这就导致了更为抽象的和经过验证的、超越了宗教仪式和习惯的道德。

在希腊人引发冲突和促进道德的许多事情当中有上帝的故事,体现了从没有宗教信仰到凶杀的各种人类罪恶。看到暴君统治许多希腊城市也引起了非宗教的权力问题。一旦什么是好的或公正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单凭传统的说法已不能成为答案。

让我们随着杜威和塔夫特来看柏拉图的《共和国》。我们发现了该论题的一个早期观点,即个人内部力量的拟人化,这在米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得以重现。柏拉图不断比较个人与国

的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到达,而是作为一种形式存在于上帝心中,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可以作为一个模式。

当我们抛弃作为真理的最后检验的传统,而把它与自然对比时,引出了一个问题,自然是什么?有些希腊哲学家,如犬儒学派、昔勒尼学派(Cyrenaics)或享乐主义者,感到社会是人为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形式。对享乐主义者来说,愉快就是好的,一个聪明人以找到最纯粹的和最强烈的欢娱为目的。然而,对亚里斯多德来说,任何事物的真正性质,包括人在内,不是在它的原始的开端中找到,而是在它的完备的发展中找到的。政体的存在使生活美好;所以国家是一种自然机构。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他的最高的和真正的性质是在社会中造就的。

对坚持真理和坚持理想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进行比较,代表了对道德思想的贡献,杜威和塔夫特步其后尘。这种对比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因为官方对柏拉图的教师苏格拉底的处死使他们不可能把存在的国家与理想的国家等同起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有一种人类向理想发展的观念,并认为国家应促进这一发展,但实际的国家可能不这样做。

在希腊诗人当中,良心最初主要被看作是复仇女神(神罚的一种外部象征)和爱杜士神(Aidos,尊重公众意见和敬重神的权威)两者的混合。后来的诗人加上了类似于性格与责任的见解,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抛弃他真正的自我,也不应该做违背良心的事。

279

现代社会是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加上其他因素进化而来的,罗马文明提供了政府、法律和权利的概念。基督教产生于传统,同时反映了其他一些传统,诸如日耳曼的传统和凯尔特(Celtic)的传统。大学的兴起,虽然最初它们是受宗教研究支配

的,但毕竟导致了辩证讨论的兴趣,这对个人主义的良心发展颇有贡献。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战斗是由于社会的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打响的;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把自然权利的概念作为一种明显的有吸引力的道德原则。

商业和艺术都具有把价值问题提高到一个明确程度的作用,要求人民自我反省什么东西对他们最有价值。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权力的冲突导致了一个对教条的看法问题,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所做的那样。18世纪启蒙运动的动力是针对愚昧、迷信和教条的。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哲学采取了反省的态度,使其本身与人类的理解联系起来,因而也与人自己对知识的贡献联系起来。普遍的教育、印刷的发明、把《圣经》译成拉丁文,所有这些,在人民中都有普遍提高选择和判断的作用。知识和智慧是良心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希腊文或拉丁文里,正如在法文中一样,良心这一词跟自觉一词是无区别的。

当自觉的道德由习惯的道德进化而来时,其中具有深意。在经济领域,人们不但掂量价值,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价值的尺度和出售的价值。这一见解导致每个人对自己有一种观念,认为自己的价值要比能使他满足的事物为高,因此导致对性格本身的估价。在司法领域有类似的深意。按照杜威和塔夫特的说法(1908, pp. 182 ~ 183):

在公立学校和法庭里,人们学会了谈论和思考权力和法律、责任和公正。用这些道德术语代替法律术语,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把整个过程作为一种内部过程。人必须自己确立一个标准,认定它就是“法律”,用来判断他的行为,使 he 对自己负责,并行事公正……单单一个人就能兼立

法者、法官和陪审员,也可以是原告或被告,这表明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具有激情、欲望和个人利益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具有理性和社会性的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不但感觉到他的个人利益,也承认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不但感觉到激情,也反映法律的权威和服从职责的呼声。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成员那样,他发现自己的德行的范畴内不仅是一个臣民,而且是一位统治者,他感到做一个人的庄严。

由于来自习惯道德的反省和道德的成长,个人在道德水平上的差距大大地增加了。由于生活的道德因素是从风尚、商业、政治和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的,由于道德需要在更深的意义上反省,由于反省的道德导致了与社会的冲突,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是综合地起作用的,因此不仅在创造性的预言家身上,而且在无节制的男人和女人身上也显示出差异。后者认为可以蔑视道德法律,法律是约束庸人(*philistines*)的,而他们觉得自己要优越得多。因此个人主义和道德进步的影响是把有些人提高而把另一些人降低。

犯人的罪恶和粗俗的利己者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其他人的目的和意愿的;利己主义者和每一个站在利己一边的人的罪恶是忽视其他人的利益;议会改革运动的鼓吹者和慈善家的罪恶是试图“促进社会福利,但其方法未能利用积极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合作”(p.303)。只有在现代,这种精神上的自私自利才被认识,例如,在易卜生(*H. Ibsen*)晚年的几出戏剧中可以看到。

281 杜威和塔夫特批评了直觉主义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直觉主义的伦理学只根据善意或动机而不是根据后果来判断道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只根据后果而不是根据动机来判断

道德。他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达到一致。真正的善意要求考虑后果,要想在没有意图的情况下作出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要想在没有善意的情况下进行那些能带来理想的活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传统学派只体现最高伦理理想的一个

在最高伦理阶段,霍布豪斯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人格,他把权利也包括在人格之内,权利是一个人生来就应享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人格是与把个体作为一个穷苦阶级的成员加以制服不相容的。由习俗和禁忌来控制的原始群体是不知道人格概念的。霍布豪斯的概念是在双重意义中发展的。他不仅把道德看作是发展,而且他看到自我发展的最高理想。所以,像杜威和塔夫特一样,霍布豪斯看到了作为伦理学的最高阶段类似于我们的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

麦独孤:本能心理学

麦独孤(W. McDougall)早期学医,作为人类学者工作了一段时间,建立了一所实验室,对实验心理学作出了贡献。可是,我们这里要叙述的贡献是哲学的理论而不是实验室的传统。正如我们将来看到的那样,比起弗洛伊德来,在他的资料和经验与他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明显的。

麦独孤认为,他对性格发展的描述是最新的和独创的,尽管他忽略了他的大作《社会心理学导论》的有些部分,该书1908年出第一版,后来已经修订和增补。他说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德性。伦理学,连同社会科学,是以两个主要类型的虚伪的心理假设为基础的。一个类型认为良心是一种特殊的官能、本能或直觉,诸如康德的绝对命令。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享乐主义,该学说认为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是唯一的和普遍的动机,它是

283 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至少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心理享乐主义,往往会混淆不清。如果过去的快乐和痛苦提供动机,则这一理论可能是一个机械主义的理论。如果未来的快乐和痛苦提供动

机,则这一理论包含目的。另一个选择完全取决于当前的快乐和痛苦。麦独孤否定所有形式的享乐主义。饥饿的人渴望牛排,情人渴望他的伴侣。这两种愿望都不是快乐本身;相反地,快乐乃是实现他的愿望的副产品,正如痛苦是愿望受挫的结果一样。而且,享乐主义混淆了快乐与幸福,或者说混淆了幸福与快乐。只有儿童、发展停滞者和人格不完善者才会完全受一时的快乐和痛苦所支配。高度发展的人和更为整合的人格,更能承受愉快过程中发生的痛苦,就像潮水表面的涟漪一样。对这种特殊官能的良心学说进行反驳的意见在于它几乎不考虑发展,它引出了一种在动物行为中并无对应的品行的解释。麦独孤像弗洛伊德一样,转向本能或直觉的冲动(Triebe),借以寻找各种解释,容许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的连续性。

麦独孤把动物的本能和人类的本能都看作是有目的的行为(这一定义是与有些现代生态学家的定义相似的)。每一本能包括一种知觉的倾向、一种独特的情绪,以及一种反应的模式。情绪和目标相对固定的,但其他因素在为目标服务时是可塑的,因而从属于学习和改变。他的本能表随时变化,但包括再现、逃避、爱群居、好奇、吵架、获得的本能等等——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特殊物种目标定向的行为。人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因此,在唤起本能时有一种循环的行为解释,但也许不会超过享乐主义的解释。麦独孤批评鲍德温关于模仿本能的解释。被模仿的动物几乎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因此,没有特定的目标的模仿就不可能是一种本能。麦独孤赞同弗洛伊德把本能作为行为的主要原动力,并且看到所有行为的目的,甚至梦和神经症症状。可是他抱怨说弗洛伊德把性本能和爱情混淆了。对麦独孤来说,情操和本能是分开的。他遵循桑特(A. F. Shand)的说法,把情操定义为“一种集中于某个目的的有组织的

情绪倾向系统”[麦独孤,(1908)1928,p.105]。情结是一种与病理学相似的东西,情操则是作为人格的半永久性部分来构造的。

麦独孤概略地描述了道德行为通过的下列阶段(p.156):

(1)本能的行为阶段只有通过痛苦和愉快的影响来改变,痛苦和愉快是在本能的活动过程中偶然经历到的;(2)在这一阶段中,本能冲动的操作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影响来改变的,奖惩或多或少是由社会环境来决定的;(3)在这一阶段中,品行主要是由预期社会的赞扬和谴责来控制的;(4)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品行是由行为的理想来调节的,它使一个人按照他认为是对的方式行动,而不管他眼前的社会环境的赞扬或谴责。

个体的发展或多或少概括了人类社会的进化。麦独孤还考虑到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一定范围的个体差异,虽然他并未强调这一事实。关于最低阶段,他说(p.154):

毫无疑问,即使在文明社会,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低类型的个体,他的行为很难升到这一水平之上。不论达到怎样的概念思维能力,为眼前的欲望所服务的仅仅是直接地从某种原始的本能冲动到另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他可能在追求他的目的时表现出某种狡诈的品性,可能在为这些冲动服务时形成某种习惯,也许当着陌生人的面表现出习惯性的谨慎,而对他不怕的人表现出习惯性的粗暴。他没有责任感或义务感,没有自我理想;他对自己或别人只有起码的感情,没有特性,无论好或坏,用恰当的字义来说,不能真正做决断。

麦独孤从人类社会的比较神秘的较低水平中看到了较高水平的起源。非常强烈的本能冲动怎样才能通过较弱的理性和道德理想来控制呢？他抛弃了能赋予愉快和痛苦的良心或学习这种特殊功能的解决办法，并根据本能冲动和组织感情来制订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进入德性的要素中有自我的观念和各種本能。自卑本能和相应的屈从情绪在解释羞愧和忸怩时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在儿童甚至狗身上观察到。具有仁慈情绪的父母的本能是一切利他主义的根源。柔情不能与同情混淆，同情是一种分担情感的愿望。积极的同情基本上是利己的，寻求自己的满足。它不是利他主义的根源，正如培因和其他人所宣称的那样，但它在形成利他主义和刺激社会合作方面是柔情的一个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且，随着权威的影响，同情解释了从奖惩控制的阶段到赞成和不赞成控制的阶段的转化；毫无疑问，自卑和群居的本能是起作用的。

父母保护孩子是柔情与生气联合的愿望，生气是从爱吵架 286 的本能中派生出来的，是一切道德义愤的萌芽。道德上的义愤，连同复仇的情绪，是正义和民法的根源。

一个人要达到最高的道德水平需要他的居支配地位的情操，即关心自己的情操，它是从突出自己的本能中派生出来的，类似于积极的自私情感。自尊总含有希望别人赞成的混合愿望，部分因为我们的自我观念总是在社会关系中发展的。关心自己的情操发展到一个人的家庭和较广泛的社会群体，诸如社团或国家，导致准利他主义，这是人的道德特征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导致情感生活的丰富和个人动机的控制。

一个儿童一旦超越自己的家庭限制，他就遇到赞成和不赞成的冲突标准，这在受刻板习俗控制的原始社会是不会发生的。

像杜威和塔夫特一样,麦独孤发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杰出人物的道德进步和芸芸众生的某种道德退步的可能性的原因。德性在其最高水平并不根据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的赞成或不赞成,而是根据对抽象道德原则的忠诚,我们关心自己是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利他主义还是不够的;自我批评也是性格最高水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情绪和情操是在最高的道德层次上达到一致的,即争取实现诸如正义等抽象的理想。

287 婴儿的活动在某种几乎机械的意义上是由本能引起的。只有到他能够描述他自己的目的,他的行为才能由那些目的来指导。最初,目的是即时的,并且往往是相矛盾的。“随着统一人格的发展(即清晰的自我意识、始终如一的理想行为,以及为这种自我和为这个理想的强烈的情操),这些越来越为一个单一的强有力的最后原因即自我理想所取代和控制。”(p.226)因此,人类性格的最高类型表明,它们是从与动物分享的本能倾向中发展而来的。

米德:社会行为主义

米德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1896年和杜威一同进入芝加哥大学。他对心理学的不断影响大部分是通过他对社会的影响而来的。他的思想也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沙利文(H. S. Sullivan),沙利文在米德任期时是芝加哥大学的医科生。由于米德的著作,像沙利文的著作一样,大部分是死后才出版的,所以他的影响并不总是易于追踪的。

虽然米德受到鲍德温的影响,特别是把自我的起源作为社

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但他并不接受鲍德温关于模仿本能的解释。米德认为(1934),假定我们有一个现代的对别人活动的方式所做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通过看到别人同样的行为来触发的,那是荒谬的。他也不同意把中枢神经系统看作是类似于电话交换台;这里也是追随了杜威有关反射弧论文的论点。即使我们不知道整合在哪里,神经系统仍然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活动。而且,有机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选择他自己的环境,也就是说,凭借他的敏感性来选择他的“刺激”(stimuli)。米德的主要动力是反对这种观点,即每个人被囚在他自己意识的牢笼内,叩着墙壁来跟其他犯人通话。

米德对模仿行为的解释是基于循环反应的观念。社会行为对心理、自我或意识来说是先行者。社会活动可以用来分析一个人(或动物)的姿态,与别人的调节,所有这些都与使活动具有意识的某种结果有关。当传递者对姿态进行反应时,一个姿态是一个有意识的符号,接受者也同样如此。用语言表达的姿态独特地适合于成为有意识的符号,因为我们能像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一样听到自己的声音,反之,我们却不能像别人看到我们一样看到我们自己。模仿尤其是语言姿态的特征,从性质上适合于循环的反应。

288

当我们学会了用别人的观点来描述我们自己时,心理和意识就产生了。这样,行为、社会活动,都逻辑地和暂时地先于意识。意义不是一种独立于社会的观念或意识状态,而是在经验中构成的。符号化构成客体;语言并不仅仅代表已经存在的东西。符号化的结果是自我,它在一个人具有自我意识时出现。

人们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自我的演变。在游戏时,年幼儿童有时交替地扮演几个角色;有些儿童有想象的游戏伙伴。在任何情况下,儿童不停地跟自己的“手势会话”。在有组织的游

戏时,即较后阶段的特征,儿童必然含蓄地采择游戏中每个人的姿态。不同的角色相互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关系。规则是享受游戏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自我的演变中,一个孩子首先采择别人的特殊观点,后来采择概括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观点。社会过程或社团把行为看作是概括化的别人形成的一个控制因素。“游戏中做的事情影响着孩子的一生。他继续采择他周围那些人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那些控制他和他所依赖的那些人的角色。”(米德,1934,p.160)

当然,儿童不可能把父母的全部人格体现出来。他只扮演相应的角色,因为父母的人格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它们也是在游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的,但由于后来的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因此其本身结合了各种角色。幼儿本身还没有那样的复杂性,也不了解他的父母存在这种复杂性。当孩子用父母的方式对待洋娃娃时,他的初现的父母态度是由他自己的依附需要激发起来的,正如父母的反应是由他的需要激发起来的一样。因此,所谓模仿,在这种事例和其他一些事例中,只是自我激发而已。

米德用宾语的“我”(me)来代替传统的、习惯的、体现了其他人观点的自我,因而主要类似于邻近社会的其他成员的自我。所以,主语的“我”(I)或“自我”(ego)总是存在某种无法预言的和自发的东西。由于这个缘故,也因为每个人用他自己的标准来阐述概括化的其他人,因此米德要比鲍德温更有效地容许个体差异。

米德的观点认为在社会经验之前已存在一个自我,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自我中心来自对别人观点的采择。米德说(p.223):

在捍卫心理社会理论中,我们捍卫一种机能的观点,它

对立于任何形式的实质的或本质的观点……我们反对一切脑内决定或皮内决定的观点，正如反对它的性质和地点一样。因为从我们的心理的社会理论出发，心理的领域必须是同……社会关系的策源地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这是由它预先假定的，并从中崛起或问世。如果心理是社会化地构成的，那么任何特定的个体心理的领域或地点必须伸展到构成它发展的社会活动或社会关系的机构；因此个人有机体的表皮无法限制它所属的那个领域。

结 论

尽管自我发展的概念作为发展序列的性格学的踪迹是现代的，但成分是旧的。大多数观念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是许多人当中的第一个，那未免莽撞。性格学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理想自我的概念和道德发展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道德发展的阶段可以追溯到亚当·史密斯、培因、鲍德温、霍布豪斯、杜威、塔夫特和麦独孤。具体的阶段一类型为各个学者生动地描述：穆勒的遵奉说、鲍德温的自我保护阶段、麦

290

独孤的冲动类型。亚当·史密斯和培因的同情、鲍德温的模仿，被作为解释自我发展的动力原则。后来的一些学者争论说这些描述是过于简单或错误的。穆勒承认某种同情作用，但是正如麦独孤和霍布豪斯一样，他意识到良心起源的复杂性，包括和复杂愿望相异的一些因素。所以，良心部分地发源于和其本身相反的因素。

发展的模式来自 19 世纪哲学和生物学，后来受达尔文发现

的影响。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进化为斯宾塞所预料,并且也为 18 世纪不可避免的进步观念所预料。黑格尔的辩证发展模式特别适用于心理的和社会的进化,而且完全不同于生物的模式。究竟是根据分化与整合的发展模式来考虑自我发展,还是以革命的或辩证的成长模式来考虑自我发展,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循环反应的观念可以在鲍德温、杜威和米德学说中找到。鲍德温的个人成长的辩证法为亚当·史密斯所预料,并且为米德详尽阐述。自我的社会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史密斯、鲍德温、库里和米德是这一概念的主要根源。由于库里和米德两人影响了沙利文,沙利文特别把麦独孤的关心自己的情操作为他的自我系统的根源(沙利文,1925),因此,本章的历史直接导致了第五章的概念。

291 人与国家之间的类推,言外之意也即个体官能的人格化,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杜威和塔夫特明确地把它看作为个人复杂性的根源。在米德看来,官能的人格化与鲍德温的个人成长辩证法的结合成为角色的对话。在第十四章,另一种官能人格化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晚期著作中发现,它是被批评为特别不科学的精神分析的一个方面。历史的观点表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这一方面缺乏独创性,较为深奥,而且比起他的批评家的观点来更为正统。同样的思路将表明精神分析要比沙利文愿意承认的更具人际关系。

在 20 世纪早期,麦独孤为本能内驱力对行动的影响辩护,杜威和米德为环境的影响辩护。杜威、塔夫特和霍布豪斯提出大量的历史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今天是不大谈到的,即便是那些代表环境论者或情境论者观点的人也不大谈到这些影响。

从 1900 ~ 1920 年,至少有四个心理学学派与我们的论题有

关:自我理论、本能理论、反射理论,以及建立在愉快和奖励基础上的学习理论。鲍德温、杜威、米德代表自我理论;麦独孤代表本能理论;反射理论以巴甫洛夫(I. P. Pavlov)和华生(Watson)以及其他人为代表。高(Z. Y. Kuo, 1921)是巴甫洛夫和华生的支持者之一,认为本能的概念是多余的,因为本能仅仅是反射的连接。桑代克,拥有他的效果律,是联想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理论以愉快—痛苦和奖励—惩罚为基础。享乐主义的联想主义和反射理论是元素论和还原论,而自我理论和本能理论则是非还原论的。

上述思想学派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把自己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虽然麦独孤讨论了性格发展,正如自我理论家所做的那样,鲍德温假设了一种本能,也即模仿。麦独孤批评了高,认为作为反射连接的本能即便在低级动物身上也不存在;本能总是有目的的行为。低级动物行为的刻板是由于它们缺乏智慧,并不是由于它们受本能的支配。麦独孤批评了弗洛伊德,认为他假设本能的存在,同时又假定了一个享乐原则。如果有本能的话,他们的满足自然产生愉快,那就不需要作为一个外加的原则来假定。 292

对一个思想学派一开始就假定反射弧是行为的基本单位,加上享乐原则,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本能激发的,认为自我控制了达到能动性的道路,对此我们将怎样看呢?所有这些元素,来自四个相互对抗的方法,能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找到,虽然他从未严格地试图把它们组织成一个连贯的描述。雷帕普特(D. Rapaport, 1960)试图把所有这些作为元素来构思一个系统,但他或任何其他人都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些不一致使得受弗洛伊德很大影响的沙利文为他的精神病学理论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和新的立足点。

不像美国的行为主义者,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那时自我(ego)和自己(self)的术语是受到禁忌的,那时还没有这种概念。然而,精神分析的最初动力竟废黜了自我,并重新强调本能,把无意识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裂时,他宣称阿德勒是一个自我心理学家,认为回到那个观点就等于放弃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无意识心理学。后来,弗洛伊德大力强调自我,提出新颖的自我活动和自我成长理论,但他的信徒对这一转变的反应很慢,许多人从未对他的自我发展理论予以充分的承认。有关弗洛伊德的思想总是有分歧的,因此允许可供选择的观点。

293 与弗洛伊德相比,麦独孤是一个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严肃的理论家。当然,弗洛伊德知识渊博并富有创造力,他也比较接近于现代科学的精神,对此,贬低他的人并不承认。麦独孤创立的社会心理学并不遵循弗洛伊德的实验室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要素是,或者可以构思为,科学范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可以和现代最好的科学理论比较。弗洛伊德从未严格地综合他的理论,他死死纠缠反对的理论到了荒谬的要求。另一方面,他有一种意识,即把他的理论与他的实验室研究和他的临床实践结合起来,使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达到一个新的复杂水平。然而,人们必须通过表面才能看到这一意向。

在根据这一观点评论精神分析之前,我们将讨论某些发展的理论,并在这样做时探究一下现代科学中范式的观念。

我在为本章选择哲学心理学的有关内容时,曾考虑引用一些为当代自我发展的问题进行预示或打下基础的学者的观点。尽管有些学者在撰写阶段或者甚至撰写成人类型时,仍旧保留了儿童期的正常阶段,但充分发展的阶段—类型概念是找不到的,也没有任何学者贡献出一种研究的技术。早期的学者要比

许多现代阶段理论家更关心发展的动力，这种关心直接来自精神分析。我们没有必要全盘接受哲学前辈的所有见识，以便承认我们的原始资料有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或者看一看他们要比我们同时代人甚至现在的人聪明多少。

第十二章 范式:稳定性问题

294 如果一般的发展规律足以解释自我发展,那么也就无须揭示新的规律,这倒是非常省力的。因此,在着手探讨我们的课题的理论方法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看皮亚杰关于一般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智力发展的思想,以及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

皮亚杰论发展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就皮亚杰对心理学的贡献做了部分阐述,第四章涉及他的阶段概念;第七章就认知发展做了零星的观察;第五章则讨论他的有关道德发展的概念。本章将着重研究
295 他的有关智力发展的观点。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1936),婴儿的行为是通过一些基本的反射模式的练习而得以精确起来的。一些比较完备的运动模式,诸如吮吸反射和抓握反射,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出生后几天或几星期才出现的。在此期间,吮吸和抓握反射开始与喷嚏和哈欠反射区分开来,并使之长久地保持不变。吮吸和抓握反射是皮亚杰用来描述活动图式[简称图式(scheme)]的例子。儿童把每一种图式都用于他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情中去;凡是能够吮吸,能够抓握,或者能够注视的,他都想做一番尝试。因

此,每当图式用于新的活动时,图式本身也受到影响,从而不断变化。

如同反射转化为感知运动图式一样,感知运动图式又逐步转化为智力。感知运动的协调是儿童智力的起源和核心。儿童的智力是一种适应,其间包含了同化与顺应两种互补的方式。皮亚杰把图式的运用称作同化,意指简单地重建和运用新客体的关系。他把图式的改变以适应新的现实称作顺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截然相反的过程,但在图式的真正实施时,它们又是同时发生的。同化与顺应描述了图式和世界的关系;图式的内部结构是它的组织。同化有三种类型:再造性、概括性和再认性。再造性同化是指用同一图式构成同类事物;概括性同化旨在扩展图式的适用范围,例如吮吸拇指或玩具等。再认性同化则指婴儿开始能在重复的动作中加以区别,例如,在感觉饥饿时拒绝吮吸手指。

通过练习,图式日渐抽象并得以内化。当幼儿吮吸或抓握更多不同的物体时,便获得一种与可吮性和可握性的概念相等的感知运动。于是,刺激和反应的概念不再彼此孤立地存在,感知运动图式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运算,除非有机体有一个为反应做好准备的结构,不然的话,就无法对环境或刺激作出反应。因此,首先,对婴儿来说,不存在新的客体;存在的只是他的图式里具有的客体。^[1]对他来说其他客体并不存在。 296

对皮亚杰来说,图式的存在表明它们的重复;当一个图式活动时,它脱离了一种真空状态的觉醒,借助它本身的重复,开始汲取知识。由于重复终究不是原先的翻版,所以儿童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每一个图式试图同化它周围的每一样东西。这样,就有了几种图式并存的可能;运动的物体可能引起吮吸、抓握和观察。最初,这些活动只是在不同的图式里同时进行的,但

久而久之(起先,可能纯粹出于偶然),几种并存的图式开始相互同化,并且有机地协调起来。随着不同的图式的协调,儿童逐渐为自己建立了独立于他的活动之外的客体世界。皮亚杰通过儿童寻求被手指遮盖的玩具这一实例证明,即使没有看见或触摸到玩具,他也开始知道玩具依旧存在。

在儿童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即皮亚杰称之为第三个感知运动阶段(third sensorimotor stage),儿童开始了“使有趣的景象得以延续的过程”,在这之前,他们似乎并不表现出对新奇事物的兴趣。然而,到了这一阶段,新颖的东西对儿童来说具有吸引力,他试图进行延迟模仿。不过,他的反应仍旧使用原有的图式,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他都要抓握一下,吮吸一下,或踢打和注视一下等等。这一反应表明内部活动的开始。

297 皮亚杰称之为真正智力的东西需要向意图迈进一步,即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逐渐分化。这样,到了第四个阶段,儿童就能运用一个图式以便激活另一个图式,例如:移动某个物体,以便获得另一个可以摆弄或吮吸的物体。

从感知运动阶段向实际的智力活动过渡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儿童能够呈现并不在眼前的事物(皮亚杰,1937)。典型的实验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儿童看见玩具或其他什物被装进一只盒子里,接着,把这盒子放置于一遮盖物背面,再空着取出来。于是,他就挪开遮盖物,拿到了要找的东西。现在,儿童眼见玩具被置于盒中,又由遮盖物A处移到B处再移至C处。我们暂且把这三处假设为贝蕾帽、睡枕和手绢的背面。他是去A处,即最先发现玩具的地方,还是直接去C处,即最后被放置的地方?一旦他学会了去C处寻找玩具,皮亚杰认为,他知道了客体的永久性,而不管空间的转移,请记住,儿童只看见装玩具的盒子的移动,而没有看见玩具的移动。

顺应的原型是模仿；同化的原型是游戏(皮亚杰,1951)。从模仿现有的榜样到模仿记忆中的榜样,这一模仿的发展表明,儿童逐渐形成了心理表象。在游戏中,儿童很容易将当前的情境同现有的图式联系起来;这样盒子就有可能被同化到床、卡车之类的图式中去。于是,游戏就有了象征性意义。当同化和顺应达到相对平衡时,也就产生了有意义的活动。

客体的建构只是解决世界的客观性和自我知识的第一步。后者的不变性包括空间的、时间的、物质守恒的、重量的等等。与这些成就相对应的是,儿童日渐摆脱自我中心的束缚,也就是说,他学会了用别人的观点来看问题。

皮亚杰认为,智力是图式协调的整体,它是随着不断的练习而得以发展的。广义地说,感知运动图式是运算,但是从另一意义上说,它们先于真正的运算,并为真正的运算提供准备。实际的智力是前运算的,并且经具体运算而逐步演化为形式运算的。在某种意义上,感知运动图式是连续统一体的一端,而形式运算是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然而更广义地来讲,运算又隶属于图式。同样,运算可以视作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感知运动图式则可以视作一个基本实例。 298

儿童的大多数知识是通过偶然的智力练习而不是直接的传授获得的。对于他所处的国家或州的首府名称,他可以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但这与涉及到州的性质等问题的整个知识结构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从后者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奥尔巴尼是纽约的首府,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我们很少教儿童把今天说成是昨天的明天,但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时间的结构,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词的理解先于相应的不变性。一个3岁的儿童知道相同和不同的意思,但时隔几年,仍不能对质量守恒问题作出正确的反应。例如,向儿童呈现两只用黏土捏成的

球,然后,将其中一只搓成又长又细的条状,他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不再相等。他或许因为一个球“长些”而认为它大,另一个球“细些”而认为它小。只有当他把这两种因素同时考虑,构成一个更加复杂的运算,才有可能意识到守恒的涵义。

皮亚杰的平衡(equilibration)这一术语同心理学体系中的体内平衡基本相符。它是一种内部调节的内在因素。平衡这一术语涉及到内在的逻辑,涉及到阶段的深层结构及其稳定性和演化的逻辑。这一术语意味着某些发展时期包含了一个自我维持的内在一致性;这些时期可以分别用阶段来加以划分。其他一些时期则具有内在的可变性,只能是过渡时期。平衡往往出现于感知运动阶段的结束和具体运算阶段的时候;然而,完全的平衡只有到青春期方才得以出现,也就是说,当儿童可以进行形式推理时方才出现。在这一点上,他的思维是形式运算。他能够作出假设的观点,而一个年幼的儿童是不会对一个自己也不置可否的事实加以推理论证的。

纵观皮亚杰的观点,我们对智力发展中的几个渐进因素已有所识别。图式根据它们的性质被要求去练习,并且在练习过程中,通过同化来概括,通过顺应来改变。两种不同的图式的协调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图式。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新颖的事物会对儿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然而,新奇的程度又必须是适中的。如果某种事物过于新奇,对儿童来说,它就等于不存在,因为他们无法利用已有的图式体系来加以同化。图式的守恒是通过同化,通过概括、组合和顺应的逐步演化,这在皮亚杰的著作中得到相当明确的阐述。图式要求不断的练习,至于它是不是接受的,还不完全清楚。对皮亚杰来说,正如对弗洛伊德来说一样,无论如何有某种“反复的强迫”。至于什么时候顺应会导致新图式的产生,皮亚杰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复。学习和发展

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步子发生的,是否也存在独特的跳跃现象呢?

库恩论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来探索一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即库恩(1962)关于科学理论发展的讨论。库恩对一些得到广泛支持的科学概念提出质疑,特别是对那些急于把自己视作科学家的心理学家提出质疑。这一科学观点是以观察的和实验上证实的事实为基础的。300 库恩并未提出假设—演绎的模式,在这一模式里,抽象的理论是通过这些事实来检验演绎而得到证实的。他提出的科学模式以解决难题作为其中心环节。

在一些成熟的科学里,科学家对他们认可的理论总是持一致的观点,他们采取联盟,对已发现的问题、一系列可以接受的办法、适当的方法和合理的数据等等采取统一的态度。一些科学的经典提供了这样一些科学的范式,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A. L. Lavoisier)的化学、莱尔(C. Lyell)的地质学等等。许多科学家都是这些经典的信徒,同时也留下了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也许开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能解决这些问题。

库恩运用范式这一术语包含两种涵义,一是作为训练的模式,一是作为样板的实验(1970b)。训练的模式是理论、数据、方法、指导研究的价值等综合。样板则是典型的或基本的实验,或者说是一系列观察,许多继后的实验或观察是在这一基础上变化、发展和运用的。实验的样板典型地成了教授新科学家的实验室练习。他们的许多先进的训练就是学习更多的方法,用样板或更多的领域去同化练习。

301

现在,我们无法期待像库恩所说的标准科学(normal science),并且标准科学也无法处理新的、与大众观点相背的任何结果。当范式用于解决更多更新的难题时,它就需要精心制作。总是有某些难题无法或没有完全解决。一般说来,人们要么扩充或改变范式、借以适合异常的结果,要么把问题搁置一边,留待以后考虑。然而,绝不能以此为理由来放弃范式。只有在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有更好的范式出现时,才能放弃原来的范式。

最后,异常的结果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积累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易解决。这种普遍的心理压力构成了一种危机状态。处在这种危机状态,其方法是开拓新的可能的范式,其特征是对那些自以为完满无缺的范式提出基本假设。然而,当竞争的范式被提出时,却没有明白无误的可供选择的标准。每一个范式都有它自己的标准。提出竞争范式的人运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在字义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最初,每一个提出的范式在解释由此产生的实验时是最有效的,但是比起那些解释实验资料的竞争者来却很少成功。这样,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且,构成一个范式的资料不能解释另一范式的资料。一块悬在一根绳子上的石头对伽利略来说意味着钟摆,但是对早期的科学家来说却没有钟摆的规律,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钟摆这类事物。一块悬在一根绳子上的石头在当时是作为非强使性的落体来归类的。一个范式的资料是根据其他范式的不同类别有规则地重建的,但它们也可以作为简单的而不是科学的观察来分类。

起先,一个范式通常涉及到对它们本身感兴趣的资料,但是大多数科学研究关心的资料并不是内在的兴趣,而是它们和范式的关系。一些实验器具如云室、X光管是由科学家发明出来的;他们得出的资料不是必须解释的日常生活的

在成熟的科学中,竞争性的范式时期不长;一个范式得到确认后,许多有识之士便会忠实地遵循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阐述是库恩理论部分的同义反复,因为他从不认为个体能从事科学研究,以便创立一门科学。相反地,科学的创造需要团体协作,相互参照,潜心探讨。库恩对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其他当代的科学作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性观察。在某种程度上,一个范式得到公认,严格地说,并非由于科学的标准,因为科学观点应该是争论性的[拉卡托斯(I. Lakatos)和马斯格雷夫(A. Musgrave), 1970]。

302

范式的交流导致了科学革命,并使之有别于标准科学。库恩关于标准科学的观点不同于一般科学的模式,他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和培根(F. Bacon)的经验主义模式甚至相隔了一大段距离。他问道,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几乎是正确的,那么培根的拼板式的科学观点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吗?如今,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从前吸引人们加入联盟的专题文章,可是这些教科书几乎是清一色的范式。虽然它们也提供了一些史料,但这些史料并非按当时的史实出现在课本中,而是按当今流行的范式来表达的。来自完全不同范式的早期研究的指导思想就这样经常性地流失了,心理上和人际上的分歧使得范式换了一个又一个。大多数科学家竭力反对改变范式的任何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抗是不幸的,因为当一个更趋完善的范式提出时,他们的态度便成了事物前进的绊脚石。另一方面,反对范式的改革也是需要的,因为科学需要相当稳定的范式以便研究,一些看似异乎寻常的现象最终表明与范式相一致。库恩认为培根无范式的思想是与科学不相容的;而且,任何一种不受理论上前概念影响的观察,从心理学角度讲也是不可能的。

库恩关于范式和革命的观点,既影响了宏观科学,比如热力

学或量子力学;也在小规模内,比如由 25 人组成的用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的同盟,产生了作用。后者有时是“无形大学”(invisible college),他们保持联系,以通讯或互换油印材料等方式,组成一个共同体。库恩对他的解释做了详尽的阐述,但它们涉及到物理学、化学,或有关的领域,与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故大都被省略了。

303 下面两章我将讨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这是一部伟大的科学经典,创造了一个范式。库恩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门成熟科学的标准很快或随后即被有学识的人接受并举为范式。对精神分析来说,这种接受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心理学理论,其理由我们将放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来讨论。

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承认库恩所阐述的科学史,但对其中的大量细节提出了反对意见(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哲学理论上的一些细微区别非我们的视野所能及,对我们来说,出现一些争议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争议涉及到心理学和其他分支科学内科学范式的应用,也涉及到我在科学发展与自我发展之间所作的类推。主要问题是,标准科学和特殊科学或变革科学的区别是否真像库恩所说的那样大。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小型的革命,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概念修正[图尔明(S. E. Toulmin),1970]。科学家们不可能像库恩有时所建议的那样一味地接近可供选择的构架,这样就会毫无疑问地忠于他们的范式,科学势必无变革。有时新范式从容形成,但它不是由危机引起的,而是由新范式导致了危机[沃特金斯(J. W. Watkins),1970]。即便在提出基本的哲学信奉的非常时期,也存在着正常的和哲学的科学成分[费耶尔阿本德(P. Feyerabend),1970]。长期以来,竞争的范式要比库恩所认为的更具发展的科学特征[波

普(K. R. Popper), 1970]。当库恩追溯科学的早期历史以提高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时,他将无范式阶段、复杂范式阶段两种竞争性范式阶段等这三个独特的阶段合并起来。复杂范式的科学,原则上像心理学一样,除了它的各个分支必须被看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外,它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库恩提出的许多范式的定义, 304
可分为三种类型,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人为的或工具主义的范式。如果我们不问一个范式是什么,而是问它有何作用,那么很清楚基本意思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只有用人为的方法才能解决难题。

一些社会科学家采用库恩范式中的概念,却误读了他的书(库恩,1970a)。一旦误解了意思,他们便会将信奉、方式或参照构架作为一个范式的实质性东西。一些不可思议的误解有时竟会使人把成熟的范式,看作是能够通过随意的赞同或说服就能达到的某种东西。库恩认为成熟科学的基本标准是用难题的解决来代替问题的解决。一般说来,一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通货膨胀或住房问题,但没有单一的、明确的、决定性的答案。一个难题所涉及的范围狭窄得多,也许只有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才有意义,比如象棋游戏或桥牌游戏。解决一个难题,正如解决数学中的一个问题一样,可以是完善的、最终的,能使所有的有识之士都信服。当代自然科学在难题的解决中起着重要作用;联盟之间通过发表文章交流各自的发现。社会科学家则在一般问题的解决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富有意义的贡献则是发表一些包含新概念构架的书籍。

库恩(1974)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范式概念,把它降为共同的信条,就像那些达达主义者(Dadaists)或创作十二音调的作曲家的信条一样。但我相信,能将一群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信条,肯定不同于将研究道德判断的科尔伯格和他的助手或当

代精神分析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信条,因为任何一方都具有人为的性质和难题解决的方式。每当我上这些课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库恩的科学和改革蓝图,我希望至少能对其中的科学哲学感兴趣。

作为知识的一门分支科学

305

皮亚杰关于智力和知识发展的理论,最初是以对婴儿和年幼儿童的观察为基础的。事实上,他坚持认为,他对生物学的早期研究使他的思想倾向于把同化和顺应作为适应的两种基本形式,并且他随意地把他的概念用于幼儿和动物。相反地,库恩的论著旨在描述高度发展的人类智能。但是,如果我们用皮亚杰关于智力起源的模式来解释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模式,则结果就会惊人地好。

在皮亚杰看来,智力与知识是几乎相同的概念,两者都包含一系列运算;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知识即他称之为图形表现(figurative)的知识,才涉及到特殊的环境。我们所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由规则和模式构成的。科学不是由一大堆一成不变的事实构成的,或者至少不是这样;大多数科学就是一系列运算规则和模式,也即库恩的范式和样板。在库恩的理论中,标准的科学包括把样板实验的运算用于新的问题;而在皮亚杰的理论中,标准科学是用原有的运算图式同化新问题。标准科学的方法促进科学范式的发展,就像一个婴儿通过练习不断扩大感知运动图式,相互同化等等一样。

当原有范式不再适应发展的新事实时,科学改革将产生巨大的变化。皮亚杰认为,一个主要的适应可能导致一系列新运

算的发展,也就是一个新的范式。新的范式再一次运用,如此周而复始,同化更多的新问题,使之适应某些新问题。最后,当适应反复过大时,它又会被推翻。

对库恩来说,一个范式的核心是它的实验样板,也即一系列运算,正如对皮亚杰来说运算是智力的核心一样。像皮亚杰一样,库恩并没有把产品和方法分开。库恩的科学和皮亚杰的智力一样也不是静止的。它的所有作用必然导致自身的革命。 306

皮亚杰的平衡概念导致了自我保持阶段的假设。这些阶段也许只有在智力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看到。事实上,库恩的科学范式的概念是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平衡的例子。在一个特定的科学范式里进行操作的科学家尽可能用他们范式中规定的术语来解释世界。如果有可能,排除那些并不符合的东西,不把它们作为科学资料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儿童来说,他没有刺激的运算图式,因此刺激也就不是他环境的组成部分。

当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家的行为适合皮亚杰所概述的智力发展的结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皮亚杰并没有把他的视野的意图局限在他理论中的最高智力活动上。库恩应该为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把他自己称之为发生认识论者(*genetic epistemologist*)]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的科学史的观点得到了心理学的描述。库恩把皮亚杰的一些代表作进行了排列,虽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列出影响他思想发展的一些著作。然而,库恩并不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广泛地用于其他领域的模式。相反地,传统界限的阶段思想虽然受到激进的变革阶段的冲击,但它仍然存在于艺术、政治和文化领域内,并且他把那个模式用于科学领域也是一种新的尝试。由于比起艺术、文化和政治来科学被描述为是累积的和渐进的,因此,可以在科学和其他领域之间作出一种对比。这样,库恩(1970b)对我

们怎样才能挽救他模式中的某种科学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冗长的讨论。

凯利论人是科学家

307 我们已经从皮亚杰的观点中看到了智力的发展,从库恩的观点中看到了科学的发展,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作为一门智力练习的科学。在讨论自我发展这一课题之前,一个新的课题被提了出来——人是科学家。这一“个人构念心理学”的课题是由凯利提出来的(1955,1970)。凯利(Kelly)注意到,心理学家谈论他们的被试显然不同于谈论他们自己,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科学家。他提出,假定我们像赞美自己一样来赞美我们的被试,而不是仅仅把他们看作是研究的对象,用他的话来说,假定我们“把科学的行为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范式”(凯利,1970,p.7),则情境将大为不同。

凯利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他期望事件的方法而在心理上被开辟出来的。”(p.9)因此,像皮亚杰一样,他从一个人的过程开始。他不需要内驱力或动机的概念,而没有内驱力或动机,一个人将毫无活力。“一个人通过构念他的反应来期望事件。”(p.11)即便根据定义,同一个事件不可能发生两次,作为一个反应所构念的东西仍取决于这个人如何构念情境。所有这些构念的总和是他的个人构念(personal construct)的系统。一个人形成的个人构念系统不可能和另一个人的构念系统完全一样。一个人的构念是有层次地被组织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构念系统里解决所有的矛盾。

在凯利看来,人们作出选择就是去发展和扩充他们的构念

系统。决定一个人行为发展方向的是一个人对自己预示的证实与否,而不是奖励和惩罚或内驱力减弱。对凯利来说,经验的单位是:“预期、探究、遭遇、证实或不证实,以及构念的修正。”(p. 18)然而,能力不同的人在改变他们的构念时获得的经验是不同的,他把这种差异称之为渗透性(permeability)。这一术语不是指构念的可塑性,而是指他们对新事件或层次的适应性。

凯利坚持认为,每个人的构念是可以二分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人可以被看作是好的,另一个人可以被看作是坏的,尽管在后来的比较中好的可能证明是坏的。凯利有关构念系统的这一假设是有争议的,而且,对他的基本逻辑来说也不是必要的。如果说一个人选择的唯一依据是扩展他的构念系统,从而把凯利的顿悟看作是重要的依据,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凯利的观点是完全的定向过程,但它缺乏发展的基础。他的一些阐述可能已经通过对婴儿和幼儿的注意得到改变。 308

凯利将他的观点进行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理论上和临床上的应用,在这个应用过程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的角色修正:“一个人解释别人的构念过程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可能用一个包括别人在内的社会过程来扮演一个角色。”(p.22)一个人在解释别人的过程以便扮演一个与他有关的角色时并不需要精确,但他必须把别人看作是具有他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看作是一个行为有机体。

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凯利的理论作一个全面的回顾或评论,而是使它符合皮亚杰和库恩的框架。人们可能很容易把同化和顺应置于凯利的系统之中。他关于层次的概念要比皮亚杰关于阶段的概念和库恩关于范式的概念少得多。渗透性必须具有变化,而且凯利认为一个人只有改变他的核心构念才能提出问题。然而,他并不具有像平衡或范式那样精确的思想。

向 导

丹姆伯(W. N. Dember, 1965)概述和解释了某些有关动机的实验研究,这些动机涉及到各种实验动物,包括人类。这些研究表明它们和生理需要状态的降低所看到的动机不是一回事。它们反对用反应来表达。动物,特别是人类,是由于刺激物的新颖性和复杂性而被激发起来的,至少部分是如此。随着客体复杂性的变化,人类处理这些复杂性的能力也在发生变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某种理想水平,既不过于简单也不过于复杂。一个人总是在和他自己相匹配的复杂水平上选择刺激物。他选择这些刺激物,观察它们,研究它们,学习如何去获得它们。这些活动是典型的指示器,因为适应刺激本身就是一种奖励。由于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他探究的复杂水平,因此他倾向于在高于或低于他的理想水平上选择刺激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在一个比理想水平稍微复杂的水平上选择刺激物。这些刺激物称作向导(pacers)。当一个人接触向导并掌握向导时,他的复杂水平就得到发展,同时也为选择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向导作好了准备。

向导的概念和皮亚杰的最适新颖性的思想几乎一致,虽然丹姆伯所概述的实验过程与皮亚杰所概述的实验过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向导的概念也和凯利的思想密切相关,凯利认为人们作出选择是为了扩展他们的结构系统。

看来,向导是一种非变革性发展的程式或模式。它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关系,特别是和良心发展的重要关系,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讨论。

自我理论的涵义

我们从智力发展的理论和科学理论的发展中,而不是从我们自己领域的思考中,究竟发现了多少有关自我发展的理论呢?稳定性的问题,即自我功能如何随着时间的推延,不管环境和心情的变化,继续保持一致的问题,是由同化来确切地描述的。事实上,这就是沙利文的理论和梅洛—庞蒂的理论。沙利文(H. S. Sullivan)的自我系统和梅洛—庞蒂的行为结构是与皮亚杰的存在于运算中的行为恒常性的模式相一致的。自我的思想,作为一个完美的或明确的东西,对第四章提出的观点来说是基本的。非加利特(H. Fingarette)把自我的讨论作为对意义的研究在这里也是适当的,虽然像人类自我那样复杂的东西是无法用一个特征来详尽地描述的。如果我们真地把自我的观点作为对意义的研究,那么纽伯格(H. Nunberg)称之为自我综合功能的东西就不是自我要做的东西,而是自我是什么的东西[如果可供选择的话,我们遵循马斯特尔曼(M. Masterman)关于库恩范式的看法,认为专业性的问题(proper question)不是自我是什么,而是自我做什么。] 310

自我是稳定的,因为一个人有效地察觉周围环境的运算只按那些已理解的资料,从而与当前的自我结构相一致。不一致的情境是由于不适应先前的预期,也就是不适应同化,或者说不顾先前的预期。在皮亚杰的术语里,后者意味着客观情境的有些部分对一个人来说并不存在。鲍德温的选择性思维、阿德勒的倾向性统觉(tendentious apperception)、沙利文的选择性忽视都是与此相似的思想,并且是皮亚杰同化思想的一个亚集。

根据凯利的观点,即把科学行为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模式,我们可能要问,究竟到何种程度自我发展才能作为一系列范式发生,这些范式的互换导致心理紊乱。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观点是,自我发展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质变导致逐渐的量变,或者至少是很小的变化,就像智力发展一样。这一问题是该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应该夸大它的程度。相对于宗教转变来说,真正的发展必定是随着时间逐渐发生的。至于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的性质已经超出了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当这个问题发生时,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损于发展。

311 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个间断的或类范式的模式的初步证据来自这样一个独特的事实,即在成人生活中每个阶段都是可以被描述的。当成人生活中存在许多智力的等级时,大部分成人达到了皮亚杰所认为的最高阶段,也就是形式的、可逆的运算阶段。在较低阶段有某种平衡,但完全的平衡需要达到形式运算。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发展是朝着这一阶段进行的。然而,关于自我发展,大多数人稳定在远远低于和他们的智力和其他发展高度一致的某个阶段上。这一事实意味着平衡使他们稳定在那个阶段上。也许,最具破坏性的是,一个阶段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突然在一个较高的阶段上发生。而且,事实上,人们并不朝着更高阶段发展,也没有意识到朝着更高阶段发展的需要或可能性。因为产生这种思想,对他们进一步的变化来说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什么正常的人稳定在远远低于他们假设的最高水平的自我水平这一问题,相比认知水平的发展倾向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甚至讨论。向导和平衡的概念提供了下面这些假设:自然现象充当了认知发展的向导,因此最高的平衡要求达到形

式运算。自我是预期的一种结构,但这些预期不是指自然现象,而是指人际现象,只要儿童在一个和他的预期不一致的环境里进行运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证实这些预期,则他就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当儿童关于人际环境的观点和现实存在的事物相一致时,当他的预期和他周围人的行为相匹配时,平衡就有可能达到,并且变化的可能性最小。例如,在损人利己的环境中,自我保护的儿童很难产生变化。只要儿童的环境主要是他的家庭,则他的自我发展就会受到明显限制。当儿童进入社会,如果社会向他提供较高的模式,则他就有可能在一个较高的阶段达到平衡。在某些情形里,离校或工作提供了一个类似向导的较高的自我范式。集体宿舍的气氛或军队生活可能为某种水平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水平通常是较低的水平,而不是青年人业已达到的水平。这可以用来解释科尔伯格和其他人在大学早年观察到的明显的退化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年轻士兵声名狼藉的行为。根据理论和有效的观察,这种退化一般来说是可逆的。按照这一假设,父母的人格模式的效应和儿童潜在的自我水平不是由直接的教诲、模仿、强化、自居作用等等引起的。对儿童来说,当父母证实了儿童的预期时,父母的人格模式的力量是最大的。然而,父母不是一个永久的向导,他们只是一种平衡的因素。鲍威士(K. S. Bowers, 1973)和瓦切特尔(P. L. Wachtel, 1973)(见第十章)认为,人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产生的行为是和他自己以及低于潜力的有助于平衡的因素相一致的。在培养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家庭这一独特的场所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人可能把青年人看作是平庸之辈,从而助长了稳定性。唯有父母才是利他主义的,因而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提供向导和对孩子的期待促进了变化。从这些考虑可以推知,在成年生活中自我变化相对罕见,并

且,人们也看到为什么教师或治疗发疯父母的医生要为成年生活的发展提供独特的环境。罗杰斯(C. R. Rogers)关于“无条件的积极注意”的思想是治疗的条件,它和父母的内在价值一样在理论上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具有潜在的向导效应。而且,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沙夫(P. Scharf)和希基(J. Hickey),1972]关于学校里和监狱里道德发展的基本思想,即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也导源于平衡和向导的概念。

最后,选择性注意的概念可以用于其他一些有关人格的心理学理论,借以解释我们在本书多次提到的但容易忽视的许多现象。由于缺乏知觉这些现象的类别,也难以划定标准,因此人们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心理学领域的组成部分。

当科学家埋头于他们的研究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科学范式和自我结构结合起来。因此,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有些观察至少可以作为自我发展现象的一个结果和一个亚集,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运用了这些观察,但它仍然不失为自我发展的一个模式。库恩的观察在于,新的范式通常出自年轻的科学家和新的科学领域。老科学家有时不愿放弃他们习惯的范式,即便当社会变革要求新范式时,也是如此。这样,一旦科学要求变革时,个别科学家就难以适应,他们像成年生活中的一般成人那样不可能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促进自我水平。

注 释

- [1] 我遵循弗什(H. G. Furth, 1969)的做法,把皮亚杰的“schème”译成图式(scheme),而不是运用英文“schema”的译法。弗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皮亚杰在“schème”和“schema”之间作出的区分,因为“schema”一般用于图解或图示等特殊的情境。因此,在特殊的情况下,运用“schème”是比较妥当的。

第十三章 精神分析：从催眠术 到恋母情结

自我发展理论的主要部分导源于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³¹⁴的著作。然而，人们不能简单地迷恋精神分析的自我理论，而不首先考虑有关精神分析的许多流行的错误概念。同时，即便对精神分析作一个基本的介绍也需要冒险精神，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1]

弗洛伊德从未得到过既公正又苛刻的评论。有些人把他所³¹⁵说的一切都当作真理的根源。如果向他们指出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个谬误或一个矛盾，他们就会像真正的信徒一样，更加虔信这个学说的深奥。然而，也有一些人抱着批驳的态度来看待弗洛伊德：如果他们能够发现一点瑕疵或一个荒谬的论点，就会把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都抛弃，好像它只是官司场上的一个案子或一个硕大的、逻辑上一致的三段论。另有一些读者是折衷主义者，他们从弗洛伊德学说中汲取自己需要东西，并把它们和其他体系或理论中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拼凑起来。但是这么一来，却搅乱了弗洛伊德贡献中的前后一致的精髓。

有关弗洛伊德的学术著作包含着其他一些错误。在那些承认弗洛伊德持有矛盾观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声称他的本意是隐蔽的。他们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觉得弗洛伊德的本意是他们希望颂扬的真理；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本意乃是他们感到

需要与之论战的谬误。还有一种态度断定在弗洛伊德的重要发现里,除了他读过从希伯来神秘教义到让内(P. Janet)的某些新版著作外,别无他物。弗洛伊德体系中的许多成分取自民间,这些是他的某些信徒远远不能理解的。然而,正如琼斯所指出的那样,既然弗洛伊德不得不超越他的思想来源去创立精神分析,那么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观念就不仅是一种利益,而且也是一种束缚。

精神分析包括一整套基本理论;其中几乎每一个理论都未能免遭攻击,甚至遭到那些自以为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的攻击。弗洛伊德陈述的一些东西与他的思想倾向要么无关,要么相矛盾。重要的倒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精神分析的逻辑结构。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循史而行,以便寻找他的思想起源与发展。

316 我认为,弗洛伊德采用了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库恩思想的一种科学范式,即把调查方法、理论派系和一组相互联系的资料结合起来。以往还没有一个精神病学家那样做过。即使在这里,弗洛伊德也不是前后一致的,他的一些思辩著作如《图腾与禁忌》(1913)、《摩西和一神教》(1939),以及《超越快乐原则》(1920)的后半部分是全然相反的,最糟的是他几乎把自己的玄思当作观察资料来看待。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并不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病人,精神分析的基础要比那种玄思更为坚实。同时,弗洛伊德之所以伟大,其关键之一是能够容纳这种矛盾。要是一个人因为一种观念显然是荒诞的就断然加以拒绝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发现恋母情结。

作为神经学家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说过,他因为阅读了歌德论自然的文章而决定他的医学生涯的;理解他思想上终生存在的矛盾,理解他对科学既浪漫又执着的态度,这是一条线索[霍尔特(R. R. Holt),1972]。他在1873年开始学医,为了能在布吕克(E. Brücke)的生理实验室继续其研究又延长了学习。他发表了许多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方面的专题论文。不过,他对观察研究比对实验研究有更浓厚的兴趣,取得的成绩更大,这预示着他后来更重视对病人作被动的观察,而不是主动的控制。他从研究转向临床仅仅是因为他需要维持生计。

布吕克,这位使弗洛伊德拜身受业,后又忍痛离开其实实验室的老师,是许多青年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中的一员,这些青年人大多数是缪勒(J. Müller)的学生,他们成立了柏林物理学家协会,摧毁了缪勒所鼓吹的活力论教条。在这一代人中间,这个包括有赫尔姆霍兹(H. Helmholtz)、杜布瓦—莱蒙(E. DuBois-Reymond)和路德维希(C. Ludwig)的团体成了德国生理学和医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这个学派的精神可以用布吕克和杜布瓦所作的誓言来表明:“机体内除了一般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别无他力。在那些目前尚不能用这些力解释的事例里,人们要么借助物理的和数学的方法去寻找它们活动的特殊方式或形式,要么假设存在着与物质内部固有的化学—物理的力具有同等地位的,并且可以还原为引力和斥力的一些新的力。”(琼斯,1953,pp. 40~41)这样,尽管这一时代的精神是还原论的决定论,然而正是“同等地位的力”这个概念的模棱两可性使得弗洛

伊德在转变成一位心理学家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弗洛伊德对生理学和神经学的贡献足以使他从事令人羡慕的科学职业。他写过一篇有关可卡因(cocaine)的专著,对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种类的神经系统的组织学作过大量的研究。那时还不知道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对神经系统的进化和发展的知识作出了贡献。他发现了神经元理论的某些成分,此后不久,这些成分就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在他的《论失语症》(1891)一书中,弗洛伊德和当时流行的理论,即用损伤定位方面的细微差异来解释不同种类失语症的理论发生了争论。他提出了一种功能理论用以取代上述那种理论。这个功能理论基本上应用了杰克逊(J. H. Jackson)的学说,即在更为基本的能力被破坏之前,损伤的是新近获得的和并不重要的能力。弗洛伊德关于失语症的看法,与其说是他那个时代较为普遍接受的学说,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最后,弗洛伊德还出版了现今仍然被认为是有关小儿麻痹症的几部专著或若干长篇论文。

弗洛伊德对神经学所作的贡献表明他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然而,我们所关心的却是他在神经学方面的研究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例如,他在神经系统的实验室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成了他思想中一个永久的有价值的特征。杰克逊的神经病学模式,即严格分层的功能和导致退化的损伤,深刻地影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理论。

另一方面,布吕克和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导师梅纳特(T. Meynert)运用赫尔姆霍兹学派的决定论影响了弗洛伊德。正如阿玛切尔(P. Amacher, 1965)表明的那样,这两个人都深信反射弧是行为的基本单位。这种信念不纯是神经学的假说,而且是建立在由联想心理学派生出来的一个心理学的假定之上的,即

心是被动的旁观者，它接受和联结各种感受以及反应的变化。这种信念很适合柏林物理学家协会的宣言。弗洛伊德经常引用这一学说，即反射弧是行为的基本单位，好像这是一个毫无异义地发现（参阅杜威的著述，第十一章）。由于弗洛伊德刚刚作出神经元理论地发现，因此他可能把这也看作是对心理活动反射观的强化。

阿玛切尔明确指出，布吕克和梅纳特的神经学观点的另一个方面也影响了弗洛伊德后来的理论。和反射的观点相一致，但在发现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之前，他们认为神经系统的功能是把兴奋从周围神经系统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再传递出来达到肌肉。在这个过程中，兴奋的量被认为是不变的。心或意识并不决定兴奋的过程或改变它的量。兴奋可以在某些时候积累起来，直到它足以沿着特定的通路前进为止。神经系统如此活动，正如笛卡儿（Descartes）曾经认为的那样，就像一组相互联系的中空管子，而联结的法则是和流体动力学相似的。弗洛伊德在从神经学转向心理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认为神经系统的活动在于消除自身的兴奋，心力是以某种流体动力学的方式来操作的。

歇斯底里症、催眠术和暗示：某些背景

当弗洛伊德开始行医时，他的病人多是患有神经症的，尤其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女。为了了解弗洛伊德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治疗的一些背景。催眠术和暗示，或暗示易感性，这两个表面上不同的问题历来和歇斯底里症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歇斯底里症和其他神经症是

用人们在今天分别称之为暗示或催眠术的方法来医治的。

18 世纪初叶,心理治疗采用信仰法的形式,治疗是以对救世主的信仰为根据的。大多数接受治疗的人是我们称之为歇斯底里症(hysteric)患者;那时,这种虚幻的诊断用之于妇女,换句话说,用之于歇斯底里症,是司空见惯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信仰疗法专家是加斯纳(Gassner, 1729 ~ 1779),他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驱魔师。他通过激发危象也即症状的一种急性形式来开始治疗过程的。然后,他会暗示这种症状消失了,结果往往是灵验的。他的这种疗法是宣泄的(cathartic),当代的“行为矫正治疗”(implosion therapy)与其一脉相承。

麦斯麦(F. A. Mesmer, 1734 ~ 1815)以不科学为名反对信仰疗法,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却是“通磁术”(magnetism),即一种建立在类似于当时电学和磁学新发现基础上的理论。麦斯麦是一名医生,当时另有一些医生也在用磁石来治疗一些小病。麦斯麦让病人喝下含有铁质的水,然后用磁石在他们体内产生一种“人工潮”(artificial tide)。他很快就知道这些效应并不完全是由磁石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他本人发射出来的;于是他把这些效应称作“动物通磁术”。他认为,在每个人的身体内部都有一种微妙的液体,它也确实遍布在宇宙之中。如果人体内这种液体的分布搞乱了,人就会生病,如果使它恢复平衡,人就康复了。为了动用技术把这种液体从一个人身上引导或传送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激发各种危象,再将其治愈。现在用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情感协调(rapport)一词,最初就是指身体的接触。麦斯麦认为,加斯纳像他本人一样拥有高度的动物磁力,它才是信仰疗法的真正工具。有些病人在接受麦斯麦的治疗时观察不到什么效果,而另一些病人则出现痉挛或某种“危象”,还有许多人声称他们自己治愈了各种紊乱。这里,江湖医术的成分有多少,对

病理上易受暗示的病人施用暗示的良性作用又有多少,是颇值怀疑的。有时,麦斯麦被当作名流看待,有时又遭到医学界同行的反对和排斥。178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奉命对麦斯麦的方法进行调查和评价。他们不问麦斯麦是否治好了病人,却一意评价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物理流体的声明。在对磁流缺乏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把麦斯麦的医疗成果说成是“想象”,还对接受磁力的年轻妇女和发射磁力的男子之间是否存在性吸引的危险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麦斯麦已经把麦斯麦术(mesmerism)这个术语和磁力人格的概念留给了我们。有关这一历史的两个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治疗者与病人的关系所产生的力量是早已皆知的,而每一个新概念总是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原先的概念是不科学的。

麦斯麦有一个学生叫布依希格尔[Amand-Marie-Jacques de Chastenet, Marquis de Puységur(1751~1825)],是个贵族,也是一个在电学方面做过一些实验的军官。他的一些发现与一个名叫雷斯(Victor Race)的病人有关。雷斯出身农民,其家族有好几代人为布依希格尔家族干活。这一史实的另一个常见特征是催眠对象社会性地服从催眠师。雷斯是很容易通磁的,但是布依希格尔注意到在他的危象中有某些独特的特征。通磁后,他没有发生痉挛性抽动,而是进入一种睡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比清醒时更警觉。他善于接受通磁师的暗示,但一旦清醒过来,他对刚发生的事情又很健忘。布依希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良性危象”(perfect crisis);不久,他发现这种状态很像梦游症,于是就称其为“人工梦游症”。从雷斯那儿,布依希格尔了解到这种病人在催眠期间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在正常状态下难以启齿的事情,即便这些事情是受意识支配的。采用这种方法,治疗者就能为处理各种生活问题提出实际建议。布依希格尔相信,这种

疗法的作用来自通磁师的意志,而不是什么体液。

321 布雷德(J. Braid, 约 1795 ~ 1860)杜撰了催眠术(hypnotism)一词。他是反对“麦斯麦术”的,并试图揭露它的欺骗性,然而,尽管他拒绝动物通磁术这个含混的解释,后来却也承认这种现象是真实的。起先,布雷德强调感觉固恋的生理伴随物是造成催眠性睡眠的原因;后来他承认这是在引发催眠现象时暗示的效应。由于人们对催眠的兴趣随着布雷德的研究而降低,但 19 世纪 70 ~ 80 年代又活跃起来,尤其是在法国。对弗洛伊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沙可(J. M. Charcot)领导下的萨尔伯屈里哀学派(school at Salpêtrière)和南锡的伯恩海姆(H. Bernheim)领导下的一个较小的团体。在 1886 ~ 1887 年,弗洛伊德获得了一笔旅行奖学金,跟着沙可学习了几个月,然后回到维也纳把催眠术用于精神病的治疗。由于发现很多病人完全不能被催眠,或者达不到足够的催眠深度,1889 年,他又花了两个月跟着伯恩海姆学习。

巴黎附近的萨尔伯屈里哀医院和诊所是法国精神病学最重要的中心。沙可(1835 ~ 1893)像从前调查器质性神经疾病那样,从细致入微地描述症状着手来调查歇斯底里症。他指出,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相似的,并且和中世纪报道的着魔中邪的症状相像,沙可认为这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式。如同当时许多精神病学专家一样,沙可认为“心理退化”是歇斯底里症的根子。他把催眠状态看作是一种变态现象,表示一种歇斯底里症体质。虽然心理退化无法在解剖上看到,但可以通过各种症状的联系而得到证实。

铁路的出现导致了大量的意外事故,创伤性麻痹的数量也增多起来。但是,这种麻痹虽然是事故造成的,却不能表明有一种器质的原因。它们被认为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的,尽

管这还不能证明这一点。沙可认为,这种麻痹的症状不同于器质性麻痹,但与歇斯底里症麻痹相像。他对催眠状态下的病人暗示这种症状;而显现出来的症状就像那些创伤性麻痹或歇斯底里症麻痹一样。这样的症状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予以消除。于是,歇斯底里症麻痹、催眠麻痹和创伤麻痹就构成一组“动力性麻痹”,以此与器质性麻痹相对照。沙可假设,受了创伤后,出现一种催眠状态,该状态通过自我暗示助长了神经障碍的发展。 322

根据沙可的建议,弗洛伊德(1893)研究了歇斯底里症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它们有三个方面不同。首先,歇斯底里症麻痹完全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一肢或一个部分,而不影响其他。相反地,如果是严重的器质性麻痹,则会蔓延开来。其次,歇斯底里症的感觉变化(感觉缺失)比运动变化(麻痹)更为明显,而器质性麻痹恰好相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器质性麻痹的分布与神经系统的走向一致,而歇斯底里症症状却不超出通常所说的器官范围。这篇论文成了有关该课题的决定性论述。

李厄保(A. A. Liebeault, 1823 ~ 1904)是南锡的一个乡村医生。在催眠术声名狼藉的时候,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对病人进行催眠的医生之一。他用催眠术治疗患者时全然不顾症状的性质;他认为治疗就是让受催眠的病人确信其症状会消失的。

一个名叫伯恩海姆(1840 ~ 1919)的大学教授和上流社会的医生转而接受了李厄保的观点,并于1882年在南锡加入了李厄保一派。伯恩海姆在催眠术实践方面更为精细,在催眠术的理论方面更为老练。他承认,比起地位较高的病人来,催眠术对习惯于被动服从的人如士兵和工人来说是极为有效的。伯恩海姆认为,催眠是一种正常现象;他相信,其效果和清醒状态下通过直接的暗示所获得的效果是一样的。伯恩海姆还做了催眠后暗

323

示的实验:在一个受催眠的对象从迷睡中清醒过来的一个特定时间里要求他从事某种行为,被试就会在受暗示的时间里执行这个行为,而且是清醒的,完全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但是却记不得催眠者曾经对他做过暗示。这些实验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有关人未意识到观念所具有的力量的深刻印象。由于伯恩海姆娴熟的询问技巧和病人的注意高度集中,使得病人能记起他在催眠状态下所经历的事情,这也使弗洛伊德对伯恩海姆的论断,即催眠状态和正常状态之间的区分完全不像以前所假定的那样,有着深刻的印象;这样,催眠后的遗忘就不是绝对的了。伯恩海姆越来越少地使用催眠,而是倾向于更多地对清醒状态下的病人进行暗示。他对沙可的歇斯底里症和催眠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伯恩海姆认为,许多假设的歇斯底里症状都是杜撰的。由于沙可是一个有名望的神经病学家,加之他与受人尊敬的医生伯恩海姆的公开论争,催眠问题被提升到了令人崇敬的科学领域。

让内(1859~1947)在某些方面是弗洛伊德的前辈,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弗洛伊德,在某些方面他们又旗鼓相当。在他们同时在中年的时期,让内也许更为知名。如今,让内已不为一般人所知,他的一些主要著作也难觅有英文版的,他的追随者更是屈指可数。他起先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心理的不自主运动》(1889)。不自主运动的现象与催眠现象有关,它们包括不自主写字、不自主说话、水晶球占卜术等等。在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用某种方法集中被试的注意,将一支铅笔塞在他手上,并用耳语给予暗示,使他写下某个话题或问他一个私人问题。许多被试都能这样做,而且所做的回答、所写的文字,都是在意识状态或聚精会神时所不及的。让内常对无法催眠的人使用这种“分心法”(method of distraction),这种方法可以和弗洛伊德使用的自由联想法相媲美。

考虑到病人作为被试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工作的治疗意义, 324
1889年,让内为取得医学学位而开展研究。在布洛伊尔(J. Breuer)和弗洛伊德探讨《歇斯底里研究》(1895)的案例报告的同一时期,让内也在处理类似的病例并撰写论文。让内的歇斯底里症理论集中在由于病人的心理虚弱(*insufficance psychologique*)所造成的“意识域狭隘”上,心理虚弱是对当时流行于法国的“心理退化”这一概念的译述,它包括体质虚弱、身体创伤的效应和身体疾病。在让内看来,歇斯底里症状可以追溯到潜意识的固定观念,它们是人格中的自主部分,具有自己的生命和发展,即一个有助于意识域狭隘的过程。它们起源于创伤事件。当这些固定观念被发现,带回到意识中来,并被驱散后,歇斯底里症也就治愈了。但是,在其他病例中,治疗只会把潜意识的固定观念转化为有意识的固定观念即强迫观念。让内把暗示、诱导分裂和再教育作为测量来处理先前发现的固定观念。在催眠状态下,他向病人暗示创伤事件没有发生过,或者创伤事件所造成的某些不愉快的现象是虚假的。在让内看来,潜意识的固定观念,如同荣格后来所说的情结(*complexes*),虽是心理虚弱造成的,但也是进一步引起心理虚弱的原因。

让内理解催眠术中亲善关系的重要性,并把亲善关系的选择描述为病人总是对一个人即催眠师产生受暗示性。由于这种受暗示性是在知觉世界时产生的一种歪曲,让内认为它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形式。尽管受暗示最高的病人表现出最佳的疗效,但他们也最依赖于治疗者或对催眠术最有瘾癖。由于这样的病人具有内在的心理虚弱,所以治疗者应该首先照顾病人的精神,然后逐渐拉大两次疗程的间隔。

作为一个学者,让内发掘出催眠史和歇斯底里史上的很多东西,指出了被沙可和伯恩海姆发现的新现象实际上已为许多 325

早期的调查者所知道。他认为,在催眠下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即被试为取悦催眠师而扮演的角色和能够自发地展现出来的人格的未知一面。让内给他的方法取名为心理分析,他还打算在这个方法之后采用“综合法”。后者是一种教育形式,即要求病人完成一项他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然后再给予稍微难一点的任务,如此等等。

在让内的后期著作《歇斯底里的主要症状》(1907)和《心理治疗》(1925)中有两组观念与弗洛伊德的某些观念并驾齐驱,虽然这两个人似乎并不相互影响,特别是在自我心理学方面。

让内指出,歇斯底里症状是变化多端的,它们会伪装成许多其他的疾病。单一观念的梦游症是自发的梦游症,它总是涉及特殊的观念情结。在发病时,病人完全沉浸在对某一创伤事件的记忆再造之中,而不顾及他所处的真实环境。他会产生幻觉和非同寻常的能力,例如一种对他来说在日常生活里不具有的活动能力。一俟清醒后,病人又恢复了对他现实生活的意识,而忘记了梦游症发作期间的事,包括他曾再现的创伤记忆。让内假定观念的情结及其记忆是从意识人格的其余部分分裂出来的。他把这种分裂情结看作是一切歇斯底里现象的原型。

就情结的规模而言,复杂观念的梦游症与单一观念的梦游症是相似的,但却包含了不只一个的观念情结。在失忆症(fugue)中,病人会假设一个新的同一性,借以得到解脱,开始新的生活。不过他们虽然能忘记先前的同一性,却不会忘记母语和其他的日常技能。结果,一旦出现某些令他们想起家庭、住房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会回到先前的同一性,并忘记失忆期间发生的事情。在双重或多重人格的病例中,病人会反复地在两种同一性之间来来往往。多重人格的一个特征是:遗忘只有一种方式,如人格 A 意识不到人格 B,而人格 B 却完全能意识

到两种人格。梦游症的全部现象可以通过催眠术的方法再现。在双重人格中,第二人格看上去往往是更为正常的。让内假定,病人曾经有过一个正常的人格,而他现有的状态却是病态的,催眠术使他恢复真实的、健康的状态。在这些病例里,催眠治疗的目的在于延长第二状态,而把第一状态降到最低限度。最理想的是,消除所有遗忘症,使病人恢复所有的记忆。

让内描述了局限于身体特定部位的催眠症状,例如局限于中央凹周围区域的视野,这显然是为他的意识域狭隘的解释性概念提出的模式。他提出,催眠症状可能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通常的症状迹象或恒常的特征。在严格的而不是通俗的、模糊的意义上说,易受暗示性是催眠的恒常特征;是在没有意识的干预和没有意向的参与下,一个观念向一个行为的迅速转移。暗示的这一涵义与固定观念的分裂和意识综合功能的虚弱是密切联系的。让内断言,这种易受暗示性会随着歇斯底里症的治愈而消失。

让内在其晚年的著作里估计到,在大约 3/4 的病例中,创伤性事件是性的事件,并指出,弗洛伊德认为全部都是性的事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让内是在比弗洛伊德更为狭隘的涵义上使用性这一词的。让内反对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这显然是因为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关于这类事情的意识,所以他把这个概念看作是没有根据的推断。

让内始终给被弗洛伊德竭力抛弃的各种附加疗法保留一席之地,可是在他的晚年,他发展了类似自我发展的观念,它们是从属于休息疗法和功能训练的。人类的行为可以根据从原始冲动到最复杂的和充满思想的行动这样一个倾向性层次来描述。让内把“较高的倾向”描述成需要较高的紧张,这是一个略有混淆的术语,因为日常生活所说的焦虑紧张是和他称之为“较低的

倾向”的东西有关的,或者说使一个人处于这种较低倾向。

在让内的精神经济学中,另一个概念是力(force)或者是心理能(mental energy)[像弗洛伊德一样,让内没有把来自牛顿物理学中的力的概念和能这个热力学概念区别开来。力是一个矢量,具有方向和数量,能却是一个标量,有数量而无方向(见霍尔特,1967)]。凡在力大而人处于较低倾向的地方,行为往往紊乱无章。大的心理能与高度紧张有关,即与按照较高的倾向进行活动的能力有关。当高度紧张的人缺乏足够的力时,他体验到衰竭,需要休息。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刺激。让内认为,对某些人来说,长期地限制环境的刺激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性甚至会达到这样的地步,这些人可能需要永久地摒绝享乐或成功的任何希望。从他这种兼价平衡的治疗观中得出的就是这些处方。

一个创伤性的固定的观念被说成是一个未完成的动作,或者一笔需要结算但又尚未还清的债务。要完成它,取决于在创伤事件和其他意识人格之间建立起联想的联系,这就需要运用自由回忆,同时又不能变成梦游症。让内似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观点与弗洛伊德关于发泄和不断地工作的观念更为相似。

328 总之,沙可的催眠术实验直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观念能够引发,也能够消除诸如感觉缺失和麻痹等歇斯底里症状。有关歇斯底里症和器质性麻痹之间的区别性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伯恩海姆关于催眠后暗示的实验表明无意识观念能够激发活动的模式,以及无意识记忆能够原则上回复到意识中来。沙可认为创伤是神经症的先决原因。当沙可把催眠和歇斯底里症扯到一块认为是病理的时候,弗洛伊德以其对心理退化的否定和有关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受同样一组心理规律支配的信念

而包容了所有这一切。众所周知,催眠师与其病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已被弗洛伊德改变为移情的关键问题。让内向我们显示了一个有才华的但不是革命的头脑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应该做的事情。

歇斯底里研究

由于《歇斯底里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的出版,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在探究类似科学范式或原始范式的某些东西的工作。该书的第一个病例是O.安娜,她在大约1890~1892年期间是由弗洛伊德的老师和朋友,一位杰出的维也纳医生——布洛伊尔治疗的。当布洛伊尔在治疗安娜的时候,弗洛伊德仍在研究神经解剖学,但不久他就得知了这个病例。当弗洛伊德在和治疗歇斯底里患者时所遇到的困难作斗争的时候,他脑子里总是记着这个病例。布洛伊尔方法的生动与精致,以及这一病例的最终公布则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创造性。

长期以来,由于罹患严重的不治之症,O.安娜很容易陷入各种梦游状态。这时,她就想起已经发生的各种症状,追溯引发每一种症状的最初的创伤事件。当伴随着原始的强烈情绪回想起这么一个事件时,她就从相应的症状中解脱出来。布洛伊尔在一天一次,甚至一天两次为她看病时,常常诱导深沉的梦游症,借以帮助安娜回想起这些事件。

在19世纪的80~90年代,许多精神病学家运用了催眠术。最典型的是用催眠术使病人接受有关他或她的症状将会消失的暗示。催眠状态本身是一种休息疗法,特别是当它被延长的时候,被认为具有某种治疗的效果。布洛伊尔的用法则不同:催眠

只是一种手段,用以诱导发泄的再生或发泄(abreaction)一个创伤的事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写道:歇斯底里患者因为回忆往事而遭到痛苦。当激起的强烈情感不恰当地表现在行动或语词里时,一个单独的严重的创伤或一系列小的创伤就会导致一种症状。由于这种创伤的反应并不明显,例如家人的死亡,或者由于创伤本身引起的一种阻碍反应的麻痹性情感,例如恐惧,所以这种情境是有可能发生的。病源性记忆从意识的残余部分中分裂出来,因此没有一个被试受到记忆的正常影响。

当时许多精神病学家由于器质性观点的定势,对那些患歇斯底里症的妇女态度急躁或不屑一顾。他们知道这些病人没有明显的器质性创伤,也不会因其精神不安而死亡。由于这些症状会自动缓解,因此它们往往被说成是由“想象”所造成的而不予理睬。布洛伊尔、沙可、让内和弗洛伊德与大多数同行不同,他们乐意倾听病人的抱怨,就像布洛伊尔频繁地访问安娜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不过除了诱发深沉梦游之外,布洛伊尔似乎还以其在这种诊疗中所扮演的被动的与接受的角色而预示着医生在精神分析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把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理论和其先驱相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追溯到他们与伯恩海姆、沙可和让内的联系,就像这些作者本身所做的那样。如果说沙可认为有些歇斯底里症是身体创伤的直接后果,那么弗洛伊德却认为所有歇斯底里症都是身体创伤,尤其是性创伤的间接后果;而布洛伊尔虽然在许多病例上都赞同这一观点,却不承认这一观点的普遍性。这一理论与让内的理论相似。由于布洛伊尔在让内开始学医之前就已经在治疗O.安娜了,所以他无疑是独立地得出这一理论的。让内亦如此,他在这一理论的问世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先权。这两种理论的一个共同因素是把创伤事件看作像未完成的一幕

戏剧。

主要的不同在于，弗洛伊德早就对妨碍病人恢复创伤性记忆的东西感兴趣了。他观察了病人在联想时发生的行为；病人会变得紧张或不安，他会说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会很快地改变话题等等。病人的行为好像是在防御病源性记忆，或者在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抗拒着这种东西——记忆。于是弗洛伊德取得了一个重大的飞跃：他认为，最初压抑记忆的力就是阻碍记忆不被意识到的力（防御和抗拒两个术语可以互用，而压抑是一个表述性术语）。让内讥讽弗洛伊德的压抑观念。 330

让内和沙可各自强调的有关心理虚弱或心理退化的观念遭到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攻击。他们声称注意到歇斯底里患者的智力成就、教养和道德感与心理退化或心理虚弱相悖。他们曾和沙可一起假定催眠状态是研究歇斯底里症状起源的条件，但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里却抛弃了这一看法，认为这种假设只是布洛伊尔提出来的。

由于布洛伊尔发现了宣泄法，弗洛伊德始创了精神分析理论，所以人们对布洛伊尔撰写理论章节，而弗洛伊德撰写疗法章节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深入思考之后就可以明白，恰恰是这种分工的结果预告了未来。在布洛伊尔撰写的章节里，包括了有关催眠状态和约束能量对自由能量的思考，前者是一个很快就被抛弃的概念，后者却为精神分析学家所津津乐道。弗洛伊德撰写的章节描述了他所运用的方法，即一种既引导出精神分析的本质，也产生准科学范式的成见。

在弗洛伊德叙述的五个病史和有关疗法的篇章里，他提到了动用各种不同的辅助疗法，包括微电电击、饮食、休息、水疗和按摩。虽然并非每个病例都采用催眠，但它却是被广泛采用的。 331
弗洛伊德曾下结论说，催眠术无害，但几年之后他又收回了这个

观点。他的主要手段是根据这样一个基本法则而采用自由联想法的,即过于麻烦的、过于离题的或过于琐细的心念是无法抑制的。弗洛伊德通常轻按患者的前额,使她相信他这么做的时候,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将会浮现在她的头脑里;如果有必要,他会反复地这么做。如果联想的意义不明显,那么当联想所引起的一连串思绪接踵而来时,它就会明显起来的。

心理治疗这一章,也是这部书,是以弗洛伊德讨论抗拒和移情(即一种特别困难的、依附于医生个人的抗拒形式)的问题而结束的。那些与病人的成长史直接联系的记忆经常作为指向医生的冲动而闯入意识。这些新的症状如同病人当前发作的症状一样,是治疗的障碍和必须被分析的。

弗洛伊德论及心理治疗的一章在转变这一问题上的方法独到。他舍弃了无效的电疗。弗洛伊德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当医生和病人事实上都知道病人本身正在遭受某些病状的折磨时,还暗示病人说他没有遭受症状带来的折磨。弗洛伊德的正直、这种正直成为他自我分析的工具,使他放弃了使用依赖虚假和自欺欺人的方法。

至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判断表明了治疗中的抗拒和创伤性记忆的原始压抑之间的关系;自由联想是一种克服抗拒、恢复失去的记忆的手段。由于辅助疗法和理论之间没有联系,它们被放弃了。暗示、轻按前额以诱发回忆,以及催眠显然是最后被抛弃的东西。弗洛伊德之所以反对催眠,是因为他不是天才催眠师,也因为许多患者不能催而眠之。此外,即便催眠引发出忘却了的创伤,疗效也常常令人失望,因为处在正常的清醒状态下的病人不得不接受和同化他过去予以拒绝的致病因素。催眠回避了抗拒,但是病人只有在抗拒本身被逐渐克服时才能从症状中解脱出来。弗洛伊德不用其他技术而越来越依靠自由联想

和梦的分析,同时向患者指出他在自己的陈述里根本不会注意到的遗漏、矛盾,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弗洛伊德指出,这些遗漏和矛盾表明无意识力量的作用。正是理论和治疗的结合,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两项计划

1895年,弗洛伊德写了一部无标题的手稿,寄给他的朋友费里斯(W. Fliess),后来克里斯(E. Kris)称之为《建立一门科学的心理学计划》(1954),该手稿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常态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的主要事实的神经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的模式。弗洛伊德决定不发表这部手稿,并且果断地离开神经学而转向心理学,尽管事实上他更有资格成为一名神经学家。《计划》一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我们追溯到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的某些根源。人们可以看到早期神经解剖学的局限和错误,例如弗洛伊德不时把每一个观念和单个神经元对应起来。

根据阿玛切爾(P. Amacher, 1965)的研究,霍尔特(1965)提出的论点是,在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中有许多最晦涩而又漏洞百出的部分都导源于该《计划》的模式。在《梦的解析》第七章,该模式又一次出现,不过这次却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否定态度,即这一模式并不涉及解剖定位或结构。虽然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语言变成了心理学的语言,但其他方面并无多大改变。在《计划》中,神经系统排除了与反射弧模式相一致的物理能;在第七章,物理能已变成心理能。当神经心理学的发展明确地驳斥反射弧模式的时候,精神分析却迟迟没有变化,部分是因为神经学的观念早已转换成掩饰它们本来面目的心理术语了。精神投入(cathex-

is),这个弗洛伊德用以表示心理能的术语,以及派生的“反精神投入”、约束的精神投入和自由的精神投入等等,始终保留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中,尽管他一直回避给出明确的定义(霍尔特,1962)。

大约在弗洛伊德完成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开始了另一项计划,即他的自我分析,这项计划主要通过分析他的梦而得以完成。由于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实践要求每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首先把自己作为一个面对另一个分析者的病人,因此人们就会问:谁是第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呢?精神分析学家的作用包括三个方面的功能:当病人重视童年时候的创伤事件和问题事件时,充当病人的目标或对象;指出患者故事和联想中的遗漏和矛盾,借以寻找无意识抗拒的作用;为患者的联想和记忆提供解释。对弗洛伊德来说,第一个功能是由医生费里斯来完成的。在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时期,他和费里斯保持着积极的和亲密的合作,但费里斯似乎一点也不具备后两种功能。至于后两种功能,据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在最关键的几年里没有得到外界的帮助。他的自我分析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批判了自己的思想,揭露了他自己的无意识遁词和自我欺骗。甚至在这一分析的前景如何或初期尝试的后果怎样等一般的指导都没有的条件下,弗洛伊德走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在自我分析时期,弗洛伊德认识到,病人告诉他的,而他也信以为真的(病人本身并不总是信以为真)童年时代的许多性诱惑故事是幻想的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由于治疗结果令人失望,例如,对无意识没有现实的标准,这些记忆并不出现在精神病人的妄想之中,所以他对所有的父亲都纵情于性反常的行为的说法感到惊讶,这就是弗洛伊德怀疑童年时期性创伤的真实性的理由。然而,琼斯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可能是决定性

的因素。

当创伤理论的这一基本要点被打破时，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精神分析被整个地推翻了。但他很快就认识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东西是可以被利用的，并且将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如果在许多病例中并没有发生性诱惑的话，那么这些诱惑就是幻想的东西。在决定一个儿童的创伤经验方面，幻想的东西似乎具有和现实一样的力量。如果这些诱惑不是由成人引起的，而是在儿童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儿童就一定有性的冲动。由此产生了弗洛伊德的主要发现之一，即婴儿性欲。尽管这也许是真的，但正如埃伦伯格 (Ellenberger, 1970) 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特殊的儿科学在这个发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保姆都知道这门儿科学，可是弗洛伊德本人在 1895 年肯定不熟悉这门儿科学，并且婴儿性欲的观点也激起了很多反对意见。

创伤的范式

现在，让我们来概述一下弗洛伊德在早期精神分析中的地位。事实上，他的著述并没有明确使用我称之为“创伤范式” (trauma paradigm) 的一组观点，这是我根据他不再相信婴儿性诱惑的真实性时所集中思考的问题的逻辑结构而重新构筑的。

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是，行为和思想是有规律的。心理学的规律对于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对于精神病学家和病人都适用。在心理退化中找不到精神病的解释。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术语来自这一假设，正如他努力做的那样，医生应该解释各种症状和其他一些显然是无意义的行为。

心理决定论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它本是一个结论,但也是一个与后来的研究有关联的假设。心理决定论认为,观念可能引起身体症状,因此也可能治愈身体症状。这一发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从多年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中得出来的。布洛伊尔对 O. 安娜的治疗表明,恢复创伤性记忆能够消除症状,弗洛伊德和让内在许多病例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发现。运用催眠术,沙可借助观念既创造了症状,又消除了症状,伯恩海姆关于催眠后暗示的实验强化了这一结论。弗洛伊德本人有关歇斯底里症性麻痹的研究表明,观念可以引发酷似身体病痛的症状。

一个有关的原则是动力无意识,它是弗洛伊德的所有发现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这个原则也许不完全属于弗洛伊德,因为让内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它指出,无意识观念有点像意识观念那样影响行为,但是这个表述十分乏力。另一个表述是,行为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无意识,这个表述过于强硬,尽管它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观念认为,一个特定的观念当它是无意识的时候要比它成为有意识之后更有力地影响行为。最精致的,也可以说是极为正确的观点是,意识和无意识观念都影响行为,但是行为的结果只影响它的意识根源。这里还不包括由无意识愿望派生出来的意识现象、潜意识压抑和其他并发症。如果这个陈述能够成立,那么治疗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它只是关于意识和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对行为的短期关系的一个图解式的看法。行为的无意识根源是不能用普遍的奖励和结果来标志的;因此,这是一个“无效法则”(卢文格,1966)。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歇斯底里症的突发过程总是内部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性的愿望和个人的道德准则或自我。内部冲突引起神经症已是一条永久的原则,但是当时人们更多注意

的是罹患神经症的素质，这种素质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心理创伤，特别是童年时代的性诱惑。正如弗洛伊德当时认为的那样，由于儿童没有性感受的能力，因此青春期对诱惑记忆的恢复成了致病的原因。使一个事件成为创伤事件的原因是一个人在当时没有充分地、恰当地作出情绪反应；压抑这种记忆使它成为致病因素。治疗的目的是恢复被压抑了的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彻底发泄被抑制的情绪，以便在这些记忆和其他的意识自我之间建立联系。 336

治疗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尤其是梦的分析。由联想、梦、遗忘症状等等组成的资料还没有像从前一些心理学家处理资料那样被概括。妨碍治疗进展的主要因素部分在于病人抗拒去追忆被压抑的记忆，这已为病人中断回忆和其他一些对病人来说虽不明显、但对治疗者来说却是很清楚的迹象所证实。这个概念是新的；它把治疗期间的观察与病源性压抑联系起来。一种形式是把病人对亲属的症状迁移到对治疗者。这样，抗拒和移情是作为对被压抑的创伤性记忆的恢复进行干预的过程而出现的。

另一项有意义的发现是情感移置。一种适合于某种观念的情感能够联想起另一种观念，看来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发现，尽管这一发现的原材料来自亚里斯多德。情感移置是解释症状或梦的一个必要前提。

自我概念是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的术语而应用的。主要过程和次要过程的术语出现在那部《计划》中，但后来这些观念却是以不同的涵义提出来的。理论的一个方面是把特殊性的创伤和特殊的精神性神经病联系起来，但结果证明不行。然而弗洛伊德知道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于歇斯底里症有特效，而且具有更为普遍的应用性。

当神经症记忆，即创伤性诱惑中的共同成分不是共同的经

337 验,而是共同的幻想时,这个范式就倒塌了。然而,合乎规律的假设、动力无意识、自由联想、抗拒、移情和情感移置等概念却毫无损伤。由于幻想在导致病源性记忆时具有与现实同样的力量,因此心理决定论给人们的印象比以往更加深刻,对内部冲突作为神经衰弱的原因这样一些病例来说也是有说服力的。儿童感到他应该对自己的愿望和幻想负有责任,因此压抑就成为更有理智的了(琼斯,1965,p.285)。弗洛伊德在下一个时期的中心特色是发现“恋母情结”,用以取代创伤性诱惑的虚伪催眠。

弗洛伊德的思想来源

弗洛伊德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人们容易忽视他的思想的一些重要来源。当我们在比较他的那些伟大发现时,应该如何估量他的那些错误的根源呢?弗洛伊德的思想来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羽翼丰满、发展成熟的科学;其次是与他的思想的某些方面很相似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其三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临床研究以及他的那些导师。

在第一方面,有热力学的科学发现,进化论和杰克逊的神经学。这些范式只是通过类比的方式影响他的思想;没有一个范式直接与他的工作密切相关。热动力学的影响常常被误解。赫尔姆霍兹学派的名言,即在有生命的物质里只能找到以物理、化学或诸如此类的方式活动的力,促使弗洛伊德接受了物理决定论的信条,然而,在赫氏名言和热力学的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的联系。能量及其守恒是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它们成了上世纪初到本世纪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非同寻常的科学结构的模式。例如,斯皮尔曼(C. Spearman)断言,“g”因素,即能力

测验中的一般因素,最好被看作是心理能。让内的心理概念也接近于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能或“情感负荷”(charge of affect)是某种产生于自我之前或之外的东西。正如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即令是最伟大的头脑也受时代神话的影响。能就是弗洛伊德时代的神话。正如通常所转化的那样,在弗洛伊德假设能量移置或“宣泄”之后所作的可靠的观察是与情感移置这一不朽发现相关联的。

338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最重要的来源是弗洛伊德的研究,以及与弗洛伊德一起在实验室和诊所里工作的其他人的研究。尽管弗洛伊德极力反对催眠术,但催眠术在弗洛伊德早期的发现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样,即便是最有价值的源泉也会成为障碍。弗洛伊德在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精神分析陷入了复杂难解且又一无成果的心理玄学的境地。在这一背景下,另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把焦虑性神经症看作是由于令人不满的性行为如手淫和性生活中断所造成的。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最初理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弗洛伊德,1895),有时候他几乎要说焦虑是由于一种毒素的积累而造成的。有时候他又用性欲的身体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分裂这个意思极为不同的观点来谈论焦虑的根源。总之,这一理论后来被取代了。

在弗洛伊德提出他的观点之前,在哲学家的著作里已经有许多争论,特别是有关无意识问题的争论。赫尔姆霍兹根据无意识的推理撰写知觉的问题;赫尔巴特(J. F. Herbart)有过压抑的概念,不过在他看来,强有力的意识观念压抑着较虚弱的无意识观念;有鉴于此,弗洛伊德不能不解释无意识观念,虽然哈特曼(E. Von Hartmann)在1869年出版了《无意识哲学》,但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统治宇宙的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驱力,现象世

界只是它的一个表现(或观念)。人类的存在,特别是一种无理性的存在,在它身上,意志力采取两种本能形式,即求生本能和起着繁殖功能的性本能;后一种本能更为重要。从叔本华和其他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弗洛伊德也许只是得到与他的治疗神经症的工作极少有关系的片言只语、假设和类比。

339 琼斯强调指出,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解释是与他两类心理机能的描述联系在一起的,即服从不同规律的主要过程和次要过程——弗洛伊德的新概念。“如果任何人要说他(弗洛伊德)是从别人那里得到无意识观念的,那么,这话里面包括的极端荒谬是无法由这话里面包含的一丁点真理所抵销的。”(琼斯,1953,p.379)另一方面,埃伦伯格却花了几百页的篇幅来谈论弗洛伊德的先驱“对无意识的发现”。这两位都是学者,并且都为他们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弗洛伊德是有史以来最富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若无任何背景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创造出完整的思想体系。心灵必须有某种东西才能发挥作用。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之所以崇敬弗洛伊德,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无意识,而且也因为他发现了自我、快乐原则、心理创伤的致病效应,以及病人对治疗者依恋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思想源远流长。充斥于常人头脑,充斥于许多心理学教科书,甚至充斥于诸如《弗洛伊德的发现》之类的精神分析手册内的东西都是一种具体的、半图像的和各因素之间缺乏联系的像梦一样原始化了的翻本。这种原始的观点描述的是弗洛伊德从民间获得的东西,而他所补充的属于独创性的东西却是细节、差别,总之是因素之间的联系。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许多人学不会精神分析。

结 论

如果本章看来有点离题的话，那是因为在早期，自我发展被
作为好像是一个游荡那样来描述的。自我是个体所存在的，但是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从内驱力理论到自我理论

341 精神分析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含有一个关于人类本性的不同观点:人作为其环境的对象(与“心理退化”的早期学说相对照)、人作为其内驱力的对象,以及人作为其环境和内驱力的对象和主人[希金斯(J. W. Higgins),1961]。第一个时期在上一章提及创伤范式时已经讨论过了。本章我们想通过描述内驱力的范式来说明第二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第三个时期由两个交叠的倾向组成,在第一个倾向里,内驱力的范式涉及到自我发展和自我心理学的有关方面,这将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描述。第二个倾向提出了一个新的或自我的范式,包括内
342 驱力心理学和自我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这将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如果不是逐字运用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模式,则这些术语引起了一种比较。至于适应于科学标准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将在下面一章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并不是彻底的或定义明确的。

弗洛伊德在他充分巩固创伤范式之前,在他获得同盟者之前,描述了创伤范式。本章将提出内驱力范式,重点放在内驱力范式和我们课题的关系上。我们将紧紧追随弗洛伊德,但范式思想的产生是为了探究逻辑的现实而不是逐字的表达。

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最伟大的著作《梦的解析》。他根据对自己梦境的分析,根据对有些病人的梦境的分析,根据对其他正常人的梦境的分析,建立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日常

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性学三论》(1905b)、《玩笑及其和无意识的关系》(1905a),这三部著作进一步建立了作为正常生活的普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在这期间,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弗洛伊德记录了所有典型的病史。他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同时也失去了一些追随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是对这一时期的总结,它包含了对内驱力范式的一个充分的现实的看法。下面一节我将主要讨论这一看法的论据。

内驱力范式

“释梦是一条理解人脑无意识活动的捷径。”[弗洛伊德(1900)1953,p.608]无论从表面上看梦这种现象如何荒诞怪异,但它总是具有意义的。要想解释它们,必须追溯其显意部分,再推衍出其隐意来。它是由一个人对梦境要素的自由联想决定的,其意义在于愿望的实现。在幼儿身上,梦境中的意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但在成人身上,有时会由于日间一些弥散的并不经意的事件唤起长期来被压抑的婴儿形态的梦。通过梦境的伪装,人们发现了无意识思维的规律,也就是主要过程。主要过程包括各种要素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梦境,以及情感移置使一个要素适合另一个要素。在梦中,抽象的观念如同画谜或象形文字一般栩栩如生地再现。梦境的要素在明显的梦中可能被省略,特别是那些要素之间的联系。那些把潜在的内容伪装起来的心理称作梦的操作(dream work),精神分析的任务便是揭开这层伪装的面纱。 343

每个人都有梦,这就产生了对日常生活和正常心理加以精神分析的需要。日常生活和精神病理学包括小的过失、错误以

及常令我们头疼的健忘症。像做梦一样,误解具有意义,它揭示的要么是一个人不_想公开的某种东西,要么是一个_人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动机。动作倒错[parapraxes (Fehlleistungen)]这一术语是弗洛伊德用来描述口误、笔误、过失以及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情的遗忘而引进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这些现象还没有被概括为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材料,玩笑和动作倒错是通过类似于梦的操作那样的过程构成的。

精神性神经症的症状基于一个相似的模式;它们或表现为不得要领的动作,或表现为无意义的思想,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在过去的某些情境中,其思想是合乎情理的,其动作也是有的放矢的。过去的经历必然是有意识的,但症状行为的最初意识却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歇斯底里症典型地表现出对经验和意图的记忆缺失;患有强迫性神经症的人,其症状赖以存在的经验仍为记忆所及,但其症状的联系,也即症状的目的性却被抑制了。要想治愈这两种症状,可以通过解除压抑、恢复记忆和联系来实现。这样,一些在成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意识自我来处理,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殆尽。那些构成症状基础的经验是创伤性的经验,它在患者心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创伤的解释是定量的,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的“经济的”。创伤是这样一种体验:短时间内增长的刺激过于强烈,以至于难以适当地应付或处理。

在移情性神经症中,也就是说在焦虑性歇斯底里症、转变性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替代了性欲的满足。与自恋性神经症、早发性痴呆和抑郁症相比,移情性神经症构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是颇为有效的。移情性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得病,往往是由于他们的性欲在现实中受挫。症状的显现无非是一种调和,既发泄了被压抑了

的性欲,又施行了自卫的措施。

这里的性欲是一个广义上的性概念,它包括各种性变态的行为和孩子气的肉欲,比如婴儿的吮吸。唯其如此,才能用来解释日常生活的许多事实。性欲并非出现在青春期。早在孩提时代,它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在青春期,这些形式依附于生殖,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非都是如此,也不完全是性反常行为,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涉及生殖器官。性的恐惧、幻想、儿童的愿望,特别是男孩对阉割的惧怕和女孩希望成为男性的渴望,在正常人的性格形成、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形成,以及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抗拒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常人的性反常、乱伦以及杀人的梦境向我们表明,神经症患者的恋母情结仅仅是对正常人发展的普遍特征的一种夸张的说法。

压抑这一概念与性欲没有内在的联系。它是一个动力的或地形的概念,地形(topography)涉及不同的精神系统,如无意识、意识和前意识系统。压抑必须与倒退区分开来,倒退是一个从高级阶段向低级阶段发展的术语。在性的发展中,各阶段(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或多或少有规则地出现固恋现象。由于受挫,里比多——即性的内驱力——就可能倒退到早期的阶段,尤其是那些固恋较强烈的阶段。有许多途径可以释放这种剥夺而不至于歇斯底里。无压抑的倒退导致性变态而不是神经症。而且,性的冲动是可塑的,取决于目标与对象。升华(sublimation)是用有价值的社会目的代替无法实现的性欲目的的一种术语。由挫折导致神经症,其间必然经历性欲内驱力与自我内驱力的冲突或自我与性欲之间的冲突。

导致神经症及其症状形成的孩提时代的事件包括窥视父母的性交、成人的引诱以及对阉割的恐惧。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例如性交,它就可能要比实际观察到的更为详细地被描述。对年

幼儿童来说,幻想如同真正发生的事情那样有着心灵上的现实性[这些具有共同内容的幻想的再现使得弗洛伊德推测它们是种系发生(phylogenetic endowment)的一部分。他总是错误地相信特征获得的遗传学说]。

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是以病人的幻想为基础的;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反应的形成构成症状。在妄想狂里,妄想是以梦的理论的“次级修正”的形式来构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围绕一个无意识的核心而产生的文饰作用,以便在一个似乎有理的关系中呈现它。在创伤性神经症里,特别是在战时的创伤性神经症里,自我正在探究保护和利益,除非再现当时的真实情境,否则的话很难有治愈的希望。因一度患病和久病不愈而获得的动机也会在所有其他神经症患者中出现,但远远不及由于战争而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相应地,其他一些无意识的和孩子气的病因在战争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也得以体现,但远远不及其他情境下引发的神经症。

弗洛伊德指出焦虑是精神病理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撰写《导论》期间,他继续认为不完整的性刺激导致焦虑。然而,这一理论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的组成部分。当记忆受到压抑时,这一观念的内容与它在意识状态下和无意识状态下的情形是一样的。弗洛伊德并不认为一种无意识情感的观念能持续很久,那些被压抑了的观念,不论它们属于何种性质[焦虑、愤懑、狂怒,或是积极的里比多(libido)的兴奋],其情感都会变成焦虑。焦虑导致症状的形成。压抑则是自我从具有危险性的里比多的感受中挣脱出来的一种尝试。对恐惧症患者来说,就是把内在的危险转变为外在的危险。

精神分析的治疗在患者身上激起强烈的感受。积极的感受促使他们产生取悦于医生的愿望,从而帮助它们完成治疗。然

而,不论是消极的感受还是积极的感受,这两种倾向迟早都会给治疗带来不利,且有悖于他们的天性。要想治疗持续下去,需要对这种关系本身加以分析。医生必须告诉病人,这是一种移情的感受,它导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重复这一模式的过程中,病人能够回忆起它们的根源。这一过程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核心所在。这样原本作为治疗过程中一大障碍的移情变成治疗的一种主要手段。

弗洛伊德认为,伯恩海姆、让内和其他人所使用的暗示和催眠的精神分析法,无论对病人还是医生都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对抗拒和移情的分析则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病人能够耗费小而收效大。不论是在施行催眠术还是当主要症状已经消失之时,精神分析学家都应努力帮助病人克服其抗拒,以免再度发病。 347

以上概述了 20 世纪早期的精神分析,即内驱力范式。内驱力(trieb)是把症状理论、梦、动作倒错、玩笑、自由联想和移情等等联系起来的纽带。用来表达正常生活、神经症和治疗的这些原理是相互联系的。

这里,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反对人物,然后再来看一看弗洛伊德的思路,这条思路一方面成功地扩展到自我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内驱力范式的基础。

反对者：阿德勒与荣格

1911 年,阿德勒和其他一些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率先和弗洛伊德脱离了关系。1913 年,荣格和瑞士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也相继退出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阵

营。阿德勒和荣格最初都曾经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中的佼佼者。在此,我无意去介绍他们作品中一些在旁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部分,而只想将其在病理学、治疗和自我发展方面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和让内的观点作一比较。

阿德勒和其他一些脱离弗洛伊德阵营的分析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他比弗洛伊德更强调环境的重要性。正如 H. 安斯巴赫和 R. 安斯巴赫(R. R. Ansbacher, 1956)所指出的,许多新近的对精神分析持有异议的学者,比如弗洛姆和霍妮(K. Horney),他们也同样注重环境因素与情境因素,与其称他们为新弗洛伊德派,还不如称他们为新阿德勒派。

348 阿德勒不曾出版过大量的病史资料,所以要想重新整理他的疗法还颇有些困难。阿德勒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个体心理学,其治疗方法称之为“个体心理治疗”;阿德勒和他的病人相对而坐,两人椅子大小和形状也一模一样;阿德勒认为医生不应使病人产生一种卑下的感觉(与此相反,弗洛伊德的病人则躺着接受治疗,他自己坐在一边,这样,他可以观察到病人,而病人却无从观察到他)。

个体疗法的第一步是信任。对医生而言,他必须充分理解病人,包括他的生活风格(life-style)和想象中的生活目标(fictitious life goal)。阿德勒也将“生活风格”和“想象中的生活目标”用于正常人身上。医生必须去发现病人在思考问题和确定目标时的错误。如同正常人一样,病人也在为统一性和一致性而奋斗;这样,他就有可能推说自己病魔缠身而不得不推卸生活交付给他的责任。医生可以问病人,一旦他治愈了,他将做些什么,这时,病人可能会如实地道出他原本最想逃脱和推卸的生活责任。

第二阶段可能持续时间较久,也许长达几个月,医生要帮助

病人唤起对其生活风格和想象中的生活目标意识,使其明白它们与他的现实情境之间的矛盾。在最后阶段,必须由病人自己道出他在这些方面的改变措施。在弗洛伊德看来,阿德勒的疗法是由对前意识的探究构成的,尽管它与精神分析在理论上的判断大相径庭,但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早期阶段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阿德勒对抗拒和移情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抗拒是病人向医生表明他的优越性和不满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神经症患者对付别人的一种恒定的方法,也是他们有待于医生指正的错误的生活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积极的移情是由医生通过指出被压抑的性的因素而人为地引发的。病人缺乏勇气,也没有足够的社交兴趣,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来鼓励和激发他们潜在的社交兴趣。

如上概述,只是对阿德勒理论的简洁说明,它表明在弗洛伊德看来,阿德勒已经放弃心理学和无意识的分析,尽管在他们的材料中,仍旧保留了这些词语。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不能称之为精神分析的一个流派,因为它有悖于精神分析的实质,特别 349 是對抗拒和移情的分析。

当阿德勒从无意识的研究中退出,朝向一个有关常识的心理学时,荣格(1943, 1945)却更深入地致力于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从中发现了一个“众神”(pantheon)或性格的稳定性,人格面具(persona)被定义为类似于一个门面或面具的某种东西,定义为意识自我和无意识自我的总和,定义为集体精神的部分。人格面具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这张脸,适合于他在生活中的职能与地位,主要受到社会的制约而非他自己的个性所决定,但又是为他的自我所接纳的。与此相对的是人的阴影(shadow),亦即他消极的人格特质,难以为他的意识自我所理解和接受。他

的无意识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即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与他自己的历史有关,并包含了原则上能意识到的一些要素。由于精神分析的缺乏和压抑的提高增强了无意识,那就是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包含着先天的意象,典型的有:男性中的阿尼玛(anima)与女性中的阿尼姆斯(animus),也包含诸如智慧老人、魔术师、出现在历代社会的神话与宗教之中的魔鬼等形象。

在与弗洛伊德结识之前,荣格已开始致力于词语联想技术的研究,以此作为探讨无意识活动的一种方法,并提出了种种复杂的情结。情结这一术语,荣格最初取自齐亨(T. Ziehen),但他了解类似于让内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了解在治疗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无意识情结的涵义。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大体在于对婴儿期性行为看法,特别是对恋母情结的看法。荣格把里比多看作是“心理能”(psychic energy)。该心理能不一定具有性的内涵,而且,他有时用心理能意指魔力。他说,心理能需要一种相反的压力,因此,荣格的心理能和弗洛伊德不一样,它没有热力学的涵义。荣格在弗洛伊德称之为潜伏期的地方找到了性欲的起始。

350 当一个病人企图逃避面临的责任或困难时,神经症便发生了。荣格的这一观点类似于让内和阿德勒。弗洛伊德认识到在战时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疾病所引起的神经症是次要因素,虽然它们有可能经常出现。荣格治疗了大多数病人而无须对病人的无意识进行探究;然而,他的许多理论只适应于很小一部分病例。

荣格称之为分析心理学的分析无意识的方法,是通过对梦的分析来进行的,这种分析甚至要比精神分析涉及范围更广。他主要根据普遍的象征主义来解释梦,而不是像弗洛伊德强调

的那样根据个体的联想来解释梦。对荣格的梦的解析来说,压抑和潜意识的压抑力等观点是不必要的。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人格面具和阴影的分析。病人需要分解他的人格面具,并且承认、接受和同化他人格中的消极方面。第二个阶段涉及阿尼玛或阿尼姆斯的问题。男性对女性有一种理想的想象,这种想象来自他的母亲,那就是阿尼玛。女性对男性也有许多理想的想象,这种想象和阿尼姆斯结合在一起。除了理想之外,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还是一种第二自我,因此,两者都会歪曲一个人对异性的知觉,并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它们必须作为心理功能来理解和同化。在第三阶段,诸如智慧老人或伟大母亲等意象出现在梦境中,并且必须被处理。

1913年,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后,他出版了一部关于类型学的最负盛名的著作(1921)。他的主要区分是内倾(introverts)与外倾(extraverts)的区分。现在这两个术语已成了人们的习惯用法,虽然在荣格的精确定义中并不是这个意思。内倾这一术语是指从内部的或主观的因素来发现一个人的动机,外倾则是从外部因素推衍其动机。一个人可能从一种态度转变到另一种态度,但如果他羁留在某一极上,我们就可以将他描述为那一种类型的人。荣格设想弗洛伊德是外倾的,因为他把主要价值归因于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和客观上的原因,而阿德勒则是将其归因于目标和意图,这是主观的,因而是内倾的。荣格认为他的“分析心理学”综合和汲取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理论,他并没有忽视两人的方法,相反地,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特别对青年问题具有价值。

351

在荣格的治疗过程中,人格面具,包括意识自我和无意识自我,是被分解的,而且要求一个人紧紧抓住他的无意识问题。个

体无意识被同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病人的视野开阔了,并接近自我实现的理想或个性的形成。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可能会继续深入到集体无意识,从而使病人重新回到他的起点,或将自己与意象等同起来,唯我独尊,把自己看作是神明先知,或成为精神病患者。所以,必须努力避免集体无意识这一危险。

如同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在治疗中遇到的问题一样,荣格在对青年病人进行治疗时,也会涉及到性冲动和权力欲望等问题。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则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哲学和宗教的问题;一般说来,年长的病人已经克服了父母的移情和青年人的幻想,而这些在对青年病人的治疗中是必须加以处理的。

352 尽管荣格关于自我实现的概念看来意指自我发展,但他的类型学却是按不同的线索组织而成的。这些功能具有内倾和外倾两种特征,从而产生八种心理类型。病人往往有意识地选择自我感觉较为良好的一种功能来左右自己的意识行为;因此,为了达到精神上的平衡,医生可以建议病人从事一些有关其他功能的活动,例如,可以鼓励一位数学家(思维)念念诗(感受),或作作画(感觉)。这样,尽管在某些方面,荣格派的分析不像阿德勒派的分析那样直接地与精神分析相对立,但该派的分析者比起精神分析者来扮演了一个更为主动的和直接的角色。

在荣格的理论中,抗拒与移情的概念是较为模糊的;尽管在人格面具的标题下,他必须处理抗拒,讨论它。在讨论移情时,他也不太重视弗洛伊德对它的强调。他指出,在一些病例中,移情最好由它自己表现出来,而不是把它作为主体加以分析。然而,精神分析的标志不在于承认移情。催眠师和磁学家通常承认催眠师与其病人之间的爱欲关系。对弗洛伊德来说,移情是治疗的舞台,在这舞台上,旧的冲突可以为新的发现所扮演。这一思想看来并不是由荣格提出来的。最后,虽然弗洛伊德相信

特征获得的先天因素,但这不是他的范式中的实质部分;后来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并不赞同这一信念。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荣格范式的核心;如果真想从集体无意识中勾画出意义来,那必须根据特征获得的先天因素的错误学说来做。

内驱力范式中的自我发展

内驱力范式是一个变革性的成就,因为它涉足了前人从未涉足过的生活心理学领域。由于心理现象大多数是根据内驱力来解释的,因此如何把内驱力心理学和自我心理学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问题。两者是彼此独立的学科,还是相互包容的学科?荣格和阿德勒继续潜心于梦与动作倒错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心理学是内驱力心理学。阿德勒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内驱力,而他自己的解释则是依据自我;荣格的内驱力已经没有性的特征,对他来说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几乎完全独立于意识自我。正因为他们的前提如此相异,所以荣格和阿德勒并未影响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研究方向。尽管最初弗洛伊德把自我(或道德冲动)和性内驱力对立起来,但后来他的研究表明自我是内驱力派生的。 353

费伦齐(见第五章)认为,当儿童适应现实时,他的自我就得到发展,不是因为趋向发展的自发的努力,而是因为客观环境要求他完全放弃本能的满足。费伦齐的解释停留在自我形成的最早阶段。

弗洛伊德[(1914)1957]在有关自恋的文章中提出了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派生的观点,这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重要一步。他根据各种证据把自恋的倾向看作是性心理发展的一个组成部

分。自恋的性反常行为只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和典型的症状。弗洛伊德假设了孩提时代一个初级自恋的阶段,这时儿童会对各种物体均表现出真爱。人们对他的这种自恋概念的主要争论在于,这种爱一旦受挫,里比多便回到自恋的位置上。这种回归称作次级自恋。这一广义上的自恋不再是一种反常的行为,而是“里比多对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利己主义的补充”(p.74)。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其兴趣脱离现实,而妄想狂患者可能是因为里比多脱离现实造成的。一个患有器质性疾病的人,其兴趣脱离外界,只关心他自己。而疑病症患者也像器质性患者一样,具有为自己的身体征兆感到痛苦的特征,其里比多脱离外界。

354 认为在儿童和古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其思维和愿望全能的观念,也是一种自恋。“一个孩子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自恋,他的自我满足和难以实现性。”(p.89)父母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子女,而忽视了其缺憾之处,非但不对他们施加规则,相反却为他们争取种种特权和优惠。他们期望那些由于现实的原因本身无法兑现的梦想能在子女的身上得以实现。“父母对子女的爱如此之深,如此之稚气,无非是他们的自恋对象发生变化,从而无疑地表现出它最初的性质。”(p.91)

关于费伦齐的早期自我发展理论,弗洛伊德进一步作了如下探讨。一个自以为至善至美的孩子,当他顺应了家庭和社会的需求时,就会抛弃自负的感受。只有将这种自我转化为理想的自我,他才能获得自己不再拥有的至善至美。自我理想[ego ideal,在本文中,这一术语可以和理想的自我(ideal ego)和良心交替使用]的产生也就是回归自恋。因此,自我理想的产生,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回归。

经常为弗洛伊德援引的自我理想的概念,早在他有关自恋的文章问世之前,就已被杜威、詹姆斯(W. James)、鲍德温和麦

独孤所运用(第十一章)。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最初的观点把这种自恋的回归假设为它的起源的动力,把进步看作是通过回归产生的。对内驱力派生自我发展的观点来说,这是一次力的远足(*tour de force*)。

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为双重的本能理论所扰。弗洛伊德反复重申有两类本能即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性本能,这两种本能是在饥饿和爱欲之后形成的。有时,他又把它们称之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现在,他又把客体里比多与自我里比多相比较,并且该理论有赖于从一种里比多转化为另一种里比多的经典事例。分析家的反应与事态相符。回想起来,我们可能会问:双重本能的理论,也即性与自我内驱力的分离,是否真的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是否在任何方面与作为一种方法的精神分析有关。弗洛伊德在关于自恋的文章中谈及了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区别是生物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就精神分析的方法而言,单从假定的双重本能的起源来看,是很难将这些本能的愿望区分开来的。因此,被舍弃的并不是该范式的基本部分。 355

有关自恋的文章一开始就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即从根本上削弱了内驱力范式的基础,如果一种内驱力能够通过理想或意识的确立而得以满足,那么它是否会像弗洛伊德(1915)定义本能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身体上的需求”呢?是否就是那些定义内驱力的满足呢?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派生论的巨大成功是以内驱力范式的削弱为开端的。

在《悲哀与抑郁症》一文中,弗洛伊德(1917)开始研究日后成为自我理论主要贡献的一个主题。在这篇文章中,像其他许多文章一样,他往返于精神病理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之间。他指出抑郁症在很多方面与正常人的悲哀,诸如情绪低落、对客观

世界丧失兴趣、爱的能力的丧失、活动能力的降低,以及彻夜失眠等等有相似之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抑郁症患者降低自尊,但这种降低并不具有正常人悲哀的特征。他们喋喋不休地谈及自己的缺点,但和正常的自责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在别人面前缺乏羞耻心。因此,一方面,抑郁症患者似乎已经丧失爱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的所失报告出来。而且,他的自责通常指向旁人或自己曾经爱过的人。综上所述,弗洛伊德重新建立了如下一个模式:一个人先是爱上别人,继而又失去了自己所爱的对象,于是,他便通过将自己与失去的那个人等同起来控制这一损失。自我与失去的爱之间的冲突现在通过自恋回归而得以内化。因此,他的自责是指向先前那个所爱的对象的。

356 通常,此人不是他直接环境中的一个成员,便是那些深受郁郁寡欢、情绪低落之苦的人中间的一员。在《自我与本我》(1923)、《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弗洛伊德采用了相同的方案,并将其用于孩子对父母的自居作用及其正常的自我发展。

这期间的另一篇文章,即《本能及其变迁》(1915)就爱和恨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它具有两个与本课题有关的特征。在弗洛伊德看来,爱和恨并非像乍一看时那么对立。即便人们经常看到彼此相爱的人旋即反目成仇,但冤家主要不是来自性生活,而是来自自我寻求自我保护而进行的斗争。就此而言,不能说爱具有内驱力和客体的关系特征,只能说它是自我和客体的关系。也许,不能把性本能说成是爱它们的对象;“爱”这一术语的可用性首先是从生殖器开始的。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为阿德勒的从属于自我内驱力的观点提供了某种基础。

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

1920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自我功能”的原则。弗洛伊德把人对最大快乐和最小痛苦的追求看作是在临床上无可辩驳的真理;他认为该原则和费希纳(G. T. Fechner)的原则一样,费希纳认为人对心理紧张的追求保持在一个恒定的低水平上。紧张的出现被解释成不愉快。人们可能争辩说这些原则是不相等的;它们甚至没有必要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相一致,也没有必要与今天的心理学事实相一致。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反驳这篇文章,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贴切地驳倒弗洛伊德的论据。那么人为什么没能生活得更愉快些呢?弗洛伊德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生活中的真正困难在于用现实原则代替快乐原则。而且,有些本能和人格有着不同的乃至冲突的愿望,以至于这些愿望的满足可能引起自责或内疚。但是快乐原则无法解释某些显著的观察。人在他们的梦境中重复着曾经蒙受的精神性创伤,也即他们生活中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体验。这一模式不是简单的固恋,因为在他们清醒时是不会详细谈论这些事件的。这一模式也违反梦的特征,梦的特征是愿望的实现。

一个决定性的观察涉及到弗洛伊德的孙子,他常扔掉自己心爱的玩具,大叫着:“滚开!”有时他把系着绳子的玩具扔到看不见的地方,然后拉着玩具的绳子兴奋地大叫:“在那儿!”这类游戏重复着出现和消失;确实,这是那个孩子的唯一游戏。弗洛伊德把游戏的涵义解释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现许多痛苦经历,比如他无法控制母亲的消失和出现。母亲的消失这一世

358

界性的问题在捉迷藏这一世界性的游戏中得到反映。这个公式便是：痛苦的经验是通过儿童主动重现他曾经蒙受过的痛苦而被掌握的。同理，看过牙病的孩子回家后就玩牙医的游戏，把更为年幼的儿童当作牺牲品。儿童就是在重复他过去经历过的事件的活动中获得经验的。弗洛伊德在后一个例子中看到两个其他的动机，一是借迁怒为自己的消恨，二是表达“一种愿望，即希望支配自己，希望成熟，希望做成熟的人所能做的一切”[(1920) 1955, p. 17]。很明显，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颠倒的表达和用希望成熟和希望报复来表达的快乐原则不完全是对抗的解释，但两者都被要求去说明游戏。

与弗洛伊德相反，我认为，儿童希望成熟和希望报复的愿望揭示了快乐原则的空虚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操作原则可以解释该愿望的起因，事实上这些愿望寻求的不是满足，因为这说明不了它们的存在。这两种愿望是否表达的都是希望掌握从一个被动的角色到一个主动的角色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快乐原则的解释和颠倒表达的解释就可以归结为一种解释：像内驱力一样推动着去掌握操作，并在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寻求满足。

弗洛伊德断言，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的似内驱力，这种重复要比压倒一切的快乐原则更原始和更基本。除了性创伤神经症的梦境和儿童的游戏之外，他还引证了其他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线索是有些人老是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屡次重复，就像那些和酒结下不解之缘的女人一样。然而，对精神分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治疗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不变地重复着早年生活中和他们父母的最不愉快和经常遭受挫折的体验，并借助移情方式将这些反应转向治疗者。因此，问题的原因肯定会在治疗过程表现出来，尽管病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原因。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包含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由于在治疗期间,抗拒最初是无意识的,因此相比之下,与其说是意识对无意识,还不如说是自我对压抑。抗拒产生于自我,而自我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这一过程预示着结构图式(自我、超我和本我)代替了心理图式(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导致这一替换的一个问题似乎在这里:如果压抑是在意识系统的支配下产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它?如果压抑这一事实本身被压入无意识,那么必定还存在着一种压抑,能这样无限地重复下去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弗洛伊德要说的了。有关自我是一致的但主要是无意识的假设究竟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在回避这个问题,似乎还是个问号。 359

另一条线索来自弗洛伊德早期的文献,并预示他后来有关焦虑的论文。神经系统的功能是保护有机体免遭极度的刺激。一旦这种保护作用遭到破坏,有机体将要承受远比他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同化的更多的刺激,创作由此产生。受伤的机体状态是惊恐,焦虑可以消除惊恐。梦境中创伤的再现是一种对创伤事件和惊恐的追溯性控制的试图,这种惊恐是无法通过期待的焦虑来减少的。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假设了两个众所周知的新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精神分析学家普遍反对死的本能这一概念。他们的发难超过了文章中无法接受的部分,他们有时忽视了自我心理学的上述一些贡献。在死的本能这一概念中,困难和矛盾已经由他人讨论过[见实例,里古(P. Ricoeur),1970;洛华德(H. W. Loewald),1971b]。其实只要注意那些最初的冲动是来自弗洛伊德的原始的性本能和饥饿本能就行了,也即另外一种内驱力范式的解释。

在《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1923)这篇论文中,提出自我的任务是控制。自我是一个组织,围绕着它的有三个方面:现实的环境、本我、超我,它必须努力控制每个方面。这里运用了两个新的术语,一是相当自我理想(ego ideal)的超我(superego),一是本我(id)。本我这一术语来自格罗迪克(G. Groddeck, 1923),
360 意指非人力所能感受到的无意识的内驱力。且不管标题本身,自我和本我在某些方面和内驱力范式的关系要比自我范式更密切。本书大部分篇幅涉及到发泄理论,并根据心力(psychic energy)及其倾向解释自我成长。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一书中,弗洛伊德[(1926), 1959]把重点放在焦虑问题上,因为在他的三个范式中,他对每一个范式都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在创伤范式中,焦虑实质上是一种对未发泄的性紧张的中毒反应。在内驱力范式中,焦虑被看作是释放属于压抑观念的感情。这种压抑导致焦虑。在这一新的观点中,因果的序列是颠倒的,即焦虑产生压抑。

尽管弗洛伊德没有把分娩的创伤归因于他的信徒兰克(O. Rank)的研究,但他认为在焦虑的自然迹象中有着作为生理体验的结果的与生俱来的同样的模式。因此,对后来的焦虑体验来说,分娩可能是一种原型。在婴儿期,创伤是因为没有适当的反应机会,并由于短时期内的过度刺激导致惊恐而引起的。也存在(一贯还是经常?)一种本能的需求——紧张的因素。在婴儿期自我的虚弱很容易导致它被克服。“这种情境(一个婴儿)被看作是一种‘危险’和希望受到保护的反抗,这种保护是非满足的,即由于需要而引起的紧张,所以这种反抗是无助的。”[(1926), 1959, p. 137]婴儿害怕母亲消失是由于他不了解客体的永久性,母亲的暂时消失被看作是丧失。“这一变化是促使婴

儿为自我保护而采取的措施的第一步,并且有时代表着一种从无意识和不自觉的焦虑向一个具有危险迹象的有意识重现的焦虑过渡。”(p. 138)“让我们把这种实际上体验到的无助情境,称之为‘创伤的情境’……一个危险的情境是一种无助的再认、回忆和期待的情境。焦虑是在创伤中对无助的原始反应,以后在危险情境中作为一种求助信号而重现出来。过去曾消极体验创伤的自我,现在用一种虚弱的变式,在指向它的过程的愿望中积极地重复这种创伤。”(pp. 166 ~ 167)

361

焦虑就这样为双重目的服务。由于有了准备,婴儿开始回避恐惧和体验过的创伤。这一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焦虑信号理论。焦虑是一种在内驱力的压力下防止受创的自我活动。在这一理论中,中心概念来自于三个范式:创伤、内驱力和自我,它们是统一的。

引起焦虑的情境在不同的生活时期是不同的,每一情境都以先前的情境为基础,儿童害怕孤立,害怕失去母亲的爱,这一焦虑在女孩身上比较典型。从这一害怕出发,阉割的焦虑开始出现,这一形式在男孩身上比较典型。例如;小汉斯(弗洛伊德, 1909a)对马的恐惧或残暴成性的人对狼的恐惧(弗洛伊德, 1918)是对阉割的恐惧的伪装表达。男孩害怕父亲知道他对母亲的深情以及(典型地)对父亲的敌意,他把后者的报复想象成是通过阉割的方法来实现的。所以这些恐惧被抑制下去,表现在意识中的仅仅是对动物的恐惧,也许动物的咬啮意味着阉割。儿童在其幻想中缺乏一种现实的信息,那就是父母并没有通过阉割来惩罚他们的儿子。随着恋母情结的消退,自我寻找回避的危险以及产生焦虑的急迫感是为它的超我所不容的。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用这一方法证明了他常引证的这一陈述,即超我是对恋母情结的进一步解释。

弗洛伊德经常表示,在科学的理解有了充分发展的那一天,质的或意义的描述将被纯量的描述所替代,那时人们所了解的精神分析是一些经济的观点。这是一个简化的程序,弗洛伊德是绝不会拒绝的;因为他在《梦的解析》发表时,已认识到自己完全投入到这个有意义的竞争中去了。在这篇有关焦虑的文章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和假定的发展方向相矛盾的:“在一段时间里,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观点的某种重要性上,即导致焦虑解除的是那种在压抑过程中退缩的发泄,但今天,我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大兴趣了。原因在于,我以前认为焦虑是通过一个经济的过程不变地无意识地产生的,因此,我把焦虑的概念作为一个影响愉快和不愉快的能量的自我给予的信号,而排除了对经济因素的必要性的考虑。当然,这并没有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它是一种通过压抑借退缩来释放的能量,这种压抑是为自我所运用的,目的在于唤起影响;但是,为这种目的而运用的一部分能量的重要性是不会长久的。”(弗洛伊德,1926,p.140)当焦虑被理解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信号时,经济的观点不再令人感兴趣,而通过计划的简化期待着将这一顺序颠倒过来(这是弗洛伊德不断提倡的)。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宣称,良心的发展是文化机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用攻击性的内驱力代替了崇高的死本能,这是一个简单的无须推理的构念,虽然也引起争论。他把攻击的内驱力解释成是死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一解释似乎不是他的论据中的本质部分。他说过,攻击和毁灭的倾向是原始的和本能的;他还注意到他所不愿承认的那个事实,即自己早年曾被激起攻击的内驱力,毫无疑问,这涉及到他和阿德勒的争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内驱力的建立完全来自攻击内驱力

的转化,而不是来自里比多。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观点。

儿童最早的和最强烈的冲动是由他的父亲来抑制的。儿童为这种强加的抑制而想报复他的父亲,但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这样做将危及他所需要的父爱。于是,他就通过报复自己来控制这一情境,也即在父亲面前作出错误的冲动。另外就是通过自居作用,扮演父亲的角色,用父母对待他的冲动方式来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冲动。通过这两种方法,他建立了对自己冲动的控制。这一模式特别说明了下述观察,即儿童可能比父亲更严厉地对待自己。于是,儿童在自身内部重建了服从权威的关系,作为一种控制其他挫折情境的方法。这种内化的权威就是超我,超我监督自我,就像父亲监督孩子一样。 363

在这一解释中,弗洛伊德运用这样一个原则,即经验是通过积极重复一个人消极经受的东西来掌握的。另一个原则是指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会形成和促进内在的区别。在《悲哀和抑郁症》中,弗洛伊德的原则似乎适用于成人;在这里,用于儿童和父母的早期关系,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强有力的。这里是恋母情结和至少是良心的开端之间的联结。按这个公式,它是恋母情结中对父亲的投射和以父亲自居的攻击因素,而以父亲自居产生了良心。

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

在弗洛伊德逝世的那一年,即1939年的最初一些日子里,哈特曼(H. Hartmann)出版了《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一书,那时“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像贴标签一样经常出现在克里斯(K. Kris)、洛文斯坦(Loewenstein)和雷帕普特等人的著作中。我

364

们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里已经发现了有关自我心理学的许多贡献。在弗洛伊德时代,赖克(W. Reich)、克里斯和安娜·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们为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补充了实质性的要素。

赖克在其《性格分析》(1933)一书中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他说过,症状相对来说是容易分析的,因为它们是由自我来体验的。然而,抗拒是和自我结构相一致的,并且是和自我结构结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分析,这是因为自我本身并不和分析者相关联。而且,有症状的神经症显然是以神经症的性格结构为基础的,虽然神经症的性格不一定导致明显的症状。在一些病人中,性格的“盔甲”使得精神分析异常困难,例如,有些病人非常服从,表示友好和信任;有些病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有些病人情感缺失;有些病人在其感受和表达中申诉说缺乏真诚,也就是说,他们遇到的是破损的人际关系、一味的伪装,以及永远是“内心的微笑”(inward smile)。在赖克看来,对从事分析的分析者来说,适当的技术不是病人所要操作的内容,而是病人进行操作的方式。如果分析者只注意性格的盔甲,那么它就会成为某种异常的东西,甚至像一种症状。因此,在使精神分析的技术适应于自我心理学方面,赖克是一位先驱者。

安娜·弗洛伊德(1936)在《自我和防御机制》一书中声称,这种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一种深蕴心理学,分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探索无意识。自我、本我和超我在精神分析中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自我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为其他心理机构的观察提供媒介,一是使分析的目的得以重建。在弗洛伊德的前分析时期,催眠术作为一种技术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为了揭示无意识而绕过了自己。但恰恰是这种理由,其治疗结果是无法长久的,并最终被抛弃。最低程度的自由联想、梦的分析,以及象征的和

动作倒错的解释是被试主体所反对的。自我在催眠中是不稳定的，但这一基本法则，即病人在没有潜意识的压力下说出发生的每一件事，是与病人自我的暂时沉默相同的。然而，在移情分析中，分析者达到的不仅是本我的满足，还有自我的防御。在理论上承认自我大多数是无意识的，这可以加强自我分析的重要性。但自我的本质却抗拒着分析工作。尽管分析的目标是针对无意识的，但自我的目标却总是控制着本能的生活，并且在短期内，这些目标是冲突的。 365

在《自我和防御机制》一书中，特别注意的是防御的两种类型，它阐明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控制原则的操作；这些防御是以攻击者自居(identification)的，也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类型。我们可以从儿童身上看到以攻击者自居的形成过程；儿童能够模仿攻击者，假设他的特征，或者简单地仿效攻击活动。比如，儿童通过反复削铅笔，不断折断削好的笔尖，来表示他对牙医的厌恶。以攻击者自居是超我发展中的一种正常态度。儿童明白违背准则就会受到惩罚，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的内疚投射到别人身上，于是他把期望惩罚的这个人进行转向，从而反对那些为了使自己得到承认而蛮横逞凶的人。儿童能够内化这种批评，但他是把这种批评和自己的内疚分离开来的。真正的意识开始于内化的批评成为自我的批评，这是有些人永远达不到的阶段。这些人可以对受害者感到十分内疚，但没有自我批评。

在利他主义中，或者至少在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中，一个人放弃了他自己的一些愿望，为此他必须面临愿望的挫折。在“萨林娜·柏格拉斯”(Cyrano de Bergerac)这一故事中，独身女人喜欢做媒人便是一例。在促成代理人的满足时，强烈的兴趣暴露了利他主义的自私根源。这种利他主义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自居(认同)作用来满足替代挫折；二是把遭到拒绝的被动 366

角色换成恩人的主动角色。

“自我服务中的倒退”这一概念来自克里斯(1934)。在令人陶醉的梦中,在精神变态中,自我放弃了它的最高权力,而由原始过程来替代。相比之下,在机智、幽默和漫画中的原始过程就其自身的目的而言,是通过自我来运用的。掩饰的幽默允许攻击性倾向的表达,这些倾向是社会上不能接受的。在为自我目的的服务中,幽默作为原始过程的思维方式,这种形式的倒退不是唯一的,但它渗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审美体验、神话和宗教。

且不管前述的早期表现和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有关贡献[例如,韦尔德(R. Waelder), 1930], 哈特曼在 1939 年发表的论文还是引起了一场轰动。他写道,精神分析最初与病理学有关,并专注于冲突开始。哈特曼认为自我和本我有着不同的发源,而不是把自我看作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我们生来就具有适应可期待的环境的潜能。诸如知觉、思维和运动技能那样的功能有着它们自身的学习和成熟的过程;它们是原始的自主装置,因为它们并不明显地依赖内驱力,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冲突。它们是自我的先驱和功能。一种自我功能,例如好奇心或文饰,可能作为一种反对内驱力的防御机制而出现,但可以为适应服务,甚至成为一种目的;这就是说还有次级自主。弗洛伊德在正统的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之间架起了桥梁,甚至当他关心正常人时,他也在寻找内驱力、冲突和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哈特曼曾坚持要求精神分析在广义上作为一门普通心理学,认为对现实的适应、学习、知觉和智力活动也属于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内。这篇论文对作为治疗的精神分析是否具有直接的涵义还不清楚。但不管怎样,精神分析不再明确表示内驱力导致自我发展的观点。

哈特曼的方法是继续与克里斯和洛文斯坦合著文章(1945

~1962)。他们认为,自我不仅用来自内驱力的能量来操作,而且也用中和的能量来操作。中和(neutralization)是对弗洛伊德有关攻击和性内驱力的升华概念所作的概括。由于这些文章包含了许多有关自我发展的临床知识和有关主题,因此这些文章的部分影响在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不愿放弃这样的观点,即建立一门作为内驱力心理学的学科。

雷帕普特(1960)从事的是一项有学者风度的、明确的精神分析的系统化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驱力的紧张—减弱的概念上,从该模式中推出这一理论的许多组成要素。自我结构被描述为抑制内驱力宣泄的防御系统。自我是一种通过反内驱力宣泄而产生的结构;反宣泄是一种相对宣泄或内驱力的能量负荷的能量分配。被雷帕普特提高到主要精神分析原则的许多观念,事实上不是专指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的论题是行为”(p.39),“所有的行为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人格”(p.42),并且“一切行为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内驱力”(p.47)。这些原则从好的方面看,已为其他一些心理学派所接受,从坏的方面看,它们是极其空洞的。弗洛伊德只是在1920年才开始提出自我发展的原则。

我们在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这一节里提及的一切精神分析学家,都把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看作是精神分析范围扩展的一个新领域。他们当中没有人清楚地认识到弗洛伊德晚年在自我心理学方面要求加强一个新范式的思想倾向,在这个新范式中,内驱力范式的一些要素必须被抛弃或根本改造。其他人却看到了这一点。在下面的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哲学家对自我范式的精神分析的贡献。

基本术语

在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时,一个困难是无法给基本术语下一个永久性的定义。有时,弗洛伊德运用了和他的范式不一致的或改变了的方法;有时,译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涵义[勃朗特(L. W. Brandt), 1961]。下面我们将考虑四个术语:内驱力、本我、自我和精神投入。

内驱力范式的核心概念是 Trieb(德语,指本能),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英文的标准译法为“instinct”(本能)。大多数学者更爱用内驱力(drive)或本能的内驱力(instinctual drive)这一术语,因为弗洛伊德是用德语“Instinkt”(本能)来表示的(我认为两种用法要比固定在一种用法更为精确)。弗洛伊德在不同时期内对基本内驱力的不同描述有:与自我或道德价值相对照的性内驱力,与自我内驱力相对照的性内驱力,与死本能相对照的生内驱力,与攻击相对照的性欲。但是,这些基本内驱力的变化要比其他内驱力的简单变化更为深刻。它们涉及到一种内驱力或本能是什么东西的概念的变化。当今的用法已经倾向于把性和攻击作为基本的内驱力。霍尔特(R. R. Holt, 1976b)主张恢复弗洛伊德早期使用的愿望(wish)一词,从而抛弃内驱力这一术语。洛华德(1971b)则捍卫本能(instinct)这一术语,指出它不需要生物学的涵义,因为它是用日常用语来代替生物学的一个术语。

弗洛伊德几乎难得使用这个来自拉丁语“ego”(自我)的术语,而有意识地使用那些来自共同语言的术语。“ego”在英语中经常出现,但是他使用德语 ich 或 das Ich,这些术语和英语中的 I 或 the I 或 the me 的涵义是一样的,和法语中的 le moi 的涵义

也是一样的。所以,弗洛伊德用的词是除了最年幼儿童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皆使用的字汇,他的翻译选择了一些成人生活中很复杂的词。这里,自我意味着一个人们必须证明和解释的假定的实体,即 the I 是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体验。这种对比意味着在翻译弗洛伊德观点时有些东西被遗漏了,应该承认,即使有些东西能保留下来,也无法很好地翻译(例如,本书的论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I development”,也不能把“良心”说成是“Super-I”)。 369

本我的术语也来自拉丁语,并缺乏英语的涵义,但是在精神分析的用法上要比自我更完整。弗洛伊德的术语 das Es 就是指它。勃朗特(1966)指出,病人有时用“it”来表示本我,但是这种本我经常在他们的谈话中作为一种被动语态被诱导出来,就像他们对某种发生的事件毫无感受一样。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理论提出的这个术语,用来取代正在使用的无意识的意识这一术语,通常被翻译成:“本我所在之处,便是自我生存之地。”[弗洛伊德(1933),1964,p.80]根据勃朗特的观点,紧扣原文的翻译应该是:“它在此,我就可以成立。”(勃朗特,1966,p.374)这不仅保留了韵味,而且在情感上更接近弗洛伊德原句(“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在翻译中引入变化可以促进一成不变的过程的具体化。

上述所有术语,可以由那些对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精神分析有好感的人来解释,对初学者来说,掌握起来比较困难。翻译和使用上有不一致现象,甚至像霍尔特的愿望用法和洛文德的本能用法同样存在差异,不过这些术语在上下文的关系中运用并不妨碍彼此的理解。这种争论尽管在理论上没有多大收获,但却阻止了精神分析变成无生气的问答,提醒我们去注意隐藏在业已被证明的事物背面的一些词。对精神投入和心力我说不了多少。

370

精神投入(cathexis)没有英语的涵义,它是从希腊语引申出来的一个特定的词,弗洛伊德的术语称之为“Besetzung”。在军事上,Besetzung意味着对一种地位或国家的占有,但它还有许多其他的涵义,而其最一般的涵义是把某种东西放入某地(勃朗特,1961)。本书有意省略的一种自我发展的理论是有关精神投入这一术语的原则,也没有发现一个如何反精神投入的可以引证的观点来解释自我的发展。

精神投入被解释为一种心力(psychic energy)的负荷,尽管这一术语引进了公认的英语词汇,但是这一措词仍旧难以理解。物理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但是心力是什么呢?从霍尔特(1915)到拉什利(K. S. Lashley, 1957)的批评家对心力的攻击似乎就在这个术语的矛盾上。拉什利曾声称,如果心力的概念被摧毁,则精神分析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但精神分析中的许多权威已经批评了精神投入的概念和心力的概念,并发现它们和精神分析的治疗或理论不相干[吉尔(M. M. Gill), 1975]。库比(L. S. Kubie, 1947)对此首当其冲。霍尔特(1962)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已经找到有关约束能量和自由能量等术语的十几种不同用法。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同一个术语或相似的术语在不同的学者身上具有不同的涵义:斯皮尔曼主张把心理能假定为一般智力 g 因素的本质;荣格认为心力是无性欲的里比多,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或紧张;让内则认为心力代表了自我发展的某种东西。这种使用上的差异足以造成对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的怀疑。

回顾弗洛伊德神经病学中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起源,可以看到,用心力内投来表示的动机或内驱力不过是心理功能的反射弧模式的一种残余,现在已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并且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人们非相信不可的。渗透在弗洛伊德理

论中的紧张减弱的动机模式是同一概念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阿玛切尔(p. Amacher), 1965; 霍尔特, 1965]。作为一种动机模式的紧张减弱是否必然意味着精神分析的内驱力范式, 或者和其一样, 目前还不清楚; 然而, 历史地来看, 它们是缠绕在一起的。当内驱力范式为自我范式所取代时, 并不存在精神投入理论 371 和紧张减弱模式过时的问题。能量, 如果你愿意用心力的话, 作为一种原始的东西, 是对人类感受的描述, 不需要量的意义或高水平的解释能力。

结 论

在库恩看来,《梦的解析》引起了一场科学革命。它记载了人类精神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即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它可能是通过创伤的原始范式产生的,这种创伤的原始范式是探究心理决定论和一般心理法则的前提,它导致弗洛伊德用分析病人的术语来分析他自己。他对梦的分析遵循着早期范式的原则,例如简约和移置作用,导致他拒绝把儿童中诱奸的重要性作为神经症的恒定的基础。儿童期的性欲,特别是恋母情结,成为神经症的基础,但也是正常发展的基础。对梦的解释,即梦是对压抑了的欲望的伪装的表示,这一公式是对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和症状的展开。弗洛伊德就他的范式在梦、症状和误解中找到了他的前辈始终未能找到的资料。作为治疗的精神分析与作为理论的精神分析,这种基本方法是建立在对梦、症状、误解、手势、自由联想等分析的基础上的。库恩称之为科学范式的许多要素就是这样介绍的。

弗洛伊德的老师和前辈们的成就在内驱力的范式里获得了

重新解释。催眠现象是根据倒退和移情来说明的(费伦齐, 1909)。催眠达到的治愈是移情的治愈, 由于它容易获得, 因此比起精神分析来疗效要短, 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仅需要归纳, 而且需要移情分析。

372 包括自我发展现象在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扩展导致了新原则的发现, 首先是内驱力范式的显著扩展。很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新概念是需要的; 不能把自我简单地想象成是从内驱力派生出来的。

我曾试图介绍让内、阿德勒和荣格关于治疗方法和正常的发展与病理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就我能够发现的而言,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主要成就能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相比。他们没有把经验的领域全部引入具有新资料的科学范围。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是抗拒和移情, 他试图把这些概念和神经症的产生和治疗结合起来, 这要比让内、荣格或阿德勒的任何一种相应的观点更有力。下面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些概念是怎样和正常的自我发展联系起来的。

第十五章 精神分析:自我范式

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借助初级和次级自主性和自我功能等概念,扩展了内驱力范式,以阐释自我发展的许多现象。但是,扩展该领域的代价,定然是牺牲了简洁。内驱力的作用和明智之处,在于只用一种程式(凡看似无意义的东西,一旦被解释为无意识愿望的乔装表现时,就变得有意义了)就把许多先前无法解说的行为问题带进了心理学领域。确切地说,构成自主性自我功能的那些特征都不是这一程式所能包容的,弗洛伊德后期的许多发现亦如此。 373

关于把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的精辟之见和内驱力范式协调起来的问题,已有大量的文献,我们没有必要重加评述。不过,亨德里克(I. Hendrick, 1942)关于婴幼儿期控制的本能的论文、怀特(R. W. White, 1963)关于独立的自我心力和动机的重要性的论据,以及谢弗(R. Schafer, 1968)有关心力内投、结合、自居(认同)作用和内化的讨论,乃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374

洛华德表述了另一种看法:“现代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远远不是对那种主张本能性驱力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补充。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关于心理结构的动力组织理论的详尽描述,因此精神分析也处在把我们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上所获得的、关于本能性驱力的知识整合到这样一种心理学理论里去的过程中……虽然自我心理学并不涉及心理结构的另一个部

分,但它为作为整体的心理结构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1960, pp. 16~17)我建议把洛华德所说的内容称之为精神分析的自我范式(psychoanalytic ego paradigm),以便和囿于内驱力范式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区别开来。这一观点的三个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洛华德,以及里古,已对精神分析这一分支分别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认为它们是一致的。

埃里克森:游戏和同一性

埃里克森以其心理性欲发展和心理社会发展的图式化表述而闻名于世(这在第七章已讨论过)。不过,在他的著作中,这些具体形象的方面倒不如更抽象、更系统的方面那样与自我发展相连接。他不仅模仿了心理性欲发展的模式,而且建立起心理社会发展的模式。他还指出(1956)这两个程式是榫接卯合,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尽管如此,埃里克森在讨论中还是明确表示,他对自我发展和心理性欲发展在概念上是做了区别的。

375 根据弗洛伊德关于个人是通过对被动经验到的东西做积极的反应来获得控制的原理,埃里克森(1950)为儿童心理分析治疗的一种技术,即游戏,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么做的时候,埃里克森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隐含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另一个观念,即图式是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换的。儿童生活中的三个领域是:游戏与玩具的领域、与他人的现实关系的领域和他自己身体的领域。通过图式转换,在一个领域里产生的问题可以在其他领域里重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转换乃是儿童构念计划、进行探究和实现成长的手段。但是在一个压抑的、创伤性经验的逼迫下,这种转换就变成一种刻板的、症状的重

复。不过,借助巧妙的解析,能够把这种转换变为治疗。

埃里克森从弗洛伊德那里获得的有关自我发展的重要原理扩展了图式转换的思想,也就是说,儿童从内部产生分化,借以作为克服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中出现的失败与挫折的手段;对个人内部图式来说,人际图式具有模仿和动力的作用。埃里克森从弗洛伊德自我理论中得出的第三条原理乃是通过倒退而获得进步的原理(见第十四章)

埃里克森(1956)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阐释与本书所论及的同样的问题。他说,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分的自觉意识,有时指他对个人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是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自我发展最初是通过心力内投(introjection)和投射的过程产生的,继而是通过自居(认同)作用,再后是由于同一性的形式而实现的。这些途径并不是自我发展的阶段,而是自我形成和转化的形式。在儿童早期,父母的命令和表象的结合,即所谓心力内投,以及儿童晚期和青年早期的自居(认同)作用,都不能说是真正的同一性。真正的同一性必须由青少年自己在其他事件中,通过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他在各行各业里找到的适合自己的职业相结合的过程中,铸炼而成。

埃里克森(1969)在对甘地(M.D.Gandhi)的一项长期研究 376
中,详细描述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即病理学与创造的同一性的辩证法。甘地是如何从一些潜在的精神性神经症开始而使自己成为一名世界领袖的?埃里克森把甘地用以表示他那个消极抵抗或战斗的非暴力的政治态度的术语 Satyagraha,按字面意译为“真理力量”(truth force)。埃里克森指出,这一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和作为治疗的精神分析的

比较,因为这种治疗也把真理作为它的力量。

里古:主体的考古学和目的论

里古(1970)指出,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理论特别适宜于揭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本性的古代起源,这就是主体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subject*)。创造力的发展,包括艺术创作和自我发展,原则上不能归结为古代的原因;这些成就构成了主体的目的论(*teleology of subject*)。弗洛伊德承认婴幼儿期的资料无法准确地解释艺术成就中有价值的东西。在里古看来,主体考古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主体目的论。那么它们是怎样联系的呢?下面就谈谈里古的观点(在本节中,我只力求描述他的观点,而在下一节叙述了洛华德的看法后,才作出我的评论)。

精神分析的解释只涉及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语言。在弗洛伊德那里,正如在马克思和尼采那里一样,诠释是对原意的译码或澄清,这与对原意进行编码、恢复或增饰等宗教与美学的想象相反。弗洛伊德曾到处看到欲望或本能的显现。起初,他解释了各种症状、梦,以及过失的或乖戾的行为,但他几乎一开始也解释了艺术、才智、神话和宗教等作品。在精神分析中,象征乃是失真,但在宗教和诗歌里,象征却是启示。那么,这些不同的解释对立到什么程度呢?双重意义的似显又隐是人们对欲求之物的掩饰吗?或者说它有时也能成为启示吗?

377

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计划》(*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是他关于心理结构的最机械的描述。然而后来的一些修订本却从物理模式转向了对角色与面具的讨论,即编码与译码的场所。《计划》一文暴露了他的一个错误信念,即神经症起

源于儿童期的创伤,因此也就着重强调记忆的储存而不是幻想的构思,后来的经验表明,从根本上说,这种幻想比记忆更容易致病。《梦的解析》第七章即心理玄学在关于真实知觉的记忆痕迹的创伤潜伏里,也有这样的错误信念。在《计划》里,他所试图创造的东西乃是由寻求释放的紧张所控制的一个孤立的心理结构模式。然而,无论是恋母情结还是精神分析的移情疗法,都不能用这个模式来表达。弗洛伊德的愿望不是一个能够被释放的紧张,因为这种愿望永难满足。

梦的解析是所有解释的范式,因为梦是欲望的所有伎俩的范式。梦中所体现的欲望总是幼稚的,因此,解析就不仅仅是译码,同时也是对我们本性中淹没已久的东西的显现。欲望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性欲是这种象征主义的本质。

正如弗洛伊德(1910a)在有关列奥那多·达·芬奇的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一件艺术品既是症状又是治疗。在阐释米开朗基罗(Michaelangelo)和达·芬奇的作品时,弗洛伊德把一件白天制成的不朽作品和一件晚上制成的乏味作品进行了比较,好像它们都是梦。精神分析把这种差异称之为升华(sublimation),但那只是给问题定了个名称而已。一件艺术作品是依照它不仅仅是艺术家内心冲突的一个投射,也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标志而作为一种创造受人尊重的。

弗洛伊德在其论述自恋(narcissism)的文章中,指出了至今未被后来的阐述所同化或取代的超我形成的道路。自我理想的形成是一条既保留了婴幼儿期的自恋,又取代了它的途径。自我的自恋成分为自居(认同)作用提供了一个基础,并且也解释了从双亲那里获得的东西如何变成自己的东西。也许,为了自居(认同)作用的顺利发展,围绕着植根于自恋的一个核心而搜集他人形成自我理想的一些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里古问道,怎样使自恋的自居(认同)作用的倒退特征与结构的、因而也是进步的建立超我的自居(认同)作用的进步效果相协调?在恋母情结中,超我的基础表明,它与远离自觉意识的本我有密切的关系。超我在双重意义上是恋母情结的继承者,即超我来自恋母情结,又抑制恋母情结。恋母情结必须消退,因为它的目的是不可企及的,也因为与之相适应的性器期由于害怕阉割而告结束,这种害怕阉割的心理得到了发现性别差异这一准经验论的支持。这些事实解释了拒斥恋母情结是怎样挽救自恋的,同时也表明,超我是最有力的内驱力的表现。

丧失、缺失或替代对象是精神分析的每日食粮。如果儿童的欲望并不过奢,不企望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则恋母戏剧就将告终。欲望的满足是主要过程的基础,而对愿望的满足来说,幻想是欲望所失之物的替代品,是不可或缺的。被替代的和被曲解的派生物的观念意味着与所失之物的关系。梦、所有的象征物、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丧失了的或缺失了的東西的表现。现实的体验是把缺失之物再造的心理表征和外部世界作比较。这里就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它构成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注意到的消失—重现现象;拒绝克服艺术创作中的幻想,正如弗洛伊德在有关达·芬奇的论文里所分析的那样;以及在知觉判断中必然出现失而复得的现象。弗洛伊德说,自我是被抛弃的物体的沉积物。这样就把缺失的观念引入自我的结构。现实是内化了的缺失的相关物。由此,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就和丧失的东西不可分割了。

379 自我的问题是一个综览全局的问题。它既然受到现实、本能和良心的威胁,就必须控制这种形势以保护自己。在《自我和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一书里,这个问题是三位大师所讨论的主题。道德的内部力量是内化了的外在威胁。因此有道德的

人起初是疏外的(aliéné),他屈从于外界主人的规则,正如他屈从于欲望的禁令和屈服于现实的法则一样。在揭示梦中所乔装的隐匿的欲望时,解析使一切非原始的根据现出原形,也使一切自我疏外(alien)的根源真相毕露。由于超我是我的变式,所以它必须被译解。

超我是一种结构,不是一种观察,虽然它是以作为治疗障碍而观察到的无意识内疚的发现为基础的。超我的作用有三个:自我理想、自我观察和良心。里古指出,自我观察意味着自我重叠,由前恋母欲望开始,到模仿父亲。心理玄学不足以阐明白居(认同)作用,因为它只就该作用的倒退方面来理解自居。既然欲望一开始就是人际的,那么自居(认同)作用就不是什么外加的东西,它是欲望本身的辩证法。欲望总是另一个人向往的欲望。恋母情结这一深奥的和建设性的意义并非经济的眼光所能捕捉到的,在经济的眼光看来,它简直是理当抛弃的邪恶与淫荡的种子。

弗洛伊德从未解释过升华作用的机制或它的渐成说。从经济学观点看,它是对自恋的回归,是通过倒退的意义而获得进步。对升华作用中意义的革新需要另一种解释,而不是里比多之说。原则上,不能把“本我之所在,便是自我之所在”归结为欲望经济学。

弗洛伊德明晰地创造了一种分析而不是综合。但是里古写道,读弗洛伊德的文章,只有形成主体考古学的概念,我才能理解我自己,而且只有和目的论联系起来,我才能理解考古学的概念。当我再回到弗洛伊德那里时,我在他的著作里发现了辩证法。

洛华德：自我发展的精神分析

380

洛华德¹¹声称弗洛伊德并没有或始终未能理顺他晚年的自我理论的涵义，精神分析理论迄今尚在本能理论的影响下，因而，为了贯彻新的研究精神，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本意作某些偏离是无可厚非的。

随着自我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分析看待本能的方式也改变了。这时的反射弧模式，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里，其地位降低了，本能所孜孜以求的不再是享乐的满足，而是客体。这样，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里，本能显然就像自我一样是指与环境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原始的水平上的。要想把儿童看作是降生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因而需要与之建立关系的现实世界中，就不能从儿童的、甚至母亲的角度去看。更确切地说，婴儿与母亲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先是生物学的，而后渐渐是心理的。他们之间日渐增大的每一步差异，都引起相应的整合，并在这种整合下发展起来。对儿童来说，现实必然是在与其自我发展相当的诸阶段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他们全然不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而是有差异的。母亲与孩子之间差异的形成，导致了在以后各阶段上所发现的那种追求新的统一的努力，即一种强烈的欲求，它既是自我综合功能的来源，又是儿童连接母亲的里比多的起源。

381

母亲与孩子的最初统一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对母亲的强烈依赖，尤其是从后期倒退到这种统一，则又令人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回归到自我发展的更早的、几无分化的阶段。对年幼儿童来说，在抵御自我倒退的时候，父亲不仅起着与母亲的影响相抗

衡的作用,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自居(认同)人物。这样,由于包括了对双亲的正反两面的情感,并且发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而不只是在若干创伤性事件上,因此恋母情结的涵义就被扩大了。确实,对双亲所怀的矛盾情绪在自我的发展中起着根本的作用。洛华德极力表明,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了从事阉割的父亲是反对和阻挠母亲与孩子之间里比多联系的外部现实的代表这一方面。然而在最初自恋的前自我阶段,现实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发生学的观点看,现实与自我是同一回事。由于在洛华德看来,本能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本能就不再被看作是什么内在的和敌对于自我的东西,现实也不是什么外在的和敌对于自我的东西。

由此看来,要对神经症,尤其是精神病的倒退现象作不同的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说是脱离现实,还不如说是失去了自我与现实的界限。对婴儿和倒退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奇事异象是作为既在自我也在外部世界中的东西而被体验的,并因此作为一种令人恐惧的,且不可抗拒的东西被体验(这里,洛华德把费伦齐关于婴儿全能的概念和 H.S. 沙利文关于婴儿无助的概念之间的分歧调合起来了。见第五章)。

自我发展不是通过改变与固定对象的关系,而是通过不断重建儿童与其环境的关系和重建儿童相应的内心世界得以实现的。当儿童发展时,他所适应的现象和他所挚爱的事物也因之发生变化。在前恋母情结期,自我形成经由心力内投和投射发展到建立内在性和外在性。对外部对象的真正依恋,是以清晰的外部和内部的感受为前提的,这种依赖第一次发生在恋母情结时期,它的理想结果是超我的形成,即心理结构的内部分化。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用父母的内化或父母的表象的内化来描述的,相反地,对儿童的心理结构来说,这种关系是内在的重建起

来的。这就是说,旧的关系是被破坏,而不是被压抑,旧的关系中的成分被整合到某些新的东西中去,从而造成了儿童的差异,并由此使儿童对其父母形成一种新的看法。压抑不同于心理结构的形成,因为它通过某些不利于新的整合的因素而阻碍了发展。

母亲的内化表象包括她对孩子的态度、知觉和关系,她不仅把孩子看作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也把他理想化为未来阶段上的样子。这就对儿童产生了某种影响,并为儿童所内化,从而帮助他建立起同一性情感。这样,在儿童当前的功能水平和母亲对他未来的期望所要求的更为成熟的阶段之间的紧张是相似的。一个人未来的最佳样子和他当前样子之间的紧张,不仅仅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分析学家与病人之间的紧张,而且也是超我和自我之间的紧张。因此,心理发展的条件本身是内化的。所谓内化,指的是这么一个过程,通过它,个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心理上的关系。如此构筑起来的内心世界就和环境建立起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死亡本能,即消除刺激、减少紧张和寻求安宁的倾向,并非“超越快乐原则”的东西,因为它变成弗洛伊德根据 19 世纪机械主义物理学而假设的恒常性或享乐原则的另一个翻版。真正超越恒常性原则的是生存本能,这是生命之本能,是一种整合或创设结构的倾向。生存本能的满足不是减少刺激以回归到先前的平衡水平,而在于吸收和整合刺激,从而导向更高水平的平衡。只有后者才与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阐述相一致,即“本我之所在,便是自我之所在”。

383

在弗洛伊德那里,移情(transference)一词有三种用法。一是指里比多向对象的转移,即所谓移情性神经症。这时,该术语是“对象性宣泄”的同义词。二是指把婴儿期的对象转移到新近的

对象上去,特别是在精神分析期间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一用法在当前颇为盛行。三是指从无意识观念到前意识观念的强度转移。精神分析疗法和正常发展的性质就存在于这三种意义的联系之中。

神经症的机制是正常过程的畸变。从里比多迁移至对象,从婴幼儿期的对象迁移至同龄人,都是正常的;生命在这种迁移中汲取活力。只有通过这种迁移,自我才能把本能的生活和现实整合起来,并由此达到成熟。意识—前意识的心理系统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别,是更为成熟地组织起来的心理结构与更为原始的心理结构之间差异的另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心理结构是心理发展的条件。

本我是现在表现过去,超我是现在期望和指向未来,而自我作为组织者,则整合与表现它们。超我的先驱者,包括恢复原始的自恋,通过以全能的父母自居(认同)再度体验婴幼儿期的全能性完美。自我理想意味着后来的实现,即追求完美。在这些概念里,不仅涉及到儿童把父母理想化,而且也涉及到父母把儿童理想化。在更为现实地理解潜力方面而产生的某些幻灭与矫正,促进了超我的成长。当一个不同于外在权威和理想表象的清晰的内在权威出现时,超我就成了弗洛伊德(1921)所说的“自我的分化阶段”。

洛华德在从自我的核心或内化到不同的程度这一距离上描述超我的成分。虽然超我是作为一个结构而存在的,但它的组成部分却是变化的;例如,遵守大小便规则不再被体验为一种意向或要求,而成了一种习惯。当一种意向成为现实时,超我的诸成分就同化为自我的诸成分,但这个过程在自我瓦解、成长危机或心理治疗中也可能颠倒过来。

384

重复是心理生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心理功能

都是重复的。不过,在重复的时候,它们也会变得不同。当重复的行为是一种压抑的重演,无意识的体验具有强迫的、不变的特征时,它就无助于发展。这是消极的重复。人们经常并不意识到他的重复方面。要意识到一个人的以往经验的重复,需要假定一个积极的角色。为此,一个人就得把经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把它置于作为整合者的自我的范围里。在积极的重复中,旧的东西得到控制,但不是被消除或抛弃,而是被分解和重建。“本我之所在,便是自我之所在”就是指把消极的重复变为积极的重复。这不仅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公式,而且也是整个自我发展的一个方面。

基本原理

自我发展是埃里克森、里古和洛华德的中心论题,他们虽然从不同的方面把它与内驱力的心理学结合起来,但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是相容的。埃里克森关于性心理发展的讨论就其模式和范围而言,是非常著名的,就像他关于正常的自我发展所要完成的任务和可能遇到的危机的讨论那样(见第五章)。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生活历程中缠绕在一起的互补过程。此外,他也考虑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引起神经症的因素是怎样使另一个人取得伟大成就的问题。在里古这位哲学家看来,内驱力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是在不同的意义上相互补充的。一是后溯其根源,另一是展望其目标和成就。在洛华德看来,儿童时代的自我发展对精神分析疗法来说是一个模式,而分析使自我重新和继续得到发展。

期著作里选择了同样的原理,抛弃了早期范式中同样的残余。值得注意的是,反射弧的紧张—减弱模式不仅当作多余的东西被抛弃,而且也因为它不符合儿童是通过积极地重复消极地经验到的东西来控制经验的这一原理。不能把控制的原理归结为能量支出的经济学,不能把积极的重复解释成不需要消极体验等能量。由于控制的原理取代了作为核心的解释原则的恒常性或快乐原则,所以,它成为精神分析自我范式所有看法的关键性原则。谁都不否认成长是与延缓当前快乐、以求更为长远的快乐相联系的。这一切没有一个是精神分析的独创发现;它们都是来自民间,因而可以被任何一种自我范式所同化。

保留在自我范式里的内驱力范式的成分包含着:关于普遍的心理规则和解释的构想,弗洛伊德有关动力无意识、感情替代、主要过程与次要过程、人际内驱力的可塑性,以及儿童期性欲和恋母情结等发现。内部冲突作为精神病的普遍根源也许已被所有精神分析的自我理论家保留下来了,但这一学说是不同于前述的另一个类别。我正在寻找控制神经症、治疗和自我发展的一般的心理学原理,而不是专对某一领域的原理。

移情,创伤范式把它看作是影响治疗的障碍,内驱力范式把它当作治疗的方法,洛华德又把它作为正常发展的核心。同样,抗拒在创伤范式里被看作是障碍,而在内驱力范式里却被视作治疗的中心。由于抗拒与自我综合功能相同或是综合功能的一个方面,它就同正常成长联系在一起了。

通过倒退而获得进步的原理是内驱力范式和自我范式之间的 386
的枢纽。里古的文章已经指出蕴涵在进步与倒退、编码与译码、修饰与解释之中的辩证法的深层涵义。艾克斯坦(R. E. Ekstein, 1965)也指出这一原理在作为治疗的精神分析中的应用。例如,某些细心的人观察到,当病人身处特别的姿势,比如俯卧时,就

会产生倒退。在这种紊乱的形式里,倒退需要重建(洛华德,1971c)。

所有的解释都强调弗洛伊德的结构原理,即人际图式对人格图式起着模仿或动力作用。我之所以称它为结构原理,是因为对内部变异即自我发展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用雷帕普特和吉尔(M.M.Gill)的五种心理玄学的观点来说,这一原理也可以称之为发生的、适应的和动力的原理。但这种描述过于累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们作为考察行为解释的有益方式的缘故]。

构成这些图式转换基础的是一个由于高度概括性而难以清晰或严谨地表述出来的原理。这个原理也是一种结构原理,但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说的,不是指建立心理结构,而是指作为思维方式的³⁸⁷结构主义(见第三章)。埃里克森关于身体、玩具和人之间图式转换的讨论毕竟只适用于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一种儿童,即图式从人际关系向身体症状的转换,以及反过来从身体症状向人际关系的转换,来自这两个根源的图式都在梦中表现出来。正如里古指出的那样,这种观察既是一个发现,也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的方法;玩是编码的方法,也是被解释的东西的实质。洛华德关于移情的讨论也未超出这一广义的原理的范围。

假如人格图式果真是由人际图式产生的,那么人际图式从何而来呢?正如洛华德指出的那样,在过去,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既然儿童与母亲原本为一,则他们的关系是在他们分离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但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控制原理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人际图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一定这样对待他。”这一原理的作用像是一种内驱力[因此,弗洛伊德称其为重复冲动(repetition-compulsion),但是我之所以避免那个术语,是因为它混淆了在正常发展和神经症过程中运用这一原理的界限]。这一

原理具有内驱力的可塑性,允许替代各种受害者。如果我们把控制原理作为攻击内驱力的起源(假定攻击性论题是复杂的,已超出我们的研究范围),那么就可以导致一个巨大的理论简化。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发展起源于攻击性内驱力的转换的论述是与这一阐述相一致的。

我们能否就这个基本的人际图式来自何处的问题退一步说呢?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原理认为儿童必须对别人做一些或多或少别人曾对他做过的事。这一原理在形式上类似于作用和反作用必须相等和相反。牛顿的第三定律与自我功能的这一最基本的原理有某种相似之处。每个儿童出生伊始,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受到牛顿第三定律的支配。假如他拍一下床或地板,床或地板就用相等和相反的力回击他。假如他钻在桌子底下玩,站起来时头撞着桌子,桌子也用同样大小的力撞他的头。儿童一定会像对别的什么事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样,对物理学的这一原理也获得某种领悟。

对于年幼儿童来说,甚至长到比我们现在谈到的年龄还要大许多的时候,也难以把物理学原理、心理学原理和道德的必要性区别开来。这样,对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和相反的观察将会产生某种事件需要平衡或复原的含糊意义,这至少是可以想象的。穆勒(见第十六章)所提到的那条原始的、以牙还牙的法则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无法在一个非牛顿的世界里来抚养儿童,以期发现将变化的东西,显然也没有任何办法更细致地观察这种原始的机械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际图式塑造和推动人格图式是显而易见的和可以推测的。反过来,把人际图式的形成归因于感觉运动图式和物理学原理,虽然是合乎逻辑的,却难以令人信服。

这科学吗？

库恩不愿意把精神分析及其学派的设想称之为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见第十二章),他也许夸大了物理科学中范式的一致性,其他哲学家并不都接受对科学立下的这一标准。许多第一流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讨论过精神分析的科学校位,但是全面评述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任务。这里的讨论只是把业已介绍过的问题做一个结论而已。

勒温(Lewin, 1931)曾说过,尽管现代科学常被描述为用数学的、功能的关系来替代定性的表述,然而现代科学的这一特征比起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方式转变为伽利略的思想方式这一更为基本性的方面来,乃属次要的。根据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方式,个别事件被认为是受机遇支配的,只有经常地、重复地发生的现象,才被认为是规律的现象,或者说需要予以解释。例外的事件,如果数量不足,则不能用作反驳的论据。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解释是由分类构成的,分类的共同特征构成了以后用来解释的一种本质。分类有许多是二分法的,用一个极端表示积极的有价值的抉择。当时的心理学推理就体现了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方式。根据2岁儿童通常有执拗的现象来解释2岁儿童的执拗性;用建立在同类行为的基础上而假定的内驱力来解释行为,把行为划分成“正常的”和“变态的”两大类等等。

勒温竭力声称,弗洛伊德的一个最大贡献是消除了平常与异常、正常与变态之间的界限。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性质,即努力寻求他的病人和他自己的一组规律,与伽利略寻找恒星运动、鸟类飞行和石头下落的一组共同的规律是相似的。此外,正如我

们已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把许多以前的,甚至今天的心理学家认为是无意义的、偶然的行为都纳入了规律的范围之内。如此,弗洛伊德关于普遍的心理学法则和心理决定主义的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科学的。

精神分析的推理能与其他科学的推理相比吗?究竟有没有一门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假如有的话,它能构成一个物理科学的推理和标准所不能运用的独立领域吗?这就是舍伍德(N. Sherwood, 1969)提出的问题。

不论怎样,舍伍德一开始就问,什么是解释?我们首先得用一个参照框架来规定我们感兴趣的和我们根据常识与其他知识而认为当然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我们无法适应的某种疑问或矛盾。一个满意的解释必须在适当的复杂水平上,在适当的参照框架内解决这一疑难。他说,这恰恰是精神分析的描述试图要做的事情。精神分析的推理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病史的分析,即精神分析的描述。精神分析学家在病人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共同的主题,它们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里表现出来的,不一定完全说明任何一种单一的现象。精神分析学家所重新建立起来的解释力量与其说是与孤立的梦、症状或行为有关,不如说是更明显地与个人生活史有关。如果把精神分析的描述假定为精神分析学家去解释某种症状、某个梦或别的行为,把病史假定为这些解释的总和,这就误解了精神分析的描述力量了。

舍伍德指出,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著作里已经分析了因果关系。就拿舍伍德引为典型的劳伦茨(Paul Lorenz)的“鼠人”(rat man)例子来说,弗洛伊德(1909b)除了运用通常称之为“弗洛伊德派”的象征性意义的解释外,还根据症状、愿望和行为的起因、发生、当前的功能以及预示等,对它们进行了解释。

他继续说,根据运动与活动或原因与理由之间的区别,以及

不同于其他原因的理由,使人类行为成为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科学及其推理标准的领域也许是合理的。然而,弗洛伊德所做的事情恰好表明它们是一回事。根据定义,由于无意识的动机是被排除在意识之外的,因此它一定是原因,用某种类似于意识动机或理由的方式影响行为。原因和理由的区别不在事件中,而在解释的前后关系中。这样,舍伍德也就认为建立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可能的,但不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在评价精神分析解释的恰当性时,舍伍德提出了一个具有自我一致性、相干性(coherence)和广泛适用性的一般标准。他承认在运用这个自我一致的标准时是有困难的。但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相反动机和心向(trend)并不表明解释的不一致性,因为这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确实,如果舍伍德强调一下精神分析把内部冲突视为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就好了。既然没有什么疾病,无论是神经症还是其他疾病,那么,这个自我一致的标准在评价精神分析解释时的作用就难免有局限性。也许,对此标准,我们只要求它具有相干性和广泛适用性就够了。

当内驱力范式避免在原因与理由之间作出区别的时候,我们已看到区别被里古设想为主体考古学和主体目的论的区别。里古的结论是,要理解一个人,就必须理解原因和理由。这一辩证方法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里也可以发现,但是舍伍德却没有论及。也许为了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哲学家们将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91 精神分析中最不同于库恩所说的范式科学的一个方面是它的培养专业人员的方法,因为它主要依赖的是典型病史(的确,那些培养分析家的人可能不知道,尽管解释的问题无法归结为数学的确定性,但解释的技术却可以通过固定答案的练习来传授的)。我们不妨看一看物理学是怎样教授的,这是库恩本人讨

论过的问题(1974)。他指出,物理学的经典公式必须在为解决教科书的问题而获得特定意义的时候才能传授。对学生来说,把一般法则应用到特殊情境的这一步,乃是最艰苦的事情。库恩指出,这一步只有通过观察他人解决一个又一个事例才能学会,舍此,别无他途。因此,根据库恩本人的看法,在造就一名物理学家时,最艰苦的地方类似于训练一名精神分析学家。

从“它”(It)到“我”(I)

在许多心理学家看来,现在已成为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中心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概念,是如此远离他们的经验,如此抽象,以至于不能令人信服。由于超我放在下一章讨论,因此,我们现在就根据自我和本我与直接观察的关系再来看看这两个概念。正如勃朗特所指出的那样(1966),弗洛伊德在用 *das Ich* 和 *das Es* 这两个术语时,是有更加直接的和个人的涵义的(见第十四章)。

勃朗特援引了一个病人的病例,这个病人描述了由于“我要向东,它偏向西”因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某些部位,由此陷入了痛苦的情绪之中。勃朗特继续说:“这个病人在重复‘我被困住了’之后又说:‘我被我的情绪困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被我自己困住了。’当所有这些被动语态后来变成主动语态‘我困住了我自己’的时候,病人终于认识到‘我困住了我自己’。这种用‘我’来取代‘它’而作为句子上语的现象是和把‘它’变为‘我’的过程相应的……最后,这个人能够认识她和别人的相互关系,并能确切地用‘我’来说话:‘我想我让你给困住了……就像我让其他任何人给困住了一样。’”(1966,p.377)

布罗奇(H.Bruch, 1961, 1973)曾观察到身体表象和自我界限的失真,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拥有严重进食障碍的人的特征,也许可以归因于对来自体内的刺激作出了错误的解释。而这种错误的解释,她根据有关病例指出,起源于病人的母亲在病人婴幼儿期作出的不恰当的反应。“如果对身体意识的曲解是严重的,则一个人就会感到他既不拥有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控制其机能。当病人遭受到进食的强迫性冲动的折磨时,他就会说:‘它又找到我头上来了!’意指‘我不想吃东西’。这里,过他自己生活的意识就会全然丧失,剩下的唯有深信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无效的。”(布罗奇, 1961, p.475;原引文中此段为斜体)

霍罗维兹(M.J.Horowitz, 编印中的文章)描述了一个成年病人无法用语词来表示生殖器官或身体机能,所有这一切她都用‘它’来表示。在治疗过程中,分析学家帮助这位智力特别的病人认识她先前不能说出的有关身体部位和功能的词。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意识也逐渐扩大到先前叫不出名称的身体部位和机能。与此同时,她能产生性的快感和满足了,她的人际关系也改善了。

围绕着一个相同的见解,已经确立起一套治疗技术[恩利特,(J.B.Enright, 1972)]。这套技术要求接受治疗的每个人环顾屋子四周,然后挑选出一件在他看来是生动可爱的物品。接着要这个病人花二三分钟时间把自己当作这物品,再要他假定自己就是这物品,说一些关于这个物品的话。要求是“描述它,但不可说‘它’如何如何,而要说‘我’怎样怎样”(p.153)。根据一个人在涉及到某些重要事情时会停顿下来的假设,当病人停下不说话时,就要他说一件或两件以上的东西。“这个物品就会在纯粹幻想时不大可能出现的范围里提供一种周期性的‘注意’。当B观察A挑选物品时,B显然看到A正在选择特征上完全不

同的物品,忽视某些‘显而易见’的特征,挑选了连 B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非常怪异的特征。但是 A 感到自己不像在选择,而像被那些在他看来仿佛确是物品的客观特征的东西所驱迫和吸引。”(p.154) 393

尽管我对我的自我的认识还有问题,但我对“我是什么”的意识不是一个遥远的或抽象的推论,而是直接的。有一件事情应该考虑,凡在精神分析中,同样,凡在本书中,被说成与自我有关的东西是否都能应用于各种各样的被称之为“我(是……)”(I),“(……是)我”(me)和“我自己”(myself)的概念呢?或者是否能与这些概念等量齐观呢?此外,刚才引述的临床观察也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在精神分析的所有成功的案例里,是否都能看到说话的用词从“它”转变为“我”呢?凡治疗成功的病人在描述自己的时候都从被动语态转到主动语态吗?在其他一些心理治疗中也发生同样的过程吗?

结 论

精神分析的自我范式揭示了贯穿于神经症、治疗和自我发展的共同原理,这样也就重新获得了当内驱力范式被特殊的概念和修正抽去容纳自我现象时所失去的简洁性。埃里克森、里古和洛华德都已从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里引用了相同的原理,并且构筑了本质上相同的自我范式学说,尽管在某些专业术语上是不同的。自我范式学说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其他科学范式:这种研究方法,即精神分析的病例研究,通过一种理论而把大量的发现结合起来。一些重要的发现起着范式的作用,例如对被压抑的愿望的乔装表现的梦的解释;对主动重复被动体验的儿

394

童的游戏的解释。病人的行为和症状被看作是应予治疗的疑难问题(严格说来,当发现某些病例揭示了若干共同的成分时,它们和其他科学的比较就更准确了)。但是,即便把精神分析范式中最成功的地方和更为精确的科学相比较,也无法抵消含糊、拙劣的推理研究或对弗洛伊德和其他老资格的分析学家的权威的盲目崇拜。范例的概念已被用来标志思想结构中的一个兴趣,而不是学术著作中的文字。精神分析也像它的对手一样,宣称要和各门严谨的科学相比较,不仅比较理论、方法和资料的协调性,而且也比较普遍规律的基本假设和物理决定论。

不考虑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而专讲精神分析,并不是对它作为一种疗法而具有的疗效进行评判,而是因为它对自我发展的理论作出了贡献。虽然从1845年第一版的格里辛格(W. Griesinger)心理治疗学的教科书[选录于奥尔苏利(Altschule), 1965]中已经能够见到有关自我功能的成熟的讨论,但是我知道其他学派既没有对自我发展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也没有任何要发现对自我发展、神经症和治疗具有共性的原理意图。只有那些把诊断、分类和各种疾病分类学中的症状作为天职的精神病学学派才代表了亚里斯多德推理的遗风,尽管它的许多文章也会含有当代面貌的数字表格。

一个重新提出来的问题里,认知的或结构的解释能否取代心理动力学的解释?这个问题在第十二章是跟个体身上自我发展的局限性问题一起提出来的。在第十六章论及H.S. 沙利文和皮亚杰有关青春期良心发展的文章中还将再次出现。科尔伯格(1966)就常常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关于性别角色的自居(认同)。他说,儿童首先学会把他自己看作永久地属于某一性别的,就像他知道其他物体的永久性一样。然后,他以同性的其他儿童和成人自居(认同),并且倾向于选择同性的父亲,因为他认

识父亲就像认识他自己一样。这个观点和精神分析关于只有通过恋母情结阶段才会以双亲中的同性自居(认同)的假设相反。霍罗维兹(1974a, 1974b)有关心理治疗的认知研究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科尔伯格经常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在认知发展和精神分析解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霍罗维兹把认知解释作为精神分析心理玄学内结构观点的一个特征。无论从他们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排斥的方面来看,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我假设女孩子妒忌男孩的阴茎,是因为她们都假定愉快是和可见物的尺寸成正比的,那么这是弗洛伊德的假设还是皮亚杰派的假设呢?或者作出这种区别已经过时了吗?布罗奇(1973)因为把认知的解释和精神分析的解释混淆起来而受到公开的批评,但他还是争辩说它们在临床方面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395

最后,无论是否把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这都是一个不值得为之争论的问题。范式的思想已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了。我们研究的问题是:自我一致的标准能够应用到精神分析的推理上去吗?从被动语态转变为主动语态是成功的疗法标志吗?“它”能完全变成“我”吗?

注 释

- [1] 本节摘自洛华德的诸多论文(1951, 1960, 1962a, 1962b, 1970, 1971a, 1971b, 1971c)。洛华德决定保留本能(*instinct*)和心力(*psychic energy*)这两个术语。这是因为前一个术语已成为“*Trieb*”的正式译名,而这两个术语的本意都是指人类的情感。虽然这一曾在理论上产生过异议的热力学的涵义新近在意思上有所改变,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现象学那里借过来的生物学和化学的术语。洛华德认为这些术语能恢复到它们原来的前科学涵义,但我认为他错了。

第十六章 良心的起源

396 良心(Conscience)的起源问题已经载入我们的编年史。它是怎样引诱一些人去设想一项永远不能还清的债务,去肩负一项永远不能履行的义务,去接受一项永远不能逃避的惩罚的呢?良心起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已由穆勒、霍布豪斯、杜威和塔夫特(J. H. Tufts)以及麦独孤(第十一章)用各种方法来描述。本章的目的旨在从理论上对良心的起源进行考察。

397 按照常识和通俗说法,我们给良心取名的经验是什么?由于良心从经验上可能对不同年龄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此其发展过程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一个指导思想是肯定具有某种成熟的良心概念。同时,我们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在成熟的良心的必要前提中,具有与成熟的良心显然对立的行为或态度。要是谁在发展的某一点上说:“良心从这里开始”,这可以证明是武断的。

良心的现象

良心的要素包括责任感,包括对过去的行为和感受以及对将来的行为和感受负有责任,也即自我批评的能力、标准和理想。所有这些观念似乎都直接含有良心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

具有不同的发展根源,即便在逻辑上并不是独立的。

除非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良心便没有意义,这种责任包括思想和感受。也许在日常用语中最接近责任的说法是责备。在良心这一词汇中责备是最先获得的语词之一。责备涉及到过去并对过去负有责任。它有责备别人的涵义,但不排除责备自己。责任还含有对现在和将来的义务。负责、责任、义务既包括认知方面也包括动机方面,还包括一组概念、权利、义务、特权等等。此外,还一定有某种吸引力、号召力或承担义务。不管一个人有没有清晰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要想履行自己的义务,承认别人的权利,并不是生来就明白的。

良心首先是一个反省的概念,它含有自我批评,因而也包括自我观察——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自觉。也许自觉是有关自我观察的一种早期的模糊的观点。所有这种反省的(reflexive)术语只应用于具有某种自我意识的人。在自我发展方面最早出现的问题是自我和非我的区别,因而这个问题就成了良心反省方面的先驱。即使我们在良心范畴内包括对违背准则而受到惩罚的恐惧,这里仍然包含某种自我意识。 398

一种包括在良心之内但并不构成良心定义的反省品质叫自制。某种最低限度的自制能力对于成熟的良心达到最高限度的发展序列来说是先决条件,但失误会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生。把冲动与控制区别开来是最基本的。一贯正确的控制是良好的行为,它是一个与良心不同的问题(本文不讨论过度控制的问题)。

也许良心的最基本的方面是自我批评的情感成分,包括羞耻、惭愧和内疚。埃里克森(1950)描述过羞耻的情感、赤身裸体时的情感、被对手或具有敌意的评论家“攻击”(put down)时的情感。虽然羞耻与惭愧的区别并不常见,但人们还是能把这两种情感区别开来的。感到惭愧意指比羞耻较甚的自贬,例如,一个

人在他所爱的人面前感到惭愧。按照儿童的想法,当儿童从感到羞耻进而发展到感到惭愧时,所变化的并不是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尽管这些人不是他的双亲,而是他把他们像所爱的人一样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同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责备和羞辱。

一个人感到惭愧,不只因为他对这些行为负责,还会因为那些不能由他负责的特征,诸如畸形脚和私生子,而感到惭愧。有人为某些行为感到内疚,本来可以不那么做的,而且也常常作出表示抵制思想感情。内疚与耻辱不大相同,但是与惭愧却比较相似;在良心的内化和发展过程中,它要比羞耻和惭愧高级。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听众或观众,在他们面前,感到惭愧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的情境对内疚的感觉并不重要。判断别人是感到惭愧的核心,自我判断是感到内疚的核心。

399 良心的一个不同的要素包含在坚持标准和为理想而奋斗之中。这里强调的是“应该”,而不是“不应该”,强调奋斗,而不是强制。其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人可以因为没有坚持标准,或者没有为理想而奋斗从而批评自己。然而,自我批评的起源和理想的起源是不同的。成熟的良心所忠于的最终理想是公正的理想;科尔伯格就是这样主张的(见第五章)。公正的观念包含两层意思,即公正的理想和公正得以实现的感受,这就是标准和承担义务两个方面。

要想完整地解释像良心那样的如此丰富和多样的经验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加上一个附加的要求:无私(disinterestedness)。具有真正成熟的良心的人有这种可能性,甚至有这样一种倾向,虽然不像爱他自己那样爱其他人,至少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立场。这种态度包括把别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还包含超越利己主义和仅以服从能使良心得到满足的倾向这两个方面。

超我和自我的理想

在转向某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观念时,必须放弃或多或少用来限定我们视野的现象学的方法。在当代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良心、超我和自我理想这些术语有相互矛盾的用法。正如弗洛伊德一会儿交替使用这些术语,一会儿使这些术语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一样。这里,良心这一术语最初是根据它的涵义,从日常用语中获得的,只是在忠实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修改。至于超我和自我理想这些术语,我是根据最常用的当代的意义来运用这些术语的。由于目的是洞察发展的起源,那就不需要独创性,也不需要文献作全面的回顾。

陈(I. Chein, 1972)把他的有关精神分析结构理论的观点概述如下:自我和超我是道德的;自我和本我追求愿望的满足;而超我和本我是陈旧的和原始的。这一公式表明为什么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概念没有一个可以省略。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超我的发展究竟是“自我”发展的一个方面,还是一个独立的过程。目前只要知道超我的概念不能省略就可以了。 400

弗罗格尔(J. C. Flugel, 1945)在全面讨论成熟良心的各种起源时,描述了四个本质上独立的来源,并承认特殊的行为同时反映了这四个来源的影响。第一个来源是理想本身或自我理想。第二个来源是把道德态度与别人的告诫、特别是父母的告诫相结合。弗罗格尔把这两个来源称之为自我理想,以便与超我相区别。这两个来源在弗洛伊德之前已为人所了解,特别是为鲍德温和麦独孤所熟知。第三个来源是不利于自己的寻衅行为。至于第四个来源,弗罗格尔最初称之为施虐—受虐狂,但有时为

了便于掌握也使用别的术语。后者将在这里加以强调。最后两个来源,弗罗格尔称之为超我,它们代表了对精神分析的独特贡献。现在,我将运用与弗罗格尔相似的但又不局限于他所使用的术语,按我认为的发展序列来讨论这四个来源(其他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在下列这些方面发生分歧:把什么样的作用归诸于自我理想和超我;究竟把自我理想看作是超我的前提,还是把超我看作是自我理想的前提)。

格罗特(Lampl-de Groot, 1962)由于受到弗罗格尔的影响(格罗特, 1949),在一篇简洁而精辟的文章里探讨了超我和自我理想的来源。自我理想开始于最初自恋阶段幼儿的“幻觉愿望的实现”。当幼儿意识到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时,幻觉愿望的实现由万能的壮观的幻想所取代。当他的这一点幻想也破灭之后,就产生理想和道德。对格罗特来说,全部程序主要是愿望实现。

401 由于认为良心与超我相等,格罗特从不愉快的经验着手,在一个独立的顺序里探讨了超我的起源。有些不愉快的经验后来构成父母的限制和要求,也即孩子服从父母以保持父母的爱。在下一阶段,这些要求通过自居(认同)作用被内化。最后,这个孩子接受了各项限制并形成了良心,借以保证他与父母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更广泛的群体的社会关系。超我始终起着限制的作用。

格罗特问:既然这两个顺序如此不同,那么,又为何把它们视作一个顺序,在自我范围内建立一个单独的机构(agency)或亚结构(substructure)呢?她的回答虽然采用不同的方法,但父母的形象在两个顺序中都起着决定作用的观察;自我理想与仿效父母有关,而超我与实现父母的要求有关。虽然它们的目的是对立的,但是,由自我理想所支配的愿望实现与由超我所支配的限

制和禁止这两个机构在实践中可以合并成一个亚结构,并且彼此影响其功能。所以,理想归根结底可以体验为要求。

格罗特因为把自我理想说成是自我功能和自我范围内的亚结构而感到歉意。这种两重性的说法是一个令其他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确实,解决的办法在于,自我发展的过程总是朝向结构化的,这就需要创造自我范围内的亚结构。在形式上,自我发展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吗?功能的分化和结构的形成是描述同一组现象的两个方法;只是具体的思维习惯使它们听起来像不同的东西。

解释早期发展的一个困难在于,成人的生活语言无法适应。“幻觉的愿望实现”似乎含有三种要素:愿望、无法实现的知觉、实现假的知觉。在幼儿时期,这样的顺序是不可信的。相反地,愿望和知觉必须融合;希望吮吸母亲的乳汁和想象它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区别。愿望不能实现的失望是造成愿望和愿望实现的知觉分开的原因[参见斯切特尔(E.G.Schachtel),1959;谢皮尔, 402 1970]

精神分析完全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弗罗格尔认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像一下子产生的超我那样复杂,弗洛伊德在其论述中也隐含着这一点,即超我是恋母情结的后代。由于格罗特对发展的起源作了更深入的探究,弗罗格尔所坚持的观点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就是:把良心的起源确定在潜伏期是否比把性欲的起源确定在青春期更有根据?

良心的发展

为了重建良心的发展,我借助了上述的来源和其他一些来

源,也包括我自己的反省。良心的发展还不足以用来指导观察;人们至少不能在低水平的推理上来讨论它。我试图运用那些能详细说明和相当清楚地观察事物的概念。

幼儿一开始就具有通过想象实现愿望的能力。不能达到追求的满足导致了愿望和知觉之间,以及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此后不久,最初的思维加工明显地占据优势,在说话时儿童采取了自以为是和企图实现其他一些愿望的幻想形式。他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理解幻想的万能和自以为是的自我,正如把自己理想化的一些解释那样。他的思想容易波动,而且结构不大严密。他不会区别现实和幻想,不会区别真实的自己和理想化的或所希望的自己。确立这种区别是与承认自己理想化的或所希望的自我形象的非现实性相一致的。

同样,当他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把一切权力归于他的父母时,他就不再对理想化和现实的自我形象感到兴趣。在双亲所表现的行为和他们应该表现的行为之间,作出区别是和双亲(以及其他入)必须服从的规则和标准或多或少一样的。在儿童具有抽象的行为标准之前,权力本身就是正义(科尔伯格, 1971)。即使古代的形式,总还坚持和继续着某些影响,真正的理想和道德可以在这一遗痕上找到——也就是说,取代对自己和双亲的理想化。

上述是结构或形式方面的问题。儿童的各项标准的内容,在他的道德结构已经确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继续改变。首先从费伦齐(1925)所说的“括约肌道德”开始,儿童从权力遵奉的道德着手,然后,在顺利的情况下,发展到自我评价的标准,在特殊的情况下,发展到公正的无私标准。这是科尔伯格(1971)非常详细地探究过的发展。

自恋。这是弗洛伊德上述顺序提出的心理动力的解释。儿

童把他的自私,从他的现实自我转移到自我理想,这就能够保持那些现实,迫使他去承认他所没有的完美境界(第十四章)。另一种动力的解释来自奥苏贝尔(第五章)。面对灾难失去自尊的儿童,当他学会了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时,他就会变成一个父母权力下的卫星,在他们的光辉照耀下发亮。实际上人们能够接受弗洛伊德和奥苏贝尔的解释;两者似乎并不矛盾,而且和那些对顺序作出形式说明的纯认知的解释也不矛盾。奥苏贝尔所说的自尊难道不是自恋的翻版吗?

寻衅。愿望无法实现是另一条发展路线的起点,其结果是转过来侵犯自己。我们可以说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婴儿只有愿望或冲动,只要我们对这些术语并不赋予更多的意思。这些愿望的受挫,即使是暂时的,也一定会导致某种接近寻衅的行为。当人们适当地谈论攻击性冲动的时候,虽然可以在这些孩子身上观察到他们好像在生气,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越过冲动和实现相结合的最初状态。根据弗罗格尔的观察,孩子寻衅的目标是他自己。冲动的控制,甚至由自身利益激起的控制要比冲动本身的构成来得迟。只要有冲动的表示,其体验要比任何一种自身利益需要的控制更具激发作用,此时,对自己的直接侵犯就有可能发生。由于在儿童身上,长时间内冲动超过控制居优势,因此侵犯自己的通道就可能长时间开着。确实,自斥和不加掩饰的自我侵犯通常是低级的自我迹象[卢文格和韦斯勒(R. Wessler), 1970]。在这时,冲动的控制部分是指向对自身的侵犯。冲动与控制的区别意味着对自己一分为二,意味着一个较高的结构程度。冲动的控制乃是寻衅的最重要的转变,即不再指向自己。以后,指向自己的各种寻衅行为就会感到耻辱,感到内疚,感到惭愧。这些情感的获得,可以保留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就所有那些消极的感情而论,成熟的良心可能是健全的,因而能够容忍

自己,也能容忍别人。

控制。控制(mastery)的内驱力与寻衅的内驱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由寻衅的内驱力派生出来的。控制的内驱力和寻衅的内驱力又是各自独立的,每一个内驱力都能转向内部,没有必要再去探究人们在良心起源方面的兴趣。需要掌握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人们必须处理他们已经遭受到的痛苦,也就是说,经验是通过人们积极地重复曾消极地经历过的事件而掌握的(第十四章和十五章)。弗洛伊德用这一原则解释儿童的游戏,梦中不愉快的移情经验和创伤、性事件的重复、焦虑以及冲动的控制和超我的形成等等。安娜·弗洛伊德、弗罗格尔、埃里克森、洛华德和里占,无疑还有其他人,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曾提出相似的观点。在拜读了这些作者和其他人的论文之后,我要说它们是如何影响我的。

405 如果说经验是通过人们积极地重复曾消极地经历过的事件,或者说是通过“幻觉愿望的实现”,即初期的令人满意的冲动性想象而掌握的,这是毫无道理的。即使冲动的形成允许一定程度的由寻衅和生气伴随的令人不快的知觉,仍然是不够的。经验必须用某种更为一致的方法来构成,使人们能意味深长地谈论掌握它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要谈论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婴儿。

哪些经验使得儿童觉得需要去掌握它?弗洛伊德的例子是,生病就医以及所爱的人或物暂时或永久地丧失。按照费尼齐尔(O.Fenichel)的说法,每当儿童处于“充满了大量刺激的时候”(1945,p.44),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境:试图通过在游戏中积极地再现而掌握它。他也会无休止地重复新近获得的但尚未完全自动化的技能,正如亨德里克(I.Hendrick,1942)指出的那样,重复什么样的技能,似乎和需要(内驱力?本能?)有关。不论这

—原则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多少种限制,但它仍然是一个自我作用的主要模式。

在良心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是一种内驱力。儿童的冲动必须受到他父母的约束。由于儿童受到父母的约束和控制,他就想约束和控制父母,但是他不能也不敢。这种情感加倍地使儿童感到灰心,因为他不但受到控制,而且还要防止自己作出受控制的自然反应。但是这里包含的需要是可塑的,儿童将启用一个新的受害者来对付使他备受否认的人。有时,受害者可能是一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或小伙伴,但不管怎样,他在这方面也是受约束的,而最终的受害者无疑是这个孩子本人。他通过全部或部分扮演父母的角色来控制这一情境。这一角色扮演是自制的根源,是区别冲动与控制的根源,是自我形成与超我形成的部分动力(第十四章和十五章)。

一个人把遭受别人的痛苦还给别人,形式上与原始的解脱机制相似。不仅相似,所包含的相似点在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经验掌握方面或多或少反映了解脱的发展。这些冲动的一个结 406
果是恩怨必须平衡的意义。最初这一意义具有报复和以牙还牙的法律形式。在良心的发展过程中,以牙还牙的法律形式所起的作用已为穆勒、韦斯特麦克(E. Westermarck, 1906)、霍布豪斯(1906)和奥迪尔(C. Odier, 1943)所承认。

穆勒[(1861)1965]指出,希望惩罚那些对别人曾经作出伤害的人是一种自然的感情,这种情感来自两种冲动,即“自我防御的冲动和同情的感受”(p. 306)。我们希望报复或反击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或那些争夺我们同情的小动物的人,或那些试图伤害曾经伤害他们或他们小辈的人。凭借我们的理智,我们的同情心的范围可能扩展,不仅仅扩展到我们的孩子,而且扩展到宗族、国家或人类。因而,穆勒所称的“正义感”,包括惩罚

的愿望,他认为本身没有道德。道德的东西是指完全服从社会的利益。以牙还牙的法则是-一个原始的和自发的正义感的受人欢迎的原则,而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仍然是一个秘密追求的东西:“当报应以恰当的形式偶然降临到罪犯身上时,普遍的满意感表明,这种以牙还牙的偿还手段是可以接受的,也是非常自然的。”[穆勒,(1861)1965,p.313]

407 **父母的标准。**由弗罗格尔确定的良心的第四个要素是把父母的禁令、标准和理想变成自己的禁令、标准和理想。人们可以用这样一些术语来谈论孩子在组织他的经验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他需要一个起码的准则观念,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心理发展,而不是仅仅通过活动来掌握。把年龄列入这一成就实属不易,不仅因为有着明显的个体差异,而且因为把一个日期放在缓慢演变的概念里有着内在的模棱两可性(第八章)。为了进一步探究儿童采择或接受父母标准的意义和机制,我们必须回到早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讨论过的一些问题上来,这些问题与安娜·弗洛伊德(1936)关于寻衅的自居(认同)作用的讨论相似。

互爱。良心的第五个要素已经用各种方法表述过了;像评价自己一样评价别人;评价别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了解别人观点的能力。在它达到最高和最难的程度时,这一要素就变成了无私,即处于与儿童和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的对立极,达到律师们所称的“秉公气质”的目的。

对良心来说,这第五个贡献者的出发点是爱,或者说是人类的契约。在解释利他主义(altruism)时,爱和良心是可供选择的,一个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的是追求他的孩子或配偶的利益,但是为某个比较疏远的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对这种良心来说,上述观点就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据。同时,一个人如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爱的良心,要获得发展是难以置信的。孩子对他父母

的爱包含接受父母的标准和理想,也包含上述在解释良心的形成时那些并不直接的其他方面的东西。

然而,孩子对父母的爱本质上是一个不对称的关系。对称的爱、对同伴的爱,对成熟良心的发展来说似乎是必要的。这确实是幼年后期和青年早期的一个新的要素,并且是无法避免的。

弗洛伊德的报告(1921)假设了下列程序:儿童因为父母爱他的兄弟姐妹而感到嫉妒。在争取父母关爱的影响下,对兄弟姐妹的敌意感情转化为自居(认同)作用。同等待遇的要求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作为嫉妒形成的一种反应,并依次成为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

沙利文(H.S.Sullivan)的贡献在于他对前青春期伙伴这一角色的观察(第五章)。在与伙伴相处中,青少年第一次学会评价别人应该像评价自己一样;珍惜他人的成就和幸福应该像珍惜自己的一样。一个人为伙伴的幸福感到欣喜并不是无私的,而是一种基本的追求。通过自己与别人的感情交流,接受别人观点的能力成熟了;这些经验为少数人达到无私铺平了道路。最高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这些经验或类似的经验中可以找到它们的根源;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它们不可能在先于同性伙伴的关系之前的性关系中得到发展。

408

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皮亚杰用不同的术语涉及到同样的发展观(第五章)。皮亚杰从儿童单方面对父母的尊重到他对其他儿童互相的和平等的尊重的转化中,看到了儿童从他律到自律的关键。

沙利文强调孤独的感情迫使青少年与伙伴建立排他的关系。皮亚杰强调认知的方面和与同辈人交往的需要。两位作者都发现过渡在青春前期,或者说在12岁。像他们的推理一样,不同的是他们把我们带到同一个观点上来;认识到自己是同辈

社会的一员,从而摆脱权力主义的遵奉,这对于良心的成熟来说是必要的。

光是感情共鸣对创造“秉公气质”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个步骤或前提。说得更确切些,服从的道德,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共鸣的转化,就不可能导致良心的最高状态。有关良心发展的谬论之一在这一点上被揭露出来。我们可能期望在我们研究的领域里创造或促进良心的成熟,但是根据这些东西的性质,没有直接的方法使它们超越服从的道德。不管有没有维护道德的约束力,通过教诲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至多只能产生大于责任的无私。

来源和阶段

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五个或多或减少对成熟良心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独立来源。这些来源的发展次序是:(1)自我意识的形成;
409 (2)指向自己的寻衅;(3)控制的需要;(4)采纳父母的戒律和标准;(5)互爱和尊重。

每一个来源在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有其根源:

1. 理想的自我,更确切地说是理想化的自我,其根源在自我意识中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自恋时期;这一发展最终成为自我理想。这一发展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前社会阶段的自我和非我的区别。

2. 指向自己的寻衅可以在许多婴儿中观察到,并且是冲动阶段的一个特征;来不及计算利益就按冲动行事,恰恰是冲动阶段的标准之一。冲动和控制至少可以从指向自己的寻衅中获得它的某种力量,以后耻辱和内疚也是这种情况。

3. 控制的需要,包括自我控制,例如防御内外的危险,是自我保护阶段的特征。

4. 采纳和以父母及其他人的规则 and 标准自居(认同)显然是遵奉阶段的一个特征。

5. 最后,互爱和尊重是良心阶段的特殊潜力。从这些潜力中发展了对个体差异的宽容和对公正的忠诚,后者标志着良心的最高等级以及自我发展的自主的和综合的阶段。

当这些组成部分半独立地有助于良心的形成时,它们不是独立的发展线索。相反地,良心的成熟和自我发展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至于构成了一个有关事件的单一的复杂的序列。但是,我们不能说自我和良心就是一个东西,或者说这两个术语是可以省略的。实际上,这两个术语来自不同的领域。然而,良心发展的各个阶段与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紧密地并行着,而且一个人用以解释良心发展的动力原则是与解释自我发展的原则一样的或重叠的。 410

作为向导的良心

最后一个争论是,良心或者说自我理想本身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动态原则。向导(pacer)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词,是第十二章讨论过的题目。“如果对一个人发生效力,并促使个体的改变,这就是向导……因为他和这个向导保持着积极的接触并最终掌握了它,他自己的复杂水平也得以提高,他为成为一个新的向导而作好准备。”[丹姆伯(W.N.Dember),1965,p.421]

把良心看作是向导至少可以追溯到鲍德温时期(第十一章)。在把年幼儿童从成人那儿学到的适应的自我和他欺骗年

龄比他小的习惯的自我进行对比的过程中,鲍德温预先提出了弗洛伊德后来根据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的控制才阐明的原则。儿童最终发展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种理想的自我最早体现在由父母和老师建立的标准上,随着发展,儿童把理想的自我掺入到习惯的自我中去,当他取得进步时,新的模式就为他建立起来。因此,他的“道德顿悟必须找到它的最深刻的表达,因为期待向往并不超出这种理想”(鲍德温,1977,p.42)。

洛华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但更为复杂的观点(第十五章)。对洛华德来说,心理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介于更有组织的或更成熟的心理结构和缺乏组织或不大成熟的心理结构之间的压力。最初是母亲把创造这种条件的功能付诸实现。随着孩子的成长,这种在缺乏组织的结构和有组织

411 的结构之间的压力,就会内化为本我(无意识的)和自我(有意识的和前意识的)之间的压力,或者内化为自我和自我理想或超我之间的压力。超我体现了对未来的希望、理想和抱负;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功能,而且是由于它的性质。当那些抱负得以实现,并成为习惯时,它们也就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而孩子或成人便有了新的抱负。因此,超我并不代表一个有关抱负和禁令的固定程序,相反地,“超我”是把理想和抱负公式化的功能的一个名词。超我是借现在来体现未来。洛华德把良心描绘成超我的“声音”。从整体来看,超我这一术语的用法在本章近似良心这一术语的用法。

在丹姆伯的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验中得出的向导概念、鲍德温的作为向导的理想自我的概念,以及洛华德的作为自我发展的向导的超我观念之间,其相似性是引人注目的。

结 论

有关良心的可以辨别的要素来源于自我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作为动物的人类这一观点来看,正如尼采和里古所说,良心是一种病态;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又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和一切文化的起始。良心的起源在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良心以自恋和人际关系为基础。良心起源于爱和寻衅。良心在其性质上是对父母和孩子的不平等地位的再现和纪念;然而,就其最丰富和最难得的良心来说,它又超越了一切不平等的地位。

下面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出来,与其说我们的整个编年史是自我发展的历史,还不如说我们的整个编年史是超我发展的历史。自我这一领域是根据经验和它自己的一致性来下定义的。其道德的、人际的,以及认知的要素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以至于无法从概念上或发展上予以区别。良心的发展是该序列的一个综合部分。不管人们是把超我看作良心的另一个术语,还是把超我看作部分从属于良心或自我,部分独立于良心或自我 412 的一组功能,它的发展是正常地服从于自我发展的。当超我具有另一种意义时,它涉及到良心的旧时的和刻板的来源[谢弗(R. Schafer),1974]。自我发展和超我发展是两个独立的课题,这两个独立的课题究竟已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需要弄清楚的,但本书的课题是自我的发展。

第十七章 走向一个明确表达的概念和理论

413 科学家像恋人一样——他们到处看到可以引起对他们爱人回忆的东西。我们在许多地方,远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已经发现了有关我们课题的提示。在图 8,涉及到本书论题的一些相互关系被提纲挈领地揭示出来。自我发展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一种具有独特的概念、问题、测量方法、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训练,光靠一本书是无法公正对待得了的。许多作者运用独特的观察丰富了我们不同阶段和类型的了解。也许最生动和最有趣的描述是亚类型,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描述。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各阶段,着重动力的、动机的,或多或少有关阶段和过渡的理论解释,然后转向适用于所有阶段或几个阶段的理论。

414 不能把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婴儿描述成具有自我的。婴儿的动作可以被描述为由本能的内驱力所驱使的,并且最初是受反射指导的,但首先这些内驱力和反射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皮亚杰、洛华德)。^[1]当婴儿的反应逐渐向有意义的行为发展时,婴儿同时作出对现实的相关建构。在每一步,他的现实和他的发展的自己或自我都是相互构造的[费尼齐尔,1945;洛华德;卡勒(E. Kahler)]。这一自我形成的时期在我们的方案中被描述为我向思考或前社会阶段。一个不经过幼儿期而在前社会模式中进行操作的人,要想顺利通过我们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

415

的。大多数这样的成人也许被安置在公共机构里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例如生活在流浪汉的帐篷里。这一时期在临床文献中所占篇幅较多。

许多学者把冲动阶段作为自我发展的下限。其病理学的典型是受冲动支配的人格和热情的精神病患者,后者与冷漠的精神病患者相反,是自我保护阶段的一个亚类型。许多儿童在迈入青春期时仍然处于冲动阶段,但并没有看到显著的反常现象,虽然这可能取决于社会环境。这一类成人可能作出勉强的正常调节,通常成为游民或居于奴仆地位。冲动的性格类型与刘易斯(O. Lewis, 1966)所描述的“贫乏的教养”有共同之处,但确实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格雷夫斯(C. W. Graves)把冲动阶段到自我保护阶段的过渡称之为中间阶段,即“觉醒和惊吓”。一个人意识到本身有吃惊的冲动和迷惑世界的力量,因此他渴望一个道德上规定的、必须硬性执行的不变的秩序。自主和民主对他并不相宜;他喜欢专制,如果允许的话,他会选择专制而不是民主。很显然,格雷夫斯已经发现低级自我水平和法西斯倾向联盟的一个动力。

有关自我保护阶段常见的明确描述是艾萨克斯的 Delta 阶段。典型的权力主义人格属于这一阶段,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喜欢服从和被服从(阿多诺)。沙利文对有些儿童“敌意移情”的描述,即认为自己生活在敌人中间,能够解释儿童的温柔是怎样转换的。这一阶段的实质,即正常儿童和遭难成人共有的特质,被科尔伯格称之为朴素的工具的享乐主义。行为是由快乐和痛苦、奖励和惩罚来支配的,因而是享乐主义。工具主义这一术语涉及到别人和对社会准则的权宜的或功利主义的关系。朴素这一术语涉及到奖励的具体性质和近期的个人利益。专注于具体的获益和近期的好处,不仅是正常儿童的特性,也是这一类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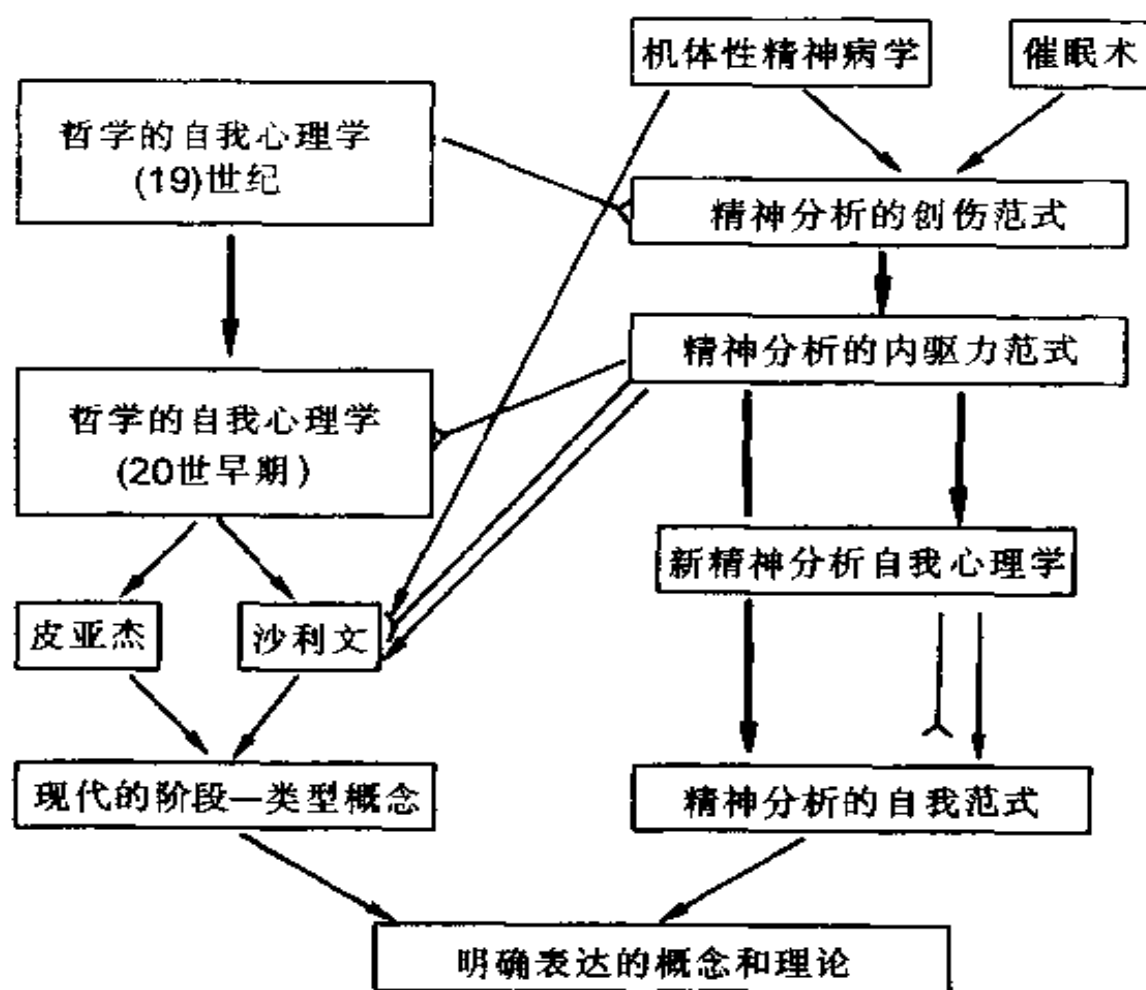


图8 自我发展的概念和理论发展史图解

有理智的成人的特征,而往往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暴露和失败。

自我关心(self-interest)可能引导儿童从冲动过渡到自我保护的功利主义,但过渡到遵奉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儿童长期自私下去是不行的,因为必须放弃自我关心才能有助于互利和同一性。这一过渡的最生动的唤起是奥苏贝尔(D. P. Ausubel)的卫星化描述。弗洛伊德用自恋这一术语作了颇为相似的描述,而奥苏贝尔则指自尊。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观点中,结果是儿童

获得自我理想,省略了奥苏贝尔所强调的一个阶段,这里,理想是由全能的父母为代表的。

遵奉类型比任何其他类型为更多的学者所承认和描述。穆勒了解到遵奉的压力起自于一个人把强烈的冲动隶属于社会控制之下的需要,但是他的论文《论自由》(*On Liberty*)最初关心的是遵奉个体充分发展所带来的危险。不久,心理学家就把“调节”假设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合乎需要的状态,并且很容易把它与遵奉社会规范相等同。对该等式的不满是心理学内部的一个动力,它导致了我们的论题。

有关遵奉类型的许多描述存在差异。沙利文认为一个人无法感受对别人的价值,而艾萨克斯则从描述高尚、体贴、帮助、分享甘苦开始,帕克认为遵奉者能知耻但不会犯罪,而别人则认为犯规就是犯罪。这些差异可能代表了遵奉的不同亚型,或者涉及到遵奉与前后阶段之间划定界限的差别。沙利文、格兰特(J. D. Grant)似乎在遵奉阶段的后一阶段找到了认同(自居)作用的开始;艾萨克斯则在遵奉的前一个阶段看到认同作用的起源。这种不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认同作用是对动力进行理论解释的一个要素。然而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术语是描述自我阶段得以改变的各个过程的一个名称。有些精神分析家喜欢用其他术语,诸如内化或心力内投,用以划定过程演变的界限(洛华德、埃里克森、桑福特,1955;谢弗),但用法并不一致。

417

大多数美国青年和成人处在遵奉阶段或良心阶段,或者处在两者之间,根据研究结果(卢文格、科尔伯格),我们称之为自我意识或良心遵奉水平。对沙利文来说,从遵奉阶段过渡是良心阶段是在青春前期,经过交友的过程完成的。对佩里来说,在大学期间同样的过渡使大学生从二元的视界发展到多重性,然后发展到相对主义,最后发展到献身精神。

学者之间的分歧在更高阶段越发明显,这种分歧在于是否因为成熟的人格更加丰富和多样,或者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局限性和抱负投射到他们的最佳的表象上去。

那些对良心阶段以上的自我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具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有艾萨克斯、沙利文、格兰特、格兰特(沃伦)、科尔伯格、佩里、马斯洛,也许还有罗杰斯。对艾萨克斯来说,从 Beta 水平到 Alpha 水平的过渡到由奋斗为标志的,即承认自己和别人,承认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效应。对沙利文、格兰特和格兰特来说,过渡到第六和第七水平是以自我知觉的生长为标志的;同样也是以人际关系的改变为标志的。在第六个水平,人能够从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区分自己;在第七个水平,他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整合过程。罗杰斯声称要注意感受的更大直接性和个人在其连续统一体上端构念的流动性。后者和最高阶段的现实知觉的增强有着特殊的联系,用马斯洛的术语来说,就是“减少盲目性”。佩里强调的是奉献精神以及相对主义地看待世界;发展上成熟的奉献精神与不成熟的不加批判接受的信念和尊重别人的可供选择的信念是有区别的。容忍两可性(弗伦凯尔—布伦斯维克)和处理紧张生活的能力(罗杰斯、斯切特尔)是最高阶段的组成部分。

现在转向过渡阶段的理论(即转变理论)。该理论原则上适用于所有阶段,有 5 种情况:整体(monolithic)的或单一的动机理论、岁月(time-and-tide)理论、辩证理论、结构理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

整体理论来自单一阶段的动机,并使之成为所有阶段的说明以及阶段与阶段之间过渡的说明。仔细研究也许会发现,在每一阶段,有些理论家选择了一个显著的动机,并使之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确实,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可能有几个这样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会犯本体论(ontological)的错误;它们选择人类发展中某一阶段的动机,认为它千真万确,一切人类行为都是由此激发起来的,不管它有没有可能借助其他方式激发起来。我把这些观点斥之为谬误,不是因为它不真实,虽然单一的动机理论不可能都是真实的,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否认了本书的主题,本书的主题是动机的转化。

戈尔茨坦(K. Goldstein, 1939)和罗杰斯把自我实现的奋斗看作是主要动机。戈尔茨坦有关一个主要动机的论据是,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动机,则一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加以选择,他作出选择的原则就成为主要动机。罗杰斯和戈尔茨坦关心自我实现,认为它是最高阶段的动机特性,边沁借单一的动机来研究快乐和回避痛苦,从而为所有阶段作出像自我保护阶段那样的某种模式。同样,桑代克(E. L. Thorndike)根据他的效果律把寻求酬赏避免惩罚作为动机,而斯金纳的强化时间表(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使享乐主义得以更新。一些简化论者(还原论者)的理论甚至将他们的解释取决于反射、本能的内驱力,或中枢网状系统;我们并不关心这些理论,因为我们的论题超过他们的视野。在老式的主要动机理论中有对鲍德温的模仿,对亚当·史密斯和培因(A. Bain)的同情;这些理论都有遵奉者的特征。 419

我们回顾的一些学者中间,通常对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动机有所偏爱,虽然还不至于排除其他动机。对沙利文来说,避免焦虑在形成和维护自我系统方面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动机。奥苏贝尔强调自尊的重要性,看来它是麦独孤称之为自尊情操(self-regarding sentiment)的一个新版本。为了把自尊和别人眼中的尊重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动机,人们几乎必须处在良心阶段,也就是说不能跟麦独孤的观点离得太远,因为他把自尊看作是通向更高阶段的钥匙。也许,最接近麦独孤思想的可以

用我们的术语来翻译,这就是麦独孤把自尊看作是带领一个人进入良心阶段的那种东西。可是,奥苏贝尔则把自尊看作解释生活早期转化的动机力量,对此,精神分析家使用自恋这一术语,其涵义与早期自我发展更为一致。对阿德勒来说,为优越而奋斗在一个时期为主导动机,但是当他后来加上社会兴趣时,就成为一种本质上两阶段的理论:与自我保护阶段相一致的为优越而奋斗,以及与遵奉和良心阶段相一致的社会兴趣。

420 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中,主要动机是占统治地位的。然而这并不使它成为阿德勒为优越而奋斗的新的翻版。这种意象是自我保护时期的意象,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自我不仅应该努力掌握这一冲击(*impinging*)的世界,而且也应该掌握它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内部禁令。弗洛伊德要比阿德勒更明确:控制意味着自制占统治地位;而且,一个人必须把掌握自己的经验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掌握作为一个自我动机是一个极广泛极复杂的概念,无法把它列入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它跟芬加雷特(H. Fingarette)作为意义探究的自我特征颇为接近。自我实现可以看作是意义探究的最高形式。凯利(H. Kelly)否认动机概念的必要性;在他的体系中,最接近的对应词是一个预期事件的方法,这些事件显然接近意义的探究。如果皮亚杰有主要动机,那必定是适应。适应这一概念是许多或多或少遵奉的人所倾向的,虽然这样分类会使皮亚杰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意指的是比遵奉更广泛的东西。如果科尔伯格有一个主要动机,那必定是平衡。平衡和意义探究都是接近阿德勒的整体(*Einheit*)理论的,也就是接近一致性和统一性。

有些理论家坚持一种多元论的动机观点,以此表明他们并不提出一个主要动机:穆勒、帕克、马斯洛,也许还有艾萨克斯和沙利文、格兰特。他们都承认动机的转化,但缺乏一个过渡阶段

的动机,他们没有多谈一个人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的。

与整体理论相反,岁月理论并不选择任何独特的或可辨的动机。这些理论是根据各种不同影响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发展;格塞尔(A. Gesell)的著作是典型的。有些人把重点放在个体内部的成熟,有些人把重点放在改变环境的要求。岁月当然进入大多数理论之中,正如它们进入所有生活一样,但只作为辅助解释而不作为主要力量。在沙利文的理论中,自我发展的动机力量大部分是由各种物质和情绪的需要的成熟所提供的,也许是以内部的时间表为基础的。皮亚杰并不提及成熟的物质需要,但他认为社会的相互作用是使道德推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需要的来源。我们极大地忽视了社会学习理论家,因为他们很少涉及我们的论题,而把重点放到环境要求和奖励上,这和皮亚杰强调的环境完全不同。埃里克森对岁月的所有要素都赋予极大效应。其他一些学者,对自我发展受社会成熟影响广为宣扬,其中有奥苏贝尔和哈特曼、克里斯(E. Kris)和洛文斯坦(Loewenstein)。

也许,在自我发展理论中最古老最清晰的文章是那些辩证地阐述的文章。鲍德温的术语是个人生长的辩证法;对他来说,对话的双方是自我和改变,每一方都觉察和分析对方,并且通过知觉而逐渐得到改变,所以最终个人对别人的概念和对自己的概念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最早的观点来自亚当·史密斯,对他来说,同情指导着这一进程,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是其结果。库利补充了一个术语,叫镜中自我,即从别人的眼睛中反映出来的自我。这一思路在米德(M. Mead)所谓角色的内部对话的理论中达到高峰,这种角色作为自我的社会起源几乎表现在每个人身上。这些经典的辩证理论所缺乏的而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所出现

的是结构的概念。鲍德温的认识论研究(1906~1915)是结构理论的起源之一。

然而,角色对话的结果,不仅是社会观点的内部体现,而且还是辩证法本身的采纳。如果不去赞同哲学上令人讨厌的观点,诸如内部力量或内部要素,则这方面的自我发展是难以描述的。诸如力量和要素等术语具有令人讨厌的涵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谢弗(1972)也反对使用名词“内化”或形容词“内部的”。他说,此类术语是以一种空间的隐喻为基础的,对我们的理解并无促进作用,它导致了具体的思维方式,贬低了精确的概念化。对心灵结构的描述无疑依靠一种隐喻,它把心灵或自我变成一个地方,但是结构的严格定义是靠慢慢改变的稳定功能,并且按其相似性将功能归类;这里谢弗是追随哈特曼、克里斯、洛文斯坦和雷帕普特的定义的。这样他就把我们的观点和哈特曼—雷帕普特学派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了。我们所说的结构是由组织来定义的,它当然不是空间的,稳定性不是主要的(布莱西)。所以,我们使用“内化”或“内部的”等术语是以我们的结构概念为转移的。对谢弗的提问:“在什么里面?”我们的回答是,在结构里面。谢弗所描述的危险是真实的和值得关心的。不过,通过观察世界而了解个体经验和通过个体经验而了解世界是自我发展的原因,而隐喻为把握一个困难论题助了一臂之力。因此,我不承认一切空间的和机械的涵义,而是把一种辩证理论的形式描述为拟人化的内部力量。这是一种作为内部精神差异模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论。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与人的和谐和统治与国家的和谐之间的类比乃开内部力量拟人化理论的先河。杜威和塔夫特无疑把社会的分工,特别是法庭上的分工,看作为个人复杂性发展的起源,尤其是良心、超我、本我等概念,这在精神分析中通

常称之为结构理论。这一理论在精神分析家中间差不多是被普遍接受的。自我、超我和本我有时具有人体内三个侏儒的特征,这是最受贬斥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一,甚至在精神分析家本身,正如格罗斯曼(W. I. Grossman)和西蒙(B. Simon, 1969)所表示的,他们要捍卫心理学的科学体面。弗洛伊德不接受这一观点,即精神分析必须超越其拟人说,他说:“我们的理解与我们的拟人说是同步的。”[纽伯格(H. Nunberg)和费登(E. Federn), 1962, p. 136]

自我的辩证法和本能的冲动,这一精神分析的中心论题,与自我理论家诸如鲍德温和米德的角色辩证法结合,因为儿童的角色本身就是在他的冲动中体现出来的,他的自我最初是从父母的角色中借用来的。因此,根据我们论点的推导,是支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辩证法的拟人说是牢固地建立在哲学史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鲍德温、杜威、米德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儿童发展史的了解和推测。423

关于自我结构的最明确的事实是它的相当稳定性。大多数理论把自我稳定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不再提及;所有理论看来都是某种理论的变式,其主要支持者为沙利文。该理论的先见之明可以在阿德勒、甚至在赫尔巴特(J. F. Herbart)的文章中找到。根据这一理论,自我发展的每一阶段体现了人类的动机和与其功能模式相一致的人际关系观点。自我或自我系统掩盖了对人际关系的观察,因而和它的参照构架并不吻合。自我系统的目的,当然还有其他东西,乃在于防御焦虑,而超越自己的认识范围或界限的动机就会引起焦虑(沙利文)。因此,由于看错或有选择地漠视这些动机或关系,人们不得不为修改他的参照构架的痛苦命运作好准备。实际上这个理论和任何心理结构稳定性理论是一样的,不论是认知结构的理论(皮亚杰、梅洛

—庞蒂),抑或科学体系的结构(库恩)。一种结构或一种思想体系只有当观察与其基本前提相符合时才能被认作资料。因此它的稳定性对其功能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把范围扩大一下,自我的综合功能(纽伯格)和精神分析中的抗拒[维各特(A. Vergote)]与该理论是相似的。

科尔伯格严格地从结构前提得出一个变化理论:“道德的认知,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就像同样的基本理

极小的阶段概念,结构平衡在杜威和塔夫特看来不是一个突出的要素,虽然科尔伯格把所有精神分析家都归入学习理论家和相信文化规则直接内化的社会角色理论家这一类,但不平衡的概念与理想的错配在洛华德看来像任何地方一样清楚。再则,还有一个问题,结构平衡,包括稳定性和改变、固恋和进步,究竟能够达到多远。

有关向导的观点在涉及自我发展理论的实验心理学中得到确证[丹姆伯(W. N. Dember)]。对鲍德温来说,起源于双亲标准的理想的自我起着向导作用。对洛华德来说,超我起着向导作用;他的概念跟鲍德温相似,但更为发展,并和精神分析相连接。对科尔伯格来说,对道德推理下一阶段的争论和推导起着向导的作用。所以,很显然,科尔伯格只看到外部的向导,而鲍德温和洛华德则假设原本为外部榜样的内化。 425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那五种过渡的理论实际上是五个可供讨论的理论问题,不是相互排斥的理论或逻辑上并列的标题。现在讨论第五个标题,即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和本能的辩证法是一个经过所有三个时期或精神分析范式的中心主题,虽然词汇和概念的细节有所改变。自我的中心任务和动机是控制其本能的内驱力,控制环境、控制其自己的道德规则。确实,经验必须被掌握,办法是积极地重复消极经历的东西;那就是基本动力。

角色对话是儿童对双亲、冲动对控制、依赖对统治等同时并进。角色的每一次改变是恰如其分的,儿童的自我和他的改变是相当复杂的。自我的发展倾向于把更多的生活带入自我范围,从而牺牲了无意识的冲动。但是这种发展方向不可能尽善尽美;生活总是从冲动的源泉吸取它的生命力。而且,有时或者也许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倒退的成分,例如,自我理想防

卫和保护着儿童自恋的形成和采纳。这一程式近乎于洛华德的自我理论的翻版;其他一些人有着基本上与弗洛伊德相仿的学识,虽然在表达的确切方式上有所不同。

历史上,精神分析是在反对自我心理学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而自我心理学是在反对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得到促进的。确实,精神分析辩证法和自我心理学反映了权威人士的长期争论,并希望把里古的观点认作精神分析的中心主题,一方面发掘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另一方面发掘《图腾和禁忌》一书中的虚构的种族史。当代精神分析的自我范式,正如在埃里克森、洛华德、里古等学者那里所发现的那样,似乎体现了一种试图克服这种辩证法的对立方法,并把精神分析和自我心理学引入了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

本书的重点放在概念和理论上而不是放在研究上,至于实际应用方面则更少。但研究和应用总是在研究领域周围并可能使研究领域成形。我们不准回顾近代经验主义的研究,因为那只是该方法和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的片断,我们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可能性,着眼于本书有关观点的启发性价值。

最经常提出的研究计划,特别是由新手提出的研究计划,是测验某个合适的群体,然后穿插一个实验或等待一次诸如分娩之类的生活体验,然后再测验,观察自我的变化。理论上还无法证实这种愿望,即变化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室、课堂,甚至生活体验而在短期内发生。有些水平的测验可能会像一个教具,或测验体验本身的工具一样发生变化,但这不能作为自我结构改变的指示,因为自我结构是不易测量的。对于设计那些过分刺激被试的实验来说,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限制。然而,总而言之,设计那些鼓励自我发展的程序所引起的道德问题要比可供选择的程序,诸如行为矫正来得少。自我发展是生长,没有办法可以

强制的。一个人只能尝试去开门,他是否愿意穿过这扇门乃系他自己的选择。不过,有些研究者会获得顺利的改变。文章中能找出改变的包括监狱(科尔伯格)、心理治疗(艾萨克斯)、工作情境[拉斯克(H. Lasker)]和学校(科尔伯格;布莱西)。

实际应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我水平的改变。当一个人不论在哪里与人们一起工作,例如在教室里,在监狱里,在精神病医院,在心理治疗诊所,或者在工厂里,他必须通过他的自我去接近他们,情况就是如此。所以,不论我们的目的是教育的、治疗的、恢复健康的,还是行政管理的,自我发展的知识原则上是一样的。它带来多少实际益处还有待证实;没有人坚持说自我水平是唯一重要的变量。

427

运用这一概念的一个方向是把个体归入相似的自我水平的群体,以便给予教育或处理。沃伦、帕尔默(T. Palmer)、布莱西等人曾尝试过这一方法。然而,向导在引导改变方面的重要性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上述的益处,因为较高自我水平的成员能够提供一种适当的向导的观点给那些进步缓慢的人,通常不会冒退步的危险。所以自然的群体差异有其自己的益处。

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临床医生的兴趣,且不管这些临床医生是不是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医生,或精神分析家。他应该处理有关病人的问题和概念上不同于自我水平的调节;不论处在哪一级自我水平的人都可能成为病人,虽然在病理类别上有所不同,或表现出的症状特征属于不同的水平。原则上,心理治疗的过程可能给自我以新的生长。这是沙利文(H. S. Sullivan)、罗杰斯、洛华德理论的中心思想,虽然各自为了不同的理由。事实上,有关这类生长的证据还不足。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是,一个人对心理治疗的顺从性可能和他的自我水平有关,这可以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得到证实。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

适当的治疗可能和病人的自我水平有关,器质的和操作的治疗更适合于较低水平,顿悟治疗适合于较高水平[这是斯温森(C. Swensen)研究的课题,即个体交流]。

428 在对治疗者进行研究时遇到许多问题,这也是需要解决的。治疗者的自我水平和他的治疗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研究这个课题的困难是大量的治疗思想,它们在各方面有所不同,而且每种思想有着不同的解释(请考虑一下我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和所接受的观点之间的不同)。治疗者的自我水平与成功治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研究治疗效应的问题将在这里受阻。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变式涉及到治疗者的自我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否最好的治疗者总是具有最高的自我水平,或者说治疗者的自我水平是否应该与病人的自我水平相匹配?格兰特和格兰特(1959)曾研究过不同的医疗队治疗海军少年犯的效应。标准是能成功地治疗并使其归队服役。被试按照高低自我水平分类,医疗队按照预测的效应分类;至于哪些东西列入预示并无规格。自我水平可能是预测效应的一个成分。自我水平高的被试对最高预测效应的医疗队反应最好,但自我水平低的犯人则相反。这一发现证实了根据犯人的自我水平,不同的治疗者具有不同的效应。沃伦(1969)和帕尔默(1974)根据少年犯的自我水平给予不同治疗的有关研究,由加州青年领导机构和其他单位继续进行。治疗者和病人自我水平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大概与向导的理论相关联。

比研究治疗者更麻烦的是考察治疗者的监督。假设一个遵奉者或一个自我保护者是一个训练分析家,或是一个选拔考生的委员会成员,或是一个社会工作的监督人员。这里可能出现一个问题,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不管他是病人还是考生,都是被视作有良心问题的。如果治疗者或监督人员自我水平较

低,他可能把内疚或顾虑解释成需要消除的征兆,结果将会步入一条死胡同,病人或考生几乎没有顾虑的权利。对这样一些问题本书无法给予解决,但可以提供一些探究的办法。那些能把病人和治疗者或监督人员和受训人员匹配起来的人可能会发现这些考虑是有用的。

本书中被忽视的一个领域,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应用。一种来自学生的常见的批评是这样说的:“既然世界居于如此众多的麻烦之中,难道你没有责任去献身于提高普遍的自我水平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自我发展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性质要比家庭广泛得多,这一主题相对来说被忽视了。霍布豪斯、杜威、塔夫特、里斯曼、弗洛姆、埃里克森是例外,但在这一群人中,只有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概念完全接近于我们的看法。至于社会改革甚至社会生存等紧迫的问题,还没有证据表明凭借提高一般的自我水平就能完成。再则,人们很难着手去提高一位选出的或委任的官员的自我水平,以及在他任职之前提高他的自我水平,因为这会妨碍他被选中。总之,向往公职的候选人,各种自我水平都有。进一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有效地帮助自我发展,自称自我水平高的人也没办法进入有关的机构。世界可能被烧尽或者其资源很快被耗尽,来不及通过公立学校的系统学会如何去促进自我发展,也不及从那些激进的和起破坏作用的人的异议中采纳一种程序。

这种概念能够用于政治领域的唯一途径,看来只有评价一个人怎样吸引公众中各种各样的人,而不得罪别人。这种应用可能有个操纵的场所,但也不一定。每一代政治家都具有讨好他们追随者的那种最低劣和最利己的本领。他们常常在下述两个方面获得成功,一是被选进官署,二是煽风点火把社会搞得一片混乱。问题是,一个人能否将良心和总统兼于一身?那些对

430 大部分人有帮助的概念、道德和自我结构的复杂知识看来是有可能的。诸如塔普(J. L. Tapp)和科尔伯格(1971)、阿德尔森(J. Adelson, 1971)以及赫斯(D. H. Hess)和托纳(J. V. Torney, 1967)等人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研究可能有所帮助。理论要求某种道德保护措施,因为在原则上自我水平较高的人能了解自我水平较低的人的推论方式,而自我水平较低的人只能靠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我水平较高的人的动机,从而也就容易误解它们。因此传播自我发展的理论原则上必须帮助那些自我水平较高的人的候选人,而不是帮助那些自我水平较低的人的候选人。

只要稍微站得远一些观察,人们就能够辨别出现代心理学的四个主要学派:行为主义—心理测量、精神分析、认知—结构、人本主义,并给出一幅素描。本书规划的工作如果不从这些学派中汲取材料是不可能的。由于同一事实,我们也不能只依凭其中某一派的方案,至少像纯粹派艺术家或信徒所解释的那样。

像行为主义者一样,我力求讲清可以观察的东西和可以推测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经验主义的研究应该在一个最低限度的推理水平上来进行。当行为主义者从方法论的精确性转向一种学说,认为只有特殊的刺激和特殊的反应才是真实的,或者认为这才是正统的科学研究的课题时,我开始部分地与行为主义者分手。行为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唯名论的和反理论的思想体系(第十章),不是出于对证据的科学总结,而是一种哲学的臆测,这我们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本书里所谈的是发生在有机体内部的事件,这是纯行为主义者禁止我们去窥视的。

心理测量的方法与行为主义的方法密切关联(虽然行为主义治疗者联合精神分析者力持单例报告的重要性,但是这与统计的要求是不相宜的)。一个评价自我发展和有关变量的严格

的方法被充分强调(第八章和第九章)。也许我的最独特的贡献是设计一种方法用以理论和测量的相互反馈,但是典型的心理测量方法,即测量极性特质并根据一般的线性假设的方法来分析它们,使本书的论题黯然失色。我们的核心概念绝不会出自这些研究(第十章)。

我们关于自我发展的概念是结构转化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是心理学的认知—结构学派的一个部分,特别是皮亚杰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正如第三章所表明的那样,当追踪结构主义的逻辑极限时,它是反人本主义的,这导致了对人类自由的否定,并使意识和选择没有立锥之地。我们与结构主义者分手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否定意识就是否定我们所确定的东西,否定我们原来的观察,否定我们登堂入室之门。 431

近年来,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学派被解释成是介于行为主义—心理测量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之间的一种选择。我并不赞同对这些学派的所有异议,我曾从这些学派中汲取资料,又跟他们有联系。同时,自我发展如果在个体身上没有选择的余地或力量,没有为发展进行自发的奋斗(阿德勒),没有积极的倾向(奥尔波特,1960),没有课题的目的论(里古),就不可能获得最终的理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我们往往在有关我们的自由程序和有关我们的选择的决定因素等方面欺骗自己。然而,如果意识不重要,或者如果对我们的自我决定的感受来说没有真理可言,则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其他一些心理治疗都将不起作用。

我有关精神分析的论题是复杂的。我已经说过,弗洛伊德真正的贡献是那些通常被忽视的东西,不仅为外行人所忽视,也为专业人员所忽视,专业人员学习精神分析理论是死背课文。事实上,通常称作弗洛伊德发现的所有要素来自民间,大多数是

在极不显眼的研究中发现的,例如让内的研究。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范式的结合,一个把现在与过去、诊断与治疗、疾病与正常发展、平凡的生活与有意义的生活、所有的解释与少数原则等等结合起来的理论。每个范式都从一个伟大的发现开始。集中于创伤范式的是心灵宿命论和动力的无意识。内驱力的范式从释梦的程式和婴儿性欲开始。通过被动转化到主动这一控制的形式的发现,开始集中到自我范式。奇怪的是,动力范式的最核心的术语是最难翻译的,产生的问题在第三章有所触及,我们的概念难以精确地注释这些术语,与此相反的是只能例举它们的名称。随着范式的改变,不但理论而且治疗方法也有所发展。精神分析治疗和自我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已由埃里克森、洛华德和里古等理论家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弗洛伊德所有研究的关键是假设一个包括正常的和变态的精神生活和行为的范式。哈特曼—雷帕普特学派的概念和原则甚至牺牲了这个领域。我们关于自我发展的阶段概念,像精神分析一样,原则上是普遍适用的(第八章)。精神分析家所说的结构理论缺乏一个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结构主义,也即平衡(第三章)。把认知的原则引入精神分析理论能够丰富和加深其治疗(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

以实验的或心理测量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心理学的自我发展概念缺乏精神分析的解釋的理论力量。当然,治疗本身是一个调查性的工具,许多人会说它比实验室中使用的工具更为有力,虽然由于它的狭隘取样而受到限制。用何种心理研究方式可以从精神分析中获益还不清楚。但是,如果心理研究不走极端,而是一种理解个体的方法,则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都能对我们的自我发展理论作出贡献。然而即使沿着哲学理论(第十一章)的脉络也无法发掘它的所有财富。

那么,本书所能贡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物,因为它有自己的逻辑和结构。这是否成为心理学的另一个学派,使之与上述的那些学派竞争?如果说“自我发展”成为一个学派,我将认为这本书是失败的。我想提出和帮助创造的是某种像范式一样的东西,一个具有独特方法和历史(正如图 8 所勾画的那样)的训练模式,一个逐渐累积了大量的数据、越来越可能适用于实际的理论体系。我发现我的伙伴在这个园地里所缺乏的是理论与数据之间理想结合的反馈环路。^[2]在我们的造句测验手册中所体现的反馈技术可能无法直接用于那些借其他评价方法工作的人;至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理论以反应数据,则一个人简直难以称自己是一位科学家。 433

我承认在我们的科学概念中有点压力。一个科学范式是由它的数据形成的,转过来又形成数据。数据的积累没有简单的培根式程序,更没有一个根据因素分析、多项的判别分析,或对数据的随机的计算机检索的程序。我们对人的概念也有相应的压力,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科学家是人。虽然我们已经学习了性格结构如何发展和如何保持,但总是学不完。我并不认为这是失败,而是作为一个勇敢的举动来承认该问题的中心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谜,或者说仅仅是对科学的一瞥而已。

我希望做的是:帮助建立一个心理学的分支,它继承哲学心理学的一些学问,把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与当代阶段一类型的人格概念结合起来,并且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本书旨在帮助创造一个范式,使之生根和成名。

注 释

[1] 在本章中,凡论题已在先前各章叙述过的,这里仅提及作者姓名以资

参考。

- [2] 雷斯特(J. Rest, 1975)引用科尔伯格的文章,把自己的研究列为“干巴巴的经验主义”这一明尼苏达传统的一部分,借以与 MMPI(明尼苏达多重人格调查)的理论产物相对照。但是即使在雷斯特的例证里,我想他也会同意的,记分方案完全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雷斯特或科尔伯格都不曾作出任何规定让数据改变的理论。

附录：当前的研究和某些展望

心理学领域的形成,既不是由于官方的声明,也不是由于抽象的逻辑,而是由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数精力充沛的研究人员的兴趣和能动性。下面讨论的一些研究程序,已经在参考书目内被提及,本书即属其中之一,但是它们所引导的一些新方向却没有完全结合这里提出的观点。该领域的研究,实际上需长时间的努力,一些重要的著作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出版物中出现。本附录的基本意图是,对一些正在进行研究的概念内容作一概略的介绍。^[1] 435

塞尔门的人际观点采择

塞尔门(R. Selman)和他的同事在“哈佛—乔治拜克尔社会推理”研究(Harvard-Judge Baker Social Reasoning Project)中的主要目的是阐述有关人际关系推理的发展,特别是在人际情境中采择别人观点的能力。塞尔门把这种能力视作本书称之为自我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塞尔门的人际关系发展概念中的主要要素是:主观性(即理解内隐的思想和感情)、自我意识、人格和人际关系的本质。虽然,最初他非常强调理解别人观点的认识能力的重要性,但现在他似乎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内容上,而把观点仅 436

仅作为一个要素。我们先来看看塞尔门的几个阶段,然后再来考察他的评价方法。

年幼的儿童没有成人特征中那些明显的主观概念。因此,他们对明知不是真人但客观上存在的小丑或木偶迷惑不解。这是前主观时期,不属于塞尔门的研究范围,但包含在整体性研究当中。

塞尔门的水平零,是产生自我中心观点的水平。在这期间的儿童,典型地说是学龄前的儿童,知道别人和他一样具有思想和感情,但不能将别人的感情和他自己的感情明显地区别开来。自然的自己和心理学的或主观的自己并未明显地区别开来,有关思想和感情的问题则借行为或表现反应出来。人际关系既可以用自然的术语来解释,也可以用自我中心的愿望来解释:一个朋友可以是你的邻居,也可以是具有好玩的玩具的人。

水平一,是产生主观观点的水平,是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典型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儿童把人看作是可以解释的社会事件,并能将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区分开来。然而这时的儿童,每次只能觉察出前后关系中一个特定的观点,因此,这时的儿童能够理解在一个事件上某个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不同,他不承认混合的感情,这种感情意味着一个人会有两种观点,也不承认观点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一个人做事,另一个人评价;他们可以互不考虑对方的感觉。一般的特质或态度是无法公式化的;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是按照对特定情境的反应来回答的。一个朋友可能被解释成一个和你一块玩的人。

水平二,是产生反省观点的水平,是小学高年级儿童的特征。处在这一水平的儿童,每次可以接受一个以上的主观观点。因此,他理解相互关系。不仅一个人的行为影响别人的感情,而且两个人的意图和感情也可能彼此发生影响。这就使他有可能

根据别人的观点来剖析自己,从而形成自我意识。而且,一个人在一个事件上可能不只一个观点,这样他就可能体验到内部的矛盾。这时,一个人在别人面前表露的形象,可能不是他实际的或真正的自己。典型的例子是,朋友是那些彼此合得来的人。

水平三,是产生第三者观点的水平,是前青春期儿童的特征。继上述各种观点以后,下一步是理解不感兴趣的旁观者的观点,或者用米德的话来说,是“概化他人”的观点。通过理解外部观点,儿童能够把他自己看作是对别人的主观感觉进行反应,同时看到别人对他的主观观点作出反应。这就开创了从相互关系走向共同兴趣的道路。从认识自己到反省自己的社会活动,期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儿童现在看到的人不只是特定活动的连续,而是有一个连续的自己或有概括化特质的人格来构成和解释行为。然而,这些特质是用定型(stereotyped)的关系表达出来的。这时的友谊是一个不会因为小小的冲突而破裂的连续关系。

水平四,就个体的概念和他们的关系而言,青年期趋向定性系统。人格和人际关系被看作具有深度和复杂性的。人被看作具有不同的特质、态度和价值的。人际关系从质的方面区分,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深奥的,另一种是表面的。而且,一个人在不同的意识水平上操作,例如,他可能不理解是怎样影响别人的,甚至影响他自己人格的某些方面的。在上述各种观点之外,个体还可以假设一种抽象的或想象的观点,例如,社会体系的观点或法律体系的观点。在这个时期,亲密的友谊可能意味着共享私人的秘密。

438

塞尔门的最高水平是象征性的相互作用。这里,个体的概念和人际关系的概念,合并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之中。相互关系可以看作是人格结构的一部分,而个体的主观感受则取决于他

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

这样,思想、感情和动机的主观性,在水平一上明显地表露出来,自我意识在水平二上表露,人格的概念则在水平三上表露。至于水平四,主观的概念、自我意识的概念、人格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这三个特征唯一属于个体。在每个水平上,也有一个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

塞尔门的主要工具是六个人际关系两难推理,比科尔伯格的测验更适合青少年。将这些资料很好地录在视听磁带上,然后用录音机或录像机放出来。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例(塞尔门, 1974, p. 10)

汤姆已经节省下一些钱来买米可·胡特的生日礼物。他和他的朋友格雷格要去镇里挑选米可喜欢的东西。汤姆告诉格雷格说,米可这些日子很悲伤,因为他的狗佩佩逃走了。于是他们去探望米可,并试图在不询问他需要什么的情况下探出他需要什么。他们和米可谈了一会儿话之后,意识到米可正在为他失去的狗而悲伤。当格雷格建议由他去弄一只新狗时,米可说他无法马上得到一只新狗,而且无法将新的狗视同于原有的狗。说完米可就去办他的事情去了。正当米可的朋友想买点什么时,他们发现动物商店里有一只小狗。那是最后的一只狗,狗主人说,这只小狗明天出卖。汤姆和格雷格商量,无论如何要为米可弄到这只小狗。汤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你认为汤姆应该做什么?

439

对个别进行交谈的儿童提出的第一问题是,被试认为正在买生日礼物的汤姆该做什么、为什么。接着是一组有关个体和他们的主观性的概念、自我意识、人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

面的标准问题。这些问题按难易分级,从而显示出连续的阶段。这样,在小狗的故事中,儿童被问到有关米可的心情,他是否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悲伤,人们怎样才能知道别人的心情,如此等等。像皮亚杰的临床法(*methode clinique*)那样,当被试的反应的涵义并不清楚时,谈话者可以变换方法进一步探究。从本质上讲,意向不是测量记忆或理解的依据,如果必要的话,故事的某些部分可以重复。

塞尔门的研究组把重点主要放在发展上述各阶段的图式和测验的记分手册上,这一投射方法目前也用来研究6~14岁之间的正常儿童和受干扰儿童人际观点的纵向发展,从而将这项研究与皮亚杰工作中测得的逻辑推理发展和科尔伯格测验中测得的道德判断等联系起来。最后,他们对促进正常儿童和低能儿童的道德和社会推理的发展而开展的干预策略感兴趣。

塞尔门认为,就人际观点的采择(*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taking*)来说,作为深层结构的逻辑推理是内容,而人际观点的采择则是作为内容的道德判断的深层结构。然而,就那些确定无疑的能力测验来说,理论关系并不预示经验的结果,因为在一个特定水平上选定的工作,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尽管如此,塞尔门在他的研究中已经在他测量过的领域之间建立了假设的关系,然后考察从正常儿童和受干扰儿童那儿获得的数据与那些假设的关系。^[2]塞尔门指出,人际观点的阶段和道德推理

龄伙伴。因此,这些数据表明,在有些情况下,行为紊乱可能是塞尔门正在测量的特殊能力发育不全的结果。这一发现为干预策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去促进这些能力的发展。

显然,塞尔门的人际观点采择概念与本书中自我发展的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即使它在自我发展方面不比其他有关的概念更详细,但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对于儿童早期阶段的论述,塞尔门的概念要比我们的或科尔伯格的概念更为丰富。再者,塞尔门有一种从年幼儿童中获取行为样本的高超技术。这种技术,既不是造句测验,也不是未经修订就使用的科尔伯格的测试。同时,塞尔门的测验还可以用于成人,并为他们的个体差异提供测量。

441 塞尔门的概念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似乎要比该概念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更密切;然而,他的测验,要比造句测验更接近科尔伯格的测验。由于它的混合性质,因此可以在道德发展与自我发展之间提供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联结,正如当前研究中表现的那样。本书的中心课题之一就是我们的论点,那就是,所有的道德发展和自我发展的概念只有一个主要来源,也就是说所有的概念都接近同一个思路。另一方面,科尔伯格认为自我发展是先于道德发展的。虽然塞尔门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站在科尔伯格的

... 但是他的数据又似乎支持我们的观点。他的数据并未能

布劳通的自然认识论

布劳通(J. Broughton)的主要兴趣,在于他称之为自然认识论的发展上。正如科尔伯格把儿童看作是道德哲学家一样,布劳通把儿童看作是形而上学者、心理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认识论者。布劳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自然认识发展的各阶段。他的认识吸收了鲍德温的研究,特别是四卷本《遗传逻辑》(*Genetic logic*)(1906~1915)中的观点;他还吸收了皮亚杰的研究,特别是皮亚杰早期出版的几本书的内容,以及佩里的研究(1970)。布劳通的谈话长达2~4小时。他给每个儿童一组问题,同时伴随着标准跟踪或探索问题,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合于阐明被试的意图。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对各个阶段的结论性阐述,然后来考察一下他的研究方式。

在最低水平,即水平零,学龄前儿童认为自己是“内在的”,现实是“外在的”。这时他们不能将思维与客观事物区别开来。

在水平一,年龄大约5~6岁。在这一水平,儿童认为自己是自然的身体,而身体的运动改变着自己。分不清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然而,思维能够改变自己而不需要运动身体。思维是看不见的,但思维与它们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凡是真实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所以,思维是似是而非的。精神(或大脑)控制着自己,它告诉身体去做什么,但身体本身也会运动;所以,精神对身体的控制相当于自我控制。布劳通直率地指出,在这一水平,精神或大脑与身体的关系是权力关系;他求助于(可能跟在他的被试之后)“大人和小人”(big person and little person)的隐喻(参见第十七章中有关内驱力拟人化的讨论)。在现实与现象

之间并无区别,所以人们假定看见的东西和感觉的东西是一样的,感觉的差异可能是唯一的错误。这是朴素的现实主义的阶段。

水平二,朴素的主观主义,出现在大约7~12岁的儿童身上。在这个水平,可以区别精神和身体;自己是一个包括精神和身体两个方面的个体。自己或精神包含着个体对事物的反应和观点,个体存在于这些反应和观点的独特性之中。知识是个人的,所以事实和观点或假设之间的区别被模糊了。

水平三,出现在大约11~17岁这一年龄,并具有分化的或唯灵的特征,现象和现实有了区分。社会的人格或角色被看作是虚假的现象,不同于现实的内在的自己。有意识的精神和下意识的心理过程被区别开来。社会的证实或舆论被看作是从现象背后寻求现实的一种手段,但那些脱离现实和真理的事,则是完全任意的。当假设与事实区分开来时,抽象趋于具体化。自我是人的正常本性;这种本性是一种实体,它在心理内容的变化过程中保留自己。与变态的和无意识的人相比,正常人被看作是有意识的和能够控制的。正如早期的几个水平那样,自我无法被假设去自主地认识自己;一个人能够自己恐吓自己或令自己吃惊。因此,在这一水平出现反省的自我意识。

443 水平四,出现在青年晚期,并且具有二元论者或实证论者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人,在思维的逻辑体系、假设和从假设进行演绎等方面都变得能干起来。自己或精神被看作是解释行为模式的一种假设结构。另一方面,在这一水平,精神可以根据其理论化基础来表达。因此,精神可能是一个原因的结果或一个非前因的原因。

在布劳通的水平四里,另一种观点有一半与科尔伯格的水平保持平行,即思维具有不可知论的甚至玩世不恭的表现。自

己不是一个为人格、经验和行为提供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抽象假设,而是简单地由经验和行为来解释的。个体是一个控制论系统,它引导人去满足物质欲望。在这一水平,主要强调在一个相对的和主观的参照框架内看待每一件事情,从而使个体处于唯我主义的立场。在科尔伯格之后,布劳通倾向于把这一水平放在水平四之后,但他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可能性,那就是该水平有可能成为水平四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变式,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它是水平四的一个分支,但是在从水平四发展到水平五的过程中它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水平五,自我作为一个观察者与已知的自我概念区分开来;作为一个选择者的内在的自我与作为一个行动或欲望的内在的自我区分开来。正如精神被认作是概念上的结构一样,生理学上的身体也被认作是概念上的结构。知识和现实的问题可以根据方法的观点来表达。现实由解释框架的一致性和功用性来定义。

在布劳通的最高水平,即水平六上,精神与身体是一个完整的自我的体验。凡是真实的东西都是一个判断,一个在特定的控制条件下能够被普遍体验到的东西的结构。

作为一个引导性研究,布劳通对十个年龄在 10~24 岁的人进行了谈话。他用鲍德温的概念列出了有关自己、精神、现实和知识等一组初级问题,例如:“自我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精神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在哪些部分是自我的部分?”“是自我控制身体还是身体控制自我?”“什么是思想?”“你是怎样知道事物的?”“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吗?”他运用引导性研究中得 444 出的数据去修改他的谈话和他的阶段定义。主要研究中的问卷法包括大约 100 条这类问题。被试是四年级、八年级、十二年级

的学生,每年级 4 个男生和 4 个女生,再加上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大学生各 6 名。主要研究之后,根据收集来的数据再度修订水平的定义。上述的概要还远远不能表达布劳通的水平概念;他运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每个水平的思维活动。

关于布劳通得出阶段类型的概况的过程,他要比其他学者更清楚。他在谈话过程中,发现了有关观念的自我一致性的群集。对每一个阶段类型的描述引用了同一抽象水平的观念;所有的类型都涉及到同样的主题;每一个类型都可以在一个逻辑序列里被看作为其他类型。因此,每一个类型都可以在与其他类型的关系中被概述。从这些理想的类型推进到真实阶段的一个结构,布劳通要求表明一个单一形式的原则,从这些转化中以便获得每个亚领域中的每一个类型及其观念。

布劳通已经证实了他的设想:在谈话中,有三个亚领域(即自我、精神和身体)以及能够分别记分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他指出,有关亚领域的分数是高度相关的。而且,分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与其他一些理论上合理的领域的关系最后得到证实。皮亚杰的测验发现,认识论水平滞后于逻辑思维的水平,但是科尔伯格的测验发现,认识论的水平超过道德判断水平。当这些关系尚未确证时,布劳通提出了领域是独立的假设和必须排除它们同步发展的假设,从而创立了某种非同步发展的形式。

445 概括地来说,布劳通根据水平内的逻辑一致性,水平的逻辑序列,水平内的内在一致性的经验证据,与年龄的关系以及与其他领域逻辑关系的经验证据等证实了他的构思。他确认的最后一个标准是,通过纵向研究的方法,经验地证实水平的序列。这是他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布劳通已经批评过我们在自我发展概念上混淆自己与自

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混淆对客观的反映与自己的反映。对他来说,我们的良心阶段和较高一些阶段的某些见解,例如,对反省特质感兴趣,对区别现象与现实感兴趣等等,是不同于那些阶段的。我们从造句测验中概括出来的阶段定义法,并不像他的方法那样把定义的要素强加在同一领域或同一抽象水平里面。虽然他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都运用数据,并且两者都遵循逻辑一致性的准则,但是我们的方法侧重于数据,而他的方法则侧重于逻辑性。比起他已经提出的去建立有关自我发展其余领域的非同步发展的认识论的亚领域来,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在某种意义上说,布劳通和塞尔门正在为同一个偶像而竞争,也就是说,他们为一个基本的或多或少可以认识的能力而竞争。这种能力为那些属于表层结构或内容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深层结构。双方均以科尔伯格的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尽管双方的研究价值与科尔伯格的研究无关(在塞尔门的研究中,他甚至采用了科尔伯格记分算法中的某些任意的做法)。两人都采用了皮亚杰的临床法。迄今为止,彼此都不想把他们的研究联合起来。从布劳通在某些被试身上所花谈话时间过长来判断,他并不承认传统的心理测量逻辑,正是这种心理测量逻辑,只须抽取一个合适的行为样本就可以评价一个领域,无须耗费探究的精力。取样的逻辑适用于非同质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去维持它,像组建它时所花的力量一样。

布莱西关于责任心的研究

446

布莱西(A. Blasi)的主要兴趣是责任心的发展。像塞尔门和布劳通一样,他采用了皮亚杰的结构性谈话法,也像他们那样,

他考察了一个比整个自我发展更狭义地被定义和更一致地被构造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研究有赖于科尔伯格的工作,也有赖于塞尔门和布劳通的工作。道德判断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一个人感到他应该对满足的事情负有责任。

布莱西最初根据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范围来看待自我发展和责任心发展之间的连接。自我发展可以概要地被描述为从外部到自我,从世界(依赖外部的强化源、由于外部的刺激而作出直接的冲动、缺乏对自己的洞悉、笼统地指责别人和指责世界)到一个人的经验、兴趣和控制的逐步内化(例如,意识到思想、欲望和动机;强调自信、胜任和自主)。众所周知,责任心是这些范围内的一个方面。而且,从造句测验中获得的证据表明,人在不同的自我阶段,倾向于不同的责任心:在前遵奉阶段,责任心要么是外在的,要么是无法认识的;在遵奉阶段,责任心得到承认,但刻板地集中在规则和权威上;在良心阶段以及继后的几个阶段,责任心定向于自我。

447

考虑到与哲学传统有关的责任心概念,布莱西提出他的责任心定义:责任心是一个建立或认识他自己和他的活动之间的必要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发生在活动之前,也可以发生在活动完成之后。一个人与活动完成前的关系相当于责任的概念,就是对“我需要按某某方式去做吗?”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与活动之间的关系,已在自主中完成,并且与责任的概念相对应。比如说,“这项工作一定要我做吗?”这个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是一定。在一个人和他的活动之间,有其他各种关系,例如,对他来说适宜、称心,或者简单的自然因果关系。只有当活动被看作是必须时,或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必须完成这个活动,或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完成这个活动是他的道德体验的一部分,这时的行为就是责任心。

根据定义,由于责任心存在于建立自己与活动之间一致性的关系之中,因此责任心的结构必须逻辑地与一些基本的规则联系起来,这些规则负责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决定着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意义和世界对他的意义。这些规则相当于本书中所称的自我结构。由于一个人基本而又明确地了解他自己(这就是他的自我定义),因此,他也了解了与他的基本特征有关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必须的(这就是他的责任心)。活动的责任心可能来自不同的根源,例如,权威、社会压力、他的良心,或者一个人自己,尽管如此,责任心毕竟总是自我的(或个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把他解释为必须与责任的根源有关联。有关责任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澄清自我发展的两个方面:第一,有关阶段的中心要素或结构核心的定义;第二,自我进入活动并由活动来表达的方式。

在科尔伯格、塞尔门和布劳通的方法中,有一个对本书中出现的自我发展概念的含蓄的批评,那就是,阶段的结构特征和发展序列的内在逻辑性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含糊不清的结果是,有时候,可能难于决定某些特征究竟是自我的一部分,还是碰巧跟它联系上的(这是第八章讨论的一个课题)。一般说来,这种含糊不清乃是自我结构特征不同于逻辑的结构特征或数理的结构特征这一事实的结果(见第三章),但是,也有可能把自我当作无所不包的结果和把它当作一个单一的器官,从而用经验的方法对它进行测验造成的。这种方法揭示了自我的意义和它的转化,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助于区分逻辑的特征和阶段的基本结构的一个单一的方面。自我概念或自我定义是这一角色的候选人;探究责任心的阶段特征的规则乃是研究自我定义的一条途径。

448

从长远观点来看,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自我发展的兴

趣,有赖于理解自我阶段如何在活动中表现出来,这与它们如何在造句测验或其他语言叙述中表现出来恰恰相反。根据人格来预示活动已经构成心理学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从态度和价值的角度还是道德判断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心理结构的领域和行为领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或简单的,需要一个能把这些领域和它们的连接方式联系起来的理论。责任心及其发展的研究,可能提供这种理论,虽然由责任心决定的活动不是受自我阶段影响的活动的唯一类别。

在这一研究中,可以发现的一个附带收获是,更好地理解卢文格的自我发展概念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既不是由测量之间的经验相关,更不是由卢文格的单一器官系统的假说,更不是由科尔伯格的必要但不充分的关系的假说来阐明的。所需要的乃是具体的实例(比如,履行道德活动)和发展之间功能关系的分析。

449 在布莱西的第一次研究(1971,1976)中,根据造句测验测得的自我水平将六年级儿童分成几组。为每组儿童提供两难故事,要求他们表演出来,不同的儿童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个故事针对一个特定的自我水平。对处在冲动阶段的儿童,训练其不依赖父母的责任心看来是较为合适的;对处在自我保护阶段的儿童,训练其规则定向的责任心看来是较为合适的;对处在遵奉阶段的儿童,训练其有法律精神的责任心是较为合适的;对处在遵奉阶段以上的儿童,训练其自我定向的责任心看来是较为合适的。实验设计要求部分组接受与他们的水平相适应的训练;其余的组接受对他们的水平来说过高或过低的训练。按照假说,只有在适当水平上进行训练才是有效的。然而,实验只有两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修订实验,以便为该假说提供一个适当的测验(下面我们还要讨论该研究的一些结果)。

除了表演两难故事之外,儿童还要用独白的方式讲述英雄的事迹,并交换角色。例如,他原来在某一场合下扮演英雄,现在换成在另一场合下扮演领导等等。这样一来,即使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能大量洞察儿童在责任心方面的思维结构。

该研究采用如下形式:由若干故事组成的“责任心故事测验”,每个故事附有一个有助于儿童独立操作的半标准化的谈话表。一个故事分成三段提出。在第一段中,英雄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比如说,处于服从和利他之间,或者说处于个人欲望与信守诺言之间。问被试英雄该怎么做,为什么,特别要提问的是,英雄是否真地必须去做,为什么。这里所研究的责任心,影响着对某些必须完成的活动的责任判断。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表现的是责任心的反面,首先描述英雄消极的或不良的行为以及被发现的冒险行为,然后提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例如受到惩罚或丧失友谊,借此研究责任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发现被试在承认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在有关责任的对象,例如权威、法律、群众或自己等方面的思想。下面阐述的故事,摘自形式 A,这是为小学低年级儿童准备的: 450

第一部分:有一天,妈妈将约翰和他的小弟弟大卫留在家里,她出门买食品。约翰正在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大卫正在他坐的椅子旁独自玩耍。忽然,约翰看到大卫试图爬上椅子:他很小,可能会跌下来。照理,约翰应该将他拉开,但是他不想错过电视中的任何一个情节,尤其是此刻。约翰分不清该做什么:是帮助他的小弟弟呢?还是继续看电视。

第二部分:约翰希望看到电视的结尾,于是决定坐在电视机前不动,但节目尚未结束,大卫就跌下来了。椅子也和

他一起翻倒了。当妈妈回到家中时,大卫还在哭。于是妈妈问约翰,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部分:妈妈对约翰的表现不高兴,她教训他说,他不该连看两天的电视。约翰并未连看两天,便对妈妈说,她不公平,而且不喜欢他。

形式 A 中的两难故事,涉及到愿望对服从、愿望对责任、愿望对利他、服从对利他、愿望对信守诺言等。形式 B 适用于三年级至八年级的学生,它增加了一个两难推理,即利他对法律,这一特殊的内容适用于适龄的被试。形式 C 适用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像形式 B 一样,也增加了一个两难推理,特殊内容再度修订,两难推理中增加了利他对个人的发展。根据这些手段得出如下信息:(1)故事中的英雄该做什么,为什么,(2)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情,英雄必须做哪一件,为什么,(3)英雄该如何控制不良行为,(4)怎样察觉活动与认可之间的关系,或者,谴责是否被接受或拒绝。

按照成熟的次序,已经发现儿童对一个必要活动给出的理由是:惩罚或体罚;社会关系和社会动机,例如,互惠和友谊;建立在委托或契约基础上的报酬。下面提供几个在谈话中从不同方向表现责任心的例子。

惩罚:“妈妈真的必须做饭,爸爸在向她发火。”

体罚:“你必须上学去或你找不到工作——你将没有钱和食物。”

社会互惠:“如果我觉得烦,总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你有责任心,是因为你可能处在同样的境地。”“我的妈妈必须使爸爸愉快,因为他总是让她愉快。”

权威:“这个人知道他的职责;这就是一种权威的气氛;你必

须按经理说的去做；他的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契约：“她的工作具有特殊性，那是她必须遵循的；她必须按工作规定明确无误地去做；契约是必须遵守的。”

自我一致，自我定向：“这个教师既然选择了教师工作，她就应尽其所能把书教好。”“一个人对自己负有责任，一个必须按自己的原则行事。”

这些责任心的类别，一方面可以很容易地与自我发展的阶段相关联，另一方面可以与道德推理的阶段相联系。然而，许多人在确定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和将同一标准用来确定责任心之间存在差距。例如，在一年级的小组里发现，有 95% 的人能理解并有时还把诸如同情和友谊这类社会动机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即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而且，他们中约 65% 的人，社会动机已成为主要标准。然而只有 30% 的儿童能够从道德上而不是从惩罚上理解某个行动是必要的，布莱西的研究目的，在于阐明道德判断与责任心之间的差距。 452

跨文化的应用

有关自我发展的连续统一体的普遍性问题，通过跨文化研究，是最有说明力的。科尔伯格借助测验作过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这些研究尚未详细报道。然而，某些突出的发现，特别是结构和方法的普遍适用性的发展，已经在科尔伯格的论文中有了明显的摘要报道(1969, 1971)。

两位研究人员已经把自我发展的造句测验用于不同的文化。库塞苏(O. Kusatsu)测验了大量的日本群体。他在不同职业组的自我水平特征中发现了大量的具有统计意义的差异。

拉斯克(H. Lasker)运用主题统觉测验,先在印度,后在荷兰的安地列斯岛中的库拉索岛,研究了成就动机。这项研究的意图是找出激励成就定向的途径。他发现把所有的成就主题同样对待,就像他曾经使用的标准记分系统一样,会使他的数据中的一些感兴趣的方面变得模糊。他还发现存在一个与自我发展的阶段大致并行的成就主题层次。此外,他在库拉索岛的研究中发现,在与社会经济的等级差异相对应的平均的自我水平上,存在着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差异。于是,他的注意力转向激励自我发展的方面。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拉斯克在库拉索岛的研究。

转变过程

也许研究任何一种心理现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去试图改变它。当前,广泛的兴趣在于对发展的自我或道德水平实行干预的方法;说实在的,并非所有这些研究都已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他们的研究不全是具有目的,也不全都把注意集中在概念问题上。

许多研究采用以下的形式:A级,通常是高中生,事先用一种或多种自我发展或道德发展方面的测量来测验他们。然后用一种为提高自我水平或道德水平而设计的实验课程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周期性学习。接着再进行测试。这种类型的研究,已经由摩修(R. Mosher)在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中、斯普林萨尔(N. Sprinthall)和其他人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学生中进行过实验[卡尔基—梅龙大学的范顿(E. Fenton)也对课程的发展作过研究]。事实证明,与控制组相比较,经过这种学习的学生有明显的提高。事实上,许多课程或程序已由这些研究所证

实,现在需要去总结和整理这些结果。

科尔伯格为促成转变而做的示范是,让一个班级在几个月内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讨论道德两难的问题^[3]。要求教师或者领导者去引导大家讨论,以便让那些发展较快的儿童去照顾不成熟的儿童,因为在每一阶段,都可能遇到水平参差不齐的儿童。这样,比较成熟的儿童就充当其他儿童的引路人。领导者应该为那些比较成熟的儿童创造条件,但问题是,这些程序对领先的儿童和落后的儿童是否同样有效。

当科尔伯格和他的同事试图在监狱里建立一个道德讨论组时(科尔伯格、夏尔夫和希基,1972),他发现他的建组意图没法实现。原来,那些自认为在科尔伯格的水平2即机械的享乐主义上操作的人,从习俗的角度看,他们的水平只相当于水平1即惩罚与服从的定向。对他们的结论是,不可能在这种不适宜的情况下去激励他们的道德发展。

科尔伯格把他当时采用的变化过程称之为公正群体方法。⁴⁵⁴ 为了建立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群体,必须对参与者予以控制,这种控制不只是在一片断时间内实行,而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运用。在监狱中实行这种方法,意味着有赋予纪律和其他准则的警卫和监督以及维持纪律的责任心。第一步是为该群体制订一个章程,接着制订特殊的准则,对违反者的惩罚以及公布纪律措施等等。道德两难的讨论,不要采用任意发言的方式,因为它通常只在群体会议上采用。例如,当发生了偷窃、破坏公物或贩卖毒品等违背准则的事情时,知道罪犯的人可能在他们对友谊的忠诚和他们对群体或群体目标的忠诚之间体验到冲突。这种公正群体的方法,目前正在有些学校和监狱里进行试验。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花费工作人员和参与者的大量时

问。例如,制订章程,为维持一组特殊的准则需要指导。以后,在群体会议上,为了把该组群体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转向程序问题,需要予以指导。相比之下的优点是,当故事的构造比较乏味时,现实生活的冲突和两难推理能够继续制约着参与者。总之,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一个公正的群体,不论其道德发展的关系如何,都是合乎需要的事物。

一种理论观点认为,公正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平衡观念的具体化。特别是接近遵奉阶段的那些群体,比如许多同狱犯人和许多年幼的或年长的高中生,由公共机构的安排所产生的群体感受应该是显著的。例如频繁的群体会议和群体压力,足以维持群体的优点而无须惊动上级权威或更大的群体(比如说群体所在的学校或监狱),这就必然会促进遵奉阶段的发展。公平或公正的指导观点能够起到引路人的作用,促进遵奉阶段的人沿着良心阶段方向发展。如果有机会去考察别人的感情和观点,观察认知—道德的冲突,参与有关道德问题的集体决议,那么对各种水平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然而,从良心阶段或更高阶段开始参与的人在道德发展或自我发展方面可能收益较少。

根据上述观点,布莱西设计了一个实验去促进责任心水平的发展,但每组在两周内持续约 10 个小时。这样,与科尔伯格当时发现的必不可少的公共机构的安排中的总变化相比,它是与改变自我水平的工作相称的。然而,如果能观察到某些细小的变化,那也是有益的。最有效的一种训练方法,似乎是为独立的责任心所做的训练。第一步是,不去解释准则和秩序的文字,要求被试用自己的智能去辨别有关准则和秩序的语词和精神。以下几步是,根据它们的目的而不是形式去理解法律,与权威的精神相一致,懂得要想预见每一个事件是不可能的,并且比较法律的目的和法律的文字的相对重要性。下一个主要步骤是,接

受活动对法律文字所负的责任。以下几步包括：下级敢思考要比盲目地服从更为重要，权威也应该接受决议，最后，承认应该对盲目服从所造成的消极结果负有责任。在朝自我定向的责任心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步骤看来是特质定向的获得和自我标准的获得，把自我定向作为责任心的主要对象。

拉斯克在库拉索岛的研究中发现，成年居民约 1/3 的人能够归入自我保护和遵奉阶段之间的自我过渡阶段。拉斯克在赫曼斯基金 (Humanas Foundation) 的赞助下，与皮纳多 (V. Pinedo) 合作，编制了促进阶段转变的训练课程。这些课程的建立，如同布莱西的研究一样，一个小组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属于同一个阶段的人，而且这些参与者都是从一个单一的工作环境中招收进来的，有些来自大公司，有些来自相对说来比较小的公司。训练的课目，开始有两天的集中训练，然后逐渐减少，一直延长到差不多 6 个月的间隔。课程的活动是由许多群体治疗和群体训练的技术来修改的。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皮纳多已经找到意识的或前意识的犯罪线索，这是在布莱西已经获得的数据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出的阶段转变。 456

皮纳多的观察是最广泛的，这在促进自我保护—遵奉阶段的人过渡到遵奉阶段的训练是最有效的，在对参与者的自我保护性质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首先要创造出一种安全的与奖励的气氛。鼓励人去认识他自己的力量。自我意识和对别人感情的认识，是通过理解人际关系的角色转换训练出来的，这样就培养出更为丰富的群体感情。拉斯克从另一角度出发，找到了感情的连续性，其表现可举例如下：“我是重要的”，“我和别人一样”，“我有时更像别人”，“我希望别人喜欢我”，“我希望别人承认我”，最后是“我希望成为集体中的一员”。

正如拉斯克已经做过的那样，将某一个特定的过渡集中到

一个水平上来,能够比其他技术更明显地引出基本的信念结构。他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是,对某些转化可能比其他一些转化更合适。由于在群体技术和群体认可的好处之间内在的配合或平衡,向遵奉阶段的转化可能是它运用的基本要点。当我们把拉斯克的方法看作是一种研究技术时,该方法的其他局限在于布劳通的观察,即每个阶段必须以该阶段与其他阶段的关系来解释,这是很难与拉斯克的方法相结合的。很明显布劳通试图将自我发展归纳为一个单一原则的转化,而很少考虑到塞尔门和

457

参考书目

- Adelson, J.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he Young Adolescent." *Daedalus*, 1971, 100, 1013 ~ 1050.
- Adorno, T. W., Frenkel-Brunswik, E., Levinson, D. J., and Sanford, R. 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 Allport, G. W.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37.
- Allport, G. W. "The Ego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 451 ~ 478.
- Allport, G. W. "The Open System in Personality Theor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0, 60, 301 ~ 310.
- Allport, G. W.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 Altschule, M. D. *Roots of Modern Psychiatry*.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1965.
- Amacher, P. "Freud's Neurological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logical Issues*, 1965, 4 (4, Whole No. 16).
- Angell, J. R. "The Province of Function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1907, 14, 61 ~ 91.

- Angyal, A. *Neurosis and Treatment: A Holistic Theory*. New York: Wiley, 1965.
- Ansbacher, H. L., and Ansbacher, R. R. (Eds.)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6.
- Ausubel, D. P. *Ego Development and the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1952.
- Baer, D. M. "An Age-Irrelevant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70, 16, 238 ~ 245.
- Bain, A.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London: Longmans, 1859.
- Baldwin, J. M.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0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7.)
- Baldwin, J. M. *Thought and Things: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Thought, or Genetic Logic*.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Originally published 1906 ~ 1915.)
- Barton, W. E. "Viewpoint of a Clinician." In M. Jahoda, *Current Concept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 Bell, S. 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Object as Related to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Child Development*, 1970, 41, 291 ~ 311.
- Bellak, L., Hurvich, M., and Gediman, H. K. *Ego Functions in Schizophrenics, Neurotics, and Normals: A Systematic Study of Conceptua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spects*. New York: Wiley, 1973.
- Bentham, J.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xcerpts in M. Warnock (Ed.),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

- ism, On Liberty, Essay on Bentham, Together with Selecte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89.)
- Berlyne, D. E. *Structure and Direction in Thinking*. New York: Wiley, 1965.
- Blanck, G., and Blanck, R. *Ego Psych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Blasi, A. "A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Responsibility Train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71.
- Blasi, A. "Role-Ta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Chicago, Illinois, September, 1975.
- Blasi, A.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Ego Development." In R. deCharms, *They Need Not Be Pawns: Toward Self Direction in the Urban Classroom*.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76.
- Blasi, A., and Hoeffel, E. C. "Adolescence and Formal Oper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1974, 17, 344 ~ 363.
- Bleuler, E. "Das autistische Denken." *Jahrbuch für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n*, 1912, 4, 1 ~ 39.
- Bleuler, 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6.)
- Bowers, K. S. "Situationism in Psychology: An Analysis and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3, 80, 307 ~ 336.
- Brandt, L. W. "Some Notes on English Freudian Termin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61, 9, 331 ~ 339.
- Brandt, L. W. "Process or Structure?" *Psychoanalytic Review*, 1966,

53,374 ~ 378.

- Breuer, J., and Freud, S.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Vol. 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5.)
- Broughton, J.M.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pistemology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 Bruch, H. "Transformation of Oral Impulses in Eating Disorders: A Conceptual Approach." *Psychiatric Quarterly*, 1961, 35, 458 ~ 481.
- Bruch, H. *Eating Disorders: Obesity, Anorexia Nervosa and the Person With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Brunswik, E.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Vol. 1, Part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 Bull, N. J. *Moral Judgement from Chicago to Adolescenc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69.
- Chein, I. *The Science of Behavior and the Image of 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 Cohen, J. "Multiple Regression as a General Data-Analytic Syst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8, 70, 426 ~ 443.
- Comte, A.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Excerpts in H. D. Aiken (Ed.), *The Age of Ideology*. New York: Mentor, 195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2.)
- Cooley, C. H.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Excerpts in C. Gordon and K. J. Gergen (Eds.), *The Self in Social Interaction*. Vol. 1.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Wi-

- ley, 196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2.)
- Dahlstrom, W. G. *Personality Systema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ypes*.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2.
- Dember, W. N. "The New Look in Motivation." *American Scientist*, 1965, 53, 409 ~ 427.
- Dennis, W. *Readings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8.
- Dewey, J.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1896, 3, 357 ~ 370.
- Dewey, J., and Tufts, J. H. *Eth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08.
- Dubos, R. "Biological Dererminants of Individuality." In H. V. Kraemer (Ed.), *Youth and Culture: A Human-development Approach*.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1974.
- Ekstein, R.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 In D. Brower and L. E. Abt(Eds.), *Progress in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II.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1965.
- Ellenberger, H. F.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Enright, J. B. "Thou Art That: Projection and Play in Therapy and Growth."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72, 9, 153 ~ 156.
- 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50.
- Erikson, E. H.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56, 4, 56 ~ 121.
- 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63.

- Erikson, E. H.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Norton, 1964.
- Erikson, E. H. *Gandhi's Truth*. New York; Norton, 1969.
- Emhart, C. B., and Loevinger, J. "Authoritarian Family Ideology: A Measure, Its Correlates, and Its Robustnes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Monographs*, 1969, No. 69 ~ 1.
- Fenichel, O.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New York; Norton, 1945.
- Ferenczi, S. "Introjection and Transference." In *Sex in Psychoanalysis*. Boston; Gorham Press, 191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9.)
- Ferenczi, S.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Sex in Psychoanalysis*. Boston; Gorham Press, 191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3.)
- Ferenczi, S. "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25, 6, 372 ~ 404.
-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Feyerabend, P. "Consolations for the Specialist."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Fingarette, H. *The Self in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 Fisher, A. L. "Freud and the Image of Man." *Proceedings,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61, 35, 45 ~ 77.
- Flew, A. "Motives and the Unconceious." In H. Feigl and M. Scriven (Ed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and the Concepts of Psychology and*

- Psycho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 Flugel, J. C. *Man, Morals and Socie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5.
-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 Frenkel, E., and Weisskopf, E. *Wunsch und Pflicht im Aufbau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Vienna: Gerold, 1937.
- Frenkel-Brunswik, E.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al and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49, 18, 108 ~ 143.
- Frenkel-Brunswik, I. "Personality Theory and Perception." In R. R. Blake and G. V. Ramsey (Eds.), *Perception: An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1.
- Freud, 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6.)
- 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 M. Bonaparte, A. Freud, and E. Kris (Eds.), *The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 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 Drafts and Notes: 1887 ~ 1902*.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4.
- Freud, S. *On Apha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1.)
- Freud, S. "Some Points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rganic and Hysterical Motor Paralysis." *Standard Edition*. Vol. 1.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3.)
- Freud, S. "On the Grounds for Detaching a Particular Syndrome from

- Neurasthenia Under the Description 'Anxiety Neurosis.'" *Standard Edition*, Vol. 3.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5.)
- Freud, 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Vols. 4 and 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0.)
- Freud, S.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Standard Edition*. Vol. 6.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1.)
- Freud, S.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Standard Edition*. Vol. 8.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5a.)
- Freud, S.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Standard Edition*. Vol. 7. London: Hogarty Press, 195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5b.)
- Freud, S.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Standard Edition*. Vol. 10.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9a.)
- Freud, S. "Notes 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Standard Edition*. Vol. 10. London: Hogarty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9b.)
- Freud, S.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Standard Edition*. Vol. 11.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0a.)
- Freud, S. "Five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Vol. 11.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0b.)

- Freud, S. *Totem and Taboo: Standard Edition*. Vol. 13. London: Hogarty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3.)
- Freud, S.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Standard Edition*. Vol. 14. London: Hogarty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4.)
- Freud, S.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Standard Edition*. Vol. 14.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 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Vols. 15 and 16.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6 ~ 1917.)
- 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Standard Edition*. Vol. 14.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7.)
- Freud, S.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tandard Edition*. Vol. 17.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8.)
- Freud, S.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0.)
- Freud, 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1.)
- Freud, S. *The Ego and the Id: Standard Edition*. Vol. 19.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3.)
- Freud, S.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Standard Edition*. Vol. 21.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6.)
-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tandard Edition*. Vol.

20.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0.)
- Freud, S.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Vol.22. London: Hogarty Press,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3.)
- Freud, S. *Moses and Monotheism: Standard Edition*. Vol.23.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 Fromm, E.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41.
- Fromm, E.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 Furth, H.G. *Piaget and Knowledg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 Gergen, K.J. "Personal Consistency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C. Gordon and K.J. Gergen (Eds.), *The Self in Social interaction*. Vol.1: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Wiley, 1968.
- Gill, M.M. "Topography and System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logical Issues*, 1963, 3(2, Whole No.10).
- Gill, M.M. "Metapsychology Is Irrelevant to Psycho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Psychologist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Psychoanalysis, Chicago, August 1975.
- Goldstein, K. *The Organism*. New York: American Book, 1939.
- Gordon, C., and Gergen, K.J. (Eds.) *The Self in Social Interaction*. Vol.1: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Wiley, 1968.
- Grant, J.D., and Grant, M.Q. "A Group Dynamics Approach to the

- Treatment of Nonconformists in the Nav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59, 322, 126 ~ 135.
- Graves, C. W. "Deterioration of Work Standard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66, 44, 117 ~ 128.
- Greenberger, E., Josselson, R., Knerr, C., and Knerr, B. "The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e of Psychosocial Maturit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75, 4, 127 ~ 143.
- Greenberger, E., Knerr, C., Knerr, B., and Broun, J. B. "The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e of Psychosocial Maturity." Mimeographed. Baltimore: Report No. 170,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4.
- Groddeck, G. *The Book of the It*. London: Vision Press, 195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3.)
- Grossman, W. I., and Simon, B. "Anthropomorphism: Motive, Meaning and Causality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69, 24, 78 ~ 111.
- Haan, N., Stroud, J., and Holstein, C. "Moral and Ego Stages in Relationship to Ego Processes: A study of 'Hipp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3, 41, 596 ~ 612.
- Hammond, K. R. (Ed.) *The Psychology of Egon Brunswik*.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 Harakal, C. M. "Ego Maturity and Interpersonal Style: A Multivariate Study of Loevinger's Theor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tholic University. 1971.
- Hartmann, H.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 Hartmann, H., Kris, E., and Loewenstein, R. M. "Papers on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Issues*, 1964, 4(2, Whole no. 14). (Originally published 1945 ~ 1962.)
- Hartshorne, H., and May, M. A.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Character*. Vol. 1: *Studies in Deceit*.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 Hartshorne, H., May, M. A., and Maller, J. B.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Character*. Vol. 2: *Studies in Service and Self-Control*.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 Hartshorne, H., May, M. A., and Shuttleworth, F. K.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character*. Vol. 3: *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haracter*.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 Harvey, O. J., Hunt, D. E., and Schroder, H. M. *Conceptual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61.
- Heath, D. H. *Explorations of Maturity: Studies of Mature and Immature College Me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5.
- Hebb, D. 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0, 15, 735 ~ 745.
- Hendrick, I. "Instinct and the Ego During Infancy."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42, 11, 33 ~ 58.
- Hess, R. D., and Torney, J. V.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Chicago: Aldine, 1967.
- Higgins, J. W. "Some Consider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Preliminary to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Proceedings,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61, 35, 21 ~ 44.
- Hobhouse, L. T. *Morals in Evolu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06.
- Hogan, R. "Moral Conduct and Moral Character: A Psychological

-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3, 79, 217 ~ 232.
- Holstein, C. B. "Moral Judgment Change in Early Adolescence and Middle Age: A Longitudinal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March 1973.
- Holt, E. B. *The Freudian Wish and Its Place in Eth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15.
- Holt, L. P.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Process: An Examination of Freudian Theory with Reference to Some of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Counterpar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adcliffe College, 1948.
- Holt, R. 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Freud's Concept of Bound vs. Free Cathex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62, 10, 475 ~ 525.
- Holt, R. R. "A Review of Some of Freud's Biological Assump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 Theories." In N. S. Greenfield and W. C. Lewis (Eds.), *Psychoanalysis and Current Biological Though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 Holt, R. R. "Beyond Vitalism and Mechanism: Freud's Concept of Psychic Energy." In J. H. Masserman (Ed.),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Vol. 11: *Concepts of Ego*.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1967.
- Holt, R. R. "Freud's Mechanistic and Humanistic images of Man." In R. R. Holt and E. Peterfreund (Eds.), *Psych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1972, 1, 3 ~ 24.
- Holt, R. R. "Drive or Wish?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Motivation." In M. M. Gill and P. S. Holzman

- (Eds.), *Psychology Versus Metapsychology: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Memory of George S. Klein*. *Psychological Issues*, 1976, 9(4, Whole no. 36).
- Home, H. J. "The Concept of M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6, 47, 42 ~ 49.
- Hoppe, C. F. "Ego Development and Conformity Behavio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72.
- Horowitz, M. J. "Microanalysis of Working Through in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74a, 131, 1208 ~ 1212.
- Horowitz, M. J. "Stress Response Syndromes: Character Style and Dynamic Psychotherap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74b, 31, 768 ~ 781.
- Horowitz, M. J. "Hysterical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in press.
- Howe, L. P.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identificatio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55, 4, 61 ~ 79.
- Howe, L. P.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Psychiatry to College Settings."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Clinics*, 1970, 7, 263 ~ 291.
- Isaacs, K. S. "Relatability, a Proposed Construct and an Approach to Its Valid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6.
- Isaacs, K. S., and Haggard, E. A. "Some Methods Used in the Study of Affect in Psychotherapy." In L. A. Gottschalk and S. H. Auerbach (Eds.), *Methods of Research in Psychotherap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6.
- Jahoda, M. *Current Concept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58.
- James, W.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890.
- Janet, P. *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 Paris: Alcan, 1889.
- Janet, P. *The Major Symptoms of Hysteria*. New York: Hafner, 192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7.)
- Janet, P. *Psychological Healing: A Historical and Clinical Study*. Vol.1.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 Janik, A., and Toulmin, S. *Wittgenstein's Vien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 Jaspers, K. "The Axial Age in Human History." In M.R. Stein, A. J. Vidich, and D.M. White (Eds.), *Identity and Anx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8.)
- Jesness, C. F. "Sequential I-Level Classification Manual." Mimeographed. Sacramento, Calif.: American Justice Institute, 1974.
- Jesness, C.F., and Wedge, R.F. "Sequential I-level Classification Manual." Mimeographed. Sacramento, Calif.: Department of Youth Authority, Division of Research, 1970.
- Jones, E.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1;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3.
- Josselson, R., Greenberger, E., and McConochie, D. "Phenomenological Aspects of Psychosocial Maturity in Adolescence." Mimeographed. Baltimore: Report No.198,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5.
- Jung, C.G. *Psychological Typ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

- versity, Press, 197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1.)
- Jung, C.G. "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nalytic Psychology." In H.M. Ruitenbeek (Ed.), *Varieties of Personality Theory*. New York: Dutton,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3.)
- Jung, C.G. *Two Essays on Analytic Psychology*. New York: Meridian, 195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3, 1945.)
- Kahler, E. *The Inward Turn of Narrative*. R. and C. Winston,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7, 1959.)
- Kelley, H.H., and Stahelski, A.J. "Social Interaction Basis of Cooperators' and Competitors' Beliefs About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0, 16, 66 ~ 91.
- Kelly, G.A.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New York: Norton, 1955.
- Kelman, H.C.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 51 ~ 60.
- Klein, G.S., and Schoenfeld, N. "The Influence of Ego-Involvement on Confid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41, 36, 249 ~ 258.
- Kohlberg, L.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Orientations Towards a Moral Order. I: Seq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Thought." *Vita Humana*, 1963, 6, 11 ~ 33.
- Kohlberg, L.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Moral Ideology." In M.L. Hoffman and L.W. Hoffman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4.

- Kohlberg, L. "A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x-Role Concepts and Attitudes." In E. Maccoby (Ed.), *The Development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Kohlberg, L.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 A.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9.
- Kohlberg, L. "From Is to Ought: How to Commit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and Get Away with It in the Stud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T. Mischel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 Kohlberg, L., Colby, A., Lieberman, M., and Speicher-Dubin, B. "Standard Form Scoring Manual."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 Kohlberg, L., Scharf, P., and Hickey, J. "The Justice Structure of the Prison-A Theory and an intervention." *Prison Journal*, 1972, 51, 18 ~ 31.
- Kris, E. "The Psychology of Caricature." *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4.)
- Kubie, L. S. "The Fallacious Use of Quantitative Concepts in Dynamic Psychology." *Psychiatric Quarterly*, 1947, 16, 507 ~ 518.
-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Kuhn, T. S. "Reflections on My Critic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

- 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a.
-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b.
- Kuhn, T. S.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 In F. Suppe (E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 Kuo, Z. Y. "Giving Up Instincts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21, 18, 645 ~ 664.
- Lakatos, I., and Musgrave, A.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ambert, H. V. "A Comparison of Jane Loevinger's Theory of Ego Development and Lawrence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
- Lampl-de Groot, J. "Neurotics, Delinquents and Ideal-Formation." In K. R. Eissler (Ed.), *Searchlights in Delinquenc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9.
- Lampl-de Groot, J. "Ego Ideal and Superego."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62, 27, 94 ~ 106.
- Laperriere, K. "Maternal Attitudes in Different Subcultural Groups."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62.)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63 ~ 4850.
- Lashley, K. S., and Colby, K. M. "An Exchange of Views on Psychic Energy and Psychoanalysis." *Behavioral Science*, 1957, 2, 231 ~ 240.
- Lecky, P. *Self-Consistency: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Is-

- land Press, 1945.
- Lévi -Strauss, C. *Tristes tropiques*.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Lewin, K. "The Conflict Between Aristotelean and Galileian Modes of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In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1.)
- Lewis, O.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La 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 Lieberman, M.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Stage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Montreal, Canada, August 1973.
- Loevinger, J. "The Technic of Homogeneous Tests Compared with Some Aspects of 'Scale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48, 45, 507 ~ 529.
- Loevinger, J. "Intelligence." In H. Helson (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51.
- Loevinger, J. "A Theory of Test Response." In *Proceedings*, 1958 *Invitational Conference on Testing Problems*. Princeton;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1959.
- Loevinger, J. "Measuring Personality Patterns of Women."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1962, 65, 53 ~ 136.
- Loevinger, J. "Conflict of Commitment in Clinical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3, 18, 241 ~ 251.
- Loevinger, J. "Measurement in Clinical Research." In B. B. Wolman (Ed.), *Handbook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 Loevinger, J.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go Development."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6a, 21, 195 ~ 206.
- Loevinger, J. "Models and Measures of Developmental Variation." In J. Brozek (Ed.), *Biology of Human Vari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66b, 134, art. 2, 585 ~ 590.
- Loevinger, J. "Three Principles for a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66c, 71, 432 ~ 443.
- Loevinger, J., Gleser, G. C., and DuBois, P. H. "Maximizing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 of a Multiple Score Test." *Psychometrika*, 1953, 18, 309 ~ 317.
- Loevinger, J., and Sweet, B. "Construction of a Test of Mothers' Attitudes." In J. C. Glidewell (Ed.), *Parental Attitudes and Child Behavior*. Springfield, Ill.: Thomas, 1961.
- Loevinger, J., and Wessler, R. *Measuring Ego Development I: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a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0.
- Loewald, H. W. "Ego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1, 32, 10 ~ 18.
- Loewald, H. W.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0, 41, 16 ~ 33.
- Loewald, H. W. "Internalization, Separation, Mourning, and the Supergo."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62a, 31, 483 ~ 504.
- Loewald, H. W. "The Superego and the Ego-Ideal. II: Superego and Ti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2b, 43, 264 ~ 268.
- Loewald, H. W.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70, 25, 45 ~ 68.
- Loewald, H. W. "Some Considerations on Repetition and Repetition

- Compul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71a, 52, 59 ~ 66.
- Loewald, H. W. "On Motivation and Instinct Theory."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71b, 26, 91 ~ 128.
- Loewald, H. W.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Comments on the Concept and the Phenomen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71c, 19, 54 ~ 66.
- Lord, F. M. "Sampling Fluctu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Sampling of Test Items." *Psychometrika*, 1955, 20, 1 ~ 22.
- Mahler, M. S. *On Human Symbiosi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Individuation*. Vol. 1: *Infantile Psycho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8.
-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 Maslow, A. 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2.
- Masterman, M.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cDougall, W.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Enlarge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2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8.)
-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Merleau-ponty, M.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2.)
- Mill, J. S. "Bentham." In M. Warnock (Ed.),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Essay on Bentham, Together with Se-*

- lecte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38.)
- Mill, J. S. "On liberty." In M. Warnock (Ed.),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Essay on Bentham, Together with Selecte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9.)
- Mill, J. S. *Utilitarianism*. In M. Warnock (Ed.),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Essay on Bentham, Together with Selecte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61.)
- Mischel, W.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of Self-Imposed Delay of Reward." In B. A. Maher (Ed.), *Progress in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Research*. Vol.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6.
- Mischel, W.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1968.
- Mischel, W.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9, 24, 1012 ~ 1018.
- Mischel, W. "Toward a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3, 80, 252 ~ 283.
- Mischel, W., and Ebbesen, E. B. "Atten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0, 16, 329 ~ 337.
- Mischel, W., and Mischel, H. "A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Morality and Self-Regulation." In T. Lickona (Ed.),

- Moralit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 Nunberg, H. "The Synthetic Function of the Ego." In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1.)
- Nunberg, H., and Federn, E. (Eds.)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Vol. 1: 1906 ~ 190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 Odier, C. *Les deux sources, consciente et inconsciente, de la vie morale*. Neuchâtel, Switzerland: De La Baconnière, 1943.
- Palmer, T. B. "California's Community Treatment Program for Delinque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971, 8, 74 ~ 92.
- Palmer, T. B. "The Youth Authority's Community Treatment Project." *Federal Probation*, 1974, 38, 3 ~ 14.
- Parain-Vial, J. *Analyses structurales et ideologies structuralistes*. Toulouse, France: Privat, 1969.
- Peterson, D. G. *Physique and Intellect*. New York: Century, 1930.
- Peck, R. F., and Havighurst, R. J. *The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60.
- Perry, W. G., Jr.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 Piaget, J.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6.
- Piaget, J. *Judgment and Reasoning in the Chi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8.

- Piaget, J.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32.
- Piaget, J.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6.)
- Piaget, J.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7.)
- Piaget, J.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Norton, 1951.
- Piaget, J. *Six Psychological Stud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 Piaget, J. *Struc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Pittel, S. M., and Mendelsohn, G. A. "Measurement of Moral Values: A Review and Critiqu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6, 66, 22 ~ 35.
- Polanyi, M.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Popper, K. R. "Normal Science and its Danger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relinger, E., and Zimet, C. N. *An Ego-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Character Assess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Rapaport, D. "The Structure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logical Issues*, 1960, 2(2, Whole No. 6).
- Rapaport, D., and Gill, M. M. "The Points of View and Assumptions of Meta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 1959, 40, 153 ~ 162.
- Redmore, C., and Waldman, K. "Reliability of a Sentence Completion Measure of Ego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75, 39, 236 ~ 243.
- Reese, H. W., and Overton, W. F.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In L. R. Goulet and P. B. Baltes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0.
- Reich, W. *Character Analysi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4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3.)
- Rest, J. R.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Stages of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3, 41, 86 ~ 109.
- Rest, J. R. "Manual for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Mimeograph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4.
- Rest, J. R. "New Options in Assessing Moral Judgment and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Valid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Denver, Colorado, April 1975.
- Rest, J. R. "New Approaches in the Assessment of Moral Judgment." In T. Lickona (Ed.), *Moralit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 Rest, J. R., and others. "Judging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Moral Dilemmas -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4, 10, 491 ~ 501.
- Rest, J., Turiel, E., and Kohlberg, L.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as a Determinant of Preference and Comprehension of Moral Judgments Made by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9, 37,

225 ~ 252.

Rickman, J. (Ed.) *A General Selection from th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75.

Ricoeur, P. *Freud and Philosophy: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Riesman, D., Glazer, N., and Denney, R. *The Lonely Crowd*. Garden City, New York: Dorbleday, 195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0.)

Rogers, C. R.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Formulations of the Person and the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Rogers, C. R. *On Becoming a Per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Ryle, G.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Sanford, N. "The Dynamics of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5, 62, 106 ~ 118.

Sanford, N., Webster, H., and Freedman, M. "Impulse Expression as a Variabl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1957, 72, No. 11 (Whole No. 440).

Scammon, R. 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Body in Childhood." In J. A. Harris, C. M. Jackson, D. G. Paterson, and R. E. Scammon (Eds.), *The Measurement of 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0.

Schachtel, E. G. *Metamorpho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 Schafer, R. *Aspects of Internaliz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8.
- Schafer, R. "Internalization: Process or Fantasy?"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72, 27, 411 ~ 436.
- Schafer, R. "Problems in Freud's Psychology of Wom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74, 22, 459 ~ 485.
- Schiwy, G. *Structuralism and Christianity*. Pittsburgh, Penn.: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elman, R. "The Relation of Role-Tak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Judgment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1971, 42, 79 ~ 92.
- Selman, R.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Levels of Interpersonal Reasoning Based on Levels of Social Perspective-Taking."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Judge Baker Social Reasoning Project, 1974.
- Selman, R., and Byrne, D.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evels of Role-Taking in Middle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1974, 45, 803 ~ 807.
- Shapiro, D. *Neurotic Styl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 Shapiro, D. "Motivation and Action in Psychoanalytic Psychiatry." *Psychiatry*, 1970, 33, 329 ~ 343.
- Sherwood, M.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9.
- 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 Rochelle, N. Y.: Arlington House, 196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59.)
- Spitz, R. A. *No and Yes: On the Beginning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7.

- Spitz, R. A. *A Genetic Field Theory of Ego Form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 Strawson, P. F.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London: Methuen, 1959.
- Sullivan, C., Grant, M. Q., and Grant, J. 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Maturity: Applications to Delinquency." *Psychiatry*, 1957, 20, 373 ~ 385.
- Sullivan, H. S. "Schizophrenia: Its Conservative and Malignant Features." In *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 New York: Norton,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5.)
- Sullivan, H. S.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1953.
- Tanner, J. M. "The Regulation of Human Growth." *Child Development*, 1963, 34, 817 ~ 847.
- Tanner, J. M., and Inhelder, B. (Eds.) *Discussions on Child Development*.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0.
- Tapp, J. L., and Kohlberg, L. "Developing Senses of Law and Legal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1, 2, 65 ~ 91.
- Thomson, G. H. *The Factorial Analysis of Human Ability*. Cambridge, England: Houghton Mifflin, 1939.
- Thorndike, E. L. "Units and Scales for Measuring Educational Products." I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s*. Indiana University Bulletin, 1914, 12, No. 10.
- Thorndike, E. L., and other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7.
- Tolman, E. C. "Can Instincts Be Given Up in Psychology?" *Journal*

-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22, 17, 139 ~ 152.
- Tolman, E. C., and Brunswik, E. "The Organism and the Causal Tex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935, 42, 43 ~ 77.
- Toulmin, S. E. "Do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ormal and Revolutionary Science Hold Water?"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Tryon, R. C.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 An Alternative to 'Mathematic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35, 42, 425 ~ 454.
- Vaihinger, H.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A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Religious Fictions of Mank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1.)
- Van den Daele, L. D. "Ego Development and Preferential Judgment in Life-Span Perspective." In N. Datan and L. H. Ginsberg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Normative Life Cris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Vergote, A. "Psychanalyse et phénoménology." *Recherche et débats*, 1957, 21, 125 ~ 144.
- Wachtel, P. L. "Psychodynamics, Behavior Therapy, and the Implacable Experimenter: An Inquiry into the Consistency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73, 82, 324 ~ 334.
- Waelder, R.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Function: Observations on Over-Determinatio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36, 5, 45 ~ 62.

- Waelder, R. *Basic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0.
- Warren, M. Q. "The Case for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Delinque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9, 381, 47 ~ 59.
- Warren, M. Q. "Intervention with Juvenile Delinquents." In M. Rosenheim (Ed.), *Pursuing Justice for the Chi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Watkins, J. W. N. "Against 'Normal Science.'"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Werner, H.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0.)
- Westermarck, 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06.
- Westermarck, 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Vol. 2. London: Macmillan, 1908.
- White, R. W. *Lives in Progress*.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52.
- White, R. W. "Ego and Reality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logical Issues*, 1963, 3(3, Whole No. 11).
- Wohlwill, J.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

名 词 索 引

本索引页码均指英文版原著页码,请按中文版边码检索。

A

- Abilities, measurement of 能力,能力的测量 55, 164 ~ 168, 241 ~ 243
- Abreaction 发泄 327, 329, 336
- Abstraction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发展阶段的抽象 14, 40, 57 ~ 58, 173
- Accommodation 顺应 34 ~ 35, 271, 273, 295 ~ 299, 305, 308
- Achievement motive 成就动机 21 ~ 23; 参见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主题统觉测验; achievement themes in 成就课题中的主题统觉测验
- Action patterns 活动模式 42, 295
- Active repetition 积极的重复 见 Mastery, through active repetition 控制, 通过积极的重复来控制
- Actuarial classification 实际分类 216 ~ 218
- Adaptation 适应 271, 295, 420
- Adjunct therapies 附属疗法 326 ~ 327, 330 ~ 331
- Adjustment 调节 142, 147, 156; as conformity 作为遵奉的 416; 参见 Positive mental health 积极的心理卫生
- Age-specific contingencies 年龄特性的偶联 13 ~ 14, 40, 57, 173

- Aggression turned against the self 转向自身的攻击 400, 403 ~ 404, 409
- Aggressive drive 攻击内驱力 362, 387; and evolution of conscience 和良心的发展 286, 403 ~ 404
- Algorithms 算法, 见 scoring algorithms 记分算法
- Allocentric attitude 紧密关联的中心态度 145
- Allocentric perception 紧密关联的中心知觉 143 ~ 144
- Alternatives to growth 生长的抉择 130 ~ 131
- Altruism 利他主义 271, 285 ~ 286, 365 ~ 366, 407
- Ambivalence 矛盾心理 391
- American psychology,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美国心理学,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心理学 10, 267 ~ 269
- Amnesia; in hysterics 记忆缺乏; 歇斯底里中的记忆缺失 343; infantile 婴儿期的 146, 325 ~ 326
-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分析; of Family Problems Scale 家庭问题量表的 227 ~ 228
- Analytical psychology 分析心理学 350 ~ 352
- Anima 阿妮玛 349 ~ 350
- Animal behavior as continuous with human behavior 人和动物行为的连续性 272, 283, 406
- Animal magnetism 通磁说(动物磁性说) 319
- Animism 泛灵论 75, 102, 267
- Animus 阿尼姆斯 349 ~ 350
- Anomalies; in associations as evidence of unconscious forces 异常; 作为无意识力量的证据 332; in science 科学中的 300 ~ 301
- Anthropomorphism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中的拟人说 422 ~ 423
- Anti-humanism of French structuralists 法国反人本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49 ~ 50

-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94
- Anxiety 焦虑 137, 359; guarding against 防御性的 419, 423; in infants 婴儿期的 70, 360 ~ 361; neurosis 神经症的 338;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的精神分析理论 338 346 359 ~ 361; purposes of 的目的 361; and repression 和压抑 360;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的结构定义 61; theory of in interpersonal psychiatry 的人际精神病学理论 70 ~ 72
- Archaeology of the subject 主体考古学 376 ~ 379
- Archetypes 原型 349
- Aristotelian mode of thought 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方法 388
- Art,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of 艺术, 精神分析对艺术的解释 376, 378
- Assessment techniques 评价技术 209 ~ 238, 438 ~ 439, 443 ~ 444, 449 ~ 451
- Assimilation 同化 34, 295 ~ 299, 305, 308 ~ 310
- Associationism, British school of 联想主义, 英国联想主义学派 262, 318
- Asynchronous development 非同步的发展 445
- Attachment affective 依恋, 情感的依恋 42 ~ 43
- Authoritarian family attitudes 权力主义的家庭态度 224 ~ 229
- Authoritarian Family Ideology 权力主义的家庭意识 225 ~ 229; as a measure of ego development 作为自我发展一种测量的 227 ~ 229; quantification strategy of 的量化策略 228 ~ 229; scoring algorithm of 的记分算法 229; validation studies of 的效度研究 225 ~ 226
-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权力主义人格 94 ~ 101
- Autism 自闭症, 我向思考 15, 102
- Autistic thinking 我向思考 137 ~ 138
- Autocentric perception 自我中心的知觉 143 ~ 144; 参见 Egocentricity

自我中心

Automatism 自动作用 323

Autonomous morality 自律的道德 80, 82, 123 ~ 124, 248 ~ 249, 408

Autonomous Stage 自主阶段 23 ~ 24, 46, 78, 409

Autonomy: as a criterion for mental health 自主: 作为心理卫生的一种标准 149; different uses of term 术语的不同用法 79; kinds of 的种类 124; in Self-Protective Stage 自我保护阶段 79

Awakening and fright 觉醒和恐怖 103, 415

B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10

Behaviorist approach to psychology 行为主义者的心理学方法 430

Behavior rating scales 行为等第评定量表 216

Being ashamed 羞愧 398, 404

Berlin Society of Physicists 柏林物理学会 316 ~ 317 *Besetzung* 369, 参见 Cathexis

Birth trauma 出生创伤 360

Blame 责备 20, 397; externalization of 的客观化 17, 365

Body awareness 躯体意识 392

C

Case history 病史 328 ~ 329, 389

Castration anxiety 阉割焦虑 344, 361, 378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命令 263

Cathartic therapy 宣泄疗法 319, 330, 335 ~ 336

Cathexis 精神投入 333, 338, 369 ~ 370

Cathexis theory 精神投入说 66, 362, 367; criticisms of 对精神投入说的批评 370

- Causality, development in understanding of 因果性,有关因果性理解的发展 178,441 ~ 445
- Causes and reasons 原因和理由 390
- Change and development 变化与发展 30 ~ 32,39 ~ 40
- Character armor 性格的保护层 364
- Characterologies 性格学 91 ~ 105
- Character structure 性格的结构 4,202
- Character types 性格类型 116 ~ 118; assessment of 对性格类型的评价 212 ~ 213
- Cheating, measures of 欺骗,的测量 244
- Childhood sexuality 儿童期的性欲 334,337,344,349,371,385
- Chronological age 实足年龄 13 ~ 14,164,168,176
- Chumship 好友 73,407 ~ 408
- Circular reaction 循环反应 287,290 参见 Schemes, sensorimotor

- Cognitive structural approach to psychology 心理学的认知结构法 40
~ 53, 431
- Cognitive structures, development of 认知结构, 的发展 40
-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无意识 349, 351
- Commitment in a relativistic world 信奉相对的世界 130, 418
- Complexes 情结 324, 349
- Composite responses, rating of in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复合的反应,
造句测验的等第评定 236 ~ 238
- Conceptual complexity 概念的复杂性 19, 21 ~ 23, 25, 134, 175
- Condensation of dream elements 梦境的简约 343
- Conduct, three levels of 品行, 品行的三个层次 275 ~ 276
- Conflict-free ego sphere 无冲突的自我阶段 5, 10, 143, 366
- Conformist, as a universal type 遵奉者, 作为一种普遍类型的 195
- Conformist Stage 遵奉者阶段 17 ~ 19, 78, 93, 409, 416, 454, 456
- Conformist types 遵奉者的类型 93, 107, 416 ~ 417
- Conformity 遵奉 136; as an abstraction 作为抽象的 195; as adjustment 作为调节的 416; as a milestones 作为里程碑的 208; as a polar variable 作为极性变量的 56
- Conscience 良心 20, 354, 379, 396 ~ 412; derivde from aggressive drive 来自攻击性内驱力的 363; development of concept of in modern society 现代社会良心概念的发展 279 ~ 282; elements of 的要素 397 ~ 399; ethics of 的伦理观 248 ~ 249; Greek conception of 的古希腊的概念 278; orgins of 的起源 89 ~ 90, 263, 265, 285, 362 ~ 363, 400 ~ 409; as pacer 作为向导的 410 ~ 411; vs. responsibility 对责任 248 ~ 249; as a special faculty 作为一种特殊官能的 282 ~ 283; stages in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阶段 89 ~ 90, 409 参见 Ego ideal 自我的理想
- Conscientious-Conformist level 良心—遵奉水平 19 ~ 20, 417

- Conscientious Stage 良心阶段 20 ~ 22, 78, 93, 409, 417 ~ 418
- Conscious morality 有意识的道德 279 ~ 280
- Consciousness 意识, 46 ~ 51, 53, 59
- Conscious self 意识自我 351
- Consensual validation 交感证实 71, 272, 442
- Conservation of objects 物体守恒 15, 177 ~ 178, 296 ~ 297
- Constancy principle 常性原则 382, 285; 参见 Pleasure principle 享乐原则
- Content of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responses 造句测验反应的内容 232
- Continuity;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连续: 发展阶段的连续性 207, 290; vs. discontinuity 连续对中断 38, 55, 191, 207, 290
- Contradiction, coping with 矛盾, 处理矛盾 179 ~ 180
-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 手势会话 288
- Coordination of schemes 图式的协调 297 ~ 298
- Coordinations 协调 269
- Core functioning and ego level 核心功能和自我水平 105, 209 ~ 210
- Counter-cathexis 反精神投入 367
- Creativity 创造性 145, 376 ~ 379
- Crisis; of ego devaluation 危机: 自我贬值的危机 86 ~ 88; of ego maturation 自我成熟的 87 ~ 88; in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心理社会发展的 78 ~ 79; in science 科学中的 301
- Culture of poverty 贫乏的文化 415
- Curricula designed to increase ego and moral level 增强自我和道德水平的课程设计 453
- Customary morality 习俗的道德 279 ~ 280

D

- Data; of scientific paradigms 资料: 科学范式的 301; of psychoanalysis

- 精神分析的 336, 371
- Death instinct 死亡本能 359, 362, 382
- Décalage 差倾角 199
- Deceit, measure of 欺骗, 的测量 244 ~ 245
- Decentration 去中心化 297
-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作出决定的过程 48
- Deficiency motivation vs. growth motivation 缺失的动机对发展的动机 139 ~ 142
- Defining Issues Test 定义问题测验 222 ~ 224; quantification strategy of 的量化策略 222; scoring algorithm of 的记分算法 222 ~ 224
- Delinquency, developmental basis of 过失, 的发展基础 106 ~ 107, 116
- Delinquents, ego development of 违法, 自我发展的 214 ~ 216
- Delta Stage of interpersonal relatability 人际关系的 Delta 阶段 110, 415; 参见 Self-Protective Stage 自我保护阶段
- Delusions 妄想 345
- Dependence; emotional 依赖; 情绪的 22; executive 行政的 86; volitional 意志的 86
- Depression 压抑 355
- Dereistic thinking 孤僻思想 138
- Desatellization 去卫星化 77, 87 ~ 89
- Desire 愿望; 见 Wish; Freudian
- Determinism 决定论 317 ~ 318; psychic 精神的 327 ~ 328, 334 ~ 336, 371, 389
- Development; age specific models of 发展; 的年龄特性模式 170 ~ 171; and change 与变化 30 ~ 32, 39 ~ 40; dialectical 辩证法的 266, 290, 421 ~ 423, 425; evolutionary 进化的 265 ~ 266, 290; and internality 和内在性 35, 295; mechanistic approach to 的机械方法 29 ~ 30, 36 ~ 40; models of 的模式 162 ~ 172; revolutionary 变革

- 的 266, 290; and rote learning 和死记硬背的学习 31; and stability 和稳定性 35, 294 ~ 313
- Developmental characterologies 发展的性格学 105 ~ 133
-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发展的序列 15 ~ 28, 75 ~ 91
- Dialectic of personal growth 个人生长的辩证法 270 ~ 273, 290, 421
-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差异心理学: 发展的方法 204;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的心理测量方法 203 ~ 204, 242, 256
-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from non-self 自我与非我的分化 15 ~ 16, 106, 397, 409
- Disciplinary matrix 训练的模式 300
- Disinterestedness 无兴趣 399, 407 ~ 409
- Displacement of affect 情感的移置 336, 343, 385
- Dissociation 分裂 64, 324 ~ 326, 329
- Disturbed children 障碍儿童 400
- Domination as ego problem 自我问题的控制 378 ~ 379; 参见 Mastery, through active repetition 通过积极的重复来控制
- Dreams, in interpretation of 梦, 梦的解析(释梦) 336, 342 ~ 343, 376 ~ 379, 393
- Dream work 做梦 343
- Drive-derivative view of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派生内驱力的观点 75 ~ 78, 172 ~ 173, 353 ~ 356
- Drive paradigm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内驱力范式 342 ~ 347, 368, 431;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352 ~ 356; undermining of 的削弱 355
- Drive psychology 内驱力心理学 8, 10, 384; and ego psychology 和自我心理学 384 ~ 388
- Drives 内驱力 173n, 175, 347, 368; plasticity of 的可塑性 345, 385;

- tension-reduction model of 的紧张减弱模式 367; 参见 Instincts 本能
- Dualistic thinking 二元论思考 128 ~ 129
- Duty, development of sense of 责任, 责任感的发展 263 ~ 266, 272, 285
- Dynamic unconscious, principle of 动力无意识, 的原则; 参见 Unconscious 无意识

E

- Eating disorders 饮食失调 392
- Economic point of view 经济的观点 327, 344; and reductionism 和还原主义 361; and Oedipus Complex 和恋母情结 379
- Ego 自我 58 ~ 67; as coherent organization 作为一致的组织 359; as frame of reference 作为参照框架 9 ~ 10;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的基本特征 58 ~ 66; holistic conception of 的整体概念 62 ~ 64; as I 自我即我 391 ~ 393; nineteenth century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of 的 19 世纪哲学概念 8, 394; origin of concept of 的概念起源 6 ~ 11; problems in defining 定义中的问题 58 ~ 60; as a process 作为一个过程 58 ~ 60, 310;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精神分析概念 4, 59 ~ 60, 340, 359 ~ 360, 366, 375, 378, 383; as a psychoanalytic term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术语 368 ~ 369; as purposive 作为有目的的 65 ~ 66; related to id and superego 与本我和超我的关系 383; social origin of 的社会起源 64 ~ 65, 263, 270 ~ 274, 287 ~ 289; stability of 的稳定性 60 ~ 62, 74, 310 ~ 313; structural conception of 的结构概念 60 ~ 62; unconscious part of 的无意识部分 359, 365; 参见 Self, Self-system 自我, 自我系统
- Ego boundaries 自我界限 59 ~ 60, 141, 392
- Egocentricity 自我中心 81, 137, 179, 280, 297, 436; 参见 Autocentric

perception 自我中心的知觉

Ego defenses 自我防御 364 ~ 366

Ego devaluation, crisis of 自我贬值, 的危机 86 ~ 88

Ego development; as a abstraction 自我发展, 作为一种抽象的 14, 57 ~ 58, 193; and adjustment 和调节 137; and age specific contingencies 和年龄特性的偶联 57; applied to politics and social issues 用于政治和社会问题 429 ~ 430;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onceptions of 的当前概念的特征 11; characterologies of 的性格学 56 ~ 57, 91 ~ 105;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和认知发展 172, 175 ~ 180; cognitive style in 的认知风格 26 ~ 27; confounded with other types of development 与其他发展类型的混淆 183 ~ 184; conscious preoccupations in 的意识先行 26 ~ 27; correlated with IQ 与智商的关系 176; crises in 的危机 78 ~ 79, 86 ~ 88; criticisms of stage-description of 对自我发展阶段描述的批评 25, 28;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的跨文化效度 194, 452; in delinquents 过失者的 214 ~ 216; developmental characterologies of 的发展的性格学 104 ~ 133;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of 的发展序列 15 ~ 28, 74 ~ 91; different uses of term 术语的不同用法 3 ~ 4; drive-derivative view of 的内驱力派生的观点 75 ~ 78, 172 ~ 173, 353 ~ 356; in the drive paradigm 的内驱力范式中的 352 ~ 356; in 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s 情绪上失调的个体的 200; and evolution of conscience 和良心的发展 409 ~ 410; fantasies as signs of 作为自我发展信号的幻想 108 ~ 113;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的基本特征 54 ~ 58; in gifted persons 天赋者的 200; impetus for 的动力 77 ~ 78, 131 ~ 132; impulse control in 的冲动的控制 26 ~ 27; in infancy 婴儿期的 15 ~ 16, 70 ~ 71, 75 ~ 79, 81, 85 ~ 86, 106, 414 ~ 415; and intellectual-ethical development 和智力—伦理的发展 109, 133; and intelligence 和智力 175 ~ 180; and interpersonal integration 和人际整合 109; and interper-

sonal relatability 和人际关系 113 ~ 116; interpersonal style in 的人际风格 26 ~ 27; knowledge of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的知识和实际应用 426 ~ 428; as master trait in personality 作为人格中控制特质的 41; meanings of in psychoanalysis 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 4 ~ 5; milestones, of 的里程碑 25 ~ 27; as a model for psychoanalysis 作为精神分析的一种模式 384; models for 的模式 170 ~ 172, 310 ~ 311, 313; and moral character 道德特征 109, 118; and moral development 和道德发展 109, 122, 124, 440 ~ 441, 448; and need hierarchy 和需要的层次 140; philosophical sources for model of 的模式的哲学根源 290; producing growth in 导致生长 152, 426, 452 ~ 457; and psychodynamic explanations 和心理动力的解释 100, 394, 403; and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和心理性欲的发展 77, 79, 85, 137, 172 ~ 175; and psychotherapy 和心理治疗 151 ~ 156, 427 ~ 428, 439 ~ 440; research design for 的研究设计 426 ~ 428; restricted to earliest stages 对最早阶段的限制 5, 75; sources of current interest in 当前兴趣的根源 11; stage-description of 的阶段描述 15 ~ 28; substages of 的亚阶段 196 ~ 199; subtypes of 的亚类型 196 ~ 199; vs. super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对超我发展 411 ~ 412; and types of prejudiced and unprejudiced persons 和有偏见者与无偏见者的类型 99; typologies of 的类型学 56 ~ 57, 91 ~ 105; vagueness of concept of 的概念含糊性 447 ~ 448, 457; and work adjustment 和工作调节 104; 参见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

Ego disorganization 自我瓦解 61, 384

Ego functions, autonomous 自我功能, 自主性 63 ~ 64, 366, 373

Ego ideal 自我理想 359, 379, 383, 399 ~ 400; dynamic explanation of 的动力解释 403; as function and structure 作为功能和结构的 401; origins of 的起源 377, 400 ~ 401; as pacer 作为向导的 410 ~ 411; prepsychoanalytic concepts of 的前精神分析概念 354; as re-

- gression to narcissism 作为倒退到自恋的 354; 参见 Ideal self 理想的自我
- Ego identity 自我同一性 375
- Ego levels; different concepts of 自我的层次; 的不同概念 209 ~ 210; expressed in action 活动中的表达 448; probabilistic signs of 的可能性迹象 183; problems of higher 更高阶段的问题 118; relation of therapist's to patient's 治疗者的自我层次与患者的自我层次的关系 428; 参见 ego development, stage-description of 自我发展, 的阶段描述
- Ego maturation, crisis of 自我成熟, 的危机 87
- Ego psychology; in drive paradigm 自我心理学; 内驱力范式 356 ~ 358; and drive psychology 和内驱力心理学 384 ~ 388; new psychoanalytic 新精神分析的 10, 143, 173, 363 ~ 367, 414, 421 ~ 422, 432
- Ego stability 自我稳定性 72, 74, 309 ~ 314, 423; 参见 Equilibration; Equilibrium 平衡; 平衡
- Einheit 见 Unity and coherence
- Elementarism 元素主义 36
- Embeddedness affects 埋置情感 143
- Embryonic development 胚胎的发展 168
- Embryonic model of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心理性欲发展的胚胎模式 169
- Emotional dependence 情绪依赖 22; 参见 Autonomy 自主
- Energy; bound vs. free 能量; 约束对自由 330, 370; conceptions of in psychology 心理学中能量的概念 337 ~ 338; mental 心理的 327; psychic 精神的 333, 349, 369 ~ 370, 380
- Environmental mastery as a criterion for mental health 作为心理卫生标准的环境控制 150; 参见 Mastery 控制
- Epistemology 认识论 135; natural 自然的 441 ~ 445

- Equilibration 平衡 420, 432, 454; and immaturity 和未成熟的 311 ~ 312; meaning of 的意义 298 ~ 299; and psychopathology 和精神病理学 311 ~ 312; and scientific paradigms 和科学范式 306
- Equilibrium 平衡 37, 59; of a structure 结构的 33
- Eros 生存本能 382
- Es, das 359, 369, 391 参见 Id
- Ethics 伦理学 281; and conscience 和良心 248 ~ 250, 265; and logic 和逻辑 44; nineteenth-century schools of 19 世纪的伦理学学派 262 ~ 265, 272, 275; 参见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
-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94
- Ethos 社会的精神气质 275
- Evolution; of morals 演化; 道德的 274 ~ 282; pre-Darwinian concept of 的前达尔文概念 265 ~ 267; theory of 的理论 8
- Evolutionary model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演化模式 265 ~ 266, 290
- Exeutive dependence 行政依赖 86
- Exemplary experiment 模仿实验 300
- Exploratory orientation 探究定向 88, 90
- Extraversion 外倾 350
- Extrinsic status 外在的身分 90
- Extrinsic valuation 外在的价值 87

F

- 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 204, 208, 242, 256;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和相互作用的效应 228; of psychosocial maturity test 心理社会成熟测验的 250 ~ 251
- Faith healing 信仰疗法 319
- Family Problems Scale 家庭问题量表 224 ~ 229
- Fictitious life goal 虚构的生活目标 9, 348

- Fixation 固恋 311 ~ 312, 345
- Fixed idea, subconscious 固执的观念, 潜意识的 324
- Flexibility 灵活性 34; 参见 Accommodation 顺应
-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 330 ~ 332, 336, 364 ~ 365, 371
- Freedom 自由 46 ~ 51; experience of 自由体验 30;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和人格发展 91 ~ 92
- Freedom from 摆脱 91
- Freedom to 获得自由 91
- Freudian wish 弗洛伊德派的愿望; 参见 Wish, Freudian 愿望, 弗洛伊德派
- Fugues 失忆症 325
- Functional autonomy of motives 动机的功能自主 60
- Functional psychology 功能心理学 60, 268

G

- Galileian mode of thought 伽利略的思想方法 388
- Generalized other 概括化的他人 288 ~ 289, 437
- General linear hypothesis 一般线性假设 256, 430
- General systems theory 一般系统论 48; 参见 Organismic approach 有机体的方法
- 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 33
- Good form 良好形式 33
- Greek philosophy 古希腊哲学 6, 64 ~ 65, 193 ~ 194; and moral development 和道德发展 277 ~ 279
- Growth; alternatives to 生长; 的抉择 130 ~ 131; need for 的需要 131 ~ 132, 139 ~ 142
- Growth disturbances 生长的干扰 168
- Guiding fiction 指导的虚构 9, 348

Guilt 内疚 20, 107, 112, 117, 140, 398, 404; in Conformist Stage 遵奉者阶段的 416; development of in child 儿童中内疚的发展 89; unconscious 无意识的 379

H

Harvard Bureau of Study Counsel 哈佛咨询研究所 126

Hate 憎恨 356

Hedonic calculus 享乐主义演算 6, 262, 264, 273, 418; criticism of 的批评 7 ~ 8; 参见 Pleasure principle; Psychological hedonism 快乐原则, 心理学的享乐主义

Helplessness; infantile 无助; 婴儿期的 85 ~ 86, 381; as danger 作为一种危机 360

Heteronomous morality 他律的道德 80 ~ 81, 117, 408

High-maturity boys, description of 成熟程度高的孩子, 的描述 252

Hippies as Conformists 作为遵奉者的嬉皮士 195

History of science, models of 科学史, 的模式 303

Holistic conception of personality 人格的整体概念 62 ~ 64; and inner conflict 和内部冲突 64

Homogeneous keying 同质方法 225 ~ 226

Humanas Foundation 人性基础 456 ~ 457

Human diminution 人类减少 141

Humanistic approach to psychology 心理学的人本主义方法 431

Humor existential 幽默, 存在的 24, 140

Hypnosis as psychotherapy 作为心理治疗的催眠 318 ~ 332, 346, 364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 假设的规则, 262

Hysteria; and organic paralyses 歇斯底里症; 和器质性麻痹 321 ~ 322; symptoms of 的症状 321 ~ 322, 325 ~ 326, 345 ~ 346; theories of 的理论 329; treatment of 的治疗 318 ~ 332

I

- I-1. 见 Presocial Stage; Symbiotic Stage 前社会阶段; 共生阶段
- I-2. 见 Impulsive Stage 冲动阶段
- I-3. 见 Conformist Stage 遵奉者阶段
- I-3/4 见 Conscientious-Conformist level 良心—遵奉阶段
- I-4. 见 Conscientious Stage 良心阶段
- I-4/5. 见 Individualistic level 个体化水平
- I-5. 见 Autonomous Stage 自主阶段
- I-6. 见 Integrated Stage 整合阶段
- Ich, das* 我, 自我 4, 59, 69, 368 ~ 369, 391; 参见 Ego 自我
- Id* 本我 59, 62, 359 ~ 369 *passim* 各处, 378 ~ 387 *passim* 各处
- Ideal ego* 理想自我; 参见 Ego ideal; *Ideal self* 自我理想; 理想自我
- Ideal self* 理想自我 271, 274, 289, 377, 409; *Origin of in instincts* 本能中理想自我的起源 286 ~ 287; 参见 Ego ideal 自我理想
- Ideals, striving for* 理想, 为理想而奋斗 398 ~ 399
- Ideal types* 理想的类型 116, 444; *validity of* 的效度 191 ~ 194
-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自居(认同), 以攻击者自居 17, 365; *as aspect of ego development* 作为自我发展一个方面的 86, 107, 111, 115, 125 ~ 126; *in Conformist Stage* 遵奉阶段的 417; *as impetus for ego development* 作为自我发展动力的 375, 378 ~ 379, 381; *with lost-love object* 以失去所爱对象的自居(认同) 355; *with parents* 以父母自居 363, 401, 409; *as reaction-formation to jealousy* 作为对嫉妒的反应形成的 407
- Identity, sense of* 同一性, 的感觉 24, 148
- Idiographic approach to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的独特方法 57
- Imagination* 想象 329
- Imitation; instinct of* 模仿; 的本能 270 ~ 273, 287, 419; *as prototype*

- of accommodation 作为顺应原型的 297
- Impartial spectator 公正的旁观者 263
- Impulse control, problem of 冲动的控制, 的问题 16 ~ 17, 353, 359, 362 ~ 363, 404; 参见 Instinct; Mastery 本能; 控制
- Impulsive Stage 冲动阶段 16, 78, 409, 415
- Incorporative orientation 结合的定向 88, 90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个体差异 3, 62, 70, 90, 241 ~ 242; factorial approach to 的因素方法 242; and lens model 和透镜模式 253 ~ 254; recognition of 的重新认识 20, 22
- Individualism, growth of 个人主义, 的发展 276
- Individualistic level 个体化水平 22 ~ 23
- Individuality, sense of 个性, 的感知 22
- Individual psychology 个性心理学 347 ~ 348
- Infant, self-concept of 婴儿, 的自我概念 70
- Infantile sexuality 婴儿期的性欲; 见 Childhood sexuality 儿童期性欲
- Infant-mother unity 母婴一体化 380 ~ 381
- Inner conflict; awareness of 内部冲突; 的意识 22; as basis for neuroses 作为神经症基础的 63, 335 ~ 337, 385; coping with 的处理 23
- Inner life, awareness of 内部生活, 的意识 18 ~ 19, 21
- Inner logic and stage concept 内在的逻辑和阶段的概念 56
- Instincts 本能 368, 376, 380n;
- 自我 354; as origin of conscience 作为良心源泉的 285, 406;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的精神分析概念 380; as purposive behavior 作为目的行为的 283 ~ 286; sexual 性欲的 354; vicissitudes of 的变化 354; 参见 Drive 内驱力
- Instinct theory 本能理论 291, 354
- 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 renunciation of 本能的满足, 的放弃 353

- Instinctual impulses 本能冲动; 见 Instincts
- Integrated Stage 整合阶段 24, 78, 140, 409
- Integration as a criterion for mental health 作为一种心理卫生标准的整合 149
- Intellect CAVD 智力 CAVD(桑代克所编制) 242
-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智力发展 57, 266 ~ 267, 295 ~ 299;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175 ~ 180;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和科学发展 305 ~ 306; 参见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认知发展; 智力
- Intellectual-ethical development; in collegee 智力—道德发展, 大学生的 126 ~ 133; dynamics of 的动力 131 ~ 132;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109, 133; forms of 的形式 128 ~ 133; subtypes of 的亚类型 196
-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f 智力; 的发展 295 ~ 299;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175 ~ 180; and intentionality 和意图 297; measurement of 的测量 165 ~ 166; 参见 IQ 智商
- Intelligibility, locus of 可理解性, 的轨迹 37
- Interaction effects, test by subject 相互作用的效应, 被试测验 228
- Internality-externality 内在性—外在性 381 ~ 382, 446
- Internalization 内化 46, 139, 374, 382, 446
- Interpersonal dilemmas 人际两难推理 43, 119, 438 ~ 439, 448 ~ 451
- Interpersonal integration 人际整合 105 ~ 108; level of 的水平 106 ~ 108; subtypes of 的亚类型 196 ~ 197
-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taking 人际观点采择 436 ~ 441; and logical reasoning 逻辑推理 439 ~ 441; and moral judgment 和道德判断 439 ~ 441; scoring manual for 的记分手册 439; stages of 的阶段 436 ~ 441
- Interpersonal psychiatry 人际精神病学 69 ~ 74; developmental stages

- of 的发展阶段 70 ~ 74
- Interpersonal relatability 人际关系的能力 108 ~ 116, 210 ~ 211; assessment of 的评价 210 ~ 212;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113 ~ 116; as a latent ability 作为一种潜能的 210 ~ 211; levels of 的水平 110 ~ 115; and psychotherapy 和心理治疗 152, 156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apacity for 人际关系: 的能力 25; growth in reasoning about 关于人际关系推理的发展 436 ~ 441
- Interpersonal schemes as source of intrapersonal schemes 作为人格图式之源的人际图式 375, 386 ~ 388
- Interview, quantification strategy of 谈话法, 的量化策略 214
- Intrinsic evaluation 内部评价 87
- Introjection 心力内投 312, 374 ~ 375, 381
- Introversion 内倾 350
- Intuitionist school of ethics 直觉主义者的伦理学派 262, 272, 281
- Invisible colleges 无形大学 302
- IQ 智商 164, 168, 176

J

- Jesness Behavior Checklist 杰斯尼斯行为调查表 216 ~ 217
- Jesness Inventory 杰斯尼斯问卷 216 ~ 217
- Judicial temperament 法官的气质 407 ~ 409
- Just community 公正的团体 312, 454
- Justice; distributive 公正: 分配的 82; ideal of as pacer 作为榜样的理想 455; retributive 报应的 82; sense of 公正观 265, 277 ~ 280, 286, 399, 406 ~ 408

L

- Language; in establishing sense of self 语言: 建立自我观的 16, 71,

- 74, 76, 86; theory of in French structuralism 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 49 ~ 50
- Latency period 潜伏期 349
- Latent ability; and ego level 潜在能力; 和自我水平 209; scoring algorithm for 的记分算法 211 ~ 212
- Latent content of dreams 梦的潜在内容 342
- Lawfulness, postulate of 合法的假设 328, 334, 385, 388 ~ 389
- Law of effect 效果律 291, 419
- Law of no effect 无效果律 335
- Law of the talion 以牙还牙律 387, 406
- Learning theory 学习理论 291
- Lines model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透镜模式和个体差异 253 ~ 254
- Levels of human existence 人类存在的等级 102 ~ 104
- Libido 里比多 345, 349
- Life instinct 生的本能 359, 382
- Local independence 地区独立 184
- Logical subordination 逻辑从句 179
- Logic and language 逻辑和语言 44 ~ 45
- Looking-glass self 镜中自我 274, 421
- Lost object 丧失对象 378
- Love 爱 72 ~ 74, 140, 356; for parents 对父母的爱 42 ~ 43, 407; for peers 对同伴的爱 73, 407
- Low-maturity boys description of 成熟程度低的孩子, 的描述 251 ~ 252
- Lust dynamism 欲望的动力 74

M

- Magic 巫术 102, 281; developmental basis of 的发展基础 76, 267,

381

Magnetism in treating hysteria 治疗歇斯底里症(癔病)的通磁术 319
~ 320

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 恶意的转化 72, 125, 415

Manifest content of dreams 梦的明显内容(显梦) 342

Manual construction for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的记分手册
编制 234

Mastery: as master motive 控制:作为主导动机的 419; need for 的需
要 400, 409; as task of ego 作为自我的任务的 359; through active
repetition 通过积极的重复 357 ~ 358, 363, 374 ~ 375, 384 ~ 385,
393, 404, 406

Mature science 成熟的科学 300 ~ 304; criterion for 的标准 304

Meaning, striving for 意义, 为意义而奋斗 60, 131, 307, 310, 420

Meaning-reorganization view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意义重组观
61

Mechan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发展的机械方法 29 ~ 30, 36 ~
40; assumptions of 的假设 36; vs. organismic approach 对发展的有
机方法 36 ~ 40

Megalomania 夸大狂 75 353

Melancholia 抑郁症 355

Mental age 心理年龄(智龄) 57, 164 ~ 165, 168, 176

Mental degeneration 心理退化 321, 324, 341; opponents of concept 对
立的概念 330

Mental health, criteria for 心理卫生, 的标准 147 ~ 148

Mesmerism 麦斯麦术 320

Metapsychology 心理玄学 332 ~ 333, 367, 369 ~ 370, 377, 379, 386

Method clinique 临床法 439, 445

Milestone sequences of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的里程碑序列 26

- ~ 27; definition of 的界定 55; model for 的模式 167, 172; and polar variables 和极性变量 208 ~ 209, 256
- Mind-body problem 心身问题 63, 441 ~ 445
-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 明尼苏达多重人格调查 190
- Mobile equilibrium 灵活性平衡 59
- Monism 一元论 193
- Monolithic theories 整体理论 418 ~ 420
- Monotonicity 单调 207 ~ 209
- Moral character, stages in development of 道德特征, 的发展阶段 116 ~ 118
-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 3, 25, 119 ~ 122, 122 ~ 124; assessment of 的评价 218 ~ 222; and conception of rules 和规则的概念 80 ~ 85; criticism of measurement and theory of 对道德发展的测量和理论的批评 225 ~ 256; and ego development 和自我发展 109, 122, 124 ~ 440 ~ 441, 448; empirical findings of 的经验主义发现 124, 244; Hebrew and Greek conceptions of 的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的概念 277 ~ 279;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的方法论问题 122; specific models of 的特性模式 244 ~ 248; stages of 的阶段 120 ~ 122, 284 ~ 287; substages of 的亚阶段 196; theory of 的理论 43 ~ 44; trait models of 的特质模式 248 ~ 250; 参见 Ego development; Moral growth; Moral judgment 自我发展; 道德发展; 道德判断
- Moral dilemmas 道德两难推理 43; in assessment of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评价中的 119, 438 ~ 439; in assessment of responsibility level 责任心水平评价中的 448 ~ 451
- Moral evolution related to conceptual and social evolution 道德发展与概念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281 ~ 282
- Moral growth 道德成长 276, 289; stages of 的阶段 289; tendencies

- of 的倾向 137 ~ 138; 参见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judgment 道德发展; 道德判断
- Morality 德性; 见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
- Moral judgment 道德判断 43; assessment of 的评价 79 ~ 80; comprehension test of 的理解测验 221; sequences of 的序列 83; 参见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growth 道德发展; 道德成长
- Moral maturity 道德成熟; 见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
- Moral maturity score 道德成熟的评分 220
- Moral realism 道德现实主义 81
- Moral reasoning 道德推理; 见 Moral judgment 道德判断
- Moral values 道德价值 43, 330, 335, 368; period in assessment of 的评价阶段 243
- Mores 道德态度 275
- Mother-infant unity 母婴一体化 380
- Motivation 动机 308 ~ 309; for growth 的发展 131 ~ 132, 139 ~ 142; and self-actualization 和自我实现 139 ~ 142
- Motivational profile 动机测验图 212 ~ 214; quantification strategy of 的量化策略 212; scoring algorithm of 的记分算法 213
- Mourning 哀痛 355
- Multiple personalities 多重人格 326
- Multiple possibilities, recognition of 多重可能性, 的重新认识 19, 128 ~ 129
- Mutual love 互爱 409; and evolution of conscience 和良心的发展 408 ~ 409
- 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 82, 408 ~ 409

N

- Naive instrumental hedonism 朴素的工具主义的享乐主义 120, 415

- Narcissism 自恋 353 ~ 356, 381, 416, 419; and evolution of conscience 和良心的发展 377, 383, 400, 403; in parental love 父母的爱的 353 ~ 354
- Natural epistemology: determining stages of 自然认识论: 的决定阶段 444; stages in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阶段 411 ~ 445
- Needs, hierarchy of 需要, 的层次 139 ~ 140
- Negation, concept of 否定, 的概念 178
- Neur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神经病学和精神分析 316 ~ 318
- Neurone theory 神经元的理论 268 ~ 269, 317 ~ 318
- Neurosis; inner conflict as basis for 神经症: 以神经症为基础的内部冲突 63, 335 ~ 337, 385; mechanisms of 的机制 383; purpose of 的目的 345 ~ 346, 349 ~ 350; regression in 的退化 381; symptoms of 的症状 344 ~ 345
- Neurotic anxiety 神经症焦虑 89; as a misnomer 作为一种用词不当的 61
- Neurotic styles 神经症风格 191
- Neutralization 中立化 367
- Normal science 正规科学 300 ~ 303
- Novelty child's attraction to 新奇, 儿童对新奇的追求 296 ~ 297, 299
- Nuclear conflicts 核心冲突 78 ~ 79, 171

O

- Object cathexis 对象性发泄 383; 参见 cathexis 精神投入
- Object constancy 物体守恒 15, 177 ~ 178, 296 ~ 297
- Object permanence, development of 对象常性, 的发展 15, 42 ~ 43, 177 ~ 178, 296 ~ 297
- Oedipus complex 恋母情结 344, 349, 377; discovery of 的出现 316, 337; extended meanings of 的扩展的意义 381; identification as solu-

- tion to 解决恋母情结的自居 394; and superego 和超我 361, 363, 378, 402
- Ogive rules for scoring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记分的递加规则
- Omissions on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方面的疏忽 231
- Omnipotence, infantile 全能, 婴儿期的全能 75, 85 ~ 88, 353, 381, 383
- Omnipotence, volitional 全能, 意志的 86, 88
- Ontological fallacy 本体论的谬误 256, 418
- Ontological problem of types and stages 类型和阶段的本体论问题 192 ~ 193
- Operations and schemes 运算和图式 298, 310; 参见 Schemes 图式
- Opportunism 机会主义 17, 94, 107, 116 ~ 117, 120, 273
- Organism, concept of 有机体, 的概念, 34, 51; as metaphor for development 作为发展的隐喻的 29 ~ 53; as a structure 作为一种结构的 34 ~ 36
- Organismic approach; and child psychology 有机体的研究方法; 和儿童心理学 40; and mechanistic approach 和机械论的方法 36 ~ 40
- Orthogenetic law development 发展的直生律 58

P

- Pacers 向导 308 ~ 309, 311 ~ 312, 382, 424 ~ 425, 427; conscience as 作为向导的良心 410 ~ 411
- Paradigm(s), scientific 范式, 科学的 300 ~ 304, 315, 342, 371, 392; change of 的变化 302; competing 竞争的 302; conception of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中范式的概念 304; mis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 of 的概念的曲解 304; stability of 的稳定性 302, 306; uses of term 术语的运用 300
- Parapraxes 动作倒错 343, 371

- Parental standards and evolution of conscience 父母的标准和良心的发展 406 ~ 407
- Pattern 模式; 见 Structure 结构
- Peak experiences 顶峰体验 141
- Penis envy 阴茎羡慕 395
- Perception 知觉 140 ~ 147; of reality as a criterion of mental health 作为心理卫生标准的现实的 150 ~ 151
- Permeability 渗透性 307
- Persona 人格面具 349, 351
- Person as analogous with state 个人和国家的类比 277 ~ 278, 290, 422
- Personal constructs, psychology of 个人构念, 的心理学 307 ~ 308; and process of therapy 和治疗过程 151 ~ 155
- Personality, conception of in social evolution 人格, 社会发展中的概念 280, 282
-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ity 人格的发展; 和内在性 31; limitations of formal models in explaining 解释中形成模式的局限性 45; and stability 和稳定性 31; and structural change 和结构的改变 32; and structuralism 和结构主义 40 ~ 53
- Personal unconscious 个人无意识 349
- Personification of inner forces 内部力量的拟人化 277, 422, 442; 参见 Roles, dialogue of 角色, 的对话
- Perspectives, interpersonal 观点, 人际; 见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taking 人际观点采择
- Phobias 恐怖 346, 361
- Physical development, models for 身体的发展, 的模式 57, 162 ~ 170
- Physical principle 物理原则 387
- Play 游戏 146, 357 ~ 358, 375, 393; as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作为一种精神分析技术的 375

- Pleasure principle 快乐原则 6 ~ 8, 357, 382, 385; vacuity of 的空虚 358; 参见 Hedonic calculus; Psychological hedonism 享乐主义的演算; 心理上的享乐主义
- Polar aspects of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的极性问题 56, 137 ~ 139
- Polar variables 极性变量 55 ~ 56, 136, 208; definition of 的定义 55; and milestons sequences 和里程碑序列 208 ~ 209, 256
- Positive mental health 积极的心理卫生 147 ~ 151; criteria for 的标准 148 ~ 150; Problems in concept of 的概念问题 150 ~ 151; 参见 Adjustment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94
- Post-hypnotic suggestion 催眠后暗示 322, 327, 335
- Postulate of one source 源泉的假设 188 ~ 189, 253, 441; alternative hypotheses to 对源泉的可供选择的假设 188 ~ 189, 253 ~ 257
- Practical intelligence 实践的智力 297
- Prägnanz* (pregnancy) 简洁 33
- Precausality, concept of 前因果关系, 的概念 178
- Preconscious 前意识 59, 72, 348, 456
- Prejudiced children 有偏见的儿童 100 ~ 101
- Prejudiced personality; description of 有偏见的人格; 的描述 94 ~ 96; types of 的类型 96 ~ 98
- Presocial Stage 前社会阶段 15, 78, 409, 415
- Primary autocentricity 最初的自我中心 144
- Primary process thinking 主要过程的思想 138, 336, 339, 343, 378, 385, 402
- Problem of universals 普遍性问题 193
- Problem-solving in science 科学中的问题解决 304
- Profile of ego levels 自我水平测验图 209
- Progression through regression 通过倒退的进步 354, 375, 379, 385 ~

386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科学心理学的计划 332 ~ 333, 377

Psychic determinism 心理决定论 327 ~ 328, 334 ~ 336, 371, 389

Psychic energy 心理能量; 见 Energy, psychic; Cathexis 能量, 心理的;
精神投入

Psychic structure, formation of 心理结构, 的形成 5, 288, 354, 377 ~
379, 382, 386, 401

Psychoanalysis; anthropomorphism in - 精神分析: 的拟人说 422 ~ 423;
basic rule of 的基本准则 331, 365; dissenters from 的异议者 347
~ 352; formula of 的程式 369, 379, 382, 384, 391; fundamental as-
sumptions of 的基本假设 388 ~ 389; fundamental terms of 的基本术
语 368 ~ 371; logical structure of 的逻辑结构 315; major discoveries
of 的主要发现 339, 371 ~ 372, 431 ~ 432; origins of 的起源
316 ~ 339; pitfalls in reading 阅读中易犯的错误 314 ~ 315; as a
psychology of normal life 作为正常生活心理学的 342, 366; as a
scientific paradigm 作为一种科学范式 303, 315, 342, 371, 388 ~
391, 393, 431 ~ 432; structural vs. topographical model of 结构的模式
对地形学的模式 358 ~ 359; transition in methods of 的方法的改变
331 ~ 332

Psychoanalytic drive paradigm 精神分析的内驱力范式 342 ~ 347,
354 ~ 355, 370 ~ 372, 431 ~ 432

Psychoanalytic ego paradigm 精神分析的自我范式 356, 374 ~ 395,
431 ~ 432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s, adequacy of 精神分析的解释, 的适当性
389 ~ 390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as decoding 作为译码的精神分析解释
376 ~ 379

Psychoanalytic narrative 精神分析的记叙 389

-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of ego change 自我变化的精神分析理论 425 ~ 426
- Psychoanalytic trauma paradigm 精神分析的创伤范式 334 ~ 337, 342, 431
- Psychological analysis 精神分析 325
- Psychological causation 心理的因果关系 16, 23
- Psychological hedonism 心理的享乐主义 283; 参见 Hedonic calculus; Pleasure principle 享乐主义演算; 快乐原则
-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psychology 心理学的心理测量方法 203 ~ 204, 228, 242, 430
- Psychometric issues 心理测量问题 205 ~ 209
- Psychoneuroses, symptoms of 精神性神经症, 的症状 321 ~ 322, 325, 343 ~ 346
-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精神病理学; 日常生活的 343; of normality 正常状态的 140
-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心理性欲的发展 344 ~ 345, 374, 384; distinguished from ego development 与自我发展的区别 57, 77, 85, 108, 172 ~ 175; models of 的模式 169; relate to ego development 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116, 124 ~ 125, 353; zones of 的区域 169
- Psychoses, regression in 精神病, 的退化 381
-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心理社会的发展 116, 374 ~ 376; crises of 的批评 78 ~ 79; 参见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
- Psychosocial maturity 心理社会的成熟 250 ~ 253
- Psychotherapy; and ego development 心理治疗; 和自我的发展 153 ~ 155, 427 ~ 428; stages in process of 过程的各阶段 151 ~ 152
- Purposive behavior 有目的的行为 283
- Purposive, ego as 有目的的自我 65
- Puzzle-solving; in psychoanalysis 难题解决; 精神分析中的 389, 393;

in science 科学中的 300,304

Q

- Quantification strategy; of Authoritarian Family Ideology 量化策略:权力主义家庭意识的 228 ~ 229; of Defining Issues Test 定义问题测验的 222; of interview 谈话法的 214; of motivational profile 动机测验图的 212; of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的 235 ~ 239
- Quantitative traits, doctrine of 量化的特性,的学说;见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psychology 心理学的心理测量方法

R

- Rapport 关系 319,324
- Reaction formation 反应形成 345,407
- Realistic thinking 现实的思维 71,137 ~ 138,140,149 ~ 150
- Reality and ego development 现实和自我发展 139,378,380
-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 144,357
- Reality testing 现实测验 378
- Reasons and causes 理由与原因 390
- Reciprocity 交互作用 82,120 ~ 121,179
- Reductionism 还原论 63,65,291,361 ~ 362
- Reflective morality 反省的道德 279 ~ 280
- Reflex arc model 反射弧模式 268 ~ 269,287,318,332,370,380, 385; opponents of 的反对者 269
- Reflexive assumptions 反射的假设 132 ~ 133
- Reflexive traits 反射的特质 445
- Reflex patterns 反射的模式 295
- Regression 退化 200,354,381,386; and repression 和压抑 345; in the service of the ego 对自我起作用的 141,145,366

- Relatability 关系能力; 见 Interpersonal relatability 人际关系能力
- Relativism as solipsistic 作为唯我论的相对论 443
- Relativistic thinking 相对思维 129 ~ 131, 443
- Repetition compulsion 反复强制 358, 384, 387; in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智力发展中的 299; 参见 Mastery, through active repetition 通过积极的重复来控制
- Repression 压抑 146; and anxiety 和焦虑 346, 360; contrasted with structure formation 与结构形成对照 382; locus of 的区域 59 ~ 60, 359; pre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的前精神分析概念 338; and regression 和退化 345; and resistance 和抗拒 330, 336
- Resistance 抗拒 330, 332, 336, 385, 423;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有关抗拒的可供选择的解释 348;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分析心理学中的 352
- Response bias 反应的偏见 224
- Responsibility; analysis of 责任; 的分析 446 ~ 447;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446 ~ 452; ethics of 的伦理学 248 ~ 249; feelings of 的感受 21; objective vs. subjective 客观责任对主观责任 81 ~ 82
- Responsibility story test 责任故事测验 449
- Retaliation; desire for 报复; 的愿望 281, 286, 362 ~ 363; as source of conscience 作为良心之源的 265, 406
- Role conception 角色概念 23, 107; stereotyped sex 性别成见 18, 71
- Roles, dialogue of 角色, 的对话 421, 425
- Role-taking 角色采择 43 ~ 44, 405; in ego and moral development 自我和道德发展中的 424; as origin of self 作为自我起源的 288
- Rot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机械学习(死记硬背的学习)和发展 31
- Rules; conception of and moral development 规则, 的概念和道德发展 80 ~ 85, 248 ~ 250; development in understanding of 的理解的发展

106, 178 ~ 179; obedience to 服从规则 18, 248 ~ 249

S

Sadomasochism 施虐—受虐狂 400

Salience of ego development 自我发展的特点 205 ~ 206

Satellization 卫星化 86 ~ 88, 416

Satyagraha 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 376

Saving circularity in test construction 测试建构中的省时循环性 211, 231, 240

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 强化时间表 6

Schema 图式; 见 Schemes; Structure 图式; 结构

Schemes; coordination of 图式; 的协调 296; cultural as source of infantile amnesia 作为婴儿期记忆缺失之根源的文化 146; interpersonal as source of intrpersional schemes 作为人格图式之源的人际图式 375, 386 ~ 388; sensorimotor 感知运动的 76, 81, 83, 269, 295 ~ 299; sensorimotor as source of interpersonal schemes 作为人际图式之源的感知运动 375, 386 ~ 388; transposition of 的转换 375, 386, 参见 Structure 结构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292, 353, 381

Scienc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科学; 的理论发展 299 ~ 304; empirical model of 的经验主义模式 302; teaching by cases 案例教学 391;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的传统概念 299 ~ 300, 302

Scientific paradigm 科学范式; 见 Paradigm, scientific 范式, 科学的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学革命 302, 371; critique of theory of 对科学革命理论的批评 303 ~ 304

Scoring algorithm; of Authoritarian Family Ideology 记分算法; 权力主义家庭意识的 229; for core-functioning 核心功能的 209 ~ 210; of Defining Issues Test 定义问题测验的 222 ~ 224; for highest scored

- sign 最高评分标志的 209 ~ 211; for latent ability 潜能的 211 ~ 212; for modal score 形式记分 210, 218; of motivational profile 动机测验图 209, 213; of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的 215, 231 ~ 232, 235 ~ 236, 239; of tests of moral judgment 道德判断测验的 219 ~ 223; of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for Interpersonal Relatability 有关人际关系的主题统觉测验的 210 ~ 212
- Search for meaning 对意义的探究 60, 131, 307, 310, 420
- Secondary autocentricity 次级自我中心 144
- Secondary gain 次级利益 345
- Secondary process thinking 次要过程的思想 138, 146, 336, 339, 385
- Selective inattention 选择性忽视 60, 72, 272, 310, 312
- Selective thinking 选择性思维 271, 310
- Selectivity 选择性 34; 参见 Assimilation 同化
- Self; attitudes toward 自己; 对自己的态度 148; confusion of with ego 与自我的混淆 445; social origin of 的社会起源 64 ~ 65, 263, 270 ~ 274, 287 ~ 290, 421; 参见 Ego 自我
-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 24, 46, 139 ~ 142, 420; characteristics of 的特征 140; as a criterion for mental health 作为一种心理卫生标准的 149; as master motive 作为主导动机的 418 ~ 419
- Self-analysis, Freud's 自我分析, 弗洛伊德的 333 ~ 334, 371
- Self-Aware level 自我认识水平; 见 Conscientious-Conformist level 良心—遵奉者水平
- Self-awareness 自我认识 19, 30, 46, 436, 438
- Self-conception, stages of 自我概念, 的阶段 441 ~ 445
-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46 ~ 51, 397
- Self-control 自我控制 398, 405
- Self-criticism 自我批评 17, 20, 286, 398
- Self-esteem 自我评价 86 ~ 89, 403, 416, 419

- Self-fulfillment 自我实现 23
- Self-observation 自我观察 379
- Self-Protective Stage 自我保护阶段 16 ~ 17, 78, 94, 409, 415, 418, 455
- Self-realization 自我实现 148, 281, 351; 参见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
- Self-regarding sentiment 自重情操 148, 286, 290, 419
- Self-rejection 自我拒绝 20, 404
- Self-system 自我系统 60, 69 ~ 72, 309, 419, 423; development 的发展 171 ~ 172
- Sensorimotor schemes 感知运动图式 76, 81, 83, 269, 295 ~ 299; coordination of 的协调 296; as source of interpersonal schemes 作为人际图式源泉的 375, 386 ~ 388
- Sensorimotor stages 感知运动阶段 296 ~ 297
-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造句测验 215, 230 ~ 238; categorized manual of 的类别手册 232; construction of scoring manual of 的记分手册的编制 231 ~ 238; contributors to scoring manual of 的记分手册的撰稿者 230n; exemplar manual of 的样本手册 232; rationalized category manual of 理性类别手册, 232; reverse manual 的可逆手册 215; uses of in different cultures 在不同文化中的运用 452
- Sentiment; definition of 情操; 的定义 284; of justice 公正的 406; self regarding 自重的 148, 286, 290, 419
- Sequentia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序列和结构的证实 206 ~ 207, 240, 444 ~ 445
- Sex-role identification 性别角色自居 394
- Sexu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性欲发展, 的阶段 345, 参见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心理性欲发展
- Shadow 阴影 349

- Shame 羞愧 78, 111, 117, 398, 404, 409
- Signal theory of anxiety 焦虑的信号理论 361
- Significant symbol 有意义的符号 287 ~ 288
- Signs of ego levels 自我水平的符号 15 ~ 28, 183 ~ 187
- Situation-specific view 情境特征观点; 见 Specific view 特征观点
- Social behaviorism 社会行为主义 287 ~ 289
- Social character 社会特征 91
- Social desirability 社会性愿望 18, 224
- Social interest 社会兴趣 9, 348, 419
-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4, 249
-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 社会学习理论 420 ~ 421
- Society as artificial 作为人为的社会 65, 278
- Sociocentric perception 社会中心知觉 145
- Socius 64 同伙
- Somnambulism; and hypnotism 梦游; 和催眠 320; types of 的类型 325 ~ 326
- Species concept and typologies 种的概念和类型学 190 ~ 191
- Specilicity, doctrine of 特性, 的学说 62, 189, 242 ~ 245
- Specifist view 特性观点 254 ~ 255; proponents of 的倡导者 246 ~ 248; studies supporting 支持特性观点的研究 245
- Sphincter morality 括约肌道德 16, 403
- Spontaneity; capacity for 自发性; 的能力 140;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和人格发展 91 ~ 92
- Spontaneous activity 自发活动 48
- Spontaneous striving for development 为发展而进行的自发奋斗 8 ~ 9, 77 ~ 78
- Stability 稳定性; 见 Ego stability; Equilibration; Equilibrium; 见自我稳定性; 平衡; 平衡

- Stages; concept of 阶段;的概念 14 ~ 15, 41, 54 ~ 56, 298, 444; continuity of 的连续 207;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ies in defining 定义中方法论的困难 183 ~ 187; order of 的序列 206 ~ 207;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的哲学问题 191 ~ 194;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descriptions of 的建立描述的过程 198 ~ 199, 444; and types 和类型 11, 54 ~ 57, 105
- Stages of ego development, description of 自我发展的阶段, 的描述 15 ~ 28; 参见 *individual stages* 各个体化阶段
- Stanford-Binet test 斯坦福—比纳测验 164
- State as analogous with person 国家和个人的类比 277 ~ 278, 290, 422
- State-trait theories 状态—特质理论 246, 246
- Stereotypes, tendency to 定型, 的倾向 18 ~ 19, 97, 144 ~ 147
- Stereotypes, formation of 定型, 的形成 71
-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ment 发展中的结构变化 32, 374 ~ 375, 377 ~ 386
- Structuralism 构造主义 29 ~ 53, 386, 423 ~ 425; French school of 的法国学派 49 ~ 50;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和人格发展 40 ~ 53; and subjectivity and freedom 和主观性与自由 46 ~ 51; Titchenerian 铁钦纳派的 60, 267 ~ 268; units of analysis in 的分析单位 47; 参见 *Organismic approach* 有机体的方法
- Structural principle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结构原则 386
- Structur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结构理论; 的发展 423 ~ 425;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 62, 359, 422
- Structure; as aspect of ego 结构; 作为自我一个方面的 60 ~ 62; characteristics of 的特征 32 ~ 33; concept of 的概念; 51 ~ 52; meaning of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中结构的涵义 62, 422; in perceptual domain 知觉领域中的 33

- Style of life 生活风格 9,348
- Subjectivity 主观性 46 ~ 52; of feelings 情感的 438; of thoughts 思维的 436
- Sublimation 升华 345,367,377
- Substages 亚阶段 196 ~ 199,207
- Subtypes 亚类型 196 ~ 199;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的方法论问题 198; reality of 的现实性 199
- Suggestion and suggestability 暗示和暗示感受性 318 ~ 328 各处
- Superego 超我 62,273,359,377 ~ 379,381,383,391,399 ~ 402; and Oedipus complex 和恋母情结 361,362,378,402; origins of 的起源 377,400 ~ 401; 参见 Ego ideal; Conscience 自我理想;良心
- Superiority, striving for 优越,追求优越 9,419
- Superstition, developmental basis of 迷信,的发展基础 76,102,106
- Survey of Ethical Attitudes 道德态度的调查 249
- Symbiotic Stage 共生阶段 15 ~ 16,78
- Symbolic gesture 符号性手势 287 ~ 288
-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象征性表征,的精神分析概念 76
- Symbols; in psychoanalysis 象征;精神分析中的 76,376 ~ 379; significant 有意义的 287 ~ 288
- Sympathy 同情 263,272,290,419,421
- Syndrome concept and typologies 综合症概念和类型学 190 ~ 191
- Synthetic function of the ego 自我的综合功能 5,310,380,385,423
- System 系统;见 Structure 结构

T

- Tabula rasa 白板 36
- Teleology of the subject 主体目的论 376 ~ 379

- Tendencies, hierarchy of 倾向, 的层次 327
- Tendentious apperception 有倾向的统觉 9, 310
- Tension between psychic systems as condition for ego development 作为自我发展条件的精神系统之间的张力 382 ~ 383
- Tension-reduction model; of drives 紧张减弱模式, 内驱力的 367; of pleasure 快乐的 143; 参见 Pleasure principle; Reflex arc model 快乐原则; 反射弧模式
-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主题统觉测验 108; achievement themes in 的成就主题 452; as meas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ability 作为人际关系测量的 210 ~ 211
- Therapy and ego development 治疗和自我发展 153 ~ 155, 426 ~ 428
- Thermo dynamics as a source of psychoanalysis 作为精神分析一个源泉的热力学 337 ~ 338
- Thinking modes of 思维, 的模式 138
- Time-and-tide theories 岁月理论 420 ~ 421
- Toleration; for ambiguity 容忍; 对模棱两可的 23, 140, 418;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对个体差异的 409
- Trait(s); contrasted with types 特质; 与类型的比较 189; measurement of 的测量 204; models of moral development 道德发展的特质模式 248 ~ 253; models vs. structural models 特质的模式对结构的模式 256 ~ 257; perception of 的知觉 20; theory of 的理论 204
- Transference; cures in hypnosis 移情; 催眠中的治疗 371; neuroses 神经症的 344, 383; in non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非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 319 ~ 320, 324, 348, 351 ~ 352, 371; i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 331, 336, 338, 346, 358, 377, 385; uses of term 术语的运用 383
- Transition from Conformist to Conscientious Stage 从遵奉阶段向良心阶段的过渡; 见 Conscientious-Conformist level 良心—遵奉水平

- Transition from Conscientious to Autonomous Stage 从良心阶段向自主阶段的过渡;见 Individualistic level 个体化水平
- Transition from Impulsive to Self-Protective Stage 从冲动阶段向自我保护阶段的过渡 415
- Transition from Self-Protective to Conformist Stage 从自我保护阶段向遵奉阶段的过渡 416,456
- Transitions in development 发展中的过渡 14,207,298 ~ 299
- Transposition of schemes 图式的转换 76,375,386 ~ 388
- Trauma; and anxiety 创伤;和焦虑 360; childhood 儿童期的 335 ~ 336,345,377; economic definition of 的经济的定义 344; sexual 性的 326,329,333 ~ 336
- Trauma paradigm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创伤范式 334 ~ 337, 342,431
- Traumatic fixed idea 创伤的固定观念 327,344
- Traumatic paralyse 创伤性麻痹 321 ~ 322
- Trieb* 347,368 参见 Drive
- Types; concept of 类型;的概念 189 ~ 191;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的哲学问题 191 ~ 194; reality of 的现实性 199; and species concept 和种概念 190 ~ 191; and stages 和阶段 11,54 ~ 57,105; and syndrome concept 和综合征概念 190 ~ 191; and universality of 的普遍性 195 ~ 199; validity of 的效度 193
- Typologies 类型学 56 ~ 57,91 ~ 105,189 ~ 191

U

- Umwelt 一体化 51
-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无条件的积极注意 312
- Unconscious 无意识 339 ~ 340,342,346,383,411; and behavior 和行为 62,64,335; forces 的力量 332; non-Freudian conceptions of 的